

是勇敢还是鲁莽？
是英雄还是叛徒？
充满争议的一生原本就是一个传奇！

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

与魔鬼的交易

[英] 拉斯洛·勒布 著
范宸 译

一个人从大屠杀中挽救了上千人的“辛德勒”式故事
2008年被BBC制作成“最具震撼力的纪录片”
被《泰晤士报》评为“二战中最离奇的故事”
译成11种语言，发行150万册



新世界出版社

我曾和勒布合作写过《布达佩斯之战》，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热情、正直、有激情的人，看完本书后，我的这种想法更强烈了。

——英国著名学者 克里斯蒂安·阿格瓦瑞

勒布的故事有时甚至是令人心碎的……它充满感情地讲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卡斯特纳是二战期间拯救犹太人最多的人，历史却没有完全承认这一功绩。

——英国《周日商业邮报》

或许是大屠杀幸存者的缘故吧，拉斯洛·勒布的书注定和其他相关题材的作品不同，更加真实，更有感情，也不失事实依据。

——约翰·卢卡奇 《纽约书评》

二战是全世界的灾难，对匈牙利的犹太人来说更是如此，感谢拉斯洛·勒布教授公正地告诉了我们历史的真相。

——《匈牙利民族报》

拉斯洛·勒布为人严谨，而本书还原了历史真相，并借鉴了大量的史书，可以作为二战时期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法国《自由报》

与魔鬼的交易

上架建议：历史·纪实

ISBN 978-7-5104-1043-7



9 787510 410437 >

定价：38.00元

Dealing With Satan

与魔鬼的交易

是勇敢还是鲁莽？

是英雄还是叛徒？

充满争议的一生原本就是一个传奇！

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

【英】拉斯洛·勒布 著
范宸 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魔鬼的交易：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 / (英) 勒布著；范宸译.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 6
ISBN 978-7-5104-1043-7

I. ①与… II. ①勒… ②范… III. ①长篇小说 - 英国 - 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7256 号

Dealing with Satan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2008 by Jonathan Cape. REZSŐ KASZTNER © Ladislaus Lob 2008

北京版权保护中心外国图书合同登记第 01 - 2010 - 2891 号

与魔鬼的交易：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

出版策划：精典博维

作者：[英] 拉斯洛·勒布

译者：范宸

责任编辑：陈黎明

装帧设计：博雅坊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行部：(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印刷：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87 × 1092 1/16

印张：16.25

字数：182 千字

版次：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04-1043-7

定价：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 6899 8638

致 谢

和大多数出版物一样，如果没有得到很多人的鼎力相助，本书无法得以问世。特此，我要向以下个人及机构致以最深的谢意：

向苏希·卡斯特纳致谢，因为她慷慨地与我分享了她父亲的故事；向苏希的女儿梅拉夫、米切尔以及克伦致谢，因为她们欢迎我了解她们祖父所做的事；向苏希的堂兄伊扎·卡特赛致谢，因为他通过明晰的表述使我更加了解他叔叔的生平与工作。

向纽约的欧根·梅耶致谢。他的母亲曾怀着他被关在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他坚定了我对卡斯特纳进行客观评价的决心——正如他在59岁去世时未完成的那部遗著中试图要做的那样；向欧根的女儿达芙妮和他的遗孀玛西亚致谢，因为她们对我的课题有浓厚的兴趣。

向以色列学者耶胡达·鲍尔、施罗墨·阿龙森、耶奇姆·韦茨及阿莱·巴尼亚致谢，因为我占用了他们宝贵的时间并听取了他们专业的意见。

向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纪念馆的托马斯·拉赫、克劳斯·塔特兹勒、贝恩德·霍斯特曼、卡琳·希利及斯特法妮·布力布致谢，因为他们欣然向我提供了相关的记录与信息；向埃塞克斯大学的赖纳·舒尔泽与位于下萨克森的纪念基金会的温福莱特·维德曼致谢，因为他们允许我利用纪念馆的相关资源；向阿克赛尔·勃兰特与伯特伦·博克斯伯格致谢，因为他们允许我



引用纪念馆中保存的的访谈资料。

向受难者纪念馆、邵尔基金会、匈牙利犹太人纪念博物馆、犹太人研究中心（YIVO）、康涅狄格大学的口述历史中心以及战争博物馆致谢，因为它们为我提供了重要的档案资料。

向幸存者肖莎娜·哈森、佩雷茨、诺尼卡·雷维茨、塔玛·亚伯拉罕、茱蒂特·马凯、阿瑞拉·迈尔、娜奥米·赫斯科维茨、李·弗斯特、玛吉特·范德里奇及米亚姆·索末菲致谢，因为他们在以色列接待了我并向我讲述了他们在集中营的经历。

向我在海法的继兄弟大卫·科恩致谢，因为他为我提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建议。

向海法的维克多与米琪·哈尔尼克致谢，因为他们不辞辛劳地为我提供了我需要的实际上与道义上的所有支持。

向纽约的盖伦·罗斯致谢，因为他在摄制关于卡斯特纳纪录片的同时慷慨地回答了我的所有问题。

向兰登书屋的维尔·苏尔金、伊拉·阿尔弗雷及艾莉森·亨尼斯致谢，因为他们使本书得以出版。

向凡妮莎·米切尔致谢，因为她为我进行了详尽而细致的审稿。

向我坚忍的妻子希拉致谢，因为她不顾我的抗议始终不断地为我手稿中的不足进行指正。

我要对他们所提供的帮助报以最诚挚的谢意，并对那些我没能充分利用的部分，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歉意。

拉斯洛·勒布

2007 年于布赖顿

前言

1944年7月9日,在我过完11岁生日的两个月后,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大门终于在我的身后关闭了。五个月后,二战硝烟依旧弥漫,我横穿边界来到了中立国——瑞士。此时的纳粹德国正在遭受着同盟国的围攻,离我远去的集中营变成了人间炼狱,而我正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一望无垠的雪山中的日内瓦湖,虽然饥寒交迫,但我仍然活着并且很安全。我并非独自一人,而是1670个来自匈牙利的犹太人中的一员。我们是被一个和纳粹做交易的叫卡斯特纳的匈牙利籍犹太人解救出来的,交易的另一方则是大屠杀的策划者之一——阿道夫·艾希曼。事实上,卡斯特纳曾经救出了很多犹太人,不过十年来他一直因与纳粹合作而饱受谴责。

作为二十世纪的现代、民主的国家,以色列的一名法官审判了卡斯特纳,罪名是“将灵魂出卖给了撒旦”。虽然最高法院最终推翻了那名法官的审判结果,但此时的卡斯特纳已经死了。在大屠杀中营救过同胞的所有犹太人之中,卡斯特纳是营救人数最多的人,他却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街道上被一个极端犹太黑帮组织杀害了。

此事的反响远远超过了私人领域。这一议题深深地扎根于以色列的



政治生活之中，由此引发的激烈的争论震撼着这个年轻国家的根基。审判标志着当时的以色列开始渐渐地走上了右倾路线，这也决定了中东的历史进程。

时至今日，卡斯特纳仍然是一个富有争议的人物。一些人认为他是叛徒，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英雄。本书相信最高法院对卡斯特纳所做出的审判更加趋近真相。本书讲述了一个勇气和智慧并存的男人与纳粹党抗衡并从大屠杀中救出数以千计的生命的故事；本书讲述了在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即将变成人间炼狱之前被卡斯特纳救出的那1670个匈牙利籍犹太人是如何得以幸存的；最后，本书还讲述了一个在卡斯特纳的帮助下才能够在大屠杀中死里逃生并茁壮成长的小孩的故事。

本书是第一本通过详尽、全面的叙述将这三个故事结合在一起的著作。因此，本书的内容集中为三个主题，即卡斯特纳在匈牙利、德国、瑞士与纳粹党进行的谈判，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中“卡斯特纳团体”的日常生活，以及对卡斯特纳在以色列的审判与暗杀。目前已有的著作要么着重叙述卡斯特纳与纳粹进行的谈判，要么着重描写对他的审判与暗杀，而我要用同样浓厚的笔墨向读者展现我们在集中营等待他来营救我们时的亲身经历。

我们对与卡斯特纳有关的事情不再一无所知。那些事情从一个视角到另一个视角，从深层到浅显地在书籍、文章、章节之中被讨论着，做这些工作的大多是一些以色列学者。那些事情同样也会出现在许多报纸与网上评论之中，其中，有些内容客观严谨，有些则庸俗偏颇。我试图要摆脱那种完全新闻或者完全学术的模式。虽然我希望历史学家、律师和政治学者觉得我的那些论点能够令人信服，不过我的最终目的还是用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向广大读者进行准确而客观的叙述。在全书中，我都在试图避免虚

假的修饰,避免虚构事实,避免脱离我的原始资料。本着“是什么,说什么”的原则,我力图展现出最真实的卡斯特纳。

作为一个年仅11岁的孩子,我当然无法完全理解我们在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时发生的事,却能注意到很多事情并牢牢地记住。为了填补我记忆中的空缺,为我儿时那幼稚的记忆增添一些更加成熟的观点,我拜访了许多幸存者,并参阅了以色列、美国和德国档案馆中大量未发表的回忆录、自传和访谈。

关于卡斯特纳与纳粹党进行的谈判,我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他在战后不久撰写的一篇报告,那篇报告最终在德国以《卡斯特纳报告》为题得以出版。虽然这篇由他小心谨慎写就的报告试图在他自己的问题上展现出最佳的一面,但这同时也是描述他如何与纳粹合作(或者更应该说是对抗)的不可或缺文献。

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本书的结构。第一章是关于我在特兰西瓦尼亚的一个反犹太人的小镇的童年记忆,第二章描述了我匈牙利大屠杀背景下的详尽的记忆,接下来的章节则反复穿插在两个故事之中。我住在科罗日瓦的犹太人区不久便进入了卡斯特纳的“救济与营救委员会”以及他与希特勒谈判的第一阶段,接着我们便离开布达佩斯来到了卑尔根-贝尔森。卡斯特纳与纳粹持续进行的博弈影响着我们在集中营中的日常生活,并最终使我们获救后来到瑞士。接下来的叙述转向了日内瓦和纽伦堡,在这两个地方,卡斯特纳度过了战后头三年的大部分时光。最后,本书将笔触放在了对卡斯特纳的审判以及在以色列遭到的暗杀。

卡斯特纳不得不面对糟糕的处境,解决进退两难的问题。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耐性去花费大量的时间思考他要做的事情是否会得到大众的认可。看到那些正处于痛苦的深渊之中的生命,他便竭尽所能、毅然决然地

目 录

**第一章 反犹太人群中的犹太小孩** 1

特兰西瓦尼亚的小镇 1

我的家庭 6

反犹太主义 11

第二章 匈牙利的大屠杀 15

黄金时代 15

衰 落 17

灾 难 21

犹太委员会 27

第三章 科罗日瓦隔离区 31

恐怖的砖厂 31



一次没有目的地的旅程	34
------------------	----

第四章 迈开最初的步伐

39

救济难民	39
------------	----

开局策略	43
------------	----

第五章 “生命卡车”

49

“布拉德任务”	49
---------------	----

在伊斯坦布尔的惨败	52
-----------------	----

第六章 残酷的任务

57

卡斯特纳的双面性格	57
-----------------	----

“诺亚方舟”	61
--------------	----

伞兵事件	72
------------	----

斯特拉斯霍夫群体	75
----------------	----

第七章 从布达佩斯到卑尔根 - 贝尔森

79

运牛卡车上的生活	79
----------------	----

奥斯皮辛还是奥斯维辛?	82
-------------------	----

令人尴尬的林茨之旅	84
-----------------	----

恐怖的代名词——贝尔森	87
-------------------	----

幸运还是不幸?	92
---------------	----

第八章	特权集中营中的生活	101
	不同的待遇	101
	自 治	112
	难得的文化活动	117
	错综复杂的宗教信仰	124
	铁丝网综合症	129
	8 月的名单	134
第九章	艰难的谈判	139
	临时协议	139
	无法兑现的承诺	146
	真正的结果	152
第十章	从卑尔根 -- 贝尔森到瑞士	163
	如坐针毡	163
	获 救	168
第十一章	集中营解救行动	175
	慎重的细节处理	175
	伟大的时刻	182
第十二章	战后事宜	187
	正名之争	187
	卡斯特纳的宣誓书	192



备受争议的比彻	194
---------------	-----

第十三章 审判

205

悲剧开始	205
诉讼升级	209
致命一击	212
判 决	219
不公的审判	224
上诉及之后	234

第十四章 时势造英雄

241

第一章 反犹太人群中的犹太小孩

特兰西瓦尼亚的小镇

6岁时，我第一次有意识地感受到了反犹太主义。一个大约十八九岁的匈牙利人正在位于北特兰西瓦尼亚的、我们居住的小镇上闲逛，以“哈提克瓦”的曲调嚎唱着粗鄙、下流的歌曲（“哈提克瓦”在那时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圣歌，现在则是以色列的国歌）。那时，我没有听清所有的歌词，不过我现在仍然能够回忆起零星半点：“血淋淋的犹太人，臭烘烘的犹太人，滚到巴勒斯坦吧……”我当时还在怀疑那家伙是不是疯了？是不是应该有人逮捕他？但什么都没发生。

那是1939年。北特兰西瓦尼亚曾经属于奥匈帝国的一部分，而从1920年签订《特里阿农条约》（一战后用以划分世界秩序的条约）起，这里又成了罗马尼亚的领土。1940年，也就是二战开始的第二年，希特勒强令罗马尼亚人将此地归还给他的匈牙利盟友。那些飘扬在公共场所和私人



住宅的红黄蓝相间的罗马尼亚国旗迅速被替换成了白绿相间的匈牙利国旗，接着，匈牙利的军队便以胜利者的姿态驶入了这里，得意扬扬。1944年3月19日，德国人占领了匈牙利。虽然两国仍是盟友，他们却一起输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由于苏联的慷慨，北特兰西瓦尼亚再次被分摊给了罗马尼亚。

1920年至1940年，这里的大部分居民都是匈牙利人，他们憎恨罗马尼亚的统治。而从1940年开始，仍然是少数群体的罗马尼亚人反过来痛恨匈牙利人的政权。今天，罗马尼亚人的群体不断扩大，据说这两个群体正在试图和平共处。这个美好的愿望或许会实现，我不禁想起了匈牙利人与罗马尼亚人忘记彼此仇恨的唯一的一段时间，也就是他们忙于憎恶犹太人的那些日子。对生活在特兰西瓦尼亚的犹太人来说，受制于罗马尼亚人的生活虽然并不舒坦，不过至少还可以忍受。在匈牙利人接管这片土地之后，他们的日子却变得更加艰难。而当德国占领匈牙利时（包括特兰西瓦尼亚），迎接他们的是最惨重的灾难——这两个盟友迅速联合起来，完成了大屠杀的最后一幕。很多年过去后，当那些从大屠杀中幸存的犹太人回到这片土地的时候，他们还是一样不受欢迎。

我于1933年5月8日出生在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的首府科罗日瓦，也就是今天的罗马尼亚的克卢日。我是伊兹索·勒布与佐兰·勒布的独生子，我们生活在位于科罗日瓦西北方向大概150公里之外的小镇——马吉他。在1944年3月之前，马吉他大概有8600个居民，其中有2600个是犹太人。而到了1944年5月中旬，这里就只剩下了6000人了，一个犹太人都没了。大屠杀之后，那2600名犹太人中大概有400人得以幸存，但鲜有人愿重新回到那些不友好的邻居之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促进了马吉他的新兴产业的发展的同时，还见证了那些臭名昭著的豆腐渣工程代替原有的乡村建筑的过程。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这里是一个农业城市，四周环绕着麦田、果园、牧场和葡萄

园，街道上没有铺设石砖，夜晚没有灯光。如果天气干燥，街上会沉淀厚厚一层灰尘，而一旦下雨，那些厚厚的灰尘就会变成泥浆，一些马车或者牛车经常会陷入其中，于是我们将这条街称为“泥街”。街道两旁矗立着刺槐与桑树，直接延伸到葡萄园与山坡上的犹太公墓，我的母亲在36岁去世时就被埋在了那里，那时我只有9岁。

每天早上，镇里的牛群都会被驱赶着穿过街道去牧场，晚上便会返回牛棚。那时，我着实着迷于那些母牛饱含奶水的乳房。许多母牛都患上了肺结核病，我的母亲也是死于此病，但她可能并不是被这些母牛传染的。据说，她的裁缝患有肺结核病，而且经常将顾客的衣服摊在床上。当时，食盐销售国家垄断行业，只有那些在一战中负伤的老兵才能得到销售许可证——作为补偿。正因为如此，我父亲才能销售食盐。他的仓库就在主街上，他将一大堆食盐堆在门前，那些路过的奶牛不时会停下来舔一口再继续前进。

马吉他的大多数建筑都是单层的，烟囱上会有一些鹳巢，后院还有一些鸡舍、猪圈、牛棚、水井以及其他乡村设施。我们租住在一幢二层小楼的底层，小楼的主人则住在花园的一间小屋里。当时，我们家相对比较富裕，起码算得上中产阶级，但仍然需要从水井里打水，还要使用室外的卫生间。我们拥有电力（有些不太稳定），不过没有电话或收音机。每天中午，镇里的广播员就会在街上来回地走，伴着鼓声，大声朗读从附近搜集到的新闻，这是我们了解外面的世界的唯一途径。

那时，飞机、汽车和火车对我们那个小镇来说都是稀罕物。如果村庄的上空飞过一架飞机，所有小孩（包括一些大人）都会跑出来仰着头瞭望。至今，我还记得飞机在我的头顶低飞而过时，甚至能够看见飞行员的皮帽和厚厚的护镜。这样的场面着实令我兴奋不已。而汽车比马车少得多，还必须依靠曲柄轴才能够发动起来。这里的火车与公共汽车虽然很少，却是连接这里与外部的唯一交通工具。一米以下的儿童乘坐公共汽车





时可以获得半价的优惠，车门旁有测量身高的标准线。当火车进入到修理区而减速缓行的时候，乘客可以跳到田地里，在火车加速之前摘一堆土豆和洋葱后再爬回车上。后来，由于一些火车的车门被封上并有警察守卫，火车上的乘客就再也不能跳下去了。

犹太人生活在镇里的每个角落，但主要集中在主街（或百丽大街）附近，并一直延伸到百丽村。沿着两侧长满罂粟与紫罗兰的麦田走上半个小时去百丽，是我记得的早期探险之一。市场和牲畜围场在镇里的另一端，同样在百丽大街附近。

这里有一座为主流犹太社区提供服务的犹太大教堂。它建于 19 世纪 60 年代，并于 1910 年得以扩建。除此之外，镇里还有一座为犹太锡德派会众提供服务的教堂比犹太大教堂稍微小点。教堂不仅具有宗教的作用，还是人们交流的理想地方，他们经常会在祷告的时候谈谈自己生意上的事。同时，这里还有一个净身地。信徒们会在此进行浸礼仪式，在犹太逾越节薄饼（逾越节期间犹太人吃的一种不发酵的硬面饼）店中，人们可以买到节日期间需要的面包。在犹太儿童宗教学校中，许多犹太小孩会接受宗教培训。但在犹太人被驱逐干净后，这里的大教堂就变成了一座仓库，锡德派教堂则变成了臭烘烘的牛棚。

不仅如此，这里还有三个基督教堂。天主教堂和归正教堂建于 18 世纪，教堂外部是黄褐暖色，顶部有这一地域的标志性塔尖。东正教堂则出现于 19 世纪，顶部是巨大的银色圆屋顶。二战结束后，当我再次回到马吉他时，这三座基督教堂仍然矗立在那儿，并且外观依旧，犹太大教堂、锡德派教堂和净身地却消失了。我询问过很多人，但好像没一个人知道原因。后来，经过我的多方打听，终于知道它们是 1977 年被推倒了。其实这也没什么关系，反正没人需要它了。

马吉他大约 2600 名犹太人能够代表各式各样的匈牙利犹太人。其中，有些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有些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包括左派极端

主义者和右派极端主义者；有些是锡德派人，留着侧边发辫，穿着黑色长衫，戴着宽大的裘皮帽子，他们的妻子被要求剃光头后戴假发。还有一部人（应该说是马吉他犹太人中的绝大部分）对宗教保持着温和的态度。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将自己融入匈牙利的社会与文化之中，但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犹太属性，其主要表现在重要的犹太节日中。最后一类人大多是专职的商人，包括我的父母在内。这类人的子女都是我的朋友，我们几乎和非犹太人没有接触。即使我们被同化了，但我们毕竟与匈牙利人有所区别，并且始终不被他们所接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犹太小孩，有良好的教养。但当我遇到那些粗野的匈牙利农家小孩时，良好的教养和礼貌并不能让我们的日子好过一些，而我偶尔也会参加街上混乱的足球赛。

每逢周六，大部分商店都会停业，街上随处可见去教堂的犹太人。中午，很多犹太主妇捧着装有霍伦特（一道犹太人的豆子菜）、豆子和熏鹅脯的陶瓷锅赶回家里。由于没有人会在安息日做任何事，甚至不会开闭开关或划火柴，所以这些食物从星期五就开始在面包师的炉子里开始慢炖了。而周六下午散步时，年轻的犹太男女会穿上最整洁的衣服聚集在镇中心，分成小组沿着主街闲逛，而男人和女人被严格地划分开了。他们似乎在专心于闲聊，但从他们的眼神来看，他们其实更热衷于互相观察。至于我，我觉得这个游戏实在无聊透顶，于是经常约我的朋友做些有趣的事。

马吉他虽然没有犹太人担任公务人员，不过犹太人在这里一如既往地担任着商业生活与专业工作的领跑者。镇里的2个药剂师和4个执业医师都是犹太人，6个律师中有3个是犹太人。埃米·戈德伯格医生是镇里最有名的人物之一，他既是自己的接待员、秘书，又是自己的实验室技术员，人们经常会看到他乘着双驾马车风风火火地赶到病人家里，却经常忘记向那些穷人收取费用。在商业上，犹太人中有1个地主、2个葡萄酒农、4个批发商、2个银行家、2个烟草商、1个食品杂货商、1个理发师、1





个男服经销商和1个酒商。有些犹太人是宗教社区雇佣的犹太教教士、老师和环切术者；有几个犹太人是个体工匠、裁缝和鞋匠；还有一些犹太人则是劳工、散工，或者没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尤若夫·沃尔纳是当地最富有的人之一，他拥有一间小型鞋厂，还是考特维耶斯大街与百丽大街之间那条巷道周围的大部分建筑的主人。“考塞”是一家知名犹太连锁机构，由尤若夫·克莱恩及其3个儿子费里桑、米克拉斯、拉兹罗共同经营。它下属的犹太餐厅、酒吧、咖啡馆和旅店是镇里最受欢迎的聚集场所，其惬意的氛围和美味的犹太食物甚至吸引了很多非犹太人。

简而言之，直到二战前，马吉他与匈牙利的其他犹太人小镇没什么区别。马吉他的繁荣与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当地的犹太人民，却和其他犹太人小镇一样，在机会来临时面临着死亡。

我的家庭

4岁时，我母亲患上了肺结核病。虽然那时还没有链霉素，但如果我们及时把她送到瑞士疗养院的话，她也许会被治好。遗憾的是，我们既没有钱，又没有机会。因此，她在匈牙利整整卧床5年，并在我9岁的时候去世了。那时，为了不被她传染，我不得不与她保持安全的距离。要是我想和她说话，也只能够站在门口，因为家人不允许我和她有任何身体接触。当时，我们母子都感觉很痛苦，但现在我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因此我想我一定很善于忘记那些不开心的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多年后，我的肺部被发现有些异样。实际上，我已经得过肺结核病了，并且在别人还以为只是感冒、发烧的时候就自行痊愈了。我不知道我是在卑尔根-贝尔



森时还是其他时候患的病，但不管怎样，已经完成没有必要重现当年将我和母亲残忍地隔离开的一幕了。

在母亲去世前不久，我被送到科罗日瓦和祖父、姑姑住在一起，父亲和祖母则留在家照看母亲。一天早上，我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安。就在当天下午，我们收到了一份电报，接着，姑姑告诉我马上回马吉他，因为母亲的病情恶化了。当晚，那列唯一的火车停在了距离马吉他不远的几站外。所有的商铺都关门了，那冰冷、覆盖着厚厚的灰尘的候车室显得比以往更加阴沉。我躺在一条长椅上，紧张得睡不着觉，姑姑告诉我，母亲其实在早上就已经去世了。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不停地哭泣、瞌睡着。黎明时，我们裹上了粗糙的毛毯，乘坐一架马拉雪橇回到了家。那是1942年1月。

我们回到家时，父亲正等着我们，他满脸胡须，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像所有犹太人哀悼者那样深折着衣领。“现在就剩我们了。”我父亲说。当他亲吻我的时候，杂乱的胡须刺痛了我的脸颊。而他向我重复母亲的遗言时，他哭泣了起来。“我很好，”母亲临死时对父亲说，“但你们还要面对艰难的日子。”不一会儿，我母亲哭喊了起来，“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然后便死了。很快，母亲的遗言便得到了验证——或者那只是她冷静的远见。

根据犹太习俗，我们回家后母亲便被下葬了。在她的墓前，我背诵着珈底什（犹太教为死者祈祷时唱的赞美诗）。如今，我已经不记得其他人都做了什么事，但我清楚地记得，我独自在墓地旁的山坡上坐了一整天。

母亲去世多年后，有人告诉我，我曾经不愿意和母亲说话。事实上，我不知道要和她说什么，因为我一直不了解她。在对她不多的记忆中，我记得她最喜欢的两首曲子是托斯卡的《群星闪耀》和皮尔金的《索尔维格之歌》。也许她本质上是一个忧郁的人，不过我父亲经常表扬她是一个机智、镇静的人。两件事可以见证父亲对她的评价。



一次是在母亲生病时。母亲咳嗽得特别厉害，于是父亲请来了两位医生，其中一个医生在床边对另一个医生说：“她快不行了。”母亲缓过气来后说：“哦，医生，我还活着呢，是吗？”那是最后一次有医生在她的床边做出这样的预测。另一次是在母亲与一个小偷搏斗时。母亲总是将一根吸管放在枕边，接下来的场景就像一场闹剧一般——她用吸管猛地将苏打水喷到了那个闯入者的脸上。小偷骂了几句，接着便仓皇而逃。无论那个小偷多么镇静，都无法敌得过结核杆菌。

在母亲生病期间，父亲总是雇用一些当地农妇来做家务。而母亲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小姨莎莉经常会过来陪我们。对我来说，她既像我的姐姐，又像我的第二个母亲。我记得，她不仅将我带到河边，教我游泳，还带我到当地电影院看电影，让我认识了电影中的泰山、劳雷尔、哈代，以及《伊丽莎白女王和埃塞克斯伯爵》中的贝蒂·戴维斯与埃罗尔·弗林。我们还观看了赞颂英勇的长枪党人为保卫托莱多城堡而与共和党人激战的西班牙内战史诗和《大力水手》。看电影时，我们会嗑一些瓜子，能将瓜子放在嘴里而不用手就可以吐出瓜子皮是当时我最引以为豪的事。我的小姨是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一员，曾被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警察逮捕并多次严刑逼问，但从未透露过半点秘密。后来，出于对父母的孝顺，她错过了躲避大屠杀的机会。

我出生时，父亲已经37岁了。19岁时的他结束四年的中学生活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他便志愿参加了奥匈帝国的军队。他的朋友们劝他受点轻伤、手臂上扎上绷带回到维也纳或布达佩斯，因为那里的女孩疯狂地追捧勇敢的士兵。事实上，他的膝盖真的被一颗在《国际法》中是被禁止使用的即达姆弹击中了。接着，他在一片沼地上躺了几天，最后被送到了维也纳的军事医院。父亲没有将手臂用绷带吊起来，身后也没有女孩的追捧。相反，他永远地失去了膝盖骨，带着那条僵腿和一根拐棍度过了余生。庆幸的是，30年后，那颗达姆雷弹头被证明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父亲痊愈后开始做一些买卖，主要做进出口的生意。我记得，他经常出差，有时是和一个被他贿赂的罗马尼亚王子。他会为父亲打开那些通常向犹太商人关闭的大门。贿赂与腐败是当时的东欧经济的一部分，父亲十分清楚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也知道如何将诚实用在关键的地方。有一次，他乘坐火车从匈牙利去罗马尼亚（也可能是从罗马尼亚去匈牙利）。他带着一箱丝绸，希望大赚一笔，能逃避缴税的话就更好了。他将手提箱放到行李架上，手里拿着护照，脸上露出无辜的表情等在那里。海关关员走了过来，想知道手提箱里装的是什麼，父亲的表情显得更加无辜，说：“全是丝绸。”那位关员笑了笑，便径直走了。还有一次，在火车上，父亲凭借自己的机敏与沉着救了我们俩的性命。在二十世纪的匈牙利，出于生存的需要，犹太人非常需要父亲的那种素质，不过巨大的压力会对身体产生很大的伤害。父亲是85岁去世的，实际上，早在很久以前，他的身体就已经变得千疮百孔了。

爷爷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留下了父亲兄妹6人。父亲的3个妹妹（我的姑姑贝拉、斯兹蒂和詹卡）都结婚了，并且有了孩子，据说，另一个姑姑塞丽娜头脑有些不太正常。我的叔叔和爷爷一样，英年早逝，留下了3个女儿和1个儿子。作为伯父，父亲为叔叔的孩子和妻子提供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资助。后来，叔叔一个女儿幸运地搬到了布加勒斯特，并躲过了大屠杀；另两个女儿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中得以幸存；儿子则被抓住，成了奴工。外祖父母桑德尔和艾达·罗森伯格有4个儿女，除了小姨莎莉和母亲，还有2个儿子米特尤和拉杰斯，他们俩在战争爆发以前就移居到了法国，后来便失去了联系。除此之外，我所有住在科罗日瓦的亲戚都死在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中。

在我的大家庭中，没有人接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都可以精通匈牙利语、罗马尼亚语和依地语。他们努力工作，能够识字，擅长算术。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工匠，另一些人则做些小买卖。女人们留在家照看孩子，





并且会不时帮助他自己的丈夫打理一下生意。他们一般都会理所当然地把自己当成犹太人，不会想得太多，不会在安息日工作，喜欢吃犹太教食品，会在重要的节日聚集在犹太教堂里。据我所知，他们遵循那些宗教仪式并不是为了净化自己的心灵，而是风俗使然。我的父母虽然没有那么虔诚，但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们犹太人的身份。即便我们忘了，身边也会有足够多的人来提醒我们。

我儿时的犹太教育与其他小孩相似，正统的教育包括对律法、犹太法典和其他博学评论的基础学习，我却只被教会大声朗读希伯来语的祈祷文和《圣经》上的段落，却不理解其中的涵义。我的老师是一个渴望成为当地犹太高等学校教士的年轻人，会在我朗读得好时奖励我一些糖果，当时，这些糖果总会被认为是上帝给我的奖励。母亲去世时，我已经能够连续一年在犹太教堂一日三次毫不费力地背诵珈底什了。虽然我仍然无法理解那些语言，但那似乎无关紧要。

我有两个“知名”的亲戚。1924年，在芝加哥，两个富有、聪明、无聊透顶的年轻人为了制造一场完美的犯罪而谋杀了一个男孩。他们最终被抓了起来，成为当时刑事审判中最受关注的被告，并被判为终生监禁。受害人年仅14岁，名叫鲍比·弗兰克斯，杀人犯是内森·利奥波德和理查德·洛布，分别为19岁和18岁。后来，利奥波德于1958年被释放，洛布则于1936年在狱中被谋杀了。这件案子为许多小说、戏剧和电影提供了灵感，包括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享誉世界的英国著名导演）的《绳索》。二十世纪早期，我父亲的一个叔叔移民到了美国，之后便和家里失去了联系，但有人说他在芝加哥成了富商。如果真的是这样，理查德·洛布很有可能会是我的第二代堂兄。

很久以后，我另一个知名的二代堂兄也遭遇了同样的不幸。他的名字叫埃米·格拉兹维格，是我的远亲戈尔德的儿子。戈尔德从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得以幸存，她的丈夫斯迈尔也幸运地恢复了自由。他们在大屠杀后回

到了特兰西瓦尼亚，几年后又带着他们的两个儿子埃米和鲁鲁移居到了以色列。1983年，作为教师和退役伞兵的埃米成了以色列“立即和平”运动的领导人之一。2月10日，为了反抗在黎巴嫩的战争以及对萨不拉和夏蒂拉难民营中巴勒斯坦难民的屠杀，他们在耶路撒冷举行了一次游行示威。当时，一名右翼极端分子向示威人群投了一枚手榴弹，导致6人受伤1人死亡，为和平而战的埃米就是那唯一丧生的人。如今，每年在以色列由民权协会举办的埃米·格拉兹维格人权奖就是为了缅怀他而设立的。

讲到这里，我差不多跳跃了半个世纪，所以我必须回到我的童年时代，解释我追寻卡斯特纳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二十世纪中期，每个匈牙利犹太小孩的历史都可以看成一部反犹太主义的历史。下一章将会为您描述一个特别的年轻人的生活。

反犹太主义

和那些在纳粹统治下的大多数犹太人相比，我幸运多了，而我经历的大屠杀简直就是小儿科。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逃过那样的厄运，也许是因为我比较幸运吧，也可能是因为我的经历并没有我现在想象的那么轻松。无论是在犹太人区、牛车和集中营中，我都觉得受到父亲的保护，尽管那只是一种虚幻的感觉。后来，我和父亲从来没有真正讨论过我们那时经历的一切。虽然当时的我如此幼稚，对当时的记忆如此斑驳，但我相信，这些记忆可以帮我去理解匈牙利法西斯猖獗的反犹太主义。

匈牙利军队于1940年9月6日到达马吉希，在主广场上受到了一战老兵的热烈欢迎。100名犹太人戴着勋章，张开双臂欢迎那些匈牙利人。匈





牙利军队的司令斯赞伊上校命令这些犹太老兵在欢迎仪式继续之前离开这里。有人无意间听到我们的一个邻居对一名匈牙利士兵说：“感谢上帝，你们终于来了，我们真不知道要拿这些犹太人怎么办。”第二天，这里便展开了对那些所谓的共产主义者以及勾结罗马尼亚人的大搜捕。那些被逮捕的人中大部分都是犹太人，而那些指控大部分也都是子虚乌有。直到马吉他再也没有一个犹太人，搜捕才暂时告一段落。

1939年9月，6岁的我进了当地的小学。当时，那里还在罗马尼亚人的统治之下，而我还没完成第一年学业，马吉他便成了匈牙利人的“猎物”了。和其他犹太人一样，我的父亲十分重视教育。我在上学之前就会读写了，因此上学时经常获得最高的分数。这或许也应该得益于我的那位善良的女老师，她总是公平地对待班里的每一位学生。

我在那所学校读书的4年里，有时，老师会把犹太小孩和非犹太小孩分开，独立组成一个班级，由一名新老师授课。他是一个刻薄的老师，穿着高到膝盖的黑色筒靴，有着犀利的黑色眼睛，留着部队军官喜爱的那种浓密的黑色胡须，翻领上的徽章是匈牙利国旗的颜色。他总是抓住任何机会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小鬼多么令人讨厌，我们的民族多么肮脏。他不停地告诉我们，罗马尼亚是一张准备吞食匈牙利的大嘴。自从他成了我的老师，我的考试成绩便一落千丈。无论他是真的讨厌我们犹太小孩还是遵从当局的命令，才对我们如此苛刻，这段令人痛苦的生活没有持续很久，因为那里很快就没有犹太小孩可教了。

反犹太主义经常会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这对那些赋闲在家的犹太人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有时，每家人都会被要求在门外挂上红白绿相间的匈牙利国旗，仿佛要庆祝匈牙利曾经参加并输掉的战争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我将我们家的国旗挂在一个小孩跳起来后正好可以拽到的高度。我不记得是不是真的有小孩拽到了国旗，但我敢肯定，一定有人打了我们家的小报告。很快，两个宪兵便冲进了我母亲的房间，喊道：“那个犹太人勒

布在哪？”我母亲当时也不知道我父亲在哪，但他们后来还是把我父亲带去审讯了，并因我“侮辱了匈牙利国家”而罚了一大笔罚金。

还有一次，我的母亲被当成了罪犯。我的母亲是一个十分爱整洁的人，对清洁与卫生有极高的标准。尤其是在我的健康方面，她特别注意，确保定期对自己身边的东西进行消毒，并会将自己的咳痰进行焚烧。尽管如此，有人（或许还是那个因为国旗打我们家小报告的人）还是向当局告密，说那个“犹太女人勒布”凭借她那“邪恶的智慧”故意将细菌传染给四邻。我的父亲作为一家之主再次被送去审判，并且被迫支付另一大笔罚金，罪名是他的妻子试图“毒害匈牙利国家”。

当我们住在“泥街”上一幢二层楼底层时，一名匈牙利公务员全家住到了我们的楼上。我母亲过去时常会在下午感到情绪低落。难以想象的是，那位公务员非但没有告诉他的孩子安静点，反而鼓励他们尽可能地在母亲的头顶上弄出噪音。当我们被移送时，我们不得不将家具和私人物品留在那里，战后，我的一个从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幸存的亲戚去马吉他为我们收拾东西，发现那个公务员全家仍然住在楼上，并将我们的东西占为己有了。起初，他们声称那些东西都是他们的，直到我的亲戚威胁着说要报警时，他们才说了实话，但他们狡辩说，他们是出于人道主义而保护我们的财产。

在我10岁的时候，也就是1943年，我在科罗日瓦与我的祖父母相对稳定地生活着，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我的父亲经常离家在外，处理着反犹太政府归还给他的生意。科罗日瓦是一座大城市，城里有一些整洁的商店、饭店，一个大教堂，一所大学，以及许多中学。与马吉他不同的是，这里的街道既没有灰尘也没有淤泥，让人赏心悦目。我会在街上独自漫步几个小时，将自己想象成无畏的探险者。但不幸的是，我的探险经常会突然结束，因为经常会有一些无赖发现我是犹太人。假如我不能够及时逃离那里，一阵飞石会随即向我袭来。





在科罗日瓦，我成了当地犹太学校的学生。13年前，那所犹太学校曾被罗马尼亚人关闭，却于1940年被匈牙利人重新开放了。到1944年夏天，科罗日瓦已经没有犹太学校了，犹太学生和犹太教师都被赶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毒气室之中。和在马吉他一样，一个繁荣的犹太社区仅在短短几周内便被摧毁殆尽。德国人于1944年3月19日来到这里的时候，这里共有115000人，其中包括16700名犹太人，而在大屠杀后，只有1000名犹太人幸存下来。自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已经失去了两个故乡。

作为一个孩子，我对德国占领匈牙利之前对特兰西瓦尼亚的人民实行的残酷镇压印象并不深刻，也没有太大的痛苦。我在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里成长，总是试图忘记那些不快，不过那些反犹太主义的谩骂声不断回荡在我的耳边，使我难以忘记那些痛苦。很难想象一个简单的单词“犹太人”从我们那些匈牙利同乡的嘴里说出是多么恶毒，时至今日，当我听到这个单词时，我仍然会想起它的一成不变的修饰语“臭烘烘的”。“臭烘烘的犹太人”不仅是我们的出门时经常会听到的习惯用语，还是使我们变成那些非犹太人眼中令人作呕的次等人种的习惯用语，更是那些使我们的敌人对我们进行羞辱、掠夺，甚至屠杀而不会感到不安的习惯用语。

1944年3月19日之前，我对于反犹太主义的经历并没有让我为接下来的大屠杀做好心理准备。事实上，没有什么能够让我做好那样的心理准备。不过，就像我在前面所讲的那样，在大屠杀中，我遭受的痛苦比大多数欧洲犹太人少得多，所以我才能活下来讲述这个故事。许多人和我都应该感激卡斯特纳。为了向读者展示他是如何将我们从那里解救出来的，我会简要地概述一下大屠杀在匈牙利的变体形式。

第二章 匈牙利的大屠杀

黄金时代

目前，描述大屠杀的文字多达数百万，所以对我来说，即使用最宽泛的手法来回忆那个恐怖的事件没有任何意义。使得发生在匈牙利的大屠杀迥异于其他地方的大屠杀的，是它的偶然性及其发生时机的必然性：那些杀人魔王来得虽晚，但动作迅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第5年，纳粹摧毁了在欧洲所占领国家中的所有犹太社区。当时，匈牙利犹太人还没有遭到那样的厄运完全是由于匈牙利与德国间特殊的盟友关系，但在第三帝国灭亡的最后几个月，这里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最迅猛、最残酷的大屠杀。可笑的是，这样的灾难距离他们历史上最幸福的时期只有短短几十年。

著名历史学家伦道夫·布拉汉姆将匈牙利犹太人在1867年至1918年间的历史时期称为“黄金时代”。1867年，犹太人在新建的奥匈帝国双君



主立宪的体制下获得了完全的公民权利。1918年，结束了它的双君主立宪制，匈牙利犹太人最恐怖梦魇也随之开始了。

在双君主立宪制时期，匈牙利是一个在保守政府统治下的半封建国家，奥地利的君主同样是匈牙利的国王。社会的顶层是地主贵族，底层是贫穷的农民。那些处于社会顶层的人们如果需要一份工作，就会加入军队或成为公务人员。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过着贫困的生活，他们嫉妒并仇视那些地主贵族。如果匈牙利想要在现代世界中生存下去，就必须消除这两个互相仇视的社会阶层之间的鸿沟。

两个社会阶层间的填充物便是工业、商业、法律、教育、科学、传媒以及艺术，这为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国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职业。以下情况也许在匈牙利显得更加严重：上层社会看不起这些职业，底层社会却对这些职业缺乏信任。所以，这些职业等待着那些有能力并愿意去做的人们。

很多犹太人有这样的能力，并且愿意去做这样的工作。结果，这里便出现了成功的犹太中产阶级，他们不成比例地担当着匈牙利主要的专业岗位。他们不仅对这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还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文化的繁荣。

这些犹太中产阶级忠诚于匈牙利，并且将自己视为匈牙利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当中有些人有非常强烈的爱国情怀，一战时他们踊跃参军便是极好的证明。作为回报，他们获得了平等权、司法权和自由的权利，甚至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有机会跻身贵族阶层。

这种情况至少与那些住在大城市，有教养、被同化的犹太人相吻合。他们在遵循宗教条规的同时，还接受匈牙利的风俗。这类人代表着大多数匈牙利犹太人，但并不是全部。在一些村庄里，还有一类比较正统的犹太人——主要来自东欧，操一口依地语、未受到良好教育的东犹太人。他们主要是小店主、小商贩、宗教老师、流浪汉或乞丐，他们严格地遵守宗教

信条，甚至达到狂热的程度，这使得他们与周边的匈牙利环境格格不入。但无论是哪一类人，在那场灭顶之灾中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我敢说（确切地说，应该是我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说），我们从没有像那时那么安稳地生活过。不过即使在那些幸福的日子，匈牙利仍然充斥着反犹太主义。上层阶级从没有毫无保留地平等地接受犹太人，与此同时，底层阶级又怀疑上层阶级在与统治者相互勾结。因此，有些反犹太集团会将憎恨的矛头指向可怜的东犹太人，还有一些人则会将打击面扩大到所有犹太人。不管是在公共场所，还是在私人领域，他们会将所有邪恶归罪于犹太人，而只要犹太人表现出丝毫不满，就会被轻易地升级为对他们的挑衅，从而遭到经济处罚甚至严刑拷打。

衰 落

匈牙利在历史上的战争中没有获得过胜利，后来，它站在德国与奥地利的一边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还是以战败而终。根据1920年的《特里阿农条约》，匈牙利不得不割让三分之二的领土赠予邻国，剩余的三分之一的原住民在他们曾经的家乡不可思议地变成了少数民族。1919年，共产主义者贝拉·库恩在匈牙利建立起了苏联模式的政权，但很快便被充满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右翼反革命运动分子驱逐出境了。1920年，反革命的领导人米克拉斯·贺西上将宣布摄政，直至1944年才结束。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右翼政府的统治下，匈牙利的政治主要集中于两个不相干的问题上，即“复国主义”和“犹太问题”，而这两个问题





经常被那些肆无忌惮的“捍卫者”和头脑混乱的民众混为一谈。“复国主义”表达了他们重获失地的渴望。没有强有力的左翼势力的反对，所有的政治力量都集中在了右翼一边，他们极力使国家恢复原状。“犹太问题”则是为了使人们转移对经济病症和社会恶习的关注，无辜的犹太人就这样成了永久的替罪羊。后来的事实证明，沙文主义与反犹太主义邪恶的联盟是犹太人的噩梦，但可笑的是，匈牙利人也获益不多。

1938年至1941年，匈牙利收复了许多于1920年被割让的领土。不过，这并不是免费的午餐。归还匈牙利的失地是希特勒的一份大礼，作为回报，希特勒希望匈牙利能够为纳粹战争给予更积极的支持。匈牙利同意了这个条件，并于1941年作为轴心国之一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然，希特勒还希望匈牙利能够配合自己完成他那首要的工程——对犹太人的灭绝。实际上，希特勒并不需要给予匈牙利施加太大的压力。因为在大部分时间里，不管是匈牙利的领导阶层，还是暴民和流氓，都很乐于帮助纳粹或超过纳粹的要求去伤害那些犹太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二十几年里，在许多煽动的刺激下，反犹太主义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效仿1935年德国的纽伦堡种族法律，三部主要的立法接连出台了，这些邪恶的立法为随后的灾难奠定了基础。

第一部反犹太立法是1938年通过的。在基督教会的支持下，这部立法规定，只有20%的犹太人可以在金融、商业、工业和文化行业任职。犹太的领导人或多或少欣然接受了这部立法，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这会打消一些反犹太主义者的热情。

第二部反犹太立法是1939年通过的。这部立法又一次得到了基督教会的支持，但这一次犹太的领导者们进行了抗议——虽然毫无作用。按照这部立法的规定，犹太人第一次有了明确的划分标准：属于犹太社区的人是犹太人，父母中有一人或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中有两人属于犹太社区的人也是犹太人。立法还限制了犹太人的政治和公民权利：不能在政府部门

任职；不能编辑或出版期刊，出品戏剧或电影；只有6%的人能去参与专业或商业活动。这样一来，原本允许受雇于个人企业的数量也被大大减少了，大约25万犹太人没有了日常收入，不得不去用一些不正当的方法养家糊口。

第三部反犹太立法是1941年被通过的。虽然这部立法从表面上来看并没有那么激进，却有深远的影响。它规定，只要有人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中至少有两人是犹太人，那么他就是犹太人。与上部立法相比，这部立法扩大了对犹太人的定义范围，并明文规定，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不能结婚，更不能出现私通的性行为。自此，受害者的范围大大扩大了，大约10万人在一夜之间从非犹太人变成了犹太人。

每次反犹太立法的出台都伴随着更多的仇恨与对犹太人捏造的指控，比如，犹太人是密谋摧毁匈牙利经济的资本家；犹太人是企图推翻匈牙利国家的共产主义者；犹太人是企图破坏匈牙利文化的世界主义者；犹太人是吸吮可怜的匈牙利人民鲜血的寄生虫；犹太人是帮助敌人取得胜利的內奸。在这种狂热的状态下，犹太人不断被当局骚扰，底层人民也对他们时而进行言语侮辱，时而进行肉体伤害。在由各个阶层组成的暴民的支持下，右翼媒体与政客变本加厉地残害着犹太人民。起初，他们的口号是“掠夺犹太人，然后将犹太人赶出匈牙利”，但不久后，口号便演变成“彻底消灭犹太人”了。

第一部反犹太立法出台的那年，匈牙利同时又出台了“军事劳力服务”制度。大多数21岁至60岁的犹太男人都被应征入伍了，不过他们并没有加入“米克拉斯·贺西上将那些美丽的士兵”（当时流行的行军歌）的队伍，而是成了奴工。他们穿着便服，戴着黄色的臂章，被迫在家乡做着又脏又累又危险的苦工。匈牙利一旦开战，他们还要被转移到东部前线。他们过度地劳累，营养不良，缺乏基本的卫生与医疗设施，还要遭受那些残酷成性的卫兵和官员的虐待。1939年至1944年，10万多人被抓去





当了奴工，其中大约 4 万人死于这样恶劣的环境之中。

1941 年 8 月，大约 16000 名逃到匈牙利、奥地利、斯洛伐克、波兰的犹太人被匈牙利和德国士兵抓到了乌克兰的卡梅涅茨-波多利斯克，连同当地的 7000 名犹太人一起被杀害了。1942 年 1 月，在被匈牙利占领的南斯拉夫自治省伏伊伏丁那，匈牙利的准军事宪兵以抵抗游击队为借口，将 3300 名男女老少不是被枪杀，就是溺死在冰冷的河水中，其中有 700 名犹太人。

臭名昭著的万塞秘密会议召开后，从 1942 年夏天开始，德国就“放逐和灭绝犹太人”的问题不断地向匈牙利施加压力，与此同时，匈牙利右翼极端势力中各式各样的反犹太政客也开始向德国抱怨匈牙利当局缺乏灭绝犹太人的热情。米克拉斯·贺西并不是一个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而是一个在德国与匈牙利之间走钢丝绳的机会主义者，害怕遭到国际流放者和同盟国的报复。因此，他坚定地走着中间路线，任命、撤职了一系列主要大臣和各级政府的官员，其中有些人更加热衷于纳粹与反犹太主义。

随着德国与匈牙利的日渐衰落，米克拉斯·贺西及其随从（特别是他的首相米克拉斯·卡拉伊）开始考虑摆脱他们的伙伴，单独与同盟国达成和平协议。他们对犹太人的处罚也稍微改善了一些。希特勒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他不想放弃他对匈牙利的控制，也不愿放弃消灭欧洲犹太人的“宏伟”目标。于是，他向米克拉斯·贺西发出了两次不可拒绝的请柬。

第一次会面发生在 1943 年 4 月 17 日至 18 日奥地利的克莱什姆城堡。在希特勒及其外交大臣里宾特洛甫的热情接待下，米克拉斯·贺西被要求撤去卡拉伊的职务，并对犹太人采取更迅速、残酷的措施。米克拉斯·贺西说，除了杀死所有犹太人外，他们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里宾特洛甫却说，那些犹太人应当全部被真正地处死或驱逐，希特勒也同意他的观点。但这一次，米克拉斯·贺西坚定了自己的立场：卡拉伊没有被撤职，犹太人既没有被屠杀，也没有被驱逐，至少暂时是这样。

第二次会面发生于1944年3月18日，地点还是克莱什姆城堡。希特勒要求米克拉斯·贺西从两条出路中选择其一：要么任命一届听命于德国的新政府，要么面对德国军队占领匈牙利。再三考虑后，米克拉斯·贺西选择了前者。实际上，无论米克拉斯·贺西做什么选择，都左右不了大局。

这次会面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置犹太人。虽然会议没有达成正式的协议，但人们普遍认为米克拉斯·贺西同意了希特勒想将10万名匈牙利犹太人派往德国工作的要求，而这随后成了纳粹及其在匈牙利的帮凶将45万名匈牙利犹太人进行整批驱逐的借口。

出人意料的是，米克拉斯·贺西成了希特勒的玩物，他被耍了。米克拉斯·贺西返回匈牙利的火车被人为地耽搁了，当他达到布达佩斯的时候，德国军队已经悄悄占领了匈牙利，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这发生在1944年3月19日，是匈牙利犹太人历史上最阴暗的一天。

1944年3月22日，也就是德国占领匈牙利的第四天，米克拉斯·贺西组建了新的纳粹傀儡政府。从犹太人的立场来看，那些最邪恶的人物包括：多姆·斯托杰，首相兼外交部长；拉兹罗·奥第，掌管政治（犹太）事务的国务卿；拉兹罗·巴卡里，掌管宪兵的国务卿；拉兹罗·费伦奇，监督向集中营中逮捕犹太人情况的宪兵队长。这四个人只是那些嗜血的反犹太势力的典型代表，他们要为匈牙利对纳粹大屠杀所做出的“贡献”负主要责任，因此他们在战后被判处死刑。

灾难

从1944年3月19日开始，犹太人的处境急转直下。接下来几个月内





发生的事情正如伦道夫·布拉汉姆总结的那样：“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最终方案”——建立中央和当地犹太委员会、隔离、没收财产、强迫集中居住、驱逐犹太人——能够像匈牙利执行得那么残忍、迅速。”

紧随德国军队之后的是阿道夫·艾希曼和他的手下，他们的工作就是消灭匈牙利的犹太人，就像他们在其他地方做的事一样。全权负责消灭五六百万名犹太人的部门是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头目是帝国党卫军元首海因里希·希姆莱及其直属手下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不仅是党卫队区队长和党卫保安处的处长（具有情报功能），还是保安警察的长官（包括刑事警察与盖世太保）。盖世太保（德语“国家秘密警察”的缩写）的首脑是少将海因里希·米勒；匈牙利一切安全部队的指挥官是党卫军全国副总指挥（中将军衔）兼武装党卫军指挥奥托·温克尔曼；布达佩斯党卫保安处的头目是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中将军衔）奥托·克拉各斯；高级外交官是艾德蒙德·费森迈耶。他是德国大使，是德国驻匈牙利的全权代表。

在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的办公室中，直接负责犹太事务的是 IVB4 组，其领导者是大屠杀的具体策划者、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阿道夫·艾希曼。而致力于消灭犹太人的成员来自党卫保安处、保安警察局和党卫军宪兵。保安警察局有一个特别行动小组，负责执行或指导对犹太人施以最残暴的惩治。阿道夫·艾希曼的直属属下有一级突击大队长赫尔曼·克拉米、西奥多·丹勒克尔，上尉奥托·哈什、西格弗里德·塞德、狄尔特·威斯里舍尼、弗朗茨·诺瓦克等。

也许你会觉得这样的安排有些混乱，但事实就是那样。第三德意志帝国并没有有序的整体结构，而是一个错综复杂、层层重叠、相互冲突的混乱集团，其成员明争暗斗，残酷地争夺权力与利益。

艾希曼的特别行动小组不足 200 人，显然，如果没有匈牙利人全心全意的帮助，这个小组根本就不可能在短短几周内就驱逐了近 50 万名犹太

人。奥第、巴卡里和费伦奇将匈牙利的警察、宪兵以及行政部门交由艾希曼支配，大部分匈牙利人便这样饱含热情地参与到了这个游戏之中。事实上，自从那扇“洪闸”被入侵的德国人打开后，匈牙利人就经常显得比他们欢迎的入侵者还要热衷于对犹太人的迫害。他们开始羞辱、虐待他们的犹太邻居，剥夺他们的财产，想象着要为他们的祖国铲除犹太这个毒瘤，也许，他们不过是在享受虐待那些无助的犹太人带来的快感。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匈牙利的官员、警察和士兵在德国人的指导下进行了一次比其他地方都顺畅、迅速的驱逐。

在德国人入侵的第一周，特别行动小组和德国其他小队的三四百人在匈牙利官方和告密者的有力支持下在全国逮捕了近 10000 人。这些人中有政客、公务人员、军官、知识分子、艺术家和科学家，他们都被纳粹视为潜在的敌人。此次逮捕的主要目的是营造一种人心惶惶、令人恐惧的氛围，以便实现对匈牙利的完全控制。被逮捕的人中有 3000 人是犹太人，他们中有的犹太社区声望颇高的人物，有的则是在街上随便抓的。他们被分别送到了全国的各个拘留营中。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政府为了孤立犹太人、没收他们的财产、最终消灭犹太人而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法令，其中最为明显的一条法令是要求年满 6 岁的所有犹太人自 4 月 5 日起必须佩带黄色的大卫之星（犹太教的六芒星形）。大卫之星必须是 10 厘米高、10 厘米宽，牢牢地缝在外衣的左胸前。一些犹太人（包括一战的老兵）得到特许，可以不佩带大卫之星，我正是因为这条规定捡了一条命。从精神的层面来讲，佩带大卫之星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更加无助和自卑，但更重要的是为了让我们留下永久的烙印：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作为犹太人的我们都会轻而易举被认出来。但事实上，无论是否佩戴大卫之星，对我们来说都是灾难。那些没有佩带大卫之星的人被抓了起来，受尽虐待后被驱逐出去；那些佩带大卫之星的人则会受到排斥、嘲笑、虐待，最终还是会被驱逐。正如犹太人所说：“黄色的





大卫之星就是我们去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门票。”

当然，纳粹折磨我们的手段远不止这些，他们总是想方设法让我们的生活更艰难。匈牙利人与德国人时而合作，时而竞争，将我们的一切都掠夺殆尽：少数还在工作的律师、记者、医生、药剂师和艺术家都丢掉了工作；所有的犹太企业、商店、工厂都被没收并分配给了非犹太人；犹太人的家庭用品，如家具、收音机、电话、汽车、艺术作品，只要是他们看得上的东西，全都被充公了。除了少数人获得外出许可外，绝大部分人都不允许离开房间，甚至不能去公园、公共浴场、游泳池、饭店、酒吧、咖啡馆、戏院或电影院；我们日常生活必需的黄油、鸡蛋、大米、白糖、油脂、牛奶和肉类都只能在限制数量的条件下购买；除了德国人建立的犹太委员会外，所有犹太组织都被取缔了；犹太作家编撰的书籍都从书店和图书馆中被撤了出来，并在公共场所集体焚烧；犹太人的银行账户被冻结了，只能拥有少得可怜的现金。

随着布达佩斯上空的空袭不断增加，反犹太领导层被要求将成千上万犹太人逐出家乡，为那些因轰炸而无家可归的匈牙利人腾出地方来。还有几次驱逐是因为纳粹官员们决定要住在那些富有的犹太人考究的别墅里。历经几次驱逐后，除了布达佩斯外，匈牙利被分成了5个区域。第一个区域大体上包括东北的喀尔巴阡山脉，第二个区域是东部的特兰西瓦尼亚，第三个区域是布达佩斯的北部，第四和第五个区域在布达佩斯的南部、多瑙河的西部。在艾希曼的特别行动小组的专业指导下，狂热的匈牙利宪兵将犹太人聚拢后赶到聚居区，并将他们废弃的家掠夺一空。隔离区有时是一些被封堵的城区，不过更多时候是废弃的砖厂或其他工厂。在那里，这些犹太人无以遮风挡雨，整日经受风吹日晒雨淋，仅有最低限度的食物，并且没有任何医疗设备。此外，一些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会经常侦查他们有没有值钱的东西藏在自己的随身物品之中或外面的什么地方，而侦查的手段往往就是严刑拷问。随着犹太人的坦白与财产的充公，隔离区中又不

可避免地添加了很多尸体。

在隔离区待上几周后，这些囚犯又被宪兵们赶到了附近的铁路旁，并在他们的咒骂与鞭打声中登上正在那里等着他们的运牛卡车。70多个人挤在一辆卡车上，车上有两个不太大的水桶，一个用来饮水，另一个用做马桶；车门是从外面锁上的，车内没有任何食物。在夏天炙热的环境中，他们在车内人挤着人，几乎闷得无法呼吸。到斯洛伐克边界后，他们被匈牙利卫兵交到了德国纳粹士兵手中，几天后就可以到达奥斯维辛集中营。有些人死在了路上，那些所谓的幸存者则被迫不断被“挑选”。他们在一个德国医生面前站成一排，能够承担重劳力的人站到右边，老弱病残的人则站在左边。站在左边的人随即就会被送往毒气室，站在右边的人则会被派往德国占领的各个营地做苦力，只有最强壮、最幸运的人才能活下来。我们之所以能知道这些情况，还要感谢那些成千上万的幸存者。

隔离化（这是一个用于丑陋事件的丑陋的用词）于4月16日开始于第一区域，到6月3日，五个区域的所有犹太人都被关进了隔离区。放逐于5月15日开始于第一区域，于7月8日完成于第五区域。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150辆火车载着45万犹太人开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其中约33万人刚刚到达那里便被送到毒气室了。算上那些死在布达佩斯的，死于强制劳动的，死于臭名昭著的“死亡行军”的，在德国占领期间，超过50万匈牙利犹太人被杀害了，而大约25.5万人最终幸存，其中一半在布达佩斯，一半在集中营被同盟国解救。

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原定于在7月被隔离，8月被放逐，但米克拉斯·贺西迫于国外的外交压力而搁置了7月7日的放逐。20万犹太人被迫住在2600所“犹太房子”里，他们胸前佩戴着黄色的大卫之星，平均每三个人住在一间房间，而数以万计的人宁愿冒着被逮捕、被拷打、被杀害的危险而藏起来。在“保护护照”和“保护所”的庇护下，很多人得以幸存，这尤其要感谢瑞士外交官沃伦伯格及其同僚查尔斯·鲁茨。





不过，对犹太人来说，那只是短暂的喘息。当苏联军队进入匈牙利之后，米克拉斯·贺西终于决定让自己的国家摆脱这场战争了。10月15日，他通过电台宣布了单方停火宣言。德国人立即强令贺西主动辞职，并任命极端法西斯与反犹太的箭十字党领导人费里桑·斯扎拉斯为国家首相和领袖。这标志着匈牙利大屠杀进入了最后阶段。

上任第一周，为了讨好艾希曼，新政权决定将大批犹太人送往奥地利，为抵抗即将到来的苏联人修建防御工事。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从凉风习习的秋天一直走到寒风刺骨的冬天，8万犹太人被迫赤足行进了220公里，风餐露宿，饥寒交迫。而全副武装的宪兵不断对他们进行言语上的攻击和肉体上的虐待，杀害那些无法前进或他们看不顺眼的犹太人。这就是“死亡行军”，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都丧命于此。

11月，那些没有保护文件的犹太人被迫转移到隔离区，那里的条件更加恶劣。自从斯扎拉斯政变以后，大批箭十字党的杀手们开始肆无忌惮。他们掠夺犹太人的财产，将他们从藏匿的地方追赶出来，杀死了成千上万犹太人。随着苏联红军逼近布达佩斯，他们的恐怖统治变得愈加血腥。他们最喜欢的消遣是将大批犹太人赶到多瑙河大坝边进行集体射杀，并将他们的尸体扔到冰冷的河水中。尽管很多人幸运地逃脱了杀手们的魔掌，但最终，布达佩斯大约有一半的犹太人，也就是10万人，死于这样的恐怖统治之下。

布达佩斯附近一个叫吉他卡斯省级收容所是第一次和最后一次驱逐的起始点。5月15日驱逐“正式”开始的两周前，也就是4月28日，这里的1800名囚犯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7月12日，也就是贺西下令停止放逐5天后，艾希曼将又将1500人送上了去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火车。但由于得到了犹太领导人们的提醒，贺西下令将火车开了回来。7月19日，艾希曼将犹太领导人们召集起来开会，并将他们留在自己的办公室，接着他的党羽又将1500人送上了另一列火车。当这些犹太领导人再次联系到

贺西的时候，那列火车早已离开了匈牙利。

犹太委员会

艾希曼在大屠杀中一个最隐秘的策略是他对犹太委员会的利用。1944年的3月19日，在德国占领匈牙利一个小时后，艾希曼的两个高级官员威斯里舍尼和克拉米前往犹太社区，向犹太领导人们留下一纸传票，告诉他们所有的犹太机构都要参加第二天的会议。大约500名犹太代表出席了会议，其中有很多人带着手提箱，因为他们预料到自己会被立刻逮捕并遣送出国。而威斯里舍尼却营造出了一种诚挚的气氛，他向大家保证，完全没必要惊慌，可以在纳粹的统治下不受干扰地继续工作。克拉米也表现出了同样客气的姿态，向他们解释说，这里不存在逮捕，不会侵犯个人权利和财产，也不会放逐任何人，并要求在次日建立犹太委员会作为掌管匈牙利所有犹太人的官方机构。威斯里舍尼还警告道，如果犹太人试图撤出银行里的存款，就会遭到严厉的惩罚。不过，他还宣称，如果哪个犹太人被逮捕，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而仅仅是因为他犯了错。

恐吓与虚假的承诺并用是纳粹典型的伎俩，其巧妙之处就在于在使犹太人感到恐惧的同时还能看到一点希望，并最终将他们变成毁灭自己的工具。匈牙利犹太人的中央委员很快便被成立起来了，山姆·斯特恩（与匈牙利领导层有联系的富有的银行家，布达佩斯犹太社区的主席和归化主义犹太人国家组织的负责人）被任命为主席。事实上，委员会的职责就是将德国人的命令传达给犹太人，并且确保犹太人能够严格地执行命令。起初，犹太委员会不得不拟出两份清单，一份是所有犹太机构的清单，另一





份是布达佩斯所有犹太资产的清单。

3月31日，委员会的代表团与艾希曼在艾希曼的总部大华酒店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艾希曼对于即将开始的放逐只字不提，并且摆出着平和的姿态。当斯特恩对愈演愈烈的反犹太行动抱怨不休时，艾希曼向代表团保证：犹太人不需要惧怕德国人，他们将继续得到平等的对待；任何对犹太人采取过激行为的人都会受到严惩；对于犹太人在行政和经济上的限制将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得以消除。显然，他是在说谎。

会议结束后，中央委员会做出指示，各省犹太社区的领导人要服从首都的命令，并号召犹太人服从纪律与命令。当局在几个大城镇里成立了很多犹太委员会，并要求他们与中央委员会的政策保持一致。

这些委员会试图通过向匈牙利高层恳求、请愿来保护他们的犹太子民，但无济于事。匈牙利人拒绝提供帮助。德国人又下达命令，而委员会不得不执行命令。这些委员会能够做的少之又少，却在不情愿中推动了大屠杀的顺利进行：他们发表了简报传达艾希曼的命令，制作了并分发黄色的大卫之星，决定了要被充公的犹太资产，将值钱的东西送到德国人手中，确定了要隔离并被放逐到毒气室中的犹太人名单。他们喜欢那些特权，比如，他们不需要佩戴黄色的大卫之星，拥有一定程度上自由活动的权利。有些人的确对拥有这些特权而感到自豪，但大多数人还是不遗余力地试图减轻犹太人遭受的痛苦。遗憾的是，他们最终还是无法阻止灾难的到来，并且还要被迫协助那些要摧毁自己的同胞的敌人，而他们通常也会得到相同的命运。

为什么这些委员会服从德国人的命令呢？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是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他们拒绝服从命令，德国人就会对他们做出残忍的事情。二是因为他们希望通过妥协或者避免德国进行瞬间的屠杀，或者能够在第三德意志帝国倒塌之前保住尽可能多的生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无法——或者不愿——相信其他地方的犹太人遭受的悲惨命运会出现在像

匈牙利这样一个文明的国度。他们将自己视为被同化的匈牙利人，有爱国热情，服从现存的制度，以为祖国奉献为荣。他们天真地期盼希特勒和匈牙利当局能够欣赏他们的忠诚而使他们免于纳粹的屠杀。这就是那些委员会和犹太人民共同的想法。只是，匈牙利人不这么想。

对犹太委员会最严厉的指控是他们在面对大屠杀时故意没有警告社区内的犹太人。据称，他们没有告诉犹太人放逐的真正目的地，从而使犹太人误以为自己很安全。那些可怜的犹太人认为，自己只是去匈牙利边境工作而已。犹太委员会还安抚犹太人，只要他们按照德国人的要求去做就不会有事。也就是说，犹太委员会的这些谎言是大批犹太人没有反抗或者逃跑的重要原因。

但事实上，问题的关键在于那些犹太委员会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知之不多。在大屠杀的前几年，有关屠杀的消息都来自于德国占领的东欧地区的难民，毫无根据。然而，直到1944年春天，死亡集中营的事情才在匈牙利和其他地方广泛传播。

在众多描述死亡集中营中的真相的文献中，最重要的由两个年轻的斯洛伐克犹太人鲁道夫·弗尔巴和阿弗瑞德·魏兹勒合写的《奥斯维辛记录》。弗尔巴和魏兹勒从1942年便开始被关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直到1944年才逃往斯洛伐克。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他们合作写成了那篇报道。在报道中，他们准确记录了1942年7月至1944年4月发生的大屠杀的细节，以及奥斯维辛集中营从1944年1月便开始为匈牙利犹太人的到来而做的准备工作。这篇报道被译成了匈牙利语，并被送到了犹太领导人、教会高层以及一些潜在的同情犹太人的政客手中。一篇报道的副本流传到瑞士，7月被广泛出版，接着又流传到了美国，于11月出版。尽管此时各省的犹太人都被放逐了，犹太领导们仍然选择自欺欺人。他们还在为那些疯狂的事情找理由，对那些露骨的事情视而不见，并幻想用让步和屈服换来安宁。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想法一点都不靠谱。然而，就算他们竭尽全力去警告他们的犹太子民，也不太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抵抗与逃亡。犹太社区中在意识形态上存在不易调和的内斗，并且始终没有有效的中央机构能调和这些冲突。那些归化主义犹太人将自己视为文明的西方人，他们将大屠杀归罪于那些从东欧而来的东犹太人拒绝被所在国同化。相反，东犹太人将大屠杀视为上帝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归化主义犹太人的惩罚，或者是为迎接弥赛亚（犹太人期待的救世主）的到来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因此，联合行动的希望一开始便先天不足，后来又受限于行动与交流等因素，最终难逃流产的命运。在激烈的反犹太言论的攻击下，他们变得士气低落；在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压力下，他们变得麻木不仁；在匈牙利人的侵扰和虐待、德国人的蒙骗和恐吓下，他们变得胆战心惊。最终，他们没有办法进行战斗，也没有地方可以逃离，不得不忍受被人奴役的痛苦和屈辱。

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有些人勇敢地站出来伸张正义。许多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开展了英勇的地下营救活动，试图提醒人们。其中，犹太复国主义协会主席奥托·加莫里在红十字会的帮助下救出了数百名儿童；布达佩斯巴勒斯坦办公室的主任摩西·克劳兹从国外外交官手中拿到了数以万计保护护照。

而最杰出的冒险则是由卡斯特纳与一个叫“瓦达”的非正式的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完成的。正当那些犹太委员会试图通过顺从艾希曼及其党羽而躲过厄运的时候，这个小组却用自己能想到的所有办法甚至包括欺骗，去营救更多的生命。与那些犹太委员会一样，卡斯特纳在战后被冠上了通敌的罪名，虽然他并不是自愿这样做或者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最后，犹太委员会与卡斯特纳还是成了纳粹主义的牺牲品，但与犹太委员会不同的是，卡斯特纳不屈不挠，并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成功。面对着史上最邪恶的一帮罪犯，他拒绝绝望。凭借特有的胆量与决心，他成了在大屠杀中营救犹太人最多的人。

第三章 科罗日瓦隔离区

恐怖的砖厂

正如我上小学的第一年就因接管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而中止一样，我在科罗日瓦上中学的第一年又被占领匈牙利的德国人葬送了。我既想不起在中学度过的六个月的时光，也记不清那晦气的 1944 年 3 月 19 日，但我的祖母小心翼翼地制作六角的大卫之星的情形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那时，她将黄色六角形的每个方位都精确在 10 厘米之上，然后将它牢牢地缝在我们的外套和夹克上。这个命令实际上是在 3 月 29 日下达的，到 4 月 5 日，科罗日瓦街上和匈牙利其他所有地方的犹太人都佩戴上了黄色的大卫之星。我希望，我可以说自己是以自尊与反抗的态度戴上它们的，但事实上一走出家门，我就会有一种暴露在外的感觉，既害怕又尴尬。尽管我偶尔能忘记那一切，但街上的人和商店玻璃上的镜像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我是一个臭烘烘的犹太人。



5月2日，四处张贴的海报命令镇里所有犹太人准备向隔离区迁移。5月3日，报纸也传达了同样的信息。我们在家里等待宪兵将我们聚拢起来。5月8日，这天是我的生日，虽然我们没有庆祝，但我还是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我的第一只手表。手表的表面上印着“多克萨牌”的字样，表内的数字可以在夜里发着绿光。我经常在夜晚一遍又一遍地宣读准确的时间，这让家人感到心烦意乱，所以后来他们威胁要没收我这珍贵的礼物。

几天后，我的祖父母、姑姑、父亲与我们在科罗日瓦会和。我们带着行李站在街上，全副武装的匈牙利宪兵在我们面前踱步走着，非犹太人邻居则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们，有些人躲在家里的花边窗帘之后，有些人直接站在街的对面。我们家的前门被贴上了封条，上面写着“匈牙利国家所有”。后来，那群可恶的宪兵谩骂着命令我们爬上一辆卡车，我年迈的祖父母和我那拖着僵硬的腿的父亲爬不上去，就被一个宪兵粗暴地扔了上去。另一个宪兵看到了我的多克萨牌手表，便将手表从我的手腕上拽下来后扔进了自己的口袋。

就在那天，我不仅失去了宝贵的手表，还永远告别了莎莉姑姑送我的小玩具狗。那个小狗是莎莉姑姑用缝衣服剩下的碎布做成的，小狗的眼睛是两个黑色的衣扣。虽然玩具狗已经变形，甚至有些开线，不过我仍然对它爱不释手，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包括晚上睡觉时。正当我们爬上卡车的时候，那个残忍地夺走我手表的宪兵又抓住了我的胳膊，将我的玩具狗从我的怀中夺走了。接着，他狠狠地推了我一把，吹着口哨离开了。

最后，宪兵们觉得卡车的后厢里装的犹太人已经够多了，便对司机做了个手势，将我们交到了一个二十来岁衣着不整、脸色淡黄的年轻人的手里。这个年轻人没有穿宪兵的制服，只是穿一身由于短小而紧身的民服。他站在卡车的后挡板上，因对我们的憎恨而面容扭曲，一路上对我们骂个不停。我还记得，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这些臭烘烘的犹太人终于

得到了报应。从那时开始，我就会经常想，他最终是不是也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他是一个吉普赛人）。

在两个星期内，18000 名科罗日瓦和附近小镇、村庄的犹太人被带到了隔离区。和其他隔离区一样，这个叫伊利兹地产的废弃砖厂被带刺铁丝网和木栅栏紧紧包围，由准军事宪兵与常规警察把守。那些砖厂简直就像是为这些等待放逐的犹太人量身定做一般，只有长长的屋顶，没有墙壁，自然抵挡不住狂风暴雨。

那时是在夏天，我们不必担心寒冷，不过为了保住一点隐私，我们将床单和毯子拼凑在一起以代替墙壁，那些有足够的床单或毯子的人还可以将它们铺在睡觉的灰土地上。当局不定量的配给主要是一些蚕豆，我们不得不用那些从犹太家庭里掠夺而来的金属浴盆将蚕豆做熟。我们还会食用那些我们带在身边的食物补充能量，有时还可以从那些站在栅栏边上做生意的农妇手中买点东西。18000 人的饮水、煮饭、洗漱都要指望那 15 个水龙头。这里没有厕所，于是几个男人挖了四条沟渠当作坑厕，两个男厕，两个女厕，一次可以供 20 个人使用，不过完全处于暴露之中，这也使人们感到更加耻辱与尴尬。成群的黑苍蝇在沟渠里飞舞，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掉入那粪坑的恐惧。

我那时一定也承受着和大人一样的肉体与精神上的压力，不仅要忍受饥饿、污垢、疾病，还要面对死亡与自杀。不过，作为一个 11 岁的小孩，隔离区对我来说还是一次令人兴奋的冒险。面对那些由床单与毯子制成的墙壁，回想过去在家里和学校的规矩，这里几乎是一个没有期限的露营假期。砖厂中纵横交错着锈迹斑斑的用来运送砖块的窄轨铁路，我们可以连续玩几个小时，而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强行被父母带回家。我在前面就说过，我是个善于遗忘不好的事情的人。失去多克萨手表与玩具狗虽然让我感到难过，但与此同时，我经常想知道我们还要在那里待多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出色地完成了忽略残酷的现实的任务。





不过即便如此，我也隐约知道那里一座特别的建筑里正在发生邪恶的事情。我听说那里是“铸币厂”，许多男男女女都会被送去接受拷问，直到他们交代自己值钱的东西的藏身之所。不久，我开始注意到，经常有很多人被带到什么地方后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我才知道隔离区的18000人（除了其中的几百人以外）都在5月25日至6月10日先后通过6列火车被驱逐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我还记得，一天下午我独自待在我们那临时的小屋里，一队武装的宪兵正在搜查要被带走的犹太人，那时我藏在一个壕沟里，我屏住着呼吸，紧闭着双眼，而那些宪兵也没有发现到我。我不知道我的祖父母和姑姑为什么会把我独自留下，但此时我的父亲已经溜到了城里准备完成一件重要的事情。

一次没有目的地的旅程

6月2日早晨，英国与美国的飞机从意大利的基地起飞，在二战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轰炸了科罗日瓦。隔离区并不在轰炸的目标范围之内，因此当我们听到远方爆炸声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比那些非犹太人的处境更加安全。据报道，城里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轰炸大约持续了40分钟，共投下了1200余枚炸弹，460人被炸死，近1000人受伤。此外，火车站、军队粮仓、钢铁厂、火柴厂等都遭到了毁坏。鞋厂离我们最近，我甚至能看到鞋厂上方冒出的滚滚浓烟。在轰炸带来的混乱之中，我和父亲逃出了隔离区。当时，这看起来十分简单，但我的父亲为此做出了精心的准备——正如他后来向我解释的那样。

我父亲的膝盖在战争中被达姆弹击碎后，他获得了一份50%残疾的证

书，不过他绝没有失去 50% 的精力与活力。根据反犹太法令，在“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中造成 75% 残疾的犹太老兵不被视为犹太人，不用佩带黄色的大卫之星，行动不受限制，不用被隔离与驱逐，相同的权利还可以惠及他的妻子与子女。我父亲将证书上“50”的字样刮掉，改成了“75”。他当然知道他不可能依靠这个逃过一劫，不过他同样知道特兰西瓦尼亚的贿赂之道。宪兵可以随意用武力抢夺他们想要的东西，与他们不同的是，警察与市民更希望通过受贿得到实惠。那天下午，当我正在壕沟里躲避那些宪兵的时候，我父亲贿赂了一个守卫警察，离开了隔离区。他步行到城里，或许是凭直觉，或许是凭小道消息，他迅速找到了一个公务人员，贿赂他，换来了一份证书的正式副本。就这样，父亲获得了一份伪造的 75% 残疾证书。

然后，父亲又返回隔离区，在轰炸之后的骚乱中扯掉了我们夹克上的黄色六角星。他拉着我的手，步行到大门处，贿赂守卫警察后走上了通往城里的道路。我们自由了，至少在当时是这样的。我应该补充的是，我父亲曾试图劝说我的姑姑莎莉与我们一同离开，但她不想丢下我的祖父母不管，于是拒绝了父亲让她假扮成我的母亲的好意。战后，我听说我的莎莉姑姑在一到两周之后再次放弃了生还的机会，并最终被送进了毒气室。

在这样硝烟弥漫的背景下，我和父亲匆忙地从隔离区赶到了火车站，并登上了一列开往布达佩斯的火车。火车上到处都是搜寻犹太逃犯的便衣侦探，他们要求检查每个人的身份证，看见谁长得很像犹太人，他们就会检查得格外仔细。如果他们觉得需要进一步确认，他们会将嫌疑人带到卫生间检查他们是否进行做过包皮环切手术——至少对男人是这样的。很多惊恐的犹太人被发现证件是伪造的后被迫下车，被转送到了最近的隔离区。一个侦探检查我父亲的证件的时候皱着眉说：“这是一个副本。正本在哪？”我陷入了无比的恐惧之中，我父亲却拉起了他的裤腿，指着膝盖骨处的凹痕与伤疤，镇定地说：“这就是正本。”那个侦探点了点头后就走





开了。

接下来，我们待在布达佩斯的一间医院里，一位信基督教的医生同意让我父亲作为“病人”，而我可以作为他的“看护”。我们在医院里待了几天，却由于身边有太多的间谍与告密者，不得不在他们发现我们之前继续前进。我经常想起那位医生，他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两个素不相识的犹太人。我真希望知道他的名字，然后好好感谢他，并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个生活在成千上万个懦夫、投机主义者、杀人犯之间的勇敢的好人。

那张残疾证书只是一个假冒的副本，不可能保护我们很长时间。即使那是一张具有法律效力的证书，也不能保证我们能永远躲过匈牙利的法西斯分子的屠杀。从10月15日的斯扎拉斯政变开始，箭十字党的成员经常会不顾任何保护文件而不放过任何一个他们认为可能的犹太人。而我父亲早在6月的时候就已经将这一切看透，他意识到为了生存就必须想办法。

当我们离开医院的时候，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与我的表兄艾尔诺·勒布有关，他在犹太人被大学开除之前曾在布达佩斯学习建筑，他是犹太复国主义青年激进组织的成员。他的朋友找到了一座建筑里的密室，并为我们预留了一个位置。起初，我的父亲确实动心过，甚至打算住进去，但最终，他还是决定走第二条路，和我的表兄一样。后来，我听说那座建筑被同盟国的炸弹击中了，藏在里面的人无一幸免。事实证明，父亲的选择是对的，起码保住了我们的性命。

另一个选择是参加“卡斯特纳小组”。借助那张伪造的残疾证件，我父亲不用佩戴黄色的六角星，在布达佩斯享有极不稳定的自由。一向精力充沛的父亲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蹒跚地拖着我穿梭于不同的犹太组织之间搜集信息，试图要找到流言背后的真相以寻求建议和帮助。我父亲在科罗日瓦隔离区时曾听说我们会被送到一个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小镇，那个小镇在匈牙利的西部，并且有令人安心的名字——“面包之镇”。这个故事（我们现在知道是由匈牙利官方编造的）是由犹太委员会进行散布的，

事实上，能容纳科罗日瓦隔离区中所有犹太人的小镇根本就不存在，我父亲当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布达佩斯，被驱逐出省的犹太人的亲戚们突然开始收到他们寄来的有田园诗般名字的“森林湖”明信片，寄信人在信中讲述他们已经安全到达了目的地，并且受到了很好的招待。而真实的情况是，他们是在被送往毒气室之前在纳粹的逼迫下写下那些虚假内容的。我记得我父亲与其他焦急的犹太人交流听来的传闻时，经常会收到那样的明信片。很多人都在试图使身边的人更加安心，或者更多的是想使自己更加安心，人们经常会想：“如果我们就要去往那样不错的地方，那我们似乎就没有必要惊慌了。”

不过，我父亲可没有这么想。始终保持信息灵通的父亲发现了一个由卡斯特纳领导的犹太营救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当时通过某种交易已经将380名犹太人从科罗日瓦带到了布达佩斯。我不知道我父亲是否真的见过卡斯特纳，不过他一定动用了很多关系，最终使我们和几百个将希望寄托于卡斯特纳身上的犹太人一起将艾瑞娜大街的犹太教堂作为避难之所。在求生的本能的驱使下，父亲仍然四处“活动”。和他曾经把我独自留在科罗日瓦隔离区中而自己溜出去弄到伪造的残疾证明一样，现在，他又把我独自留在犹太教堂中后再次出去寻求救援，不过这一次我没有必要去躲避那些宪兵了。

父亲回来的时候，手里已经握着一张允许我们进入卡伦巴兹大街集中营的文件，那里关着大批来自科罗日瓦的犹太人。我知道那张文件绝不是我父亲通过金钱交易得到的，因为我们已经身无分文了。我们试图乔装成不需要佩带六角星的非犹太人，每时每刻都害怕被逮捕，终于顺利地穿过了这个邪恶的城市到达了南部郊区的卡伦巴兹集中营。纳粹守卫简单地看了看我父亲手里的文件后便打开了大门，示意我们进去。抱着被营救的微弱希望，我们自愿将不稳定的自由换成了被最邪恶的敌人囚禁。这是一种孤注一掷的赌博，有些人（包括我的父亲）敢于放手一搏，有些人则不





敢，不过在那时没有人能够预言最后的结果。

我记得那里有一所中学和一幢小一些的别墅，背阴的菜园里还有一些木棚，要是没有挤满那些焦急、紧张的人们，这里倒有些田园诗意。现在，我才知道，那里曾经是为聋哑人提供的维施塞尔曼协会，后来则变成了“特权”犹太人暂时的集中营。虽然我身边的人都算得上是“幸运儿”，但仍然沉浸于前一阵时间的磨难，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茫然。他们不知道迎接自己的将是什么，但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离开，却又顾虑重重。当然，年仅11岁的我无法完全感受这些，不过焦躁与不安还是在所难免的。

在卡伦巴兹大街，我经历了最猛烈的一次空袭。同盟国的飞机夜晚来袭，我们不得不躲在那些临时的木棚里，开始是附近警报的嘶嚎声，接踵而至的便是一颗颗硕大的炸弹。我们藏身于一片漆黑之中，炸弹嗖嗖地掉下来，紧接着就是一瞬间深深的寂静，最终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而告终。随着战机越飞越近，嗖嗖声变得愈发清晰，爆炸声也变得更加响亮，大地如地震般随之震颤。现在的战争电影迷们肯定十分熟悉那样的声音，不过在当时，那可不是一场电影。我害怕那样的声音，我颤抖着、呜咽着，而我的父亲也无能为力。终于，空袭结束了，我们并未受伤。时至今日，每当听到工厂拉响汽笛通知换班的时候，我的心还是会条件反射般地剧烈跳动。

1944年6月30日，被关在卡伦巴兹大街的人们（包括我和我的父亲）踏上了去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旅程”。不过，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这个消息，也不知道目的地是哪里。

第四章 迈开最初的步伐

救济难民

卡斯特纳的出现是匈牙利大屠杀中最令人吃惊的插曲之一。虽然他并不是单独行动，但他是那些致力于通过贿赂和欺骗纳粹而试图阻止屠杀犹太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中的杰出人物。事实上，双方一直是在互相欺骗，犹太人是为了挽救更多生命，德国人则是为了抢掠与谋杀。纳粹玩着残酷的猫鼠游戏，忙不迭地收酬金承诺让步的同时，却不忘将死亡列车源源不断地开往奥斯维辛集中营。总的来说，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是获得了一些了不起的成功。

起初，一切都很平淡。从1942年春开始，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从德国占领的波兰、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逃至匈牙利。他们随身的物品就只有身上穿的衣物，丢掉了工作，失去了家庭。他们拼命逃生，整天提心吊胆，生怕被警察拦住或因行人告密而被遣送回国。在他们的国家，德国人与当



地的走狗正等着将他们扔进集中营或立即处决。到了1943年11月，离乡背井的人达到了12000人至16000人。

当守法的匈牙利犹太人领导层发现他们无法满足大量涌入的难民的需求时，一个非正式的犹太复国主义团体接手了这个棘手的问题。1943年1月，他们组建了“救济与营救委员会”（希伯来语为“瓦达”）。这个组织的主席是奥托·加莫里博士，他是一名德高望重的土木工程师，是一战的军官，还是匈牙利犹太复国主义协会的主席。卡斯特纳博士是行政副主席。其他的成员包括乔尔·布兰德、汉斯·布兰德、摩西·舒威格、萨姆·斯普林曼、舒莱姆·奥芬巴赫、兹费·西拉吉、奥第·毕斯等。

“瓦达”与许多国外的地下组织有着秘密的联系，其两个成员萨姆·斯普林曼和乔尔·布兰德在与国外的联系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斯普林曼是布达佩斯一个知名的珠宝商，他雇佣了众多信差，包括匈牙利外交部和中立国的信使、匈牙利与德国情报部门的成员、双重间谍和走私贩，他们经常会在利益的驱使下为匈牙利和其他不同国家传递信息与金钱。斯普林曼和中立的伊斯坦布尔的犹太事务处的代表们也保持着联系，还是外界与巴勒斯坦的犹太事务处联系的桥梁。建立起与伊斯坦布尔的联系是斯普林曼对匈牙利犹太人最大的贡献。在德国占领匈牙利不久之前，他逃到了巴勒斯坦。

犹太事务处建于1929年，在英国的授权下主要负责处理巴勒斯坦的移民事务，最终成了以色列的第一届政府，由工党执政。其领导人包括以色列的第一任首相大卫·本·古里安和第一任外长摩西·舍托克。伊斯坦布尔犹太事务处的首席代表是查姆·巴拉斯，负责对被德国占领国家的犹太人的救济与营救。

布兰德是一个“墙头草”，他时而玩玩共产主义，时而又涉足黑市。他的妻子靠卖毛衣养家，他则终日在布达佩斯的咖啡馆和夜总会中酗酒、赌博。他是在德国接受的教育，所以说话几乎和德国人一模一样。战争开

始后，他就经常与一群德国军官混在一起，与纳粹德国反间谍机关阿伯韦尔的成员约瑟夫·温宁格的关系尤为密切。此外，他经常与一个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美国人、阿伯韦尔、盖世太保、纳粹党卫军和斯普林曼工作的靠不住的多重代理人班迪·格罗希醉酒狂欢，并在混沌的谍报活动中进一步与一些匈牙利的军官和官员取得了联系。如此来看，这的确是一种声名狼藉的生活，却意外地成了营救犹太人的宝贵资本。

1941年夏，汉斯的一个妹妹与她的丈夫被赶出了布达佩斯，与其他成千名被视为外来人的犹太人一起被运送到了匈牙利占领的乌克兰。在他俩变成臭名昭著的卡梅涅茨-波多利斯克杀人犯们的刀下鬼之前，布兰德贿赂了反间谍探员尤若夫·克雷姆，被装在汽车的后备箱里运回匈牙利。接着便是一次又一次相似的营救，“瓦达”除了要照顾匈牙利领土上的非法难民外，还积极地将犹太人偷运出国。这种计划的代码是“啼宇尔”，意思是“远足”。

除了伊斯坦布尔的犹太事务处，“瓦达”还与中立国瑞士的两个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内森·斯克沃布——犹太复国主义青年先锋组织赫查鲁茨的代表；萨利·梅耶——富有的退休商人，犹太社区瑞士同盟的前任主席，美国犹太联合救援会（为在国外遇到困难或危险的犹太人提供经济帮扶的慈善团体）的代表。尤其是梅耶，他在卡斯特纳的工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伊斯坦布尔和瑞士的帮助下，“瓦达”不仅获得了帮助难民所需的大量资金，还试图警告世界，匈牙利即将迎来大屠杀，但反响迟缓、无力。1943年11月，在布达佩斯的一家豪华宾馆里，卡斯特纳与斯普林曼在为德国反间谍机关工作的维也纳牙医鲁迪·塞德莱兹克的引荐下会见了一名德国商人。这名德国商人在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经营着工厂，为纳粹战争提供过补给，但其主要目的还是要为他雇佣的犹太劳工提供避难场所。在那次会面中，这位德国商人制定了一些逃离路线，并且与“瓦达”





建立了经济合作，更重要的是，匈牙利的领导层第一次听到了关于死亡集中营中具体的细节。“用军靴踩扁孩子们的头颅并非他们常规的手段，”这位德国商人向那些惊骇的听众讲道，“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犹太人都是按照‘科学的系统’被‘毒死或者焚烧’的。”这些描述证实了卡斯特纳和斯普林曼最糟糕的猜想，不过也给了他们渺茫的希望。在那位德国商人的描述中，除了令人恐惧的部分外，它也证实了希姆莱会留下强壮的犹太人作为奴工的新政策的事实，这或许可以为他们的营救计划提供喘息的机会。虽然“瓦达”与那位德国商人交流了一段时间，不过并没有形成重大的联合行动。那位德国商人就是奥斯卡·辛德勒。

“瓦达”曾经一次又一次地与其他组织进行合作，但都没有形成长期的合作关系。作为一个庞大而具有影响力的犹太团体，东犹太社区在主席福洛普·弗罗丁格的领导下为“瓦达”提供了大量的帮助，一直持续到1944年8月。那时，福洛普·弗罗丁格与纳粹做了一次特殊的交易——与他的50名亲朋好友一起逃到罗马尼亚。摩西·克劳兹是宗教大党米兹腊希党派的成员和布达佩斯巴勒斯坦办公室主任，“瓦达”也与他合作过，但卡斯特纳与克劳兹之间的竞争关系和个人恩怨使得他们始终无法达成共识，也给卡斯特纳带来了很多麻烦。主流的匈牙利犹太人的代言者是犹太委员会，但他们并不赞同犹太复国主义者们的社会、政治观点。这样看来，“瓦达”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独立面对德国的大屠杀。但事实上，“瓦达”内部也存在迥然不同的观点与背景，存在尖锐的矛盾，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整个犹太社区中存在的矛盾使他们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更加步履维艰。

1944年年初，“瓦达”内部就已经有了明确的分工。布兰德主要负责帮助难民，斯普林曼负责通讯网络，卡斯特纳则负责对外联系。“瓦达”的一大笔资金是由一名叫艾蒂特·维斯的男爵夫人捐献的，她本身却不是“瓦达”的成员。

从1943年11月辛德勒的来访，或者是在那之前开始，“瓦达”就有了从纳粹手中赎回犹太人的想法，而这种想法在德国占领匈牙利不久便具有了很强的可行性。面对大屠杀，“瓦达”来不及思考与纳粹进行交易是否道德，他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因为很多生命正等着挽救。事实上，一旦奥托·加莫里向那些冷漠、无能并且怀有敌意的匈牙利权贵们请求帮助无果，与纳粹交易便成了唯一的选择。可笑的是，那些可恶的德国人一下子又成了犹太人最后、唯一的希望。

开局策略

纳粹是不会让“离离原上草”“春风吹又生”的。德国军队刚刚占领匈牙利，艾希曼和他的手下便开始组织摧毁仍然存在的犹太社区与团体。面对这样直接的威胁，“瓦达”的成员试图解救匈牙利犹太人似乎变成了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

事实上，“瓦达”的计划与很久之前在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发生的营救事件类似，当时，犹太教的教士迈克尔·道夫·魏斯曼德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积极分子吉兹·弗莱彻曼曾试图与艾希曼的副官狄尔特·威斯里舍尼达成协议。1942年夏天，在斯洛伐克政府的强烈要求下，纳粹延缓了驱逐当地25000名仍然幸存的犹太人的行动，因为他们需要这些犹太人维持国家经济的运转，但魏斯曼德和弗莱彻曼认为那是他们向威斯里舍尼行贿20000美元（大概相当于今天的230000美元）的结果。这样看来，更大的营救计划似乎可行，接着，雄心勃勃的“欧罗巴计划”（“欧罗巴”是欧洲的别称）被制定出来了，“瓦达”通过秘密的通信渠道通知了相关





人士。

3月19日德国军队到达布达佩斯的时候，德国反间谍机关阿伯韦尔的探员约瑟夫·温宁格将乔尔·布兰德实施了保护性监禁。为了保护布兰德不会被其他德国部门逮捕，或者是保证所有有价值的东西的安全，卡斯特纳将“瓦达”与伊斯坦布尔、瑞士、布拉迪斯拉发的通信，以及从难民那里得到的关于德国暴行的报道，连同“瓦达”的资金一起藏在自己家里。同一天，奥托·加莫里和卡斯特纳带着家人逃到了位于塞姆西·安道尔大街15号的奥第·毕斯的公寓，并在几天后与汉斯·布兰德、乔尔·布兰德会合。毕斯是犹太人，从小受到天主教的教育，他将这所公寓注册为路德教会办公室当作波兰难民的避难所。

在布拉迪斯拉发，威斯里舍尼曾与魏斯曼德和弗莱彻曼商量找合伙人一起处理匈牙利的事务的事，结果被介绍给了福洛普·弗罗丁格——当时布达佩斯的东犹太社区的主席、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虽然威斯里舍尼与福洛普·弗罗丁格的几次会面并没有实质性的结果，但不管怎么说，魏斯曼德促使卡斯特纳开始考虑与威斯里舍尼交易的可行性问题。所以，卡斯特纳与布兰德开始让德国反间谍机关——阿伯韦尔的代表温宁格与乔安·施密特，向威斯里舍尼打探特别行动小组是否“准备在经济的基础上就节制反犹太措施的问题与非法的犹太营救委员会进行协商、谈判”（来源于《卡斯特纳报告》）。这些营救者为了挽救更多的生命，便开始与那些杀人犯讨价还价，如同买卖商品一般。事实上，对纳粹来说，我们的确不是人，充其量只是拥有潜在价值的商品。

4月5日（或许稍早一些），卡斯特纳与布兰德在温宁格的私人公寓里与威斯里舍尼会面。他们开门见山地向威斯里舍尼提问在什么条件下特别行动小组能：（1）赦免匈牙利犹太人；（2）不将匈牙利犹太人集中于隔离区；（3）不将犹太人驱逐出匈牙利；（4）允许匈牙利犹太人获得国外签证与入境许可以便移民。威斯里舍尼睁着眼说瞎话，他说，虽然德国人坚持

消除犹太人在各个领域的影响，但他们绝不会进行隔离与驱逐，“商议保留犹太实体是可能的”。实际上，他知道匈牙利当局已经勾结特别行动小组，命令匈牙利的警察和宪兵对犹太人进行注册登记，为隔离与驱逐做准备。他还补充道，德国的“高层”对“小规模移民”并不感兴趣，不过如果卡斯特纳与布兰德能够计划移民至少10万名犹太人，他就会说服柏林的高层。卡斯特纳和布兰德知道犹太事务处有3万个移民巴勒斯坦的许可，他们希望劝服德国人每张移民许可可以代表一家人，这样的话就有15万人可以移民。

为了允许10万名犹太人移民，威斯里舍尼代表特别行动小组提出了200万美元（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400万美元，那时，黑市上的兑换汇率是650万便戈兑换20万美元）的条件，其中的10%必须在一周内兑换成便戈（匈牙利当时的货币单位，1964年被“福林”替代）后提前交付，以显示犹太方的诚意和能力。施密特和温宁格也在场，他们要求将10%作为纳粹国防军的佣金，并提出了两人得到1%的服务费用的条件。威斯里舍尼还暗示，这200万美元也仅仅是一部分预付款而已。

为了使“瓦达”的领导层在谈判的过程中不受反犹太法规的约束，纳粹为他们提供了“豁免通行证”。他们不用佩戴黄色的六角星，不用受宵禁的限制，可以使用汽车和电话，可以自由地行动。虽然德国人和匈牙利的流氓并不总是遵守这些特权，不过总体来说，这些通行证还是能够让卡斯特纳及其伙伴们不必终日面对被逮捕和驱逐的威胁去进行他们的秘密工作。

为了满足威斯里舍尼的要求，布达佩斯的自由派犹太社区主席兼匈牙利犹太人的现世领导人萨姆·斯特恩将许多富有的犹太人召集到他的办公室，并且筹集到了500万便戈，“瓦达”也从自己的营救基金中拨出了150万便戈。但是，他筹集到650万便戈的时候已经超过了威斯里舍尼要求的最后期限，这激怒了德国人。





4月9日，卡斯特纳和布兰德带着筹到的300万便戈（大约相当于10万美元）来到温宁格的公寓，威斯里舍尼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比他职位更高的赫尔曼·克拉米与奥托·哈什。卡斯特纳看出了端倪，纳粹似乎将这样的交易视为重要的公事，而非私下的勒索。在布达佩斯，克拉米与哈什从犹太人手中拿走大笔便戈，与此同时，威斯里舍尼正在北部的马佳斯镇监督犹太当局准备围捕喀巴索-卢森尼亚的犹太人。威斯里舍尼曾断然否定的隔离于4月16日在那里开始了。

4月21日，卡斯特纳和布兰德又上缴了250万便戈，还差100万便戈。克拉米威胁着要撕毁他们之前的协议，哈什也表现得“义愤填膺”，但最终仍然同意延期付款。克拉米承诺，如果他们能够证明有中立国或美国同意接纳犹太人，一定数量的犹太人可以移民。

为此，卡斯特纳和布兰德在伊斯坦布尔的查姆·巴拉斯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一艘停靠在黑海的罗马尼亚康斯坦萨港口的大船已经准备好运送600名持有英国入境许可去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德国人强调，所有离开的犹太人必须假装是为了匈牙利当局的利益而被驱逐的群体，并用自己的性命发誓保守“帝国机密”。

通常，移民证件会由巴勒斯坦办公室的摩西·克劳兹分发，不过卡斯特纳并不想将这样重要的事情交到竞争对手的手上，所以他将制定接受证件名单的任务交给了奥托·加莫里和艾尔诺·西拉吉。结果，名单有了很大的改动，而且人数也几乎增加了3倍。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卡斯特纳成了最终人选的决定者。

300名来自各省的持有许可证的犹太人被纳粹带到了布达佩斯的“特权集中营”。5月2日，克拉米需要一份300人的名单，并由于又收到了1000万便戈或350万美元，准许移民的人数又增加了100个。5月3日，卡斯特纳赶到科罗日瓦，在当地犹太领导层的帮助下挑选了300名犹太人。由于其他地方犹太人的抗议，一份包括其他省份犹太人的暂时性名单

出炉了。就在当天，科罗日瓦开始了对犹太人的隔离。所以，卡斯特纳谈判的第一阶段大致与我被困于科罗日瓦隔离区、逃往布达佩斯，以及被允许进入卡伦巴兹集中营发生在同一时间。

在犹太人开始被隔离的时候，德国反间谍机构工作人员、曾在布达佩斯帮助卡斯特纳与辛德勒几次会面的牙医鲁迪·塞德莱兹克开车将卡斯特纳送到科罗日瓦。卡斯特纳在路上的所见所闻使他感到非常痛苦：“路上到处都是小股的犹太人。他们乘着牛车或马车，车上是他们少得可怜的财产。大多数人在步行，年轻人、老人、女人都疲惫不堪、步履蹒跚。他们的脸犹如在犹太赎罪日那般惨白，他们眼神中流露出悲伤与不幸，被宪兵们用尖尖的刺刀赶到了城里的隔离区——他们的收容点，也是被驱逐前的最后一站。”

在科罗日瓦的那段时间，卡斯特纳与当地犹太社区的领导人进一步讨论了合作的相关事宜，并断言，紧随隔离之后的就是驱逐和灭绝。我们并不知道讨论的具体内容，但可以肯定的是，犹太人社区的领导人并没有将其告知社区成员，而10年后，这样的遗漏成了卡斯特纳的悲剧的决定因素。

与此同时，卡斯特纳会见了威斯里舍尼。这位天生的骗子解释道，艾希曼将他从谈判中撤离，而让他负责隔离行动，因为犹太人对他的“印象太好了”。当卡斯特纳直截了当地问，德国人是不是即将对匈牙利犹太人进行大规模驱逐时，威斯里舍尼含糊其辞。直到返回布达佩斯时，他才告诉卡斯特纳，驱逐行动即将开始。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5月8日——我的11岁生日，驱逐就是于那天的一周之后开始的。

同时，艾希曼给了乔尔·布兰德一个惊人的提议。



第五章 “生命卡车”

“布拉德任务”

4月25日清晨，阿道夫·艾希曼传唤乔尔·布拉德。9点，布拉德被一名驾驶黑色梅塞德斯轿车的纳粹警官带到艾希曼在大华酒店的总部。接下来的描述主要是基于亚历克斯·维斯伯格对布拉德的回忆复述，虽然不是百分之百准确，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都能在卡斯特纳的报告和其他资料中得到证实。

这一天，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阿道夫·艾希曼不是被描述成一个穿着纳粹制服的冷酷的年轻军官，就是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的秃顶、年迈的囚犯。布兰德对他的描述是：40岁左右，中等身材，偏瘦，金发，薄唇，鼻瘦。要不是他有“钢青色、锋利、能将你看透”的眼睛，也许你会认为他只是“办公室的普通职员”。他说话就像“机枪一般，他能厉声说出一连串话，然后戛然而止”。这次会面时，在简单的开场白之后，艾希曼提



出了他那臭名昭著的“商品换血肉”的提议。

“我想你知道我是谁。我曾经负责德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些‘行动’，现在该轮到匈牙利了……我调查过你和你在联合会的同伴，而且……我准备卖给你 100 万个犹太人……商品换血肉。你可以从有犹太人的任何国家进行挑选……你想要什么样的？强壮的男人？能生孩子的女人？老人？孩子？坐下来，我们谈谈。”

布兰德摇了摇头，回答道，他无法提供任何商品，因为犹太人的工厂全都倒闭了，商业也全被禁止了。他问艾希曼是否可以用金钱代替商品，需要多少钱。不过，艾希曼坚持说道：“我后天要去柏林，到时候我还会与我们的领导人再次讨论这个问题。在这期间，你必须想好能给我们什么商品……赶紧和你的同伴以及同盟国的代表联系吧，我希望尽快得到你的答复。”

布兰德建议道，他可能会去伊斯坦布尔，那里处理巴勒斯坦的犹太事务的负责人是连接德国统治下的犹太人与同盟国统治下的犹太人的最佳人选。艾希曼同意了，不过他凶狠地提醒布兰德，他的母亲、妻子和子女将会被扣做人质，以保证他会回来。

5 月 8 日，艾希曼又一次传唤了布兰德。这次，他已经有了“高层的同意”以使谈判继续进行。“我想要一些军用卡车。你想要 100 万犹太人吗？我有一个公平的提议，你给我 1 辆军用卡车，我给你 100 个犹太人……我总共需要 1 万辆卡车……卡车必须是全新的，并要装有冬季的装备。”

艾希曼声明这些军用卡车将“专门用于东部前线”，“绝不会用于西方”，他还向布兰德保证道：“要是你从伊斯坦布尔回来后告诉我，你们可以接受这样的提议，可以先带走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 10 万犹太人，然后再交付那 1000 辆卡车。然后我们继续这样，先释放，后交付，每 1000 辆卡车换取 10 万犹太人。”

讨论继续进行着，艾希曼最终与布兰德就赎金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1 万辆卡车，200 公吨茶叶，800 公吨咖啡，200 万块肥皂，不定量的

金属钨，以及德国在战争中需要的其他商品。

艾希曼于5月14日第三次传唤了布兰德，在场的还有奥托·克拉各斯。令布兰德吃惊的是，奥托·克拉各斯将从瑞士运往“瓦达”途中被德国人截下的5万美元、27万瑞士法郎以及许多信件交还给他。这一做法是为了显示这些德国“商业伙伴”的可靠性。

5月15日，布兰德与艾希曼进行了最后一次会面，艾希曼告诉布兰德，匈牙利的驱逐已经开始了：每天都会有12000名犹太人被带走。艾希曼说，这些犹太人将被运送到奥地利或斯洛伐克等待布兰德的回复，而不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如果你在一周，最晚两周之内带着肯定的答复回来，我现在驱逐的这些人就会被送到西班牙的边界；如果你不回来，或者没有按时回来，他们就会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

当布兰德将这些情况汇报给“瓦达”的成员时，他们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大营救希望惊讶不已，但很快就开始产生了疑虑。他们不相信纳粹对交易的诚心，而且同盟国也不大可能同意这样的提议。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有机会在这样的事情中予以得益：一方面，布兰德在伊斯坦布尔或许可以警告世界，说服同盟国采取行动营救那些仍然生活在德国的魔爪之下的犹太人；另一方面，拖延这样的谈判（通过欺骗、托词、诡计——他们唯一能够与这些国家批准的杀人魔王们进行斡旋的武器），他们或许可以将犹太人的生命拖延到第三德意志帝国的灭亡。

至于艾希曼，他也不相信这样的交易能够获得成功，而且他很可能根本就不想让这笔交易成功，因为和赚钱相比，他宁愿不履行自己的义务。而这笔交易背后的真实原因或合理的假设，我们必须进行深层次的研究。

显然，艾希曼的所有行动都要听从于他的长官海因里希·希姆莱，不过希姆莱到底希望从这样的交易中得到什么呢？或许，在这最后一刻，他决定扮演犹太人的拯救者，从而在日后得到较好的待遇，他下令暂停驱逐与灭绝似乎能印证这一点。又或许他想玩弄这些犹太人，使他们配合德国





人对他们的灭绝屠杀：让他们一直保持希望，直到死亡。我们还应该从战争本身深层地考虑另外两个假设。第一个便是宣传。希姆莱试图使自己的提议被否决，这样他就可以将欧洲犹太人的灭绝嫁祸给同盟国和自由世界的犹太组织，为自己脱罪。另一个假设则具有更深刻的内涵：我们有理由相信，希姆莱是在挑拨西方同盟国与苏联的关系，原因是与英国、美国达成停战协议，以集中精力抵抗红军。如果是第二种情况，人们猜想，布兰德的任务只是班迪·格罗希那份更重要的任务的一个幌子，而此时的班迪·格罗希正准备去伊斯坦布尔建立德国情报办公室与英国、美国之间的联系。不管是什么样的动机驱使希姆莱命令艾希曼提出这样令人吃惊的提议，德国人显然错误地认为“瓦达”具有国际事务的某种影响力，不过“瓦达”并没有纠正他们这种错误的想法。

5月17日，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赫尔曼·克拉米驾车将布兰德和格罗希送到了维也纳，2天后坐德国飞机抵达伊斯坦布尔。在他们离开前，汉斯·布兰德头一次受到了艾希曼的传唤。艾希曼命令汉斯·布兰德，要将这笔交易当作“帝国秘密”来保守，并且要向他汇报从伊斯坦布尔收到的所有消息。此外，他还规定，汉斯·布兰德全家必须留在布达佩斯，每天都要向他报告行踪。同一天，汉斯·布兰德“觉得这不是一个女人应该承受的重大责任”，接着，卡斯特纳获准与艾希曼见面。他向艾希曼介绍了自己，并与汉斯·布兰德一起继续谈判。

在伊斯坦布尔的惨败

“瓦达”通知伊斯坦布尔的犹太代表们，布兰德即将到达那里后，他

们接到了一份加密的电报，大意是“查姆”正在准备接见布兰德。“瓦达”认为，电报里的“查姆”指的是魏兹曼——受人尊敬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主席。“瓦达”对这个消息感到十分兴奋，不过当布兰德降落在伊斯坦布尔的时候，他吃惊地发现在那里等待他的是查姆·巴拉斯——犹太事务处当地委员会（伊斯坦布尔的瓦达）的主席。他们刚刚到达伊斯坦布尔，格罗希就立即被自己的联系人带走了，布兰德却没有土耳其的签证而禁止入关，直到犹太事务处的官员为他弄到了一张暂时许可。

会议在派拉宫酒店进行。在会议中，布兰德向犹太复国组织的代表们讲述了在匈牙利获得的有关大屠杀的消息，并力劝他们立即获得同盟国原则上的同意，以继续与德国人的谈判。尽管如此，布兰德并没有幻想那笔交易能够成功，因为他相信，口头的承诺只能延缓驱逐，如果假装继续谈判，或许可以在战争结束之前为活着的犹太人赢取宝贵的时间。此外，布兰德描述了每天 12000 名匈牙利犹太人被带到非人的环境中等待死亡的情景，并要求与魏兹曼或舍托克具有相同影响力的人物立刻赶到伊斯坦布尔，从而让德国人认为会议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要求同盟国能够空袭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焚尸炉和通往奥斯维辛的铁路。

在接下来的几周，犹太事务处的领导人多次恳求英美政府，但都无果而终。他们既不可能为德国人提供重要的战略物资，也无法要求英美政府假装愿意参加这样的谈判。尽管犹太组织的代表与伊斯坦布尔、伦敦、华盛顿的外交家以及政治家仍在积极地探讨，但始终没有任何进展。6 月下旬，摩西·舍托克去伦敦请求英国能够“将萝卜悬吊在德国人的眼前”，以此延缓德国人驱逐匈牙利犹太人的行动。令人失望的是，摩西·舍托克得到的只是典型的官方答复，英国的外交部长安东尼·艾登向他保证，英国会竭尽所能挽救犹太人的生命，事实上，英国政府在 6 月初就已经决定拒绝接受德国人给出的价格。7 月 11 日，英国首相丘吉尔重申，英国不会





与纳粹德国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并让艾登公开宣布，将处死任何与大屠杀有关的罪犯。美国官方由于受到了英国的影响，也没有提供进一步的帮助。英美政府还告知苏联，艾希曼准备将那些卡车用于东部战线，所以苏联人也断然拒绝与德国进行谈判。莫斯科的美国大使于6月19日向华盛顿报告说，苏联政府“认为与德国政府就以上涉及的问题进行的任何对话都不合适，也是不被允许的”。

6月底和7月初，舍托克与魏兹曼请求同盟国空袭奥斯维辛集中营，却遭到了艾登及英国外交部的拒绝。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也提出了相同的请求，也被美国陆军部拒绝了。

同盟国拒绝与德国谈判（即使是假装谈判），主要是因为他们坚持要德国无条件投降。任何谈判都会违背这个原则，一个具体化的交易则极有可能对同盟国主导战争产生不利的影响。而他们拒绝空袭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原因错综复杂。首先，他们不能保证这个行动能百分之百成功；其次，他们不愿意打乱自己的战略计划；再次，他们担心大量的难民涌入他们的国家，而并不在乎犹太人的生死。当时，移民美国和英国的犹太人执行的是严格的配额制，但美国和英国都不准备放宽配额，尤其是英国。英国担心大量犹太人涌入巴勒斯坦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因为那时巴勒斯坦还在其管辖范围之内。6月底，在开罗，一名英国政客听说艾希曼的提议后诧异地问布兰德：“我要怎么处理这100万个犹太人？我要把他们放到哪里呢？”据布兰德所说，那名政客是中东的国务部长莫恩勋爵。

西方的同盟国断定艾希曼的提议背后最有可能的动机是分化他们与苏联。经过了许多秘密的探讨之后，这笔交易最终被否决了。6月19日的《纽约先驱报》斥责这笔交易是德国试图破坏同盟国团结的邪恶计划。6月20日，伦敦《泰晤士报》以“一份可恶的‘提议’”为题写下了以下内容：“显然，面临着即将来临的战败，德国政府正在绞尽脑汁全力敲诈、蒙骗、分裂同盟国。在他们最后的挣扎中……他们的幻想与自欺欺人达到

了新的高度。他们提出或发起了一个用匈牙利犹太人换取军需的提议……这简直就是这场战争中最令人作呕的提议。开始时他们蓄意屠杀，现在又企图敲诈……英国政府知道如何处理任何德国人发起的提议……德国人的‘提议’不过是期望挑拨同盟国的美好愿望罢了。”

提议流产了，布兰德任务的悲剧结局也注定了。

自从抵达伊斯坦布尔，布兰德就一直被土耳其当局骚扰。他希望见到犹太事务处的高层人员，摩西·舍托克在巴勒斯坦时却无法获得土耳其的签证，因此他决定在叙利亚的阿勒颇（在土耳其与巴勒斯坦之间）与舍托克会面。6月5日，布兰德乘火车离开伊斯坦布尔，在到达叙利亚边境之前，犹太地下组织——伊尔根的两个成员在安卡拉登上火车，并警告他不要掉进英国的陷阱，但布兰德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前进。6月7日，布兰德刚刚进入叙利亚，就被英国人以“疑似纳粹间谍”的罪名而扣留下来了，并最终被允许在英国情报人员在场的情况下与舍托克见面。他向舍托克详细讲述了大屠杀的进程以及“瓦达”做出的努力。舍托克被深深地震撼了，却无法提供帮助。当舍托克告知布兰德，英国要把他当作战俘带到埃及的时候，布兰德绝望地大声喊道：“你还没有意识到你在做什么吗？这是谋杀！屠杀！要是我不回去，我们的人就会被屠杀……我是100万个被判死刑的犹太人的代表，他们的生命就取决于我是否回去。”在担忧大量犹太人的命运的同时，他也害怕艾希曼会报复他的家人：“我的妻子！我的母亲！我的孩子！他们将会被最先杀死。”但无论布兰德如何哀求，舍托克只是承诺，他会与伦敦的高层继续探讨这个问题，但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在一名英国官员的监护下，布兰德乘火车穿过巴勒斯坦来到开罗，然后接受了英国人长达三个多月的审问。10月5日，这个痛苦的经历终于结束了，恢复自由的布兰德可以选择去巴勒斯坦或返回匈牙利，并最终在犹太事务处的帮助下选择了前者。如果他当时选择的是后者，他很可能立即





被艾希曼处决。

不过，在离开伊斯坦布尔去阿勒颇之前的这段很短的时间里，布兰德仍然取得了小小的成功。他劝服了伊斯坦布尔的“瓦达”于5月29日草拟了一份“临时协议”，协议中记录着以下内容：解决合法与政治困难的协商进展顺利；这份文件力劝德国人停止驱逐，并且允许犹太人移民。也许是通信的问题，这份文件直到匈牙利的省级驱逐完成的3天前，也就是7月5日才到达布达佩斯。

布兰德受困于中东时，他回到匈牙利的同伴以为他已经逃亡了，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同盟国拒绝帮助，甚至拒绝假装对德国人的提议产生兴趣背后深层的军事、外交和政治原因。布兰德谴责同盟国和巴勒斯坦的犹太领导层蓄意地背叛了他，却一直无法为自己辩解，也就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了。他为自己与妻子汉斯的争吵而懊恼，也自己无法取得与卡斯特纳一样的成功而嫉妒。在这两种思想的折磨下，他最终于1964年死于以色列。

布兰德的任务惨败后，在汉斯的支持下，卡斯特纳成了“瓦达”营救行动理所当然的领导人。

第六章 残酷的任务

卡斯特纳的双面性格

卡斯特纳虽然名义上只是“瓦达”的副主席，但已经是“瓦达”的核心人物了。要了解他与德国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他那矛盾的性格。

1906年4月14日，卡斯特纳出生于科罗日瓦，在那里的犹太中学念书。16岁时，他加入了巴里西亚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并在26岁时成了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20几岁时，他获得法学学位，之后成了一名记者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积极分子。他经常为《新东方》报纸提供稿件，还是伊哈德党（中左党派的集团，与巴勒斯坦的工党关系密切）的成员。1937年，他和厄采贝特（她的昵称是“伯格幽”，意思是“浆果”）结婚。厄采贝特的父亲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不仅家境富裕，还是科罗日瓦犹太宗教社区的主席和罗马议会的成员。加入这样的家庭不久，岳父母就给交给卡



斯特纳一个重要的任务——破坏伯格幽的妹妹维莎与乔尔·纳斯布彻（或乔尔·帕尔基，这是他移民到巴勒斯坦后的名字）的关系。后来，虽然乔尔·纳斯布彻和维莎都移民到巴勒斯坦，却最终成了路人，维莎嫁给了皮萨齐·鲁吉克。

1940年，特兰西瓦尼亚被匈牙利吞并不久，卡斯特纳搬到了布达佩斯，继续他的犹太复国主义活动。1942年，他被征募到匈牙利军队的奴工组服役6个月，主要在特兰西瓦尼亚建筑工事。被释放后，他又重拾了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工作，并成了正在发展中的“瓦达”的重要成员。

我一直无缘见到卡斯特纳的“庐山真面目”，但即使我们有幸见面了，他也不会留心我这个11岁的小孩。当我在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听到大人们讨论卡斯特纳的时候，我把他想象成一个超人，似乎他可以赤手劈开铁丝网，当着那些惊恐的卫兵的面带走我们，就像摩西（《圣经》中犹太人的领袖）将犹太人带离埃及那样。但事实正好相反。根据那些认识卡斯特纳的人的回忆，他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他那惊人的力量却又伴随着同样的软弱。里夫卡·巴尔约瑟夫曾是战前卡斯特纳领导的青年犹太复国主义集团的成员，他说，卡斯特纳十分“机智、精明”，但同时又强调，“他经常许下无法兑现的诺言”。拉菲·本沙勒姆是匈牙利犹太复国主义青年抵抗组织的成员，他曾在营救活动中经常与卡斯特纳会面，他回忆道，卡斯特纳“非常有勇气”，虽然勇气过大就是“自大”。

作为卡斯特纳最亲密的同事，乔尔·布兰德也有充分的理由批评卡斯特纳。因为卡斯特纳不仅在“瓦达”内部是他的竞争对手，还利用他在国外执行公务时与他的妻子汉斯偷情。尽管如此，在自己的回忆录《为死人辩护》中，布兰德对卡斯特纳的描述却不偏不倚。对布兰德来说，卡斯特纳似乎就是“那些恃才傲物的知识分子的原型，他缺乏平易近人的气质”。他反应敏捷，却不十分值得信赖，有时他做事草率，并且“不易共事”，不过“当他将精力集中到某件事情上的时候，他能够完成一些看起来似乎

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在危急时刻，他显示出了不可思议的勇气”。

福洛普·弗罗丁格在逃亡罗马尼亚不久后的一份报道中写道，卡斯特纳“本性专横，嫉妒其他人的成就，不遵守会面的时间和达成协议的内容”。但同时，他也承认卡斯特纳富有理想，极具能力，“是一个有远见、无私的人，他总是愿意冒个人风险完成艰巨的任务”。

当然，这些人的证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卡斯特纳的性格，但他的女儿苏希无疑是最具说服力的证人。从我和她的谈话中，我可以肯定地说，她非常崇拜自己的父母。正因为如此，她欣然地接受了对于他父亲傲慢的指责，但她也重复了之前自己在父亲的访谈中说过的话，“一方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他喜欢帮助别人。另一方面，他又傲慢，十分傲慢，但他有理由这样，因为他是那么聪明、博学、英俊并且魅力十足”。她不愿意接受人们对她父亲的不诚实的指控，更愿意将他视为一个运用智慧与运气而非谎言的博弈者。在接受学者安·帕斯捷尔纳克·斯莱特的采访时，她说：“他不是骗子，不过他喜欢赌运气！”

乔尔·布兰德去伊斯坦布尔后，卡斯特纳与纳粹的谈判日渐频繁，不是被艾希曼传唤，就是自己主动找他。显然，这些会面使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他必须迫使自己表现得无所畏惧。即使双腿不停地颤抖，他仍然能镇定自如，视杀人魔王们于无物。一次，他向汉斯·布兰德抱怨艾希曼总是在会面者面前吸烟，汉斯·布兰德却建议他也这样做。卡斯特纳真的这么做了，展现出了他的自信，尽管很做作，但目的总算是达到了。战后，艾希曼（不论真假）赞赏卡斯特纳的冷酷和自信，说他“就像在咖啡馆里吸烟一般”。

人们普遍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卡斯特纳是一个雄心勃勃、不可一世、奸诈狡猾的人，但又思维敏锐、外交技巧高超、勇气可嘉。如果在相对正常的条件下，卡斯特纳的许多特点或许不会那么令人钦佩，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这些特点正是与德国人建立关系所必需的，卑尔根-贝尔森集中





营中的成员肖莎娜·巴泽尔就将称其为“一个互相欺骗的故事”。而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中的另一个成员伊娃·斯皮特说：“卡斯特纳是一个‘没有顾虑的人’，一个花花公子和骗子，一个‘有着像气球一般膨胀的自负的男人’，不过，在当时的极端情况下，那些令人讨厌的特质使他‘成了与德国人接触的最佳人选——他可以贿赂他们，与那些德国人一起去拈花惹草、酗酒、打牌，并且故意输掉扑克游戏’。”

伊娃·斯皮特也许夸大了卡斯特纳为人不实、沉迷酒色的程度，不过我们肯定的是，如果卡斯特纳只运用礼貌、诚实的手段，根本就不可能取得那样的成功。亚历克斯·巴泽尔也认为卡斯特纳是一个“自大、高高在上、争强好胜”的人，但他更强调，“他之所以能在纳粹占领期间做出这么伟大的事情，完全取决于他的性格。在德国人控制的地狱采取任何行动，都需要非常特殊的个性和领导才能，做出决定的能力，甚至还需要有点肆无忌惮，他能做到这些，所以他成功了。”因此，卡斯特纳遭遇厄运时，亚历克斯·巴泽尔成了他坚定不移的捍卫者。

历史学家们对卡斯特的描写也或多或少着重于他矛盾的性格。对卡斯特纳最详尽的描写（尤其是对他战后在以色列的经历的描写）是由耶奇姆·韦茨撰写的《被谋杀两次的男人》，该书于1995年用希伯来语出版，后来还出现了英文译本。韦茨对卡斯特纳详尽的叙述既不带偏见又表现出同情，他指出了卡斯特纳“执著地想要成为中心人物”的事实，也劝告人们不要用和平年代的标准去评判卡斯特纳在大屠杀风暴中的行为。他将卡斯特纳能够坚持与纳粹罪犯们博弈到底的惊人能力归功于他的双重性格：“一个敢于深入虎穴并能与纳粹官员保持联系的人一定具有某些非凡的特质，尤其当他两手空空，根本无法提供拯救犹太人的筹码时。为了做到这一点，这个人不仅拥有钢铁般的勇气与意志，还必须具备其他更加阴暗的特质，比如狡猾和撒谎不眨眼的的能力。这些特质通常被认为是负面的性格，但在地狱般的布达佩斯，这些特质极其重要。”

德国人曾允许卡斯特纳去瑞士募集资金，但为了继续营救工作，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难得的逃生机会，一次又一次地勇敢地走进那个杀人魔王的办公室。为此，韦茨对卡斯特纳的勇气表现出了崇高的敬意。

“诺亚方舟”

当布兰德竭尽全力使同盟国真正或假意愿意与德国人进行谈判的时候，布达佩斯的“瓦达”同样在尽力劝说艾希曼，使他相信谈判的停滞只是暂时的。卡斯特纳（通常是在汉斯·布兰德的陪同下）会不时拜访艾希曼，这一小股犹太人与那个数百万犹太人的灭绝者之间便建立起了奇怪的关系。

虽然艾希曼动动手指就能够杀死他们，不过卡斯特纳与汉斯还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试图能够与他平起平坐。卡斯特纳与汉斯是在用成千上万的生命赌博，包括他们自己的性命。在死亡面前，他们装作无所谓，将仇恨与厌恶藏于手段与圆滑背后。当艾希曼欺骗、勒索、恐吓他们的时候，他们则试图哄骗他，并用自己的花招来应付他的谎言、没有兑现的承诺以及明目张胆的威胁。艾希曼蔑视他们，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但他又暗暗地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有某种神秘的能力。正因为如此，纳粹高估了卡斯特纳及其同伴的重要性，相信了他们代表美国犹太联合救援委员会的谎言。

布兰德离开后不久，卡斯特纳与汉斯鼓起勇气警告艾希曼，科罗日瓦小队遭到的任何耽搁将会对犹太事务处与同盟国的决定产生负面影响。当他们抱怨喀巴索-卢森尼亚的被驱逐者们遭到的非人道待遇时，艾希曼回答道，如果的确有100个人被挤到运牛的卡车里，那么其中一定有很多小





孩，不会太拥挤。在被要求停止驱逐的时候，艾希曼宣称，他“并不是傻瓜”，如果他这样做了，“国外的人”立刻就会停止谈判。5月22日，艾希曼释放了600名手持巴勒斯坦准入证的犹太人。当时，德国领导层已向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教法首席说明官）艾敏·侯赛尼保证，犹太人不会被移民到巴勒斯坦，所以这批人将穿越德国和德国占领的法国到达西班牙，再去非洲。接下来的事，就和艾希曼没什么关系了。

5月27日，匈牙利秘密警察的3名探员再次突袭了奥第·毕斯的公寓——“瓦达”的藏身之地。他们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美元、瑞士法郎和匈牙利便戈，这些钱是由伊斯坦布尔和瑞士提供的逃亡计划基金。幸运的是，他们没有发现一个装满伪造的身份证件的手提箱，那个手提箱当时是由参加营救难民行动的犹太复国主义先锋组织保存的。卡斯特纳与他的妻子伯格幽、汉斯·布兰德、汉斯的妹妹，以及其他几个人被带到了坐落于布达希瓦基山的警察局总部。一群波兰和斯洛伐克犹太人用假文件试图进入罗马尼亚时被匈牙利的宪兵抓获，在严刑逼供下，一个人交代了制作假证件的人的名字。这个人被逮捕后，也交代了自己与“瓦达”联系的事实。

卡斯特纳与他的同伴被拘禁5天后，汉斯·布兰德最先被提取审讯，审讯者是秘密警察的头目皮特·海恩。海恩将假证件的制造者带到了汉斯的面前，那个人承认汉斯曾花钱请他制作伪造证件。接着，海恩着重盘问她与犹太复国主义先锋组织营救工作的联系，以及德国人将她的丈夫派往伊斯坦布尔的原因。尽管被打得皮开肉绽，汉斯也没有招供。后来在审讯艾希曼的法庭上，汉斯提供证词时回忆道：“这种半问半打的审讯共持续了7个小时左右，不过我并没有告诉他们任何事情，因为我不想破坏‘瓦达’营救犹太人民唯一的机会。”

卡斯特纳是第二天早上被审讯的。头五分钟过后，主管警察便开始对他拳打脚踢，接着，电话铃响了，一名纳粹上士出现在门口，并将被抓来

的所有“瓦达”成员带到附近的纳粹总部，2个小时之后就释放了。后来，卡斯特纳才知道，纳粹害怕被逮捕的“瓦达”成员泄露艾希曼试图贩卖犹太人的“帝国秘密”，于是与匈牙利首相多姆·斯托杰进行协商，最后才决定释放他们。

在卡斯特纳被捕期间，布兰德发来一份电报说，一份“暂时协议”已经达成，正在发送的途中。因此，卡斯特纳再次要求艾希曼暂停驱逐，但那时，艾希曼已经将喀巴索-卢森尼亚和北匈牙利地区的犹太人全部驱逐了。他回复道：“那是不可能的，相反，我还会加速驱逐”。接着，卡斯特纳要求立刻将从各省挑选的犹太人带回布达佩斯，艾希曼答应了他，不过6月3日，他召见卡斯特纳，声称由于德国与匈牙利政府间的困难而无法将各省的犹太人带到布达佩斯。当卡斯特纳提醒艾希曼，他已经下令科罗日瓦那部分犹太人出发的时候，艾希曼回答道：“是的，不过我昨天又收回了命令。清楚了吗？我已经对你不耐烦了！”

这时，卡斯特纳感到了深深的挫折感，他列出了德国人违背诺言的清单：“起初，我们试图阻止或者至少延迟驱逐，德国人同意了，然后我们付钱了，付了一大笔钱，但他们违背了诺言。之后，我们要求至少允许600人移民，他们又同意了，并且许诺要将300名杰出的犹太人从各省带到布达佩斯，但他们再次违背了诺言。如今，30多万犹太人被送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那300个人无人幸免于难。”

卡斯特纳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这不仅是要从各省营救几百个生死线上的犹太人，如果艾希曼此时此刻不肯被迫让步，那么在我们希望用钱换取生命的赌博中，我们就注定是天真的失败者，就像之前那些德国占领下的欧洲人一样。如果是这样，我花费的几百万美元、便戈就只是为了一个愚蠢的幻觉，而这场游戏的失败者将被称为叛徒。”

战后，有人指控卡斯特纳为了解救自己的家人和朋友而背叛了大量的匈牙利犹太人。但事实上，他的确是要阻止那些还没有被赶到奥斯维辛集





中营的大批犹太人被驱逐。我们这些来自科罗日瓦以及其他地方的这一小帮人只是帮他完成了一次检验，如果德国人释放了我们，或许会使同盟国对艾希曼的提议产生兴趣，反之，或许可以劝服德国人推迟驱逐。卡斯特纳试图通过营救几百个人而达到营救成千上万人的目的，尽管并未奏效，那也总比什么都不做好得多。艾希曼的把戏无数次令卡斯特纳发狂，但他一次又一次地振作起来，因为他觉得如果放弃努力，他背叛的不仅仅是来自科罗日瓦的那一小帮人，而是所有可能被拯救的犹太人。

在提供证词时，汉斯·布兰德形象地描述了艾希曼的猫鼠游戏。在5月至9月，汉斯自己或者在卡斯特纳的陪同下与艾希曼会面15次以上，与卡斯特纳一样，她也对艾希曼的谎言愤怒不已。她回忆道，艾希曼“总是强调德国的军官多么信守诺言，而他也以信守诺言为荣，不过实际上，他不以任何事情为荣”。面对艾希曼的诡计，“瓦达”也显得很无助：“我们所做的一切，所有的工作，就像是磨坊里勤劳的磨车，我们头一天创造的东西，第二天便发现丝毫不剩了。”艾希曼的背信在布拉德任务的开始阶段就已经十分明显了，他曾经承诺，对从匈牙利驱逐的第一批犹太人将“不会启动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样是为了给谈判提供基础”，不过实际上，他“立即启用了毒气室”。关于有人抱怨他言而无信，他威胁要继续使用毒气（不论如何，他都会那么做），并且告诉汉斯：“你完全可以给你丈夫发电报，告诉他我在做什么——没有人认为我会害怕。”有一次，请求他不要将孩子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拒绝后，汉斯突然咆哮道：“你可能没有孩子，这就是你对他们没有怜悯之心的原因。”艾希曼回答道：“你现在可是有很大的自主权，布兰德女士，不过如果你再那样无礼，你就不要再来见我了。”

实际上，艾希曼从来不想放过犹太人，也不同意任何大规模的营救计划。他也许准备让一些人逃离，不过这只是为了便于他消灭更多犹太人。汉斯记得，当布兰德无法回到伊斯坦布尔的时候，艾希曼“十分愤怒、不

安”，不过他“很高兴这笔交易没有取得成功”，因为他能“自由、愉快地”驱逐犹太人。之后，当希姆莱命令暂停驱逐的时候，艾希曼还试图违抗他的命令。我们不知道他这样做是他自己的决定，还是听从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和海因里希·米勒的命令，以践行希特勒“不留一个犹太人”的决定。

当卡斯特纳听说艾希曼收回了他将300个犹太人从科罗日瓦送往布达佩斯的承诺时，他决定虚张声势。他找到赫尔曼·克拉米和奥托·克拉各斯，威胁着要通知伊斯坦布尔“没有必要再继续进行谈判了”。不久，艾希曼便传唤了他，哈什、克拉米、威斯里舍尼与诺瓦克也在场。艾希曼当场暴怒，卡斯特纳却毫无反应。当艾希曼冷静下来的时候，发生了以下的对话：

“你到底想干什么？”艾希曼开始了话题。

“我坚持要履行我们达成的协议。你能把我们商量好的将犹太人从各省带到布达佩斯吗？”

“我曾经说过不行，这次还是不行！”

“那我们就没有必要继续进行谈判了。”

卡斯特纳假装起身要走。

“你神经过度紧张了，我会把你送到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去恢复恢复，还是你更想去奥斯维辛集中营？”

“你这么说没有意义，没有人能够代替我的位置。”

“你必须理解我，我必须把这些犹太垃圾清理干净！争吵和叫喊都于事无补。”

“那我们在伊斯坦布尔的探讨也同样没有意义了。”

“这点犹太人对你那么重要吗？”

“这不是人数多少的问题。你一直在推进驱逐的进程，导致事情在伊斯坦布尔进行得并不顺利，因此你必须证明你的提议的认真的。你就这么





在乎这些犹太人吗？”

在近一个小时里，艾希曼时而似乎就要让步，时而怒气冲天地敲打桌子。随后，他突然决定将 100 至 200 个科罗日瓦的犹太人送到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为了骗过匈牙利当局，这些人将与被驱逐者们一起乘坐开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列车。艾希曼将责任推到了匈牙利国务卿的身上，他解释道：“我不能在这里扮演犹太人的救星，我向拉兹罗·奥第承诺过不让犹太人活着回到这个国家。”

当卡斯特纳对这个提议表示不满的时候，艾希曼的副手狄尔特·威斯里舍尼插话道，纳粹已经告知匈牙利当局，一个危险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阴谋被发现了，这个组织的成员将必须与去往帝国工作的犹太人们分离开。带着身为优等民族的骄傲，艾希曼最后许诺：“好吧，科罗日瓦的犹太人就要到布达佩斯了。”

在艾希曼作出承诺之后的两个小时里，双方进行着讨价还价，艾希曼同意“大约 200 人”将被带到首都，他们将带着行李乘坐未密封的运牛卡车，然后被送到有纳粹卫兵看守的集中营中。卡斯特纳离开时见到了要去押送犹太人到布达佩斯的纳粹上士，并承诺如果那“大约 200 人”比实际人数多，就给他一大笔报酬。最终，他们达成了共识——被运送的人必须是那些手持巴勒斯坦护照或其他出国许可文件的犹太人。艾希曼需要一份从科罗日瓦带到布达佩斯的犹太人的名单，并且拒绝了科罗日瓦犹太委员会进行编制的要求，这样，奥托·加莫里与艾尔诺·西拉吉就承担了从 18000 名隔离区的犹太人选出 388 人的艰巨任务。他们得到了科罗日瓦东犹太人社区的前任主席齐格蒙德·莱本的帮助，他那时正好在布达佩斯。卡斯特纳将这描述为一个“充满内心挣扎的极其痛苦而复杂的任务”。

负责挑选的人员更希望只救出孩子，但在艾希曼编造的“阴谋”论的要求下，名单中的大部分必须是成年人，并且他们也不能将孩子和家人分开。经过了持久、激烈的讨论，他们决定在以下范围内进行挑选：“（1）

对犹太公共生活有价值的人；(2) 为犹太社区服务过或为犹太社会事务做出过牺牲的人；(3) 奴工留下的寡妇和孤儿”。最终，他们从 250 个家庭中确定了人选。这份名单随后在科罗日瓦隔离区又被修改了，因为有的人被当地的犹太领导层替代了，有的人通过贿赂德国和匈牙利官员加入了名单，还有的人则已经被送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正因为如此，战争结束很久之后，很多人还在愤怒地谴责其中的裙带关系。

为了容纳来自科罗日瓦的这些人，“瓦达”获得了南布达佩斯卡伦巴兹大街为聋哑人提供的维施塞尔曼协会的产权。卡斯特纳将这些人的到来描述为大屠杀历史的伟大时刻，这些犹太人没有被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去迎接死神，而是被带到了暂时安全的港湾来等待生命的曙光：“6 月 10 日，一辆特殊的火车载着 388 名衣衫褴褛的犹太人，有些人甚至已经被打得半死，他们从科罗日瓦隔离区来到布达佩斯，将他们安置在卡伦巴兹大街刚建成的集中营中。在这里，他们能够安全地享用热菜热饭，夜晚拥有安睡之地，没几天，他们便又重现活力。随后，卡伦巴兹大街的集中营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5 名纳粹卫兵被命令要人道地对待这里的囚犯，而这些卫兵也执行了他们的命令。”

随着驱逐在各省持续地进行着，布达佩斯充满了恐惧的犹太人，有些人麻木地等待自己的命运，有些人则发疯似的试图躲起来或逃跑，卡伦巴兹大街的集中营却显得十分平静：“与外面混乱、疯狂的世界不同，卡伦巴兹大街有一片和平、安定的神秘之地——特权集中营。虽然有来自科罗日瓦的 388 名犹太人，并且后来又加入了一些来自各省隔离区的杰出的犹太人，但那个由栅栏隔绝的世界里一片寂静，一切都井然有序。”

守卫集中营大门的卫兵的任务并不是防止里面的犹太人逃跑，而是阻止外面的人进入。起初，加入该集中营的许可是在“瓦达”的建议下由特别行动小组批准的，但后来，“瓦达”逐渐不经过批准就私自偷运了越来越多的逃亡者。卡伦巴兹大街上搭建了更多棚屋，阿瑞纳大街与博克斯卡





大街的犹太教堂中也修建了两个新集中营，至少在几个月里，2000 名犹太人能够生活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中。

与此同时，艾希曼继续向卡斯特纳施压，要其提供布兰德在伊斯坦布尔的进展情况。虽然卡斯特纳感到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愈来愈小，不过他还是决定“继续告诉艾希曼国外的谈判一定会成功”。为了“争取时间，或许应该说是争取生命”，他打算从匈牙利犹太人身上筹集更多的钱、金子以及外国货币。卡斯特纳拜访了艾希曼以抗议奥斯维辛集中营残酷的灭绝屠杀，并说道，如果德国人继续这样，国外就没人相信他们对这个营救计划是认真的。

“你又听说了什么？”艾希曼咆哮道，“你认为帝国有足够的食物去喂养成千上万的匈牙利犹太人几个月，有足够的人员和医生去照顾病人吗？”

“我有责任问清楚，”卡斯特纳继续说道，“如果在短期内，协议达成了怎么办？要是你把匈牙利的犹太人都用毒气毒死了，到时候你用什么东西去交换那些卡车？”

“这不用你操心。我保证，一定会留着那些 12 岁至 14 岁的孩子，因为一两年后，他们就长大了，可以做苦工了，而且我还可以提供波兰或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的犹太人。”

卡斯特纳壮起胆子反驳道：“我敢肯定，你这样做是无法让其他国家让步的，正相反，如果你真的对这笔交易有诚意，就应该表现出来……我们要你保证 10 万名匈牙利犹太人的安全，包括小孩、老人和病人。为了表达我们愿意做出牺牲的诚意，我们会给你价值 500 万瑞士法郎的珠宝、外国货币和便戈，我们会按照你提供的犹太人人数按照比例进行付款。保证这 10 万人的生命将对整个谈判产生积极的影响，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立即着手开始将他们运往巴勒斯坦。”

艾希曼询问卡斯特纳钱的来源时，卡斯特纳谎称钱将会从海外筹集。卡斯特纳要求将这些人通过罗马尼亚运往巴勒斯坦，但艾希曼重申道，为



了使匈牙利人满意，移民必须看起来像是被驱逐的，而且他不会允许任何犹太人直接去巴勒斯坦，因为德国政府已经向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保证不会将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艾希曼建议让这些人先在维也纳附近的斯特拉斯霍夫的隔离营待几个星期，然后再途径法国、西班牙到达里斯本（葡萄牙首都）和西非，并同意将科罗日瓦以外各省中心幸存的犹太人按照“瓦达”提供的名单带到布达佩斯。

为了筹集500万瑞士法郎，“瓦达”将150处场所变卖给了那些冒着被逮捕和虐待的危险而没有将财产上交匈牙利当局的犹太人，就这样，那些富有的犹太人成了筹指赎金的主力军。在一个由特殊委员会（成员包括奥托·加莫里，汉斯·布兰德，舒莱姆·奥芬巴赫等）的组织下，西坡大街办公室成立了，但那些假装成犹太人的匈牙利秘密探员的经常闯入使得那些会面极其危险。

6月20日，卡斯特纳、奥芬巴赫、汉斯·布兰德将三个手提箱（其中包括20万美元，10万瑞士法郎，一些国外货币、金子、钻石、股票和1350万的匈牙利便戈）交到了斯瓦希基山上盖世太保总部的奥托·克拉各斯手中。就在那里，他们第一次见到了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库尔特·比彻，他在之后的谈判中成了卡斯特纳的主要伙伴，也在卡斯特纳后来的悲剧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汉斯后来回忆道，她当时征求克拉各斯的意见将那三个手提箱放在安全的地方，克拉各斯则自告奋勇地要保护这些箱子，没过多久，他们便遇见了比彻。战后不久，大部分的钱与值钱物品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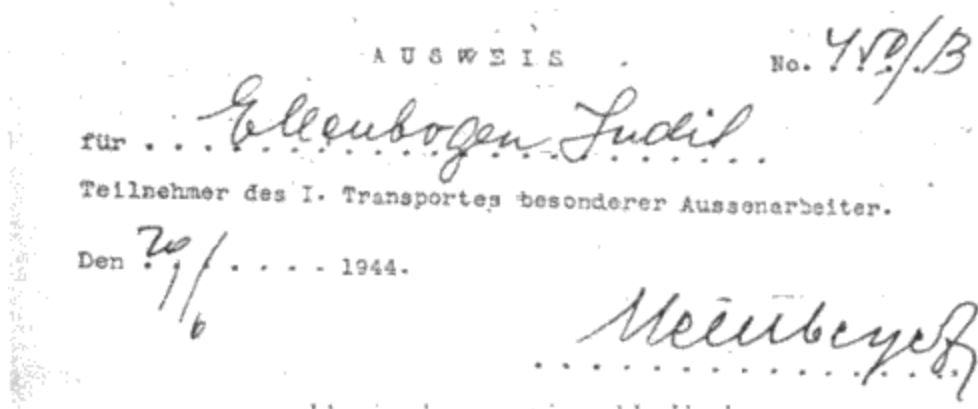
卡斯特纳与比彻于6月25日至27日相遇，卡斯特纳那些夸张的承诺给比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决定强行加入到这个交易之中，虽然在一段时间里，艾希曼仍然是卡斯特纳最频繁的接触者。当艾希曼不断询问伊斯坦布尔传来的消息的时候，卡斯特纳则不断重申，同盟国与中立国正在密切关注“巴勒斯坦的运输计划”，他们的反映会基于这项计划的基础



之上。经过了缓慢而艰难的欺骗与讨价还价，卡斯特纳说服了艾希曼，他同意运送 1300 名犹太人。卡斯特纳隐藏了自己对艾希曼那 180 度大转弯的恐惧，带着难得的自信，提议为每个人头支付 100 美元。但是，艾希曼起先要求每个人 200 美元，后来又涨到了 500 美元，在场的比彻则提出了 2000 美元的天价。艾希曼和比彻都经常与希姆莱保持联系，竞争激烈。最终，希姆莱将每个犹太人的价格确定为 1000 美元。他们达成协议，将那些来自各省和首都的犹太人运送出国，并再次坚持将他们的离开伪装成驱逐，因为匈牙利人会将他们进行的所有营救交易视为背叛。

卡斯特纳立即向艾希曼递交了一封便函，上面列出了以下规定：那些犹太人在斯特拉斯霍夫的“特权集中营”中待几天后就要通过德国和法国到达一个中立国；35 辆卡车将用来装载 1300 名乘客，每个人只能随身携带 50 至 80 公斤的行李；在德国时能得到与德国人一样的食物配给；不需要佩戴黄色的大卫之星或工作；可以选出自己的领导者，并对自己的事务进行自制；不能进行人身虐待；为了保证饮食，可以带一车半罐装食品。经过伤透脑筋的讨价还价之后，艾希曼最终同意让这些入于 6 月 30 日下午 6 点离开布达佩斯。

再一次，“瓦达”又被赋予了制定“最终”名单的使命。整个社区开始弥漫着嘀咕与谣言，很多人说，“瓦达”的成员只需要在一张纸条上签字便能使人们进入卡伦巴兹大街。卡斯特纳与他的同事们夜以继日地遭到疯了一般的人们的围攻，受到他们的祈求、诱惑和纠缠不休，他们互相争夺着名单上的席位。那些成功取得一张“门票”的人们也许与拉兹罗·戴维塞利的想法是一样的，他们知道将自己与自己的家庭交到德国人的手中无异于赌博，他们也极有可能轻松地丧命，但他们最终还是决定这样做，因为“待在匈牙利危险得多得多”。还有一些人拒绝加入这样的名单，正如汉斯·布兰德解释的那样，“他们并不相信自己能真的被送到一个中立国”，而且“他们非常害怕”。



“瓦达”颁发的身份证件

没过多久，另外两股人又被加到了名单之中：一股是大约 50 个花一大笔金钱从比彻那里购买到保护性通行证的人，另一股则是一些没被邀请但通过私人关系或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进入卡伦巴兹大街的人（比如我和我的父亲），还有就是在火车站或去奥地利边境的途中加入这个团体的人。

1944 年 6 月 30 日，火车驶离布达佩斯，一起上路的差不多有 1700 人。正如卡斯特纳所说，我们“在那时就代表着小规模匈牙利犹太人”，其中不乏“许多为犹太民族做出突出贡献的犹太人”，他们也因此得到了“特别的考虑”。这些人保证了组合的多样性与综合性，卡斯特纳在短语“辛德勒方舟”流行之前很久就称这些人为“诺亚方舟”。

卡斯特纳将确定名单的工作描述为一项“残酷的任务”，我们无需怀疑卡斯特纳与他的同事们的宣言，他们“一直试图凭自己的良心和责任去完成这份工作”。但不幸的是，他们不得不将其他人留在水深火热之中，包括因悲剧的“伞兵事件”而出名的 3 个年轻人。





伞兵事件

1944年1月，“瓦达”接到通知：犹太事务处与英国受任国巴勒斯坦之间达成协议，要向匈牙利派遣任务以帮助当地的犹太人自卫和反抗。3月，3名犹太志愿者空降南斯拉夫，他们是26岁的乔尔·纳斯布彻（也就是后来的乔尔·帕尔基）、19岁的佩雷茨·哥德斯坦，他们俩都是从科罗日瓦移民到巴勒斯坦的，另一人则是23岁的汉纳·扎尼斯，她曾经住在布达佩斯。他们曾经在以色列的集体农场工作，但他们都有英国军官的军衔，汉纳还是一位极具天赋的诗人。

到达南斯拉夫之后，在继续奔向匈牙利之前，他们与蒂托领导的反德国游击队员们一起待了3个月。由于接到了伊斯坦布尔发来的密电，非法犹太军队“哈加纳”的匈牙利分支的负责人摩西·舒威格指示他们，一穿过边境就要向诺维萨德接头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汇报。除了犹太事务处交给他们的任务之外，他们还要用无线电向英国军队发送军事信息。

3个人中最先到达匈牙利的是汉纳·扎尼斯，那一天是6月9日。那时，诺维萨德所有的犹太人（包括被指定的接头人）都被驱逐了，舒威格也被逮捕了。汉纳刚刚穿过边境，一个被“瓦达”误认做朋友的官员将她交到了反间谍机关的手中，然后就被送到布达佩斯，成了阶下囚。几天后，纳斯布彻与哥德斯坦也进入了匈牙利，并且也与那个官员进行了接洽。他们在去布达佩斯之前将自己的无线电设备交给了那个官员，却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被严密地监视了。大约是6月20日，他们抵达布达佩斯，在一家小旅店订了一个房间。他们最先拜访的是他们在特兰西瓦尼亚的青

年运动中曾经的领导人之一——卡斯特纳。

卡斯特纳立即意识到，纳斯布彻与哥德斯坦的到来会对他与纳粹飘摇的谈判带来很大的危险，假如他被发现“与营救委员会的间谍活动有关系”，那么整个计划，甚至包括他的生命都将命悬一线。卡斯特纳劝说纳斯比彻与哥德斯坦离开那里，并于第二天与他们进行了一次会面。会面结束的两个小时后，3名匈牙利秘密警察拜访了卡斯特纳的女房东，并命令她在那两个来访者回来后监视他们。

第二天，当纳斯布彻与哥德斯坦如约赶到犹太社区大楼的时候，他们认出了走廊上人群中的匈牙利秘密警察，便立即逃跑了。后来，纳斯比彻找到了卡斯特纳，并且藏在一个私人公寓中，哥德斯坦也找到了一个藏身之地。卡斯特纳进行了一次疯狂的赌博，为了打消德国人的疑虑，他告诉布达佩斯纳粹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奥托·克拉各斯，两个年轻人正在与“瓦达”合作，而且他将纳斯布彻送到盖世太保那里让他假装成伊斯坦布尔犹太事务处的一个代表。这个把戏似乎有效，不过在第一次会面之后，纳斯布彻就被匈牙利的探员逮捕了。与此同时，哥德斯坦也不再躲藏，6月28日，卡斯特纳与汉斯·布兰德私自将他送进了卡伦巴兹大街集中营去看望他的父母。匈牙利人已经找到了纳斯布彻，他们确信哥德斯坦一定是被卡斯特纳和他的朋友们藏了起来，6月30日清晨，卡斯特纳、汉斯·布兰德、奥芬巴赫、毕斯及其妻子都被逮捕后带到了巴力克营房——臭名昭著的匈牙利反间谍机构刑讯中心。

卡斯特纳被反复地询问哥德斯坦的藏身之地，由于卡斯特纳拒绝回答，审讯者威胁道：“如果你不回答，那么另外的那个人将会在十分钟之内被枪决。”卡斯特纳回答道：“给我和布兰德女士一些时间考虑一下。把我们释放几个小时，我的朋友们将留在这里当人质，我们会在几个小时后回来。”

卡斯特纳与汉斯来到了卡伦巴兹大街，向哥德斯坦说明了当时的情





况：他不可能一直躲藏起来，德国人知道他在哪，如果他不出现，他们就要将卡伦巴兹大街集中营的所有人（包括他的父母）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假如德国人发现“瓦达”与英国的间谍活动有关系，就不可能再与纳粹继续进行谈判了。没人知道卡斯特纳和汉斯究竟向哥德斯坦施加了多大压力，哥德斯坦最终决定投降。

在这段时间里，汉纳的母亲加托·扎尼斯拼命地试图要救出自己的女儿，6月，她被匈牙利密探逮捕后出意外地在监狱里见到了汉纳。匈牙利的密探采取了百般手段迫使汉纳交代任务的细节，但她宁死不屈。加托·扎尼斯被释放后一次次地拜访卡斯特纳，不过每次都被他的秘书丽丽·温加以他工作繁忙为借口而拒绝了。

不过，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瓦达”还是试图动用一些关系。比如，汉斯·布兰德后来回忆道，她与卡斯特纳曾经代表这三个俘虏与艾希曼进行协商，不过艾希曼说，“这不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最后，就在他们看到希望的时候，一场巨大的政变毁掉了一切。

10月14日，匈牙利战争部长的私人秘书伊斯特万·欧拉赫命令他的下属释放这几个伞兵，并向卡斯特纳承诺几天内就放人。15日，费里桑·斯扎拉斯推翻了匈牙利国家元首米克拉斯·贺西的政权，箭十字党的恐怖统治随之开始了，释放汉纳的计划也戛然而止。11月7日，汉纳被行刑队处决了，就像她曾拒绝招供一样，她拒绝祈求怜悯。汉纳被处决大约两周后，哥德斯坦与纳斯布彻便被驱逐了。纳斯布彻成功地跳下火车并藏了起来，最后在战争中得以幸存，哥德斯坦则杳无音讯。而10年后旧事重提，卡斯特纳被指控故意出卖这些伞兵。事实上，在不威胁到大局的情况下，为了救出他们，卡斯特纳已经做得足够多了。在大张旗鼓地没有把握地解救三个人，还是静静地保持着营救数千人的微弱希望，卡斯特纳最终选择了后者。

斯特拉斯霍夫群体

当卡斯特纳就“方舟”的命运而与艾希曼讨价还价的时候，另一个机会出现了。虽然这个机会涉及的行动要比“方舟”大得多，但仍然以失败而告终，人们还要争议到底是卡斯特纳救了他们，还是他被艾希曼欺骗了。

6月14日，艾希曼告诉卡斯特纳，他要将3万名匈牙利犹太人搁置在奥地利以表现他的诚意。事实上，他是接到了上级卡尔登勃鲁纳的命令，不得不将3万名奴工送到维也纳附近修建防御工事以抵御红军。这些奴工是应维也纳市长卡尔·布拉施克的请求，而艾希曼必须服从。艾希曼要求得到每个人200美元的赎金以使这些人不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而卡斯特纳没有意识到卡尔登勃鲁纳下达的命令，只为每个犹太人提供了100美元的赎金。最终，他们达成了共识，这些人将分成两批，15000人从布达佩斯挑选，15000从各省挑选，他们都将送往斯特拉斯霍夫的拘禁营：身体健康的男人和女人将开始繁重的工作，那些无法工作的人也不会被杀死。一家人可以在一起，他们的生活费用将由“瓦达”支出。

6辆火车满载在南部和东部匈牙利隔离区中没有被驱逐的犹太人，他们在6月25日至28日被送到了斯特拉斯霍夫，然后，那些健康的人都被送到了附近的工厂工作。卡尔登勃鲁纳曾经致信布拉施克，要求所有的安排都服从于“专项活动”或“特别行动”的可能性，这两种说法都是纳粹对灭绝屠杀的委婉用法。毫无疑问，艾希曼很高兴服从这样的命令。虽然这群人里包括不少应该送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被杀死的老弱病残，但这





种事情却没有发生。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斯特拉斯霍夫是由维也纳一个部门办公室的克拉米管理的。当卡斯特纳 1945 年 1 月看见他的时候，他说，大约 15000 名囚犯还活着并且在集中营里的条件相对还可以忍受。最终，大约 12000 人被苏联解救了，其中还包括在 1944 年 12 月被送到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中作为可能交换对象的 2000 人中的几百人。

人们对卡斯特纳在这件事里起到的作用有很大的争议。根据毕斯的观点，卡斯特纳被艾希曼的力量所“催眠”，所以他没有意识到不管他付不付钱，艾希曼都不得不那么做。同样的，在审判艾希曼时，法官们在裁决中也称卡斯特纳错信了一个“伪装的让步”。匈牙利的历史学家们则观点不一：伊斯特万·菲斯御声称卡斯特纳“就是被骗了”，拉兹罗·卡萨和与茱蒂特·莫尔纳则坚持认为，卡斯特纳“挽救了被送往维也纳的几千条性命，包括许多无法工作的老弱病残”。在西方的学者中，劳尔·希伯格谈到了卡斯特纳的成功，胡达·鲍尔则推测“或许正是由于卡斯特纳的谈判”，我们讨论的这些人才被送到了奥地利，而非奥斯维辛集中营。但我认为，艾希曼的确不得不将奴工送往奥地利，卡斯特纳则通过将许多潜在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遇难者加入到运送的队伍之中而拯救了很多生命。施罗墨·阿龙森的评价看起来不偏不倚，他说：“卡斯特纳的策略对德国在劳力、战备、外国货币方面的需求的确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

挑选会被营救的人员是一个巨大的道德问题。卡斯特纳也清醒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又一次，我们必须面对进退两难的问题：我们是要进行随机的挑选，还是要主观地去影响挑选结果？”卡斯特纳将这个令人苦恼的问题（卡斯特纳称之为“我们的良心面对的最糟糕的事情”）委托给“瓦达”的一个委员会，让他们按照事先规定的原则行事。正如卡斯特纳指出的那样，“脆弱的人手将不认识的人的名字写在纸上，由此而决定人的生与死，这的确需要真正圣洁的原则给予支持与指导”。不管圣洁与否，“瓦达”指定的原则是要救出那些“一生都在为犹太社区做出贡献的



男人、丈夫，在‘劳役集中营’中的女人以及儿童，尤其是孤儿”。

然而，委员会制订的名单并非最终名单。有些被选进名单的人宁愿待在他们现有的藏身之处，有些人则不断地祈求、哄骗、骚扰名单制订人，直至自己被列入名单。名单又被隔离区的领导者们、被贿赂的德国军官加加减减，或者由心血来潮的艾希曼进行修改。有一次，一辆装着来自捷尔隔离区和孔马罗姆隔离区 3000 犹太人本应该去斯特拉斯霍夫的列车却去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而另一辆列车，本应该运送犹太人从德布勒森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却改道斯特拉斯霍夫。纳粹上士当时护送的第一辆列车已经直奔波兰了，当他们在斯洛伐克边境发现了这个错误的时候，艾希曼决定将错就错。为了补足人员的差额，第二辆列车被开往奥地利。卡斯特纳将这些在原始名单上加加减减的变化称为“听天由命”，这也减轻了那些挑选者些许的内疚感。最后一辆去斯特拉斯霍夫的列车离开布达佩斯两天后，我们便开始了生死未卜的全新旅程。

第七章 从布达佩斯到卑尔根-贝尔森

运牛卡车上的生活

1944年6月30日下午，暴雨过后，热浪依旧，我们从卡伦巴兹大街被带到了布达佩斯东部的拉加斯兰德茨火车站调车场。我们的大部分行李和一些老人、病人都是由开篷货车运送的，我们和剩下的行李则在纳粹士兵的护卫下步行。我父亲拖着他那条僵腿，我拖着我那条11岁的短腿拼命地赶上进度。当地人站在道路的两旁或者家里的阳台上望着我们，他们冷漠的表情里透露着好奇和毫无掩饰的憎恨与恶毒的欢乐。虽然我们不必佩带黄色之星，但毫无疑问，我们还是那些“臭烘烘的犹太寄生虫”，而我们也最终从匈牙利国家健康的身体之中被清理出去了。当我们到达火车站调车场的时候，我们吃惊地发现，等待我们的火车竟是由一些运牛的卡车组成的。

继我们卡伦巴兹大街上的这批人之后，阿瑞纳大街与博克斯卡大街的



犹太教堂中的人也出现在调车场。博克斯卡大街上并非只是持有许可的150人才到达这里，所有的450名囚犯都出现了。我们等着被带走的时候，其他人也从城里的各个地方陆续赶到。两个年轻的犹太人从我们旁边正要开往奴工集中营的卡车上跳下来后爬上了我们的卡车，当我们正要离开的时候，两名波兰孤儿伊扎（5岁）与艾伯纳·温伯格（3岁）被他们的姑姑推上了卡车，他们的姑姑绝望地希望有陌生人能够照顾他们。

运牛卡车上的状况真是糟糕透顶。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人们推来挤去，一家人被挤散了，行李也被挤丢了。人们互相争吵、谩骂，有些人会试图帮助其他人，而大部分人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压根顾不上其他人。

整列火车是由35辆运牛卡车组成的。其中，1辆是留给我们的领导者和他们的家人的，1辆是留给病人的，第三辆是留给纳粹卫兵的，第四辆是用来装载供给物资的，剩下的31辆卡车则是用来运送大约1700名犹太人的。这些军事用途的卡车上都标着“限载36人或8匹马”，但实际上，每辆车上大约有五六十人和50公斤的行李，而面积还不足20平方米。在我们离开之前，车上刚刚匆忙装上了一些临时长椅，不过大部分人还是必须坐在地上。我们轮流站着、坐着、躺着，因为那里没有足够的空间让每个人都伸展开来。我父亲在一侧保护我不被挤到，我却总是被另一侧的一个男人挤到，他也在试图保护一个小女孩。车上有一个装有15至20升水的水桶，还有一个水桶被当作马桶，不过这两个水桶都太小了。

那时，我们并没有挨饿，因为我们的领导人在供给的卡车上装载了500公斤腊肉、1000公斤罐装肉，大量的奶酪、果酱以及面包。在旅途中，每人可以分到2公斤面包、500克奶酪和几罐肝酱，并且我们还随身带了一些食物。和那些开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列车不同的是，我们的车并没有被封死，我们经常敞开着车门，呼吸外面新鲜的空气，这使得我们不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心理上都觉得好受一些，而最能使我们得到宽慰的还是希望尽快到达西班牙或葡萄牙，接着再去巴勒斯坦。不过，这样的希望

无法克服我们对纳粹的恐惧，当时的我们觉得自己一无所有，无家可归。

当时，朱蒂·雅各布斯只有7岁，她是这样描述那个恶心的情况的：“卡车里的恶臭变得越来越糟，没有人死于运送的过程，不过人们会晕倒、虚弱、呕吐……就这样周而复始。”14岁的维拉·约翰斯坦纳回忆起那样的拥挤给那些曾经“崇高的人类”所造成的影响：“人们喊叫着，只为了多获得一点空间，人们之间并不交谈，他们只是说，‘我喘不上气了，我受伤了，我岁数大，给我让点地方’。”15岁的娜奥米·赫斯科维茨的描述更加生动：“一辆又一辆运牛卡车在那里等着我们，我们被告知：‘进去。’我们说：‘这是什么？我们是牛吗？’……接着，我们登上了卡车，大约80个人，那是夏天，非常热，非常拥挤。有人将一个水桶扔到车上，说：‘这是马桶。’我发了高烧，并且腹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正如我在开始时讲的那样，我们都是在文明的环境下长大的……而现在，我要坐在马桶上当着80个人解决我的问题……我意识到我只不过是一个数字，而不再是一个人。”

对6岁的乔治·布拉夫来说，“这些列车上似乎有所有令人讨厌的事情”。不过人们还是可以通过内在的精神力量来克服自己所处的环境。7岁的肖莎娜·哈森就在痛苦的回忆中加入了一段令人鼓舞的叙述：“人们不得不试图不去喊叫、焦虑、恐慌，人们要伴着车轮的声音继续生存，没人知道我们要去哪里。”

由于被空袭耽搁了4个小时，我们最终在晚上11点才离开。我们整个晚上都在赶路，不过早上时，我们惊讶地发现我们还在布达佩斯——精确地说，应该是在费伦茨瓦洛斯车站，距离拉加斯坦德茨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当我们以为自己正在奔向自由的旅途中时，为了躲避不停的空袭，我们其实是在铁路的连接点来回行进。下午时，列车才算真正地开车了，并在日落时抵达奥地利边境附近的莫雄马扎尔。





奥斯皮辛还是奥斯维辛？

在莫雄马扎尔，列车在铁路的旁轨停了三天。在那样炙热的夏天，我们大多数人决定在空地扎营。我们有匈牙利的警察和宪兵看守着，他们其实更多的是保护我们免受当地反犹太人民的袭击，而不是防止我们逃跑。我们从当地的农民手里买来食物，作为对领导人向我们分发食物的补充。与住在卡车里相比，睡在星光下惬意极了，但卫生条件依然糟糕：我们只是在最后一天挖出了几条坑厕，才不用在麦田里方便。一个女婴在一辆卡车里出生了，东犹太人剃掉了自己的胡子，因为他们的胡子经常惹恼那些恶毒的匈牙利人和德国人。经常会有流言说我们将遭遇什么，但从来没有人知道实情。

在这次停留的期间，我们建立起了正规的行政体系。从卡斯特纳开始谈判开始，科罗日瓦的犹太人就一直占有特权的位置，科罗日瓦群体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卡斯特纳的岳父尤若夫·菲斯彻自然而然地成了整个群体的领袖，菲斯彻从他的亲朋好友中挑选了一些助手作为回忆录《去往卑尔根-贝尔森》的匿名作者。我们当中的一些律师与政治家起草了一系列“营中条例”，并于7月3日开始执行，其中，常见的希伯来术语表达出了在我们整个群体中占主要地位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思想意识与实践。

我们这个群体里的一把手是菲斯彻，他有许多副手与秘书协助他工作。下一级是各个小组的负责人以及他们的副手，再往下，每六辆卡车有一个负责人和副手，最后，每一辆卡车也有一个负责人和一个副手。我们必须严格地遵守“行为规范”，包括不能在没有经过营地负责人的允许下

离开暂时营地；必须早上6点起床，以最快的速度清理自己、整理周边，然后在同一时间吃早餐；从早8点到中午、下午3点到6点，成年人（除老人或孕妇以外）必须服从负责人的分配去做一些杂务；中午到下午3点之间可以吃午餐、休息；下午6点到9点吃晚餐、准备睡觉；到了9点半，应当是一片寂静。此外，女人不允许穿长裤、短裤、泳装，也不能涂抹口红；只能使用专门的厕所与煮饭的场所；有任何疾病都必须向选出的医生或者负责人报告；只有被指派的负责人才能够散播消息或发布指令。保证这些纪律的有效性的是一些戴着臂章的年轻人组成的内部警察力量，不服从命令的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毫无疑问，这些详尽的条款和规定的目的是在混乱之中保证表面上的控制、秩序与安全，不过令我感受最深的是两点：一是人们对这些官僚游戏中权力的幻想；二是这1700人遭遇的真实的困境。他们被剥夺了往常的生活，被剥夺了财产与权力，睡在光秃秃的地里，身旁的火车任何时候都可能将他们带到毒气室中杀死。

第四天，我们被要求准备离开，恐慌随之开始。事实上，这次恐慌才是我对那次旅行最深刻的记忆。当我们在地里整理私人物品时，人们关于我们的下一站展开了激烈的争辩。不知怎么回事，有流言说我们要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一些悲观主义者被吓坏了，乐观主义者则坚持认为我们要去一个叫做奥斯皮辛的地方，根本不用担心。不过对我来说，无论是悲观主义者，还是乐观主义者，都一样恐惧。

恐慌开始后，菲斯彻获得了卫兵的许可，让拉兹罗·戴维塞利返回布达佩斯警告卡斯特纳。剩下的我们又登上了列车，在晚上奔向了另一个未知的目的地。米里亚姆·巴克是一名30岁左右的语言教师，她后来回忆起那晚卡车里的氛围时说道：“奥斯皮辛与奥斯维辛，仅一字之差，却意味着生与死……我们被欺骗了吗？列车咔嚓的在夜晚前行，车上的人却在绝望中挣扎着。歇斯底里的女人不停地哭泣，男人则面无表情地深思。奇





怪的是，竟然没有人跳下列车。”

一天后，戴维塞利在斯洛伐克边境附近赶上我们，为我们带来了令人安心的消息——我们并不是去奥斯维辛集中营。我们松了一口气，那些懂得地形的人也肯定了这个消息，我们一直是朝着奥地利向西行驶，而非朝着波兰向北行驶。第二天夜晚，我们到达了维也纳，在那里吃了一顿热饭。同时，一些失去勇气的乘客利用列车不时地停车而跳了下去，那些听说列车将被送往“特权”之地的人们则跳上车取代了他们的位置。

渐渐地，我们在莫雄马扎尔的恐惧慢慢消失了，只是我们没想到，在林茨，新的恐惧又出现了。

令人尴尬的林茨之旅

在离开布达佩斯的第七天，我们到达了林茨——莫扎特第36交响乐的故乡，不过我们当时没有听音乐的心情。我们被命令下车，去洗澡。我们排队去了城郊的一个军事除虱杀菌站，装载着行李的卡车跟在我们身后。当我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男人和女人被分开了，女人首先走进楼里，直到下午的早些时候才出来，男人们则在院子里等候。我还记得那时闷热的天气，拥挤的人群，还有我那疼痛的膝盖（我下车的时候撞上了金属台阶），总体的感觉就是周围一片混乱。我们听到了楼里的女人的惊叫声，一位纳粹卫兵咧着嘴笑着向我们解释，她们正在被毒气屠杀。和在莫雄马扎尔一样，我们又开始恐慌，因为许多大人的确听说过很多表面上的浴室实际上是进行屠杀的毒气室。

最终，我们被命令以250人至300人为一组走进楼里，脱光衣服，将

我们的衣物交予消毒，然后再次等在那里。我还记得，当我光着身子站在我那同样裸身的父亲身边、四周都是不同年龄和体型的裸男的时候，我是多么脆弱与尴尬。接着，我们被带到另一个房间，接受了一连串奇怪的检查，然后被喷洒了来沙尔（一种消毒剂）。最后，我们以四五十人一组进入最后一个房间，在那里冲了热水澡。当天天花板上的喷头喷出温水的时候，我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因为我不知道那些喷头里还可能会喷出致命的东西。许多大人如释重负，宛如重获新生一般。

这对男人来说简直糟透了。比我小两岁的威廉·斯特恩后来回忆道：“给我们喷洒消毒剂的既有德国男兵又有女兵，这使得数百名男人感到十分尴尬。”这个群体里有一名叫做威利的成员，他在一封信里对这种不适进行了生动的描述：“想想吧，几百个人光着身子，在一个狭小、闷热的屋子里身子挨着身子，等了几个小时才能够被野蛮的理发、洗澡和消毒。”他还回忆了我们当时都有的恐惧：“你无法想象在这漫长的几个小时里，有多少邪恶的预感，有多少恐怖的故事在环绕着我们。”

对女人来说，情况更加糟糕。成长于一个文明的世界，她们为被迫裸身而倍感尴尬。8岁的女孩埃斯特·君戈蕾丝就描述了她当时的感受：“看见你妈妈光着身子简直太可怕了……我一直盯着地面，因为我害怕向上看。我无法看着她与其他的女人一样都光着身子。”不仅如此，一些没有男性亲人的十二三岁的男孩也和女人一起被送了进来，另外，一些男性的卫兵和囚犯也搬着要被消毒的行李在她们面前走来走去。正如乔治·雷维茨报道的那样，女人的耳边经常会伴随着那些士兵下流的言语：“你光着身子，那些大嘴巴的纳粹却在评论哪个女孩长得漂亮，哪个女孩长得不算漂亮。”维拉·约翰斯坦纳被那些邪恶的乌克兰女助手们吓坏了，她说，她们被推到淋浴中之前会先被拉到一个纳粹男医生的面前。如果她们不快点把衣服脱掉，就会被粗鲁地、呵斥着扯掉衣服。她同样深深地害怕会被性侵犯：“我害怕他们会侵犯我的身体，我甚至没有过多地想毒气”。她





说，虽然没有人被真正地强奸，不过她觉得男性医生的检查也跟那差不多：“我们被侵犯了，因为他们竟然在我们的阴道里寻找虱子。”相反，看见那些德国士兵出现在淋浴室里，赫斯科维茨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意味着她们并不是要被毒气屠杀。不过，她的得意在瞬间变成了悲痛，因为德国人竟然将犹太人鄙视到如此程度，这些男人竟然可以在数百名裸体的犹太女人面前大摇大摆。她悲痛地说：“我们光着身子，我们无比羞愧，我们没有了名字，只是一个数字……他们在水里抓着我们，站在我们身前，在我们身上摸来摸去以达到清洁。‘她们不是人类……我们没有把她们当作女人。她们只是牲口，只是一个数字。’”

头50个被检查的女人遭受了最严重的心理创伤，她们的头被那些助手剃成了秃子，有些人则在除虱的借口下被除去了体毛。显然，在她们被告知我们的“特权”身份之前，那些助手相信我们将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而她们是要为我们去那里做充足的准备。根据西多妮娜·戴维塞利的回忆，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卫兵说道：“现在你们要进到毒气室里了。”这个冷酷的笑话之后紧跟着的便是一阵恐惧的骚乱。

开始，对女人们进行剃发似乎印证了人们对被即将屠杀的恐惧，不过当这种恐惧被证明是无中生有的时候，她们又由于失去了头发而感到巨大的耻辱。“金钱、工作、房子，这些都可以失去，但绝不能失去头发，因为头发是她们唯一的装饰，代表着美丽与女性的特质。”米里亚姆·巴克写道。据说，这种打击甚至夺去了一个年轻女人的生命，患有肺炎的17岁女孩伊娃·布莱斯洛尔就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志，在我们抵达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四周后去世了。

我们这群人里没有人直接被德国人杀死，不论是在林茨，还是在其他地方，不过林茨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对女人来说，米里亚姆·巴克对此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总结：“六个小时之后，我们又回到了男人那里，虽然筋疲力尽，饥饿难耐，但我们起码还活着……我们唯一被扼杀的便是

我们人性的尊严。”

9点时，精疲力竭、惊魂未定的我们回到了运牛的卡车上，并且得到了一些食物。我们那些消过毒的行李也被扔了回来，直到我们到达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许多人才找到自己的私人物品，有的人却什么也找不到了。据说，我们进去淋浴的时候，我们的一些领导人就待在列车上，因为他们知道里面并不是要进行屠杀，而他们不想目睹那些令人无比尴尬的事情。即使如此，当我们在黑夜里继续我们的旅程时，变得清洁以及未被毒气屠杀的兴奋又变成了忧郁。

列车又行驶了两天，中间经常会因盟军的空袭而耽搁，为装甲车让路。1944年7月9日，我们停在一个树木环绕的混凝土建筑旁，不过眼前却看不到楼房。那时，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要进入的地方就要成为仅次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的缩影。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就是比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大两倍的卑尔根—赫内德国军队训练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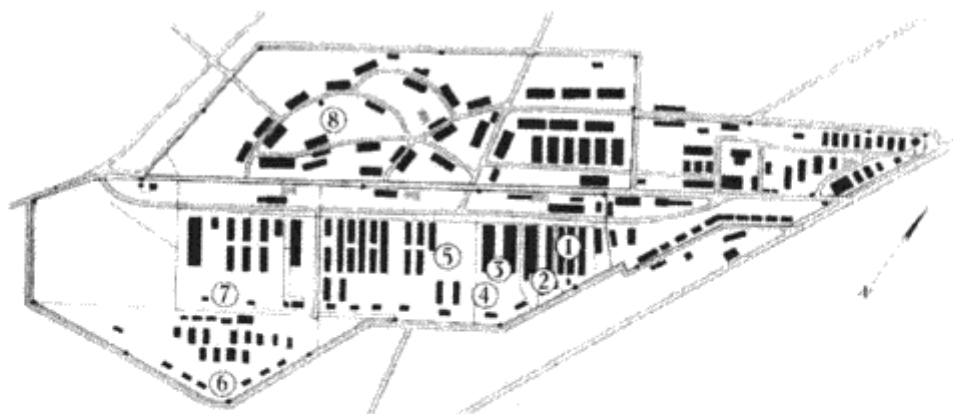
恐怖的代名词——贝尔森

被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要么刚到就被毒气屠杀，要么在残酷的环境下因做苦工而被慢慢折磨到死，而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最初是为了保证犹太人的生存而用来进行交易、勒索的地方，并不是灭绝集中营。“贝尔森”变成了恐怖的代名词，主要是由于后来其对罪犯的故意忽略，而不是由于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与1945年4月英国军队打开的那扇地狱之门相比，我在1944年下半年知道的卑尔根—贝尔森还在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





1943年早些时候，德国的外交部长就曾经想用3万名犹太人换取海外同盟国手中的德国人。4月，希姆莱下令将1万名“用于交换的犹太人”（准确地说应该是人质）聚集在一个特殊的集中营。在卑尔根镇与贝尔森镇附近、下萨克森汉诺威区塞勒30公里以北的拉尼伯格荒地上，纳粹将当时的战犯集中营的一部分改成了用于关押“特权”犹太人的集中营。这个机构的名称原本应该是“平民收容营”，但纳粹按照《日内瓦公约》中关于“红十字协会以及其他国际委员会有权接近‘平民收容营’，而无权接近‘拘留营’”的规定，将其称为“拘留营”。



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平面图（1944年9月）

- 1. 男人集中营 2. 中立集中营 3. 特殊集中营 4. 匈牙利集中营
- 5. 六角星集中营 6. 女人集中营 7. 纳粹储衣室及工作间
- 8. 战俘集中营

集中营大概是一个1800米长800米宽的三角形区域，四周环绕着两排平行的铁丝网，两排铁丝网间有大约5米宽的空地，应该是雷区，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哨塔，周边则是茂密的森林连绵延向远方。主门在东部角落附近，一条主要车道从那里延向西南，车道的两旁都是建筑。第一个建筑群在车道的右侧，包括洗浴室、消毒所、纳粹生活区、纳粹食堂、办公

室、商店、工具房和一个监狱，不定的距离之间还有一些厨房。主车道的左侧则有 80 个用于关押囚犯的低矮木屋。

当我们到达的时候，集中营被分成了 5 个场地，由铁丝网隔开。从主门开始，第一部分是男人集中营，里面囚禁着 500 名俘虏，主要是从其他集中营中带来的有不同程度疾病的俄国人和波兰人；第二部分是中立集中营，里面是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阿根廷等非抵抗国家的约 250 名犹太男女老少；然后就是我们的匈牙利集中营，包括棚屋 11 号和棚屋 10 号的一半；棚屋 10 号的另一半则是特殊集中营，里面有一大批被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剩下的约 350 名波兰犹太人，棚屋里的一扇混凝土的大墙使我们与那些波兰人交流起来十分困难；第五部分则是六角星集中营，这是最大的一部分，里面有大约 4100 名“用来交换的犹太人”，其中，男女老少都有，主要来自希腊、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法国、北非，而最多的还是来自于荷兰。顾名思义，这里被称做“六角星”是因为这里的人必须在衣服上佩带黄色的六角之星。

8 月初，大批从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撤出的女人，在被送到附近的劳工集中营之前被送到了女人集中营，那里刚刚匆忙地搭建起了一些帐篷作为她们暂时的栖息之地。11 月 7 日晚上，那些帐篷被一场暴风雨所毁，8000 个女人的一部分送到了六角星集中营，一部分被送到了纳粹储衣室。为了容纳更多的人，1945 年 1 月，战俘集中营成了女人集中营的一部分，在那 3 个月前，也就是 1944 年 10 月，许多新棚屋在新建铁丝网的环境下建在了六角星集中营与我们自己的场地中间。当一群新来的女人住进那些棚屋的时候，我们从小道消息打听到她们是荷兰人，也同样来自奥斯维辛集中营。现在我知道，她们之中有一个人叫安妮·弗兰克。

随着同盟国对德国的围攻的开始，纳粹仍然继续浪费宝贵的人力和物力将境外集中营中的囚犯转移到帝国的集中营。人们被运送超过几百英里，被挤进密封的运牛卡车，堆上敞篷的货车，或者干脆在纳粹暴徒们身





体与言语的打骂下步行，这些情况现在都有详细的描写。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是这些运送最主要的目的地之一，这里囚犯的数量也因此而急剧攀升。当我们于1944年7月9日到达时，这里已经大约有5200人，而我们12月4日离开时，人数增长到大约15250人，到1945年1月1日，人数增长为18500人，1月15日，人数增长为22300人，到3月1日，人数则增长为41500人。当英国人于4月15日接管那里的时候，他们在主营里发现了40000名囚犯，另有15000名在附近的军事营房。

与人口的急剧增长相伴的是生活条件的急剧下降。从1943年5月到1944年12月，这里有2000人左右死亡；1945年1月到2月，死亡8000人左右；3月，死亡18000人；4月的头两周，死亡10200人；从4月15日解放到6月中旬，死亡13000人。这就使得被关在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11万至12万人中死亡了51000人。这样的数据并不完整，主要是因为纳粹在这里被解放前销毁了所有文件，不过历史学家仍然认为这样的数据还是基本可靠的。

从1943年4月开始，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第一长官成了上尉阿道夫·哈斯，他似乎既适合作为主管集中营的纳粹军官，又像是一个正派之人。但是，1944年12月2日，他的职位由上尉约瑟夫·克莱默代替了，而约瑟夫·克莱默普遍被描述为最残暴的纳粹。在其他集中营进行过漫长的工作之后，克莱默于1944年5月正式成为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的长官，对大多数匈牙利犹太人进行的毒气屠杀正是在他的监督下进行的。他来到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时候，还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带来了几个亲信，包括臭名昭著的女纳粹主管厄玛·格利希。克莱默一到这里，就立即将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变成了一个拥有所有特征的典型集中营——奴工、虐待式的惩罚和致命的生活条件。我幸运地在克莱默到达这里的两天前离开了，成千上万的人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的确，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没有毒气室，也没有蓄意的大屠杀，那

51000 条生命是由于过度的拥挤、饥饿和疾病而亡的，但如果不是纳粹允许（或者更应该说是导致）这些事情发生，那么他们压根就不会死。随着集中营中人数的不断增长，纳粹没有进行任何措施改善这里的居住环境：5 个人不得不睡在一张铺上，或者人叠着人睡在摇摇欲坠的棚屋中的地板上；雨水透过棚顶漏进屋里；食物配给也逐渐变少；饮用水与清洁用水也变得更加稀缺；药品基本用完了；茅厕积堆；没有供暖；衣衫褴褛，上面布满虱子；任何天气都要在户外进行长达 5 个小时的点名。由于纳粹的冷漠，成千的人死于伤寒、痢疾、肺结核、饥饿或者力竭。起初，尸体会被埋葬在火葬场，不过随着尸体愈来愈多，尸体要么被一起埋在大坟墓中，要么被堆在一起，摆上木头，浇上汽油，一把火烧光。最后，尸体要么与其他已经腐烂的尸体堆在一起，要么就留在原地腐烂。解放前的 4 天里，在纳粹军官的指挥下，两队被俘的乐师被迫演奏着舞曲喝彩，2000 名还能走路的囚犯被分成 4 组将大量的尸体拖到了大坟墓之中。

当德国战败已成定局的时候，希特勒还命令各集中营继续守卫或消灭所有囚犯。1945 年 3 月，为了使自己免于惩罚，希姆莱下令将各个集中营移交给同盟国，并且要保证囚犯未受伤害。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守军与英国军队达成了停战协定，1945 年 4 月 15 日，英国士兵接管了集中营。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中的大部分纳粹早就离开了，只有 50 名士兵、军官以及 30 名女性主管还留在那里，其中就包括随即被审判、处死的克莱默与格利希。

英国军队眼前的场景简直可以用惨烈来形容。在对战犯的审判中，军医准将格林休斯作证道：“整个集中营中到处都是高低不等的尸体堆……阴沟里堆满了尸体，棚屋里也有数不清的尸体，有些尸体甚至与活人一起放在床铺上……有些棚屋里有床铺，但铺位不多，棚屋里挤满的人都是不同程度的衰弱，或有疾病。每个棚屋里的人都没有地方能够躺下来完全伸展，在最拥挤的地方，仅能够容纳 100 人的环境竟然住了 600 至 1000 人。”





中校高尼在日记中写道：“到处都堆放着尸体，有些尸体被与其他囚犯堆在一起，有些则零星地躺在他们倒下的地方……有人看到女人因为自己的呕吐物而呛死，那是因为她们已经没有了呕吐的力气。男人在吞咽面包的同时还会吃下虫子，这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吃，而且他们也感受不到面包与虫子的区别……男男女女到处蹲在地上，排泄着身体内的痢疾。有个女人甚至光着身子用分发的肥皂以及水槽里的水清洗身体，而那水槽里正漂浮着一具儿童的尸体。”

这就是贝尔森会变成大屠杀的同义词的原因，而正是由于卡斯特纳，我与其他人才躲过了这样的命运。

幸运还是不幸？

1944年7月9日，星期日清晨，我们的列车抵达了终点。一个牵着德国牧羊犬的党卫军小队队长命令我们从卡车上下来，并且还喊道：“快点，今天可不是你们的新年！”卑尔根-赫内的站台坐落在郊野，没有名字，那里在今天看起来与那时基本一样，而且德国与北约军经常会利用那里作为训练基地。后来，人们在回忆的时候声称我们走了大约30公里才到集中营，实际上，我们只走了7公里，耗时2个小时，因为我们实在又累又饿又病。朱蒂·雅各布斯生动地描述道：“不久，列车停下了，车门被打开了，又一次，耳边响起了那些下流的呼喝声，我们正站在一个丛林茂密的地区……我们被要求以队列前进，大概是四五排，后面还有那些卫兵鞭打我们……每隔30秒，就会有人对我们进行一顿辱骂……我不知道我们走了多远，不过我们感觉起来像是远得可怕……因为那时的我们已经严重

脱水而且营养不良。我们一直都坐在那些卡车里，我们的骨头与关节都已经不再灵活，身体根本没有良好的状态。”

我们一些沉重的行李与食物由货车运到了集中营，老人、病人、小孩本应该也乘坐货车，但没有足够的货车，而且很多空位都由我们那些身体健康的领导人们霸占了。我记得我的父亲拖着他那条僵硬的腿蹒跚前进着，而我试图快点前进，因为我害怕纳粹卫兵手中的恶狗。那条路直接通向无尽的森林之中，在那里我们能够听到男人的叫喊与枪声。现在，我知道那时是一支德国军队在进行演习，不过在那个时候，那些声音似乎是一些不祥的征兆。

对于我刚到集中营时的感受，我只有模糊的记忆，这群人里其他人的叙述却勾起了我许多回忆。朱蒂·雅各布斯就回忆了集中营的典型特征：“这是一个典型的集中营——狭长的营房、铁丝网，铁丝网间的雷区确保没有人能够逃离，人们没有希望去往任何地方。”威利用那讽刺性的语言回忆了当时所有人都有的孤立感和幽闭恐惧：“这片场地的周围环绕着卫兵、电网、哨塔，还有旋转机枪，就连一只苍蝇也无法逃离这里。”尽管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恐惧，不过自从我们离开匈牙利就抱着坚定的信念要被送到巴勒斯坦，而我们中的一些人此时仍然对此深信不疑，还将面包通过铁丝网扔给里面那些看着我们到达的囚犯。不过，对大部分人来说，卑尔根-贝尔森与我们的期望之地看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就连当时对巴勒斯坦概念混沌的我也对此感到特别失望。伊迪特·哥德斯坦就表达了她对此感到的震惊：“当我们进行完漫长的行进到达卑尔根-贝尔森的时候，一扇大门打开了，我们走了进去，大门又在我们的身后关闭了，接着我们便意识到我们无法从这里出去了。结果，这就是结果，他们欺骗了我们，我们知道了这就是结果。”我们听说其他群体也曾经确信会在两周内离开这里，但他们过了11个月后仍然没有离开。

我们的场地大约离大门500米远，一边是男人集中营和特殊集中营，





另一边是六角星集中营。男人集中营中囚犯的状况最为恶劣。伊迪特·哥德斯坦表达出了我们看见这些由于饥饿和力竭而濒临死亡的人们时的感受，他们在集中营中被用俚语称做“穆斯林人”，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总是保持俯伏的姿势，这正好符合穆斯林人在祈祷时的动作：“我们见到了‘穆斯林人’，他们只剩下了皮包骨，那时我们意识到很快我们就要和他们一样了，这就是正在等待我们的将来。”米里亚姆·巴克也提到了这些囚犯可怜的状况：“他们是眼神空洞、脸颊灰白的行尸，死亡就写在他们的脸上。”

我们刚到达自己的场地就被命令在两个棚屋之间排队等候，空地上搬来了一张桌子，桌子后面是一个打字员，于是一些人开始登记。直到现在，我们也无法十分确定我们那群人到底有多少人，卡斯特纳说是1684名乘客离开了布达佩斯，我们也通常假设是1684人从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中被救了出来。事实上，当旅行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列车上的确切人数，只知道最终到达瑞士的人数大约是1670人，而到达集中营时的人数是1684个。至于登记，并不需要身份的证明文件，只需要报上名字、生日、国籍和职业就可以了。

不久后，我们发现国籍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在与纳粹谈判的时候，“瓦达”把我们都说成是匈牙利人。鉴于专横恐惧下德国人那些荒唐的条文主义程序，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我们当中大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匈牙利人，有些人由于在一战后在各个国家辗转而拥有多重国籍，有些人则是邻国带着假身份证件逃亡者。安·帕斯捷尔纳克·斯莱特极端细致地在文章中写道：“1350人中有5个奥地利人、23个意大利人、33个波兰人、48个南斯拉夫人、115个捷克人和173个罗马尼亚人，而整个1684人当中肯定还有更多非匈牙利人。”

我们的领导人告诉我们，要称自己为匈牙利人，不过有些人对此感到犹豫。尤其是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一大批人中很多人都视自己为罗马尼亚

人，他们对此感到十分头疼。沙乌勒·兰德尼回忆道：“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人们的那些紧张、混乱的讨论，每个人都在试图决定自己的国籍到底是哪。”我还记得我父亲当时也同样犹豫不决，最终，或许是又进行了一次幸运的赌博，或者是由于匈牙利人数较多会给人一种安全感，他选择将自己定义为匈牙利人。这或许是我们最终被解救的原因之一。

在我们抵达的第二天，简诺·科尔布在自己的日记中提到，我们总共有 972 个女人或女孩，712 个男人或男孩，其中，14 岁以下的儿童有 320 人。根据托马斯·拉赫的数据，14 岁以下的儿童占 16%（大约 285 人）、男人占 43%（大约 600 人）、女人占 57%（大约 800 人）。许多儿童都是孤儿，他们有的是被亲戚、父母的朋友照顾，有的是由宗教或者政治组织的代表照顾，有的是由可怜他们的陌生人照顾，有的则不得不自我照顾。根据帕斯捷尔纳克·斯莱特的观点，年龄结构是经过“精细地平衡过”的，主要倾向于儿童和青年，在不到 1684 个人中，以 10 年为一档，她统计出 3 岁以下的儿童 60 人，4 至 14 岁的 213 人，15 至 24 岁的 362 人，25 至 34 岁的 310 人，35 至 44 岁的 270 人，45 至 54 岁的 221 人，55 至 64 岁的 130 人，65 至 74 岁的 50 人，75 至 82 岁的 11 人。

这些人在名单上显示的职业也多种多样，不过真实性并不可靠。举例来说，欧根·梅耶后来在网站上将我父亲列为“农民”，我父亲从未干过农活：我猜想，他称自己为农民是因为他料想在艰苦的环境下一个农民比一个小商人有价值。在帕斯捷尔纳克·斯莱特对此所做的编辑中可以充分地反映出职业的多样性：187 名家庭主妇、139 名学生、113 名雇工、84 名商人、77 名缝纫工、40 名工匠、36 名律师、35 名医生、32 名学童、27 名教师、25 名裁缝、18 名护士、17 名拉比（犹太人的学者）、16 名工程师、12 名园丁、12 名药剂师、10 名秘书、9 名教授、7 名锁匠、7 名杂货商、7 名机修工、7 名理发师、5 名制造商、5 名花商、5 名电工、4 名印刷工人、4 名经济学家、4 名牙医、4 名制表匠、3 名皮毛商、3 名建筑师、3 名鞋



Id:	Nazne	Vorname	Geburts- datum	Geburts- ort	Familie- name	Beruf	Ka
961	Lefkovits	Zoltán	12.2.22.	Kyiregyháza	ung.	Arbeiter	56
962	Legmann-Stern	Lea	9.3.07	Mármarosziget	ung.	Haushalt	56
963	Legmann	Ladislau	2.1.01	Kisbács	ung.	Landwirt	56
964	Lewy	Gabrie	12.6.42.	Kolozsvár	ung.		56
965	Lainer	Judit	2.3.31.	Kassa	ung.		56
966	Leitner	Felix	8.10.21	Nagyvárad	ung.	Student	56
967	Leitner	Marianne	31.1.24.	Nagyvárad	ung.	Studentin	56
968	Leitner-Blau	Rosa	3.6.95.	Nagyvárad	ung.	Haushalt	56
969	Leitner	Alexander	5.11.89.	Nagyvárad	ung.	Kaufmann	5
970	Levy	Georg	4.12.12.	Nagyvárad	ung.	Kach, Ing.	56
971	Lewy-Loskovits	Irene	21.9.13.	Kolozsvár	ung.	Haushalt	56
972	Lewy	Judit	11.4.44.	Kolozsvár	ung.		56
973	Lichtig	Mor	5.20.90.	Csarne	ung.	Kaufmann	56
974	Lichtig-Langer	Sara	5.5.92.	Salgow	ung.	Haushalt	56
975	Lichtig	Felice	19.1.21.	Lipiany	ung.	Schneider	56
976	Lichtig	Elsa	26.12.21.	Kassa	ung.	Photograph	56
977	Lichtmann	Gerich	10.2.40.	Szabadka	ung.		56
978	Lichtmann	Hedda	26.12.37.	Szabadka	ung.		56
979	Lichtmann	Mira	31.8.43.	Szabadka	ung.		56
980	Lichtmann-Klein	Rosa	29.4.04.	Rajdunánás	ung.		56
981	Lichtmann	Tibor	19.11.36.	Szabadka	ung.		56
982	Liebermann	Zoltán	12.5.95.	Kassa	ung.	Kaufmann	56
983	Liebermann-Pickel	Dora	20.	Huszt	ung.	Kinder	56
984	Link	Arnold	26.1.04.	Nagytpocsan	ung.	Beamter	5
985	Lithau-Greben	Edith	07.	Budapest	ung.	Haushalt	5
986	Lock	Alfred	7.11.22.	Wien	ung.	Elektr.	5
987	Loker-Merger	Margarethe	15.12.89.	Budapest	ung.		5
988	Lob	Ernest	28.2.206	Zilah	ung.	Ing.	5
989	Lob	Georg	31.7.31.	Szabadka	ung.	Schiller	54
990	Lob	Isak	29.7.96.	Kendermező	ung.	Agroton	54
991	Lobl-Limori	Klara	9.12.11.	Gheese	ung.		54
992	Lob	Ladislau	8.3.33.	Kolozsvár	ung.		54
993	Löwenstein	Zoltán	25.6.36.	Galánta	ung.		54
994	Löwenstein-Follák	Edith	4.10.11.	Kulence	ung.	Haushalt	54
995	Löwenstein	Emma	24.3.42.	Budapest	ung.		54
996	Löwy	Agnes	1.9.24.	Budapest	ung.		54
997	Löwinger-Löwinger	Hedy	31.7.10.	Verbove	ung.		54
998	Löwinger	Samu	17.8.07.	Vác	ung.	Kaufmann	54
999	Löwinger	Samu	17.8.07.	Vác	ung.	Kaufmann	54
1000	Lustig-Rosenberger	Julie	12.8.08.	Kolozsvár	ung.		54

我们抵达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时准备的一页名单

匠、3名画家、3名木匠、2名会计、2名面包师、2名厨师、2名演员、2名摄影师、1名织布工、1名玻璃工、1名歌手、1名细木工、1名屠夫、1名承包商、1名农艺师、1名音乐家、1名出口商、1名糖果商、1名手套商、1名记者、1名铁匠、1名职业治疗师、1名艺术家、1名翻译、1名图书馆员等。

严格按照“瓦达”的挑选标准，这些人中包括许多解散了的犹太社区的宗教、政治领导人及其家人。虽然，其中归化主义犹太人占大多数，但东犹太人（甚至是极端东犹太人）也占有一席之地，共有126人。最活跃的政治团体要属那些犹太复国主义政党，既有左翼，又有右翼：根据简诺·科尔布的统计，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199名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来自布达佩斯的230人。正如我前面已经指出的，我们这些人的内部事务都是由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根据他们的政治信仰进行管理，而通常不会争取非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认可。

1944年7月9日，就是这样一群成分杂乱的群体在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中列队进行了登记。这次登记的过程虽然并不有趣，但我们至少还不至于爬着回营。

我们被登记完毕后，我们的领导人将我们带到了我们的营房。我们的营房包括两个长长的木制棚屋，其中有许多大房间，房间里有混凝土的地板、小窗户和摆放紧密的三层床铺。人们顾不上那些匆忙制定的准则，拼命地抢睡觉的地方，人们推来挤去，只为得到自己想要的地方，首先占到床位的一些家庭或小圈子会故意将身体伸展开来以获得更大的空间，而其他人若想得到自己想要的空间就不得不动用武力。棚屋里十分阴暗、冰冷，并且散发着臭味，我们很快发现，那里还充满了虱子和跳蚤。威利对此的回忆虽然很幽默，不过那样的经历并不有趣：“在棚屋里，成千上万只饥饿的虱子正在等着我们。它们吸吮着我们的身体，到处都有它们的身影。我们抵抗虱子的战役根本毫无战果，它们总是保持数量上的优势。”





米里亚姆·巴克也概括了我们刚到那里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得到改善：“没有颜色，没有美丽，没有舒适，没有一点东西可以使人们有在家的感觉……被关在这个荒凉、冰冷的地方与缺少食物一样恶劣，一个是在折磨我们的身体，另一个则是在折磨我们的灵魂。”

晚上8点左右，我们被告知要在两个棚屋之间的空地集合，接下来的便是我们要接受的150次点名中的第一次。除了重病的学生以外，所有人包括男人、女人、儿童、老人和婴儿都必须列队，站成五排，等待点名。我们被分发了一些面包与咖啡代用品，不过我们仍然感到饥饿。我们由于在卡车里的长途旅行而感到精疲力竭，我们感到困惑与恐惧。当我们在等待点名的时候，一场雷雨把我们淋成了落汤鸡，但那些纳粹的军官不知是想烦扰我们，还是真的不太识数，一遍又一遍地点算我们。这种煎熬一直持续到10点钟，然后我们才疲惫不堪地回去睡觉。

点名算得上是我们这些人最痛苦难忘的经历。欧文·黑尔珀对此的回忆就与我十分相似，他说：“点名持续了几个小时，他们查着我们的人数，不允许我们离开，直到我们的双腿已经无法支撑身体，而只要数目不对，或者其他什么原因，我们就得一直站在那里，接着便开始下雨了。与其他集中营相比，这虽然很艰难，但还谈不上十分恶劣。”确实，比起其他集中营中人们遭受的苦难，我们所处的条件应该还算不错。尽管如此，一次又一次的点名还是摧残了我们的意志。蒂博尔·阿德勒女士就回忆道：“他们像数动物一般数着我们，对人来说，像数字一般被对待是无比耻辱的事情。当然，对他们来说，我们就是一些数字。”

作为有价值的商品，就像“中立集中营”与“特殊集中营”中的囚犯一样，我们这群人相对来说还算幸运。那些在“六角星集中营”中的囚犯就没有这样的运气了，德国人认为不大可能会有大笔的赎金或交易物来交易他们，因此这些人的生活艰难得多：他们可以穿着民服，不过必须佩戴黄色的大卫之星；他们获得的食物更差，还必须进行奴工，比如拔树



根、挖水沟、做些厨房的工作，尤其是还要拆开数百万双鞋子以回收皮革，而且这些工作都是要在纳粹士兵与犹太囚犯头的呵斥与鞭打下进行。其中，最惨的要数“战俘集中营”中的囚犯了，他们必须穿着囚服，有系统地被饿死或劳累致死。

在我们待在这里的5个月里，我们这个群体十分幸运地比其他大多数人遭受的痛苦少得多，而当我们在12月初离开这里前往瑞士的时候，我们身后的那数千个人就要迎来致命的苦难。尽管如此，发现自己被关在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铁丝网后，而不是在去巴勒斯坦、奔向自由的途中时，我们还是陷入了深深的震惊与困惑之中。

第八章 特权集中营中的生活

不同的待遇

由于德国人将我们视为有价值的商品，我们受到的待遇要比卑尔根 - 贝尔森集中营中其他大部分囚犯好得多：我们可以保存自己的衣物，不需要穿囚服或佩戴黄色的大卫之星；除了要保证我们的场地井然有序之外，我们不需要工作；我们可以定期排队洗澡，虽然女人们永远克服不了在德国男兵的监督下的那种尴尬；我们的食物相对还算充足，而且可以参加一些文化、宗教活动；我们运作内部的行政体制，不会经常遭到纳粹卫兵与犹太囚头的谩骂与威逼；男人与女人睡在不同的棚屋，不过一家人在白天时可以在一起。尽管如此，在卑尔根 - 贝尔森集中营中的 5 个月时光并不是在郊区的一次度假。

我们每天的日程被详细地安排好了。我们早上 6 点起床，送食物的人会在 7 点左右将早餐送来；在清洁完棚屋与院子之后，我们必须准备点



名，点名大约在9点半至10点半之间，或者更晚一些；11点半至12点半之间，我们会进行午餐；午饭后，我们可以做一些自由的活动，直到下午5点至6点间的晚饭开始；晚上9点是睡觉的时间；接着，10点熄灯。这样的安排有时会被点名时间的延长或同盟国的飞机飞过集中营空袭德国城市而打乱，当同盟国的飞机飞过的时候，我们会被命令回到棚屋中，或许是为了消除我们因看到天空中的朋友而感到的喜悦。基本上，这样摧残意志的单调日程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重复着。

至于那令人恐惧的点名，我们每天早上都必须走出棚屋，站成五排，等待纳粹卫兵来点名，直到他们对点名的数字感到满意。这个过程通常会持续两三个小时，而如果他们点名中间发生了错误（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他们就会再点一遍。他们有时会静静地点完了之，有时则会夹杂着侮辱与谩骂，这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心情和性格。一开始，点名就足够令我们头疼了，不过随着天气与我们生活条件的恶化，点名愈加变得令人难以忍受。这个群体里的每个成员都清晰地记得当时他们对此的厌恶，或许乔治·布拉夫的《一些恐怖的回忆》能够最清晰地将此表达出来：“他们让我们在院子里列队，四周环绕着哨塔、纳粹和卫兵，你不得不站在那里，即使是下雨或者下雪。接着，纳粹军官会进行点名，好像有人能够凭空消失似的。至少，在我的记忆里，这些事情总是令人难以相信的漫长，令人难以相信的困难、冷酷、恐怖。”

对我来说，点名就意味着对双腿的折磨，意味着无情的北风穿透我们湿透的衣服，意味着一点点的恐惧与没有尽头的无聊。就算我们最终被允许回到自己的住处，我也不会感到特别舒服。

我们1684人被挤进棚屋10号与棚屋11号之中，每个棚屋都被分成8个大房间。不过，棚屋10号里有3间房是属于波兰特殊集中营的，这样一来，留给我们的就只有13个房间，每个房间180平方米，应该由130人分享一个房间，也就是每个人占有1.4平方米。事实上，我们住得更加拥



挤，因为有几个房间被用做他用了。一个房间被用做我们内部领导人们的办公室、医务室兼衣服、食物和药物储存室；另一个房间有一些多孔的铅管，我们可以用那些流淌的冰水洗洗自己或衣物；第三个房间则是我们领导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和朋友的住处，一共 70 人。就这样，在剩下的 10 个房间中，每个房间要容纳 160 个人。

只要有可能，来自同一地域或者有相近宗教、政治联系的人会被安排到同一个房间，但男人和女人是被分开的。我模糊地记得我的房间是 10B，与“A 与 B 住的是来自科罗日瓦的男人和男孩”的事实相符。

每个房间里最大的区域由那些三层床铺占满了，共分成 4 个区域，之间有狭小的过道。门口附近有一个桌子和几个椅子，房间的后部有一个单人厕所，我们不得不在傍晚以后使用这个厕所，因为我们不能离开棚屋。最近的哨塔就在坑厕附近的围墙处，那里有一名士兵持着望远镜与机关枪监视我们，而且探照灯从黄昏到黎明会一直扫射着我们的棚屋，真是一道邪恶的“风景线”。在这样的条件下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伊迪特·哥德斯坦的回忆与我十分相似：“我获得了一个上铺，头顶是倾斜的屋顶，甚至无法坐立起来……屋里没有灯光，密不透气。下雨时，雨水便漏了下来，直接浇在我的铺上，我把碗放在漏雨的地方，但雨又会从其他地方进来……最终，我们的东西都发霉了，我们没法将它们透透气，因为如果将什么东西挂在外面，很快就会被偷走……厕所前总是排着长队，假如有人实在很急而没有排上很好的位置，那他可就要有大麻烦了。”

简诺·科尔布在日记中仅仅用了两件小事就完全表现出了棚屋在夜晚时的情景。第一个便是睡觉者发出的不同声音：“他们喊叫、哭号、说话、磨牙、大笑、发布命令……呻吟、喘气、打呼噜。”第二个则表现出了我们日益糟糕的健康状况：“每个人的呼吸都不一样，人们甚至可以从小便的声音来叫出每个人的名字。喝完汤以后，我们的肚子开始胀满气体，还要忍受发炎的膀胱。”



简诺·科尔布对他棚屋里一个典型的夜晚进行了描写，如果不是当时那恶劣的条件，这看起来似乎还挺有趣。一个拉比的妻子试图阻止她那4岁和8岁的孩子在她的床铺上打闹，她的临床则因为这样的吵闹声而无法入睡，于是开始咒骂起来；一个女人因为一只老鼠爬过她的脸颊而大声尖叫；虱子从上一层床铺掉落到下一层；另一个女人又尖叫起来，因为她上铺的男孩将被用做夜壶的果酱罐直接倒到了她身上；有个人患上了百日咳；另一个小男孩求他的妈妈不要打他，因为他在睡觉的时候把他和母亲同睡的床尿湿了；一个曾经的夜总会舞女向一个高尚的东犹太语言教师讲述着她前任同事的黄色故事，这名教师不知道是应该捂上耳朵，还是应该开怀大笑；一个曾经被宠坏的贵妇人将她的衣服挂在所有能用的钉子上了。她在这段文字中的结尾是：“24个小时之中，这里没有1分钟的安静，只有在黎明的时候，喧哗或许会减轻一些。想到那些被驱逐到其他地方而遭受更残酷的折磨的人们（包括我们的亲人、挚友），我就会感到无比的心痛。”

对于那些个夜晚，我也有一些记忆，比如当我把夜壶里的东西弄洒在我下铺那个男人身上的时候，他是多么生气。我还记得那些几乎顶到屋顶的床铺，几乎不亮的灯泡，凹凸的草垫，据说是用人的头发制成的粗糙毯子，虱子，鼾声，咳嗽，打嗝，放屁，叹气，呻吟，尖叫，低声的争吵，突然的谩骂，厕所里不断的哗啦声，夜壶被充满的声音，房顶漏雨的声音，狂风呼啸的声音，透过小窗户不时映进的探照灯的光线，远方人们的喊叫、猎狗的狂吠，我躺在冰冷、潮湿、难闻的黑暗之中。不过与大人们不同，我并没有太多地担心那种非人的生活。

我们一共有两个坑厕，一个男厕、一个女厕，都在围篱附近，被一个哨塔监视着。卫生纸总是很缺，我们不得不用一些书纸或者包裹代替。在科罗日瓦隔离区的时候，我已经克服了对与一大堆人共同如厕的震惊了，不过对很多人来讲，这种经历仍然是痛苦而难忘的。不知怎么的，一棵番

茄在坑厕附近的围篱外生长了起来。虽然它在我们离开集中营之前就死了，不过在当时压抑的环境之中，它可是不多的能够激励我们的事物之一。沙乌勒·兰德尼就是被这样并不协调的场景震撼的人之一：“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坑厕以及产生的恶臭，不过我同样也不会忘记高高的围篱外生长的那颗番茄。”

我们在棚屋里生活的痛苦经常与饥饿的难耐相伴。德国人提供给我们的每日供给包括大约 330 克面包、15 克人造黄油、25 克果酱、1 升汤和 1.5 升咖啡代用品，有时还会有一小片奶酪或香肠。14 岁以下的儿童还可以获得额外的配额和一些牛奶。我们自己带来的食物可以作为这些配额的补充，不过远远达不到我们的所需。随着时间的流逝，情况变得更糟，德国人的配额和我们自己带来的食物都变得越来越少。

面包呈灰色的块状，不论是在形状上还是在重量上都和砖头一样。每天 330 克的配给看似慷慨，但这些面包块都特别重，而且营养物质极少。有些人将它们平均分成每天一份，其他人则没有这个耐心，只将它们分成两三份，有人还曾就把面包分成两大片还是三小片更有营养的问题进行过科学的辩论。随着我们变得越来越饥饿，面包似乎也变得愈加重要。艾吉·哈戴尔就将面包描述为如“泥巴和木屑制成”一般，但“却是你一生中吃过的最好的东西”。我们的领导人把我们分到的面包储藏起来，然后再定时将旧面包换成新面包，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危机。

我们在早餐和晚餐分配的咖啡是由某种未知的代用品制成的。我还记得我们棚屋的一个过分殷勤的官员简诺·蒂罗尔每天都要喊两次：“咖啡，大家快来啊！”我们高兴地冲过去，却只能得到颜色和咖啡有天壤之别的不明物品。本·赫尔施将其称为“黑水，有时候是温的，有时候则是凉的，并不难喝，只是没有任何味道。”

每天供给的汤是由容量 25 升或 50 升的那些容器从集中营的厨房带来的，汤是由没削皮的芜菁、甜菜和许多我们从未见过的根菜制成的。奥尔





加·蒙克回忆道：“我们得到的是他们用来喂牲畜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用英语应该怎么说。汤里的东西都被切成了小片，十分脏，甚至没有进行清洗，这就是我们必须吃的东西。”如果幸运的话，有时我们会发现里面有些土豆皮，甚至是土豆块。如果再幸运一点的话，我们或许会在菜叶里发现几条肉丝。

起初，我们无法咽下这种汤，我们将它留在容器里，然后扔掉，或者试图送给铁丝网另一侧那些条件更加恶劣的人。不过随着我们变得更加饥饿，我们就不得不欣然地食用这种汤了。伊迪特·哥德斯坦对此进行了平淡的描述：“起初，没人想喝这样的东西。这是喂猪的东西，而不是人的食物，不过一两天后，人们便开始排队打汤了。”与其他人一样，我也饥饿难耐，不过汤里的那些蔬菜，尤其是芜菁和各式各样的甜菜根，我怎么都咽不下去，我父亲则将他的大部分配额让给了我。

对食物的分配经常伴随着争吵。匿名作者所著的《去往卑尔根-贝尔森》中就将这种情况总结为“营养不良与持续的饥饿使人们变得躁狂，一句无心之语就足以在两个朋友之间爆发一场争吵。”科尔布的日记就记录了“为了一盘蔬菜和几条肉丝而产生的争吵、混乱、谩骂、扭打”的场景。杰克·格罗斯对此的回忆则既生动又不失准确：“经常会有一些争斗，例如，人们排队等着将自己手中的碗装满菜汤，接着，饥饿的人们就会开始争斗，‘你给他的多，却给我的少！你为什么给他的多？你为什么要偏向他？’随后，他们便互相抢夺，有时还有偷窃。”

根据万有引力定律，菜汤里的菜料会留在容器的底部，结果，人们都希望晚盛汤，他们之间的推来挤去有时甚至会演变为大规模的打斗，不过他们对腐败的憎恶比这种暂时性的争斗严重得多。《去往卑尔根-贝尔森》愤怒的作者就特别声称，那些运送食物的人除了自己额外的供给之外每天都可以偷到30升或40升的菜汤，他们这样做是得到了我们领导人的纵容的。那些领导人也会从这些运送的食物当中得到好处，他们还允许裁缝与

鞋匠为他们提供的服务索取过高的费用。虽然我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不过我曾经不止一次看到人们因为食物而大打出手，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看到一名杰出律师的脸上因殴斗而留下的鲜血时而感到的震惊与着迷。

威廉·斯特恩两个心酸的回忆就表现出了饥饿导致的羞辱，当时他还仅仅是个孩子。一个是他回忆起他震惊地看到“一个曾经富裕、尊贵的绅士……伸出手指舔着装着食物的容器底端，因为每人定量的配给对他来说显然不够。”在另一个回忆中，他叙述了关于他自己的一件“感到无比羞耻”的事情。当时，他要奔波于两个棚屋之间将他母亲制作的果酱三明治送到他父亲手中，而他“经常会偷偷地舔掉部分果酱，并再次试图将果酱平均分配在三明治上，这样是为了满足自己对甜食的渴望”。

一天，15桶贻贝被倾倒在了棚屋前面，人们疯了一般，用手抓着那些软体动物，将它们塞进口袋然后迅速地从拥挤的人群中抽出身，津津有味地吸吮贝壳里的贝肉，接着再冲进人群里试图抢得更多贻贝。虽然用科尔布的话来说，这堆海鲜“实在是臭气熏天，就像低潮时的海岸”，不过我还是想抢一些，然而我的父亲没有允许我这么做，因为他害怕食物会被人下毒。

持续不断的饥饿使我们的头脑中无时无刻不在想着食物。在我们清醒的时候，我们从未停止过谈论我们曾经吃过的美食，以及一旦我们回到文明的社会我们将要饱餐的食物，到了夜晚，我们梦到的也是这些。人们互相交流自创的食谱，我们的一些配给会因我们的足智多谋而焕然一新。由面包、人造黄油和果酱制作而成的美味“蛋糕”会被用于生日和重大的犹太节日。我们无法确定“将汤里的土豆取出来，然后做出某种土豆沙拉状的调和物放在面包上”是否真的会制作出“比光喝汤更有营养的三明治”，如伊曼纽尔·曼德尔所回忆的那般。

比其他人的生活更加困难的是那些吸烟者。偶尔，我们的配给中会包括





一些香烟，不过从来不够用。人们没完没了地争论着非吸烟者是否应该与吸烟者得到相同的香烟，有一次，我们的领导者们提出的分配方案差点导致了一场革命。有些人会吸一些别人扔掉的烟头，其他人试图用茶叶代替，那些烟瘾最重的吸烟者甚至会用食物和财产去交换。

简单的易货渐渐发展成了与外部世界相似的复杂经济。商品与服务被用来换取其他的商品与服务，或者是假设的解放后要被兑现的欠条。这里有猛涨与暴跌、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这里有能够获得较大收益的中间人和经纪人，充当货币的则是香烟。

虽然价格经常变化，以下米里亚姆·巴克的列表还是可以使我们大概了解一下香烟在当时的市场价值以及可以买到的东西：

4 张卫生纸	1 根烟
1 顿晚餐	1 - 2 根烟
1 顿晚餐	3 - 4 根烟
1 个洋葱	3 根烟
1 罐番茄	5 根烟
1 块黄油 (30 克)	8 根烟
1 双羊毛袜	25 根烟
1 片面包 (2000 克)	50 根烟
1 双女鞋	150 根烟
1 双男鞋	200 根烟
1 件男士西服	270 根烟

至于服务经济这一部分，裁缝与鞋匠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随着我们被囚禁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的衣服与鞋子也开始破了，许多人随身只带了夏天的衣物，因为他们相信会被从布达佩斯直接送到西班牙和巴勒斯坦。随着天气变得越来越潮、越来越冷，人们对裁缝与鞋匠的需求便急剧增加。冬天的衣服都是由毛毯制成的，由德国人提供或者是取材于床铺的木

板被削成鞋底的形状连同一些皮带绑在破旧的鞋上，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一双鞋，我还记得那如踩高跷一般的鞋子让我走起路来是多么不适。这些手艺人的收益包括香烟、食物和其他物品，有时候是由顾客直接支付，和民营企业一样；有时候则有领导层对他们分配特别供给，和国有企业一样。还有一些业余的手艺人，比如，有些女人就是在这种状况下挖掘出了她们潜在的技能，她们将破布缝在了一起制成了新衣服，或者将废旧的毛衣拆开毛线织出新毛衣。

虽然我们的饮食比大多数囚犯的好，但我们仍然饥饿难耐；虽然我们比其他人健康一些，但我们当中还是有许多人患上了各种疾病，并且病情越来越严重。科尔布说，我们刚到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时候就有人患上了感冒和肠道感染，接下来的8月和9月便出现了几例昏厥、猩红热，一例胃出血，一例胃溃疡、脑炎以及一次妇科疾病。西多妮娜·戴维塞利还列出了更多疾病，诸如麻疹、百日咳、胃病。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精神病患者，最明显的是一个叫格乌里·梅左的年轻人，他总是动不动就愤怒地将整个匈牙利火车的时间表背诵一遍。我们当中还有两个驼背，恰巧都是指挥家。身体上的不适同样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科尔布再次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令人信服的叙述：“大多数人都患有疾病、消瘦、饥饿、紧张，我认为大卫由于饥饿而患上了甲状腺的疾病，他的双眼凸出，脾气暴躁，甚至有暴力倾向，这也是为什么他会与费德利特、后又与纽曼发生争吵，不过他的情况由于胃溃疡而变得更加糟糕。”

缺少必要的卫生条件也导致了一些皮肤病的出现。我父亲和我，还有很多人都染上了疥癣，那无尽的搔痒使得我整夜无法入睡，白天又使我心烦意乱，幸好瓦莱丽·斯塔克医生给了我们一些软膏。我尴尬地被她从头顶检查到脚趾，然后她要求我们剃光全身的体毛，我现在仍然记得我的父亲听从她的意见而摆弄着粗钝的安全剃刀、肥皂和冷水为我剃毛。

虽然在我们离开的时候传染病就开始流行，不过我们中间并没有发生





致命的疾病大爆发。麻疹曾经在儿童之间传染，并可能传染给成人，但医生们在产生大量患者之前成功地控制住了疫情。我们都接种了抵抗霍乱的血清，却无法针对斑疹伤寒进行大规模的接种，因为缺乏消毒酒精。或许是幸运，我们躲过了集中营中前几个月导致数千人死亡的斑疹伤寒。

医疗服务是由一个有上尉军衔的纳粹军医进行监督的，除了偶尔的意见不合外，他与我们自己的医生之间关系还是不错的。我们旁边住着荷兰犹太人的六角星集中营中有一个简陋的诊所，虽然明令禁止不同场地之间互相交流，不过我们被允许到那个诊所进行牙齿治疗，有时，儿童也会被带到那里由我们自己的医生进行外科手术。据记录，在那个德国医生的支持下，卡洛齐医生、赫尔曼医生与施瓦兹医生进行了三例中耳手术和一例肠道手术。

当时，“瓦达”在挑选名单上的人员时是想让这些人能够代表整个匈牙利犹太民族，所以这些人中包括放射学家费伦茨·波尔加、医生桑德尔·布劳恩、眼科专家尤若夫·汉姆伯格这些知名的专家等 35 名医生和几名药剂师就不足为奇了。虽然我们缺乏必要的医疗设备与基本用药，不过我们还有相当多医疗供给。我记得我们那群人还是一个相对健康的群体，不过这或许部分是因为我当时还只是一个 11 岁无知的小孩。大人们在当时一定不是这么想的，他们知道现实的情况，那些病人则能切身感受得到。

“人员过度拥挤，资源短缺。有很多医生，却缺乏组织……很难获得药品。”这就是科尔布的日记中描述的医生们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进行他们的工作的。然而，他们的献身精神值得很多人肯定，正如朱蒂·雅各布斯所述：“医生们竭尽所能保证医疗，那时候的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供给、药品和医疗设备。”雅各布斯的父亲阿达尔贝尔特·贡德斯医生则很好地诠释了医生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处理事情的机智：“我的腿感染了，而当时又没有抗生素，我父亲从凡士林中调制出一种硫磺软膏，就这样解决了问

题。”奥尔加·蒙克的儿子得了痢疾，多亏了一个伟大的医生不顾德国人的禁令而冒险跑出自己的棚屋去帮助她：“他是晚上来的，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来为我的孩子看病。他身上带着药品并让我的孩子服了下去，所以我的儿子才能活下来。”

医生们有令人羡慕的权利，可以分配一定量的食物。如果他们觉得病人需要更多营养，就会给这个病人提供额外的配额。这或许会保证病人能够快速恢复健康，不过也同样会被病人们利用，包括一个聪明的12岁小孩。大卫·科恩曾经因发烧而卧床3个星期，医生为他提供了额外的小麦粉，大卫后来承认，他其实“很快就恢复了，不过仍然卧在床上”。一年以后，大卫成为了我的继兄，因为他守寡的母亲与我那丧妻的父亲结婚了。

我也发过一阵低烧，我父亲担心那是夺走我母亲生命的肺结核的征兆。他每天都给我测量两次体温，但他借来的体温计不止一次在测量的过程中掉在地上摔碎了。作为一个正直的男人，我父亲用香烟赔偿了被摔坏了的体温计的主人，我却因为那些香烟本来可以买来的额外食物而闷闷不乐。

在5个月里，我们这个群体里有人出生，有人死亡。至少3个人死在了我们的场地，一名女医生在没有任何设备的情况下还进行了一次堕胎手术，8个婴儿出生，其中的几个是在盟军空袭的时候在棚屋里的烛光下出生的，还有一个婴儿是在我们去往集中营的运牛卡车上降世的。在我们被囚禁的整个过程中，欧根·梅耶就生活在他母亲的子宫之中，并在1945年1月出生于瑞士，后来，他成了纽约城市大学的一名著名社会学教授，还是卡斯特纳纪念网站的创办者。他在草稿中写了几章关于卡斯特纳的事情，准备出书，却在2004年死于癌症。

看起来，我们这个群体里的很多女人都已经停经了，如其他集中营中的女人一样，要么是由于心理原因，要么是由于营养不良。那时，我并没





有注意到这一点，或许是因为我那时太小而不感兴趣，或许是因为人们从未公开讨论这个话题。在男人的住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人们都不会聊起这样的话题。

棚屋间的隔离自然会影响人们的性生活。11岁的我当然对此一无所知，而其他人的回忆又忽略了这一点。有些青年男女还是会睡在一起，一些回忆录中简单地提到了他们这种大胆的行为。我记得当时听说一个纳粹女主管看到一个男人在一天下午出现在女人棚屋内的时候愤怒异常，嘴中谩骂着，拎起身边的东西挥打起来。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具体情况，不过现在我猜想她可能发现他们躺在了一个床铺上。在我们待在这里相对早一些的时候，科尔布在日记中写道：“年轻的男女夜里睡在一起会使怀孕的人增多，因为我们没有避孕措施。不过关于性的要求确实是个现实的问题，我们认真地考虑是否应当引入一个交配日。”接着，他又暗示了空袭情况下熄灯时发生的事情：“一般来说，我们会在黑暗中度过两个小时，我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脱光衣服，从性欲的角度来讲，这有许多用处。”不过总的来说，似乎并没有许多性行为，虽然部分是由于压力、沮丧与身体虚弱，不过一个更加显而易见的原因则是他们缺乏必要的隐私，而同时还有谣言称，我们的食物中被偷下了镇静剂而使我们不会产生性欲，不过这似乎不大可能。

自 治

作为一个拥有特权的群体，我们在集中营中享有某种程度的自治。一般来说，纳粹卫兵进入我们的场地只是为了日常的点名，我现在还记得他

们中的两个，这两个人也出现在许多人的回忆录中。第一个人个子很高，脾气暴躁，他会抓住每个机会来谩骂、威胁我们，我们都十分憎恨他。由于他要么是有兔唇，要么是在什么事故中留下了伤疤，我们都称他“刀疤嘴”。此外，他还有另一个外号，叫“贝塔”，这是根据一个最极端的右翼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名字得来的。另一个则有些瘦小，斜眼，和其他集中营卫兵差不多，他的嘴里总是叼着一个烟斗，并且经常遭到其他德国人的嘲笑，我们称他“卜派”（大力水手）。他也有另一个外号，叫“米兹腊希”，是根据一个宗教大党的名称而来的。

许多人对卜派都有良好的印象。有一天，他在点名时发现少了一个女孩，因为她实在无法忍受穿着她那双破旧的鞋子站在水坑里了，于是第二天就给了那女孩一个纸袋，里面装着另一双鞋，虽然也是旧鞋，不过还能穿，并且大小基本合适。有时候，他会给小孩带一些食物，给大人们带一些旧报纸。有一次，我因发烧而躺在床上，他过来点查缺席点名的人数时鼓励性地拍了拍我，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我也没能查出他在战后的境况。有些回忆录，包括亚历克斯·巴泽尔的回忆录，声称他是为英国秘密传递情报的英国间谍。不过卜派也有令人不解的时候，典型的就是由约瑟夫·伯杰记录的一件事。当时，7岁的伯杰将一个皮球踢过了围篱，这个卫兵将皮球还给了他，不过是在用刺刀将皮球扎穿之后。

还有一些纳粹女主管，她们负责检查棚屋的清洁。其中的一个女主管，我们憎恨她更甚于憎恨“刀疤嘴”。米里亚姆·巴克将她描述为“一个20岁左右貌美的金发女郎”，但“她的眼神如刀子般锋利，脸上有魔鬼般的笑容，充满了蔑视与厌恶”。她称我们为“肮脏的犹太人”，她抽打一个3岁男孩的嘴巴，因为他在她进入棚屋的时候没有站直身体。她还撕毁了一个老妇的祈祷书，并且冷酷地大笑。如果毯子没有完美地铺在我们的铺上，她那“冷酷的嘴里便会骂出一系列的惩罚措施（如取消面包配





额)”。巴克惊讶地看到“一群大学教授、世界闻名的医师、留着长胡子的令人尊敬的拉比都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帽子，一个初出茅庐的女孩却高傲地望着他们，嘴里吐出最下流的话”。莉莉·斯荣蒂拉德凡依记得，当这个女主管发现一个没被清洗的杯子时进行的吼叫：“我要撕碎你们，要是你们在8天之内没有敦促对方达到标准的话，你们就得带上黄色六角星去工作。”科尔布的日记中进行的描述可能指的是同一个人：“白色皮手套，高脚靴，制服，女裙裤，挡住一半脸的帽子，走路大摇大摆，轻佻娇媚，她总是情绪高昂，喜欢摔打盘子，威胁着要取消黄油的供给，将床铺弄乱，告诉我们她是如何在其他场地打了两个人的耳光。”没有一个回忆录提到了这个纳粹女人的名字，不过这个典型的人物很可能就是和克莱默一起从奥斯维辛集中营来到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臭名昭著的厄玛·格利希，他们在战后不久就被英国人绞死了。

根据卡斯特纳在谈判时提出的自治原则，集中营指挥官的命令会先到达我们内部的领导者，然后再传达给我们，决定我们日常生活的细节部分。实际上，我们这个群体就像一个微型的国家，有各个政党、一个政府、各等级的官员、一个法官、一个警察机关、一个书面的宪法、选举、政治阴谋、滚木立法，简而言之，所有的东西都是建立民主所必备的。唯一的障碍是，我们都是非民主纳粹的囚犯，他们可以随时取消我们的特权，甚至会毫不迟疑地将我们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些濒临灭绝边缘的无助的人还在玩弄着政治，考虑着会议的日程与会议的记录、议案与修订以及主席的决定与投票，这简直与我们需要保持自尊一样荒谬。虽然很可笑，却使我们继续生存，只要我们能够试图抛弃这样的幻象随时可能会消失的想法。

在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中，在莫雄马扎尔时被任命的领导人们仍然依据那时制定的规章继续履行他们的职能。执行的过程并不顺利，人们经常发生摩擦，不管是在私人之间，还是在政治问题上，而最大的不信任存

在于拥有大多数领导者的科罗日瓦群体与拥有大部分人的布达佩斯群体之间。此外，青年群体间的争吵（经常发生于左右翼观点之间）也时常发生，一些具有宗教信仰的派系与那些宗教信仰不强烈的派系之间也会发生争论。7月22日和23日，一个由26名成员与6名执行官组成的“行动委员会”成立了，执行官包括摩西·罗森伯格、费伦茨·考德斯、希勒尔·但泽、简诺·拉兹罗、伊莱·科恩以及他们的主管尤若夫·菲斯彻。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尤若夫·菲斯彻有独断的决定权。

经过了长时间的讨论，一系列新规则于10月出台了。新规则密密麻麻地被打在六页纸上，共有25个条款，作为我们的“宪法”之用。这样复杂的政府机构似乎更适用于一个小国，而非在铁丝网后、任由纳粹摆布的不足1700名犹太人的群体之中，不过这使得我们，至少对大人们而言，可以有事情去做、有问题去讨论，也同样让我们有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幻觉，而且有利于避免混乱。

我们这个群体将由“犹太民族精神”（也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领导，我们的主管团体需要谨慎地对待“集中营内人们的技能、知识以及财产”，“宪法”就是基于这样的共识而制定的。主管团体是由不记名投票进行选举的，主要包括1个领导人、2个副领导人以及15名其他成员。二级委员的主管是从主管团体的成员中挑选的，共有10个，主要负责管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中央与地方行政、法律与秩序、经济、食物供给、健康、教育、宗教与福利。我们同样还有一个3名成员组成的监督委员会，监督委员会不在主管团体的职权范围内。作为集中营的领导人，尤若夫·菲斯彻尤其拥有至高的权力。法律与秩序是由我们内部的警察机构执行的，一旦有人违规，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如被取消配给或睡在床铺的光板上。申请（如申请药物）、投诉（如投诉警察机构）和申诉（如申诉将要受到的惩罚）都必须按照周密的程序进行。

到11月中旬，拟定的草案被人们接受了，接下来要进行的便是选举。





经过激烈的竞选演说、宣言、争论后，52名从我们中不同政党提名的选民开始为新的主管团体投票。如果我们采纳科尔布列出的那个不很精确的列表，这些人中包括以下21个人：尤若夫·菲斯彻、道夫·布劳恩、简诺·拉兹罗、费伦茨·考德斯、尤若夫·戈特利布、德兹索·赫尔曼、费伦茨·巴托斯、尤若夫·温伯格、阿道夫·施勒辛格、贝拉·索尔特、简诺·科尔布、拉兹罗·苏木杰、拉约什·高特斯曼、亚历克斯·瓦斯、摩西·罗森伯格、艾德·马顿、高吉·波尔加、桑德尔·莱特纳、利奥·斯坦、艾多拉德·伊兹拉克以及李波特·布劳。很快，二级委员会也都成立了，科尔布负责教育与文化方面的事务。新选举出来的负责人与之前的大体一样，所以一切基本上还是照常进行。

正如预料的那样，我们之中出现了许多关于领导人不公、欺凌或腐败的控诉，我怀疑，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领导人成了集中营中艰苦生活的替罪羊。不过在我们当时的条件下，说领导人们完全没有滥用他们权力也不太现实。对于领导人们最极端的指控出现在《去往卑尔根-贝尔森》中，我认为那些指控有些被夸大化了，不过或许也揭露出了某些真相，虽然书中冷酷、尖刻的语调暗示着那个匿名作者对这些领导人的深深的个人恩怨。

根据《去往卑尔根-贝尔森》中带有偏见的叙述，菲斯彻在行政体系中的各个职位都安排了亲信，而这些人也将自己视为绝对的统治者。这些顶层的派系可以享用奢侈的食物，大多数人却要忍饥挨饿；负责大众福利的人将必需品送给他们的亲信，将分配给大家的食物卖给那些能够支付货币或值钱物品的人；主管团体的成员将自己的名字放在预计离开这里的名单的最前面；内部的警察机构通过临时的抄查与严厉的惩罚而恐吓人们。那位匿名的批评家将他的陈述总结为：“领导层使得集中营内始终充满恐惧，任何自由的言论都会被禁止，任何的批评都会遭到严惩，这些‘当权者’总是鼓吹团结的重要性，他们自己却总是追求个人的利益。”

虽然我认为这个作者因为他的私愤而夸大了这件事，但其他人同样刻薄的评论也显示出集中营表面下存在的强烈不满。科尔布怀疑，主管团体的一些成员将公共食物储备去黑市卖，并通过帮助其他犯罪者或者袭击无辜的人以隐藏他们地下的交易，他还说，就在我们被释放不久之前收到的由红十字协会提供的药品被扣留下去并且卖给了那些有能力的买家。赫尔曼·阿德勒还补充道，红十字协会作为礼物送给我们所有人的营养品思达沃塞（Starkosan）中的3/4都出现在一些领导人的私人储藏室，他们还在向每个人承诺将部分面包留作战略储藏的时候偷偷将它们卖掉以牟取暴利。

我们无法证实这些指责，但科尔布觉得身边的所有事情都有过错，而不应该仅仅抓住领导人不放的观点或许才是对的：“没有足够的诚信、缺乏秩序、缺乏系统，一系列冰冷的条规”。不过，如果这就是当时的普遍情况，那我们的领导人们也没有试图去创建一个更好的环境。伊迪特·哥德斯坦就用简单的语言批评了领导人们的态度：“集中营中的领导人们并没有与群众融合在一起。”他们的确由于自己获得物质上的优越并且对其他人高傲、专断而遭到许多人的憎恶。几名见证者说，真正的咖啡的香味会从领导者们紧闭的房间里传出来，而这也被视为我们那艰苦环境下领导者与臣民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的标志。

难得的文化活动

我们这群人里许多人都是匈牙利犹太人中间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我们行李中较大一部分是书籍、文具以及祷告用的物品。由于我们并不需要





工作，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开展了积极的文化活动了，包括轻松的娱乐和高尚的教育工程等。

我们可以在公共场地阅读各种书籍（包括哲学与历史学习类书籍，宗教读物，匈牙利与外国文学名著），这些书籍的主人也可以将它们借给别人阅读，这要么是作为一种友好的表示，要么可以换取一些香烟或者食物。有限的纸张大部分都用来制作一些官方文件，包括规章制度、会议议程、会议记录、法律程序记录，不过还有一些剩余的纸张可以用来进行艺术创作。在我的记忆中，这群人中出现了许多知名人士，并在其他回忆录中得到了证实。

我们这个群体中的几个心理学家中最杰出的一位是利奥波德·斯容帝，他是“运气分析”的创始人。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发展他的理论、传授课程、帮助病人，微调他的“斯容帝测验”。他曾经要求我在分类的精神病人图片中选出最吸引人的图片和最不吸引人的图片，然后他在我选择的基础上制作了一张图表以评估我的性格。我对此很感兴趣，虽然我觉得那些面孔都一样令人讨厌。

伊斯特万·伊尔塞是一位著名艺术家，他负责在犹太节日时装饰棚屋、为选举准备海报、绘制讽刺意味的明信片以反映集中营最典型的方方面面，比如哨塔、棚屋、三层床铺、铁质的食物容器、没法下咽的野萝卜、日渐减少的面包、打补丁的衣服以及我们的巴勒斯坦梦。

知名作家兼记者贝拉·索尔特会作一些关于文学、历史以及政治方面的演讲，他还会借助凌乱的报纸或者用香烟从卫兵嘴里换取的信息来分析战争的进程。用香烟来换取信息或许是他最不愿做的事，因为他是我们这个群体中烟瘾最大的人。索尔特身后有一些崇拜者，他向他们保证回到匈牙利后，他会成为首相，而他将会为他们在政府中提供一个职位，他也承诺会让我的父亲成为财政部长。虽然索尔特没能成为首相，不过他至少被选入了匈牙利的国会。他完成大屠杀回忆录《九个手提箱》之后便去世



了，而我在几十年后将这本书译成了英文。

德兹索·恩思特（之后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演出）和汉纳·布兰德（乔尔·布兰德的妹妹）都是专业歌手，他们会在棚屋里演唱，经常是在熄灯黑天的时候。乔治·毕少普尤其对恩思特赞赏有加：“夜深之际，那些绝望、饥饿的人群中响起天籁般的歌声，唱着作曲家威尔第与瓦格纳的歌曲……他唱了10分钟、15分钟，那简直太美了。”科尔布还记得第三个歌手：“星期五是糟糕的，那天下午4点就会停电，四周会变得漆黑……不过在我们的棚屋里玛吉特·萨尔高会唱着爵士歌曲。”合唱是我们最普遍的文化生活之一，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的成员们会合唱希伯来的歌曲，其他人则会合唱依地语或者匈牙利语的民俗歌曲或者流行歌曲。虽然科尔布说她曾经拉过一两次小提琴，不过很显然当时的器乐是十分的稀少的。钢琴家塔玛斯·布鲁姆无法弹奏钢琴，于是改谈音乐历史。

我们这个群体中的两个成员会在我们夜晚躺在床上时的时候背诵一些诗句。埃尔斯·巴勒泰是一位小说家，不过他最大的成功在于他读过许多现代匈牙利诗歌。赫尔曼·阿德勒是一位诗人，他声称他曾经因在“面包屑”中演出而获得报酬。还有一个诗人是费伦茨·亚伯拉罕，他出版过自己的诗歌，其中就包括在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写的名为《囚禁》的诗集。这部诗集的版本是唯一的，只有一份，是由黄油盒、锡杯和废线制成的，现收藏在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纪念博物馆中。在当时，它还可以用来借阅以获得几根烟或者一顿午餐。

有些活动是自然而然地进行的，其他活动则是由领导人们精心策划的。例如，10月中旬，两个棚屋中每个房间汇总的代表聚在一起讨论晚上人们开展文化活动的方式。他们讨论道，房间10b、10c、11b与11c已经有了讨论与谈话的活动，10a可以进行唱歌课程，10c则可以全天进行宗教学习。那次会议的结果我们并不知道。

这么多犹太知识分子挤在几百平方米的空间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



的讲座与讨论，我对大人的那些事情并不感兴趣，不过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看到一群人围在一个演讲者或几个辩论者的周边聆听。如果天气好，这样的场面就会发生在屋外，如果天气变冷或者下雨，他们便会在棚屋内的公共场地开展这样的活动。这些讲座在大多数的回忆录中都出现过。伊迪特·哥德斯坦就回忆起“年轻的、年长的、虔诚的、世俗的、艺术家，歌手，记者，心理学家，医生等各式各样的人都在演讲”。科尔布的日记中有具体的名单以及批判的评论，一个简洁的例子就是：“道夫·布劳恩就生物学演讲，巴克讲的是社会学，赫尔曼讲的是社会结构”，日记的两天之后接的便是“萨博那关于战争叫嚣的糟糕的演讲”。

那些演讲与辩论经常会带有政治动机。科尔布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犹太复国劳工运动“高德尼亚”的活跃分子，他提到他与其他高德尼亚的成员为了营造有利于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性气氛而开展了一系列讲座：“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势头正在上升，为了阻止这种势头，我们要组织一些文化讲座：《犹太复国主义理念的发展》（演讲者为简诺·科尔布、德兹索·维希、艾德·马顿和尤若夫·汉姆伯格）”。接着，他又介绍了下面的演讲者与题目：“法卡斯·恩格尔：《19世纪的知识运动》；卡姆洛斯：《匈牙利犹太人的悲剧命运》；巴克：《两千年之路》；道夫·布劳恩：《马丁·布伯》；曼德尔：《希伯来文学》等；拉约什·马顿研讨会：《圣经时代的巴勒斯坦历史》《车尔尼雪夫斯基之夜》《女人棚屋中的一个依地之夜》等”。

11月2日，我们庆祝了承诺犹太人将巴勒斯坦作为家乡的《贝尔福宣言》27周年纪念日，那天，尤若夫·菲斯彻代表我们的主管团体用匈牙利语和希伯来语庆祝了这一历史时刻。晚上，两个棚屋里的每个房间也都进行了演讲与讨论。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生活都带有政治倾向。根据斯容帝的提议，一个包括所有能言善辩的知识分子的“学习小组”成立了，目的是要“教

化个人，并且试图教化群众”。每个成员都要在一个规定的领域内（宗教、哲学、法律、文学、艺术、社会）挖掘人性的意义，之后便要进行一次讨论。斯容帝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详细地讲述了人性的概念。科尔布抱怨人们渐渐忘记了自己本来的目的：“三天的讨论中……没有一个字提到人性——他们都在讨论着他们感兴趣的话题……菲斯彻在捍卫犹太复国主义，波尔加讨论着人的价值，索尔特则将民族主义称为梅毒和麻风。”

我们还有一些简单的娱乐活动。西多妮娜·戴维塞利回忆道，“虽然整个群体充满艰难、踌躇与绝望，有时我们还是试图为我们的棚屋中添加一些欢乐。”这些娱乐活动中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个当我在黑夜中躺在床上虽然无法真正理解却仍然觉得有趣的游戏，也就是对中欧那些复杂的政治性和文学性的卡巴莱（Cabaret，一种歌厅式音乐剧，通过歌曲与观众分享故事或感受，演绎方式简单、直接，不需要精心制作的布景、服装或特技效果，纯粹以歌曲最纯净的一面与观众交流，可以说是一种音乐上的情感交谈和亲切感觉的接触，在欧洲十分流行）进行恶搞翻拍，用一些模仿的人物、讽刺性的内容以及幽默的歌曲来嘲笑我们群体中的一些成员、德国卫兵、食物、坑侧、天气、政党间的争吵以及许多其他话题。人们那时关于“SSK”的玩笑使我感到困惑，那时的我知道“SSK”是下流的代名词，并且与那些德国女主管有关系，不过我当时的理解仅此而已。我现在知道了“SSK”是匈牙利语“纳粹妓女”的缩写，不过我仍然不知道他们那时到底开了些什么玩笑。

我们的这个群体中大约有300个儿童和30名教师，我们到达集中营不久就决定组织教学。8月21日，人数占大多数的归化主义犹太人的课堂正式开学了，随后，为人数占少数的东犹太人服务的正统犹太小学也成立了。从理论上讲，每天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的课程应该是必修课，不过不稳定的出席率与教学资源的缺乏使得教学并没有组织者希望的那么有效。如果天气好，课堂会在棚屋外，儿童可以用手指或者木棍在沙子上写





字以缓解纸张短缺的问题；秋天到来时，我们上课的地点就会转到拥挤的棚屋之中，课程渐渐变得断断续续。我必须承认，我甚至记不得在卑尔根-贝尔森时曾经上过学。当时，一个叫莉莉·斯荣蒂拉德凡依的老师就生动地描述了教学的困难：“我从草包中将报纸（我唯一的课本）拿了出来，走向棚屋里另一角的桌子处，这就是我们的学校了。不幸的是，并不是每个学生都有一枝铅笔，而且纸张非常珍贵。有些人没来上学，因为他们没有鞋子而冻坏了脚。15个人中只有6个或者8个会出席……我们开始学习算术，这样就不需要纸和笔了。一个现代的教师会经常将留给学生的任务联系到生活之中，我会提问他们，如果五个房间中每个房间有6个食物递送员，那么一共有多少个食物递送员？或者房间里的100人要分享50升的汤，那么每个人能够获得多少？”

科尔布还说明了，即使是一个特别负责人、精力充沛的教师也仅仅能够获得极为有限的成功：“库达尔卡女士做着计划、发布指令、组织教学的工作，她简直太精力充沛了……昨天，她进行了测试，前五名的学生得到了嘉奖。他们忘记了那些无限的数字，几乎无法读写或者算术。和大人们一样，他们的记忆也变得模糊起来，他们的想象力只徘徊在平凡的事情上，他们甚至无法将未来想象成正常的生活。”

犹太复国主义在教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对那些儿童而言，教学的方法是一些有趣的游戏。当时10岁的艾吉·哈戴尔回忆道：“每天下午，犹太复国主义者们的某个人会将所有的儿童聚集起来，他们教我们希伯来语，教我们唱歌，我们就这样忙于这些事情。”不过并不止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包括左翼的哈肖默·哈特扎尔组织、宗教米兹腊希党派、右翼修正主义的贝塔组织以及其他派系）也专心于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教育或者灌输孩子们成为巴勒斯坦终生的先锋。

这并不合每个人的“胃口”。许多人厌恶那些没完没了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东犹太人会认为这漠视了宗教价值。当时14岁的杰克·格罗

斯回忆道：“因为这是一个由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的群体，我们被强迫学习希伯来课程，必须了解巴勒斯坦及其地理，不学习托拉（《圣经·旧约》之首五卷），只学习那些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目的有关系的东西。”至于那些既非犹太复国主义者又不是东犹太人的年轻人，科尔布说：“那些非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资产阶级青年也希望忙点事情：艺术、音乐、文学等”，一个“青年研讨会”的课程就包括“人体生理学”“希伯来文学简介”“两次世界大战间文学”“音乐的历史”以及“犹太历史”。

语言课程应该是最频繁的活动，不管是对大人还是儿童而言。在这样一个似乎要驶往巴勒斯坦、由犹太复国主义者占主体地位的群体之中，最普遍的当然是希伯来语课程，不过人们也可以参加英语、法语甚至德语课程。伊迪特·哥德斯坦尤其是一个全能的教师，他能够教授全部四种语言，他有英语、匈牙利语、德语、法语与拉丁语的词典。

体育是我们大量缺乏的一项课程。在当时的条件下，不要说我们缺乏必要的体育设施，我们根本没有欲望与精力去做太多锻炼。犹太的知识分子们对体育也不感兴趣，不过在我们囚禁的前几个月里，一些年轻人还是参加了一些排球、体操、民族舞的锻炼，但经常会被那些脾气暴躁的卫兵打断。有些年轻人会用床上的木板与偷来的铁丝网制成简单的武器，并且在洗涮室操练。他们并不是将此视为一种游戏，更多的是防备纳粹会在同盟国到达之前试图谋杀我们而准备自卫，这有助于年轻人保持斗志。

所有这些可以使我们在条件艰苦的集中营中得到片刻的喘息。随着我们身体与情绪的状况越来越差，我们的这些文化生活也日渐减少。不管怎么说，这些文化生活确实大大地帮助我们保持了斗志。赫尔曼·阿德勒简明扼要地写道：“我们觉得我们还是人类。”维拉·约翰斯坦纳也表达了相同的感受：“我觉得我还属于人类，而不是他们想把我们变成的东西——动物。”这些文化生活的确帮助我们在悲惨、艰苦的生活中保留了自尊与理性。不过，如果我们没有被及时营救，那么没有任何文化生活还会让我们





保留住人性。

错综复杂的宗教信仰

虽然我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并不笃信宗教，不过无论是出于信念、传统还是绝望，许多人还是会参加犹太的宗教仪式。我们会庆祝重大的节日，祈祷，学习宗教文章。我们能够带在身边的祷告物品，包括《托拉卷轴》《圣经》《塔木德》（一本犹太人至死研读的书籍，犹太教口传律法的汇编，仅次于《圣经》）的副本、祷告巾、经文匣，也被我们充分利用起来。

在重大的犹太节日，我们的棚屋便变成了临时的犹太教堂，用来对病人治疗的医务室则是我们的主教堂。光秃的灯泡上装饰了用硬纸板剪成的大卫之星，墙壁上挂满了有宗教铭文的自制海报。女人的部分被布幔隔开，混凝土的地板铺上了毛毯以代替东方地毯。其他房间虽然没有这么耀眼，但也都是按照相似的方法进行了装饰。

犹太日历中最重要的节日是罗什·哈桑纳（犹太新年）和赎罪日。在这两个节日的时候，一种羊号角（绍法，即犹太人礼拜仪式上使用的一种羊角号）应该在仪式的某些时间被吹响。我们在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也有一个绍法，它的主人提出了300支香烟的租金，最终，他还是接受了以一罐沙丁鱼当作租金的请求，而绍法也使得临时搭建的教堂得以运转。在我们隔壁的波兰场地上，那些奴工会停下来聆听号角并且祷告，直到德国卫兵谩骂、鞭笞着他们回到工作岗位。有些回忆录中写道，一个绍法和一个托拉会流传于波兰的场地与我们之间，而那个绰号为“卜派”或者“米兹腊希”的卫兵则扮演着递送员的角色，但我认为这是集中营的生活中被

杜撰出的故事之一。

最热烈的一次庆祝发生在犹太新年的两天以后。不同派系、不同政党都有自己的临时教堂以及临时用来共进食物的桌子。第一天，拉比阿道夫·肖伯斯坦那令人震撼的布道使人们泪流满面，并且创造了善意、团结的氛围，接下来，拉比蒂博尔·法特曼进行的无力、啰嗦的布道却破坏了这样的氛围。熄灯后，科尔布在黑暗中发表了讲话，呼吁人们抵抗人性的邪恶与自己的恶性，接下来便是诗歌朗诵与吟唱，一直持续到午夜。同时，在另一个房间，82岁的拉比萨拉蒙·斯特拉瑟在激动的哭喊中完成了他的布道，也深深地融入到了这样的状态之中。第二天，节日被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的点名打断了，不过在与青年先锋们完成安静的庆祝之后，科尔布将那回忆为“极其美妙的一夜”。《去往卑尔根-贝尔森》的匿名作者也对这次经历采用了温和的语气，在没有忘记我们永恒痛苦的同时，强调了这次节日中的快乐：“在那些天，整个集中营联合了起来，大家和睦相处，无比和谐，所有的分歧都被搁置了，我们庆祝起来，一同默哀。”

每周进行的安息日庆祝（星期五晚上或者星期六）则显示出了我们这个群体互为派系的特点，而最深的隔阂发生在东犹太人与归化主义犹太人之间、犹太复国主义者与非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和被同化者与传统主义者之间。虽然这里有一些互相重叠的部分，但由于始终与这些事情保持距离，所以我对他们没什么印象。其他人回忆中的三个例子或许可以使我们感觉到那里的多样性。

埃斯特·君戈蕾丝是一名拉比的女儿，她回忆起她的家人安静进行的东犹太庆祝时，她的父亲“将我们在黑夜中聚拢在一起，他会开始轻声地唱起《安宁与你同在》，然后进行祈福式（节日和安息日前夕的祝福仪式）。那非常、非常美妙。我父亲每天还会从食物供给中取出一些储存用于安息日”。

与此相反，科尔布记录了在我们到达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后一周时





哈肖默·哈特扎尔党进行的一次“社会主义者的庆祝”，祷告、讲话与持续到深夜的欢歌甚至热舞使得铁丝网后呈现了一个美妙的安息日，一名德国卫兵威胁道，“如果有下次，他会带来一杆机枪”。不过，这样的场面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还是一次次地重复，尽管低调了许多。科尔布承认，世俗群体与宗教群体的节日能够创造出篱墙内自由的氛围，不过对那些并不属于这两个群体的人，他却无法理解。一群被同化的犹太女人们喧闹地聚在一起被他认为是堕落的场景：“充满了音乐、匈牙利歌曲、进行曲、尖叫、呼喊，与那些青年先锋们的棚屋相比，这简直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没有意识到，这种狂放的娱乐其实只是人们企图克服孤寂的一种手段而已。

我们在集中营中时，四个主要的犹太通过仪式（割礼、成人礼、结婚与葬礼）也同样会进行。第一个做包皮环切手术的男孩出生于一次空袭的时候，而割礼仪式在另一次空袭中进行。在这个被上帝遗弃的地方，人们入神地观看男孩象征性地承认着与上帝的盟约。当几周以后第二个男孩要做包皮环切手术的时候，那个被我们称为“贝塔”的卫兵打断了我们的仪式，而在我们告诉他我们正在做事情后，他命令道：“这是神圣的事情——继续！”

几个年满13岁的男孩接受了成人礼，这些仪式在临时的教堂中举行，仪式包括在人群前阅读和评论托拉上的一段文字和一个晚餐后的讲话。有些还算善良的卫兵也会出于好奇来观看。胡达·布鲁姆就是在集中营完成成人礼的男孩之一，在他的讲话中，他引用了宗教用语“明年在耶路撒冷”。虽然这似乎是个不可能实现的预言，但这个群体中的许多成员竟然奇迹般地实现了这个预言。

集中营中没有举办过婚礼，不过一对来自科罗日瓦的年轻人在我们到达这里的三周后订婚了。在那种条件下，我不知道这代表着他们反抗命运的信念，还是只是一个冲动、愚蠢的举动。

第一个葬礼于8月9日为伊娃·布莱斯洛尔而举办。自从在林茨被强

迫剃了光头，她就一直忍受着精神的创伤，最终于17岁死于肺炎。按照传统习俗，她的尸体被清洗干净后穿上了白色的衣服，接着，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与她告别。之后，她的棺材由一个通常用来装垃圾的马车运走了。两周后，一个10个月的婴儿和一个67岁的女人死了，科尔布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人们悲伤的情感已经远没有在布莱斯洛尔葬礼上那么强烈了。”

我们的群体中还有一些与大批宗教人群一起生活的拉比，包括改革派和极端传统派，其中，最著名的是锡德派的拉比扎利斯·泰特尔鲍姆。虽然正是由于卡斯特纳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他才能够得以逃生，但他依然憎恨犹太复国主义，并且在解放后移民到了美国而不是巴勒斯坦。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个不太热情但引人注目的人，他的周围总是环绕着他忠实的追随者，而他们总是竭尽所能使他免于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中的苦难。他们到这里的时候带了满满一箱犹太教食品和一个他们自己的厨师，那个厨师被允许在集中营的厨房为拉比准备食物，他自己却只能够吃面包和带皮烤的马铃薯。当我们的领导人为了减少我们身上的虱子或者避免激怒德国人而要求所有男人剃掉胡须的时候，他却执意保留他的胡子，不过不得不在脸上围上围巾，像牙痛一样。他习惯于在点名的时候去上厕所，这也使得我们不得不在寒风中多站一会儿，直到卫兵确定没人逃跑。他的信徒们只喜欢围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并且态度傲慢，从不亲近他人。不过没人可以否定，他确实有独特的魅力。用胡达·布鲁姆的话来说：“他不是普通人，不管你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

我需要补充的是，当我父亲需要做出艰难的决定时（通常是我的教育问题），经常会争取泰特尔鲍姆的意见，这意味着我父亲需要精神上的指导。不过在同样的问题上，他还会听取一下斯容帝的意见，作为一个非宗教信徒，他或许认为自己应该把事情做得四平八稳。

东犹太人将泰特尔鲍姆当作圣人一般顶礼膜拜。或许他最突出的特质





是源于他信仰的冷静与自信。当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因为某些事情而灰心丧气的时候，他似乎知道没有什么真正的危害会最终接近他，而他也会将这种信念传染给身边的人。雅各布·格罗斯就是他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他解释道：“他的精神没有消沉，他总是精力充沛，给予我们鼓励……他总是微笑着，告诉我们一切都会过去……上帝会帮助我们的。”

批评家或许会说泰特尔鲍姆有充足的理由去冷静、自信，因为在我们这个相对享有特权的群体中，他是享有最高特权的个人之一。不过他确实有着人没有的内涵以及压倒一切的个人魅力。他在托拉节（庆祝神圣卷轴的节日）上的行为足以令许多人惊叹，就连科尔布也对此印象深刻。当他在泰特尔鲍姆面前表演时，他承认他所见到的情景的确极具感染力，使人着迷：“人们都狂喜。拉比在房间里跳着舞，他的信徒们唱着歌、拍着手，直到他们筋疲力尽，许多人在一旁观看，如同在剧院中一般。8点钟时熄灯了，不过歌舞仍然继续着，很晚才结束。”

在食物的问题上，东犹太人有时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不知是因为纳粹的荒谬还是虚伪，我们每日的部分汤食被规定可以是犹太教食品，一些装汤的容器上标着字母 K（Kosher——犹太教食品）。一般来说，这样的容器中只有菜而没有肉，这样就使得许多东犹太人遵从了自己的良心。不过一次又一次，人们在“犹太教食品”的容器中发现了肉丝，或许是因为容器上错贴上了字母 K。发生这样的事时，有些东犹太人会停止吃午餐，其他人则更加实际，认为这是上帝赐予他们的肉丝。至于我们有时会得到的香肠和血肠，东犹太教的人们要么用它们进行易物，要么给孩子食用，因为儿童比成人需要更多营养。宗教法规允许他们食用这些禁食，不过有些儿童仍然觉得有罪而无法下咽。

铁丝网综合症

虽然我们拥有相对的特权并且一直努力维持我们文明的人性，不过在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五个月中，我们的身体和精神状况仍然每况愈下，原因之一就是无尽的孤立。虽然我们的周围都有其他场地的人们，但我们不能和他们交流的。人们有时还是会通过一些私下的方法交流，病人或者医生到荷兰人场地的小诊所、送食员到集中营的厨房去取我们的食物时，也可以与其他囚犯交换一些信息，浴室的墙上也会留下一些文字。透过铁丝网，人们进行匆忙的交流，传递纸条、食物或者香烟。然而，这些接触根本无法减轻我们与世隔绝的感觉。

我们不能获得任何时事消息，但一些卫兵或许是出于好心或许是为了换取香烟而向我们透露一些新闻或给我们几页报纸——主要是纳粹时报《民族观察报》。有时，我们可以收到朋友或亲戚的邮件，虽然要很久才能够到我们手中，而且为了通过审查，信件的内容也不能多写。当我们听说贺西于7月7日下令禁止驱逐的时候，我们中的许多人开始相信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将自己送到德国人手中。关于7月20日刺杀希特勒以及同盟国军队进展的报道点燃了我们的希望，不过我们仍然害怕在集中营附近发生战争。10月15日的斯扎拉斯政变又使我们猜想，在德国的集中营中是否比在箭十字党的统治下好得多。大人们不断地揣测外面会发生什么，不过相比较安慰而言，那些环绕在耳边的事实、谣言以及幻想带来的更多的是失望。

天空上的战机使我们又想起了另一个诱人的世界。随着战争的开始，





越来越大规模的盟军战机飞过集中营，空袭汉诺威和其他德国城市。对德国人来说，那缓慢、平稳的嗡嗡声一定是个不祥的征兆，不过对我们来说，那是最悦耳的声音。如果飞机夜晚来袭，我们都会挤在一起透过棚屋的小窗户看远方天空爆炸的亮光，外边的卫兵则会气急败坏地让我们坐在床铺上。我经常会被大人们挤出来，不过有时我还是能够看到令我兴奋的场景。如果飞机白天飞过，里面的人会洒下一些银丝带，我与其他孩子们会贪婪地收集这些丝带，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是搅乱德国的雷达系统。对大人们来说，这些空袭意味着对他们进行拯救、为他们赢得自由的承诺，我也分享着他们的这种喜悦。不过空袭之后，战机都返回了基地，我们又和以前一样痛苦万分。

一缕阳光或一条令人鼓舞的谣言都会提起我们的精神，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没有任何被释放的迹象，饥饿、寒冷、疾病、挫折与恐惧发挥了它们的作用。7月，就在我们到达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两周后，科尔布记录了虱子与疥疮对我们的自尊造成的挫败：“这就是我们如何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都变得绝望起来的原因。”8月初，他抱怨道：“没有清洁、没有秩序、没有系统”。10月的第一周，他又记录了我们的衰弱，尤其着重提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反社会的行为以及每况愈下的身体健康：“人们紧张的状态以及道德上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坏。冲突的氛围已到达临界，人们会因为一个床铺、火炉、电灯的位置或者一勺果酱而进行激烈的争辩和谩骂。任何东西都会被偷，人们甚至不再将偷窃视为可耻的行径……大多数人都生病了，变得虚弱、饥饿、紧张。”

10月中旬，科尔布写到了他命名的“铁丝网综合症，也就是神经性兴奋、多疑、争吵、绝望、道德的日渐缺失”。科尔布提到导致这些情况的生理上或精神上可能的原因是“体重的大量减轻，每个人大概瘦了10到15公斤，甲状腺功能的增加，持续的饥饿，长时间的聚集，隐私的完全缺失，性功能障碍，等等”。

对于隐私的缺乏——不必说那公用的坑厕，就是在我们的房间中也困扰着许多人：“如果你想哭，只能在夜晚的时候躺在床上偷着哭，即使是这样，也会吵醒许多熟睡、打鼾的人，那些被吵醒的人甚至会跟你一起哭泣。”我们这么多人生活在狭小的空间里，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敌对情绪。争吵变得越来越多，每个人都变得“暴躁、易怒、紧张起来，包括在父母与子女之间、朋友与朋友之间”。与人们提倡的无私与关怀相反，这种非人的条件使我们更加反对社会起来：“集中营将人类的阴暗面展现了出来，人们偷窃、撒谎，而在正常的条件下，他们原本不会这样做的。”持续的压力使得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变得恶劣：“当人们情绪好的时候就是朋友，不过当情况变坏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互相憎恨起来。”这种愤怒并不仅限于个人之间，还存在于不同政治、宗教或者社会派系之间或之中。社会主义者与资本主义者争吵，原教旨主义者与无神论者争吵，青年先锋与老迈的资产阶级分子争吵，左翼的哈肖默·哈特扎尔与右翼的贝塔党派或者传统的米兹腊希党派争吵，人数较少但大权在握的科罗日瓦群体与人数占优但无实权的布达佩斯群体争吵。归化主义犹太人将东犹太人视为粗野的狂热分子，东犹太人将归化主义犹太人视为无神的变节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将非犹太复国主义者视为叛徒，非犹太复国主义者则将犹太复国主义者贬低为沙文主义恶霸。这些争论会导致人们的狂怒和吵架，随之而来的经常就是和解或者更多争论。

我们的斗志同样也会因为附近场地所发生的事情而被削弱。越来越多其他集中营中悲惨的囚犯被送到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9月，3000名匈牙利女人从奥斯维辛集中营来到这里，她们破衣烂衫，枯瘦如柴，穿着囚服，手臂上刺着数字。最初，她们被安排在“帐篷营”，睡在地上，没有床垫，没有毯子。她们没有坑厕，没有医疗供给，而且甚至没有饮用水。我们的一名妇科医生瓦利·斯塔克可以对她们进行检查，并且做了几个流产手术。她不能和她们交谈，不过她还是通过其他秘密方法与她们交换了





一些信息，她们的故事使我们感到了深深的不安。直到战后，我才发现我的表亲海伦与戈尔德原来也在那个群体中。

与看管我们的卫兵不同，我们旁边的六角星集中营中的卫兵并不吝惜他们的囚犯，我们就见过很多虐待人的事件。用米里亚姆·巴克的话来说：“人们一天又一天地挨打，看到一个老妇人因为无法忍受点名时连站几个小时而挨了几个耳光，我却只能够无助地站在那里，这真是太糟糕了。”我更愿意认为我们当时仍然能够同情他人，只是因为害怕那就是我们的将来，正如朱蒂·雅各布斯所承认的那样：“我们所见到的使得我们感到沮丧，因为我们认为那就是将来的我们，那就是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到11月中旬，条件变得更加恶劣。下午5点天就黑了，外面总是阴雨连绵，狂风几乎片刻不停，温度大约是 1°C — 2°C 。我们饥饿难耐，我们的衣服和鞋子在点名时被浸湿，就连我们中最健康的人也要遭受胃病和流感的折磨。我们被解救的希望急剧消失。我们试图花大量的时间躺在床上，不过这使得我们变得更加冷漠与消沉。米里亚姆·巴克记录道：“这样的休止状态是可耻的。”

科尔布通过两件事情辛酸地记录了我们当时的情感状态。在洗涮室中，他无意间听到了一个女人在自言自语：“我觉得我的早年生活不过是一场消失了的梦，梦中所有的轮廓都已经在我眼前日渐消失了。”科尔布与他的妻子伊迪特在寒风中的场地上走来走去，回忆着往事，他深思自语道：“正常的人拥有现在，而过去与将来都归于虚幻，我们却只拥有过去。我可以将未来视为现实，但我们没有现在。”埃利泽·科恩那“无聊与恐惧融合”的情绪是当时许多人的共同感受。在既没有夸大又没有缩小我们的苦难的基础上，伊迪特·哥德斯正确地概括了她与我们的遭遇：“我所在的地方并不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不过这为我带来的依旧是无尽的屈辱。”最后，威利在信中十分精确、有力地回忆了我们在集中营中的生活，在

此，我想引用一些：“我们自己带来的供给已经用完了，集中营厨房中的食物也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差。人们骨瘦如柴，吸烟者则因为缺少香烟而备受折磨。我与许多知识分子住在一个棚屋中，包括专家、教授、文人、土木工程师等等，然而，我们身体的卫生以及棚屋的清洁令人难以忍受。但我们又不可能待在外面，因为雨总是下个不停。另外，极其重视个人卫生的我也发现身上有了蟹虱，幸好被女人的棚屋里的一个皮肤科医生用简单的消毒剂去除了。不过，我的内心已经产生了厌恶，我厌恶自己，厌恶棚屋，厌恶食物，尤其是厌恶人……当我接到食物的时候（其实根本就是垃圾），光是味道就已经让我觉得恶心了，根本无法下咽……当我走进棚屋里，闻到尿味、臭味、腐败的味道，我的胃便开始翻江倒海，我一次又一次地呕吐……我的妻子牺牲了很多，将她本来就少的配给无数次地卖掉而给我换来牛奶、罐头和面包……我虚弱得卧床不起，无数个小时里我躺在这个脏兮兮、闹哄哄的垃圾场里，想着我的母亲，不知道她怎么样了，因为无法照顾她、无法让她待在我身边而受到自责。”

时间渐渐流逝，孩子们养成了很多恶习。大人们试图通过组织学校、宗教、政治活动使我们保持秩序，但这些活动越办越少。科尔布记录道：“孩子们受到家长们紧张情绪的影响，不过他们反过来又使他们的家长更紧张”。他将孩子们“粗野的行为”归因于“错误的教育”以及“不好的榜样”。大人们让孩子们尊敬大人、使他们认识到教育与礼貌重要性的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一群波兰的孤儿尤其野蛮，他们之中一些已经在集中营中待了几年，其他人也目睹过各种暴行，结果，他们也变得野蛮起来，仇恨一切人和事。艾吉·哈戴尔分析后得出认为，正是大人们自己的行为使孩子们没有了榜样与尊敬的对象：“我们看看那些成年人，他们很快便失去了镇静与仁慈。我们一致认为大人们知道所有的事情，他们机智，我们应当听大人的话，不过这种观点在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消失了，因为在这里，成年人也表现得没那么好了……许多人都曾经被视为模范市民、





律师和商人，但他们在这里的表现已经不是他们应该在孩子面前表现的那样了。”胡达·布鲁姆总结道：“家长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威信，我们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在早期，我们在玩一些传统的游戏时还保持着一些教养，但我们最终对那些游戏感到厌倦。我记得我曾经躺在床上很长时间，想象着食物，想象着巴勒斯坦，后来又想象着瑞士。科尔布看紧他的女儿，他女儿的朋友们则在重演着这个群体的历史，从我们离开布达佩斯开始，一直到集中营里的点名，还有其他场景。男孩子们则有一个不太文明的游戏，这个游戏甚至是我自己发明出来的。天气好时，人们坐在太阳下，背对着坑厕的外墙，墙的另一侧是小便处，我们经常试图尿过墙顶给那些晒日光浴的人们来点淋浴。我不记得我们是否真的成功过，不过我们觉得那确实十分有趣。

或许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淘气的孩子，不过我们所承受的艰难似乎比成人要少，主要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那令人绝望的现实。我记得我的确害怕过，不过也同样觉得是在历险，恐惧也是历险的一部分。而且我一直与我父亲待在一起，11岁的我相信他可以保护我，虽然这种想法其实是错误的。

我们的消沉突然被8月的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打断了。

8月的名单

我们一到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就开始梦想解放，猜想卡斯特纳在布达佩斯与纳粹的交易的进展。焦急的我们将任何给人希望的信息都当做重

大的事件。一天，一个德国士兵拿走了有我们名字的卡片索引，另一天，德国指挥官带着两个平民来到我们的场地，告诉菲斯彻我们将会很快离开。结果，每个人都兴奋地获取一些资格、寻求一些帮助以便能够最先离开这里，但最终只是美梦一场。

突然，8月16日下午，我们被召集起来进行第二次点名。有消息称：“赫尔曼·克拉米来了，我们要离开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条消息是真实的。赫尔曼·克拉米的确来了，手里拿着一张名单就站在我们面前，身边站着一些其他纳粹军官和我们自己的领导人。菲斯彻的副手米克拉斯·斯皮特念完了名单，名单比我们想象的短得多，300名幸运儿将要去瑞士。

这份名单到底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并不清楚。根据卡斯特纳的报告，名单最初是由柏林的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制定的，包含500个名字，主要是儿童和老人，只有少数有战斗力的男人。之后，由于卡斯特纳的推荐，又有许多人的名字出现在了名单之上，总数却被艾希曼减到了300人。卡斯特纳与布兰德的家人必须留在卑尔根-贝尔森做人质。许多的名字以A或者B开头，不过整体来说并没有明确的选择标准。许多孩子离开了他们的父母，许多妻子离开了她们的丈夫。《去往卑尔根-贝尔森》的匿名作者声称，我们的一个领导人将16个人名从原始的名单上删除了，而由他自己的亲戚取而代之。

宣布名单之后便是混乱的喜悦与愤怒。克拉米被几百个人包围着，乞求将他们加到名单之中。拉兹罗·戴维塞利与他的妻子柏丽斯求他能够让他们离开，因为他们年幼的儿子因为痢疾而奄奄一息了。克拉米同意了，但将孩子的祖父母扣了下来。威廉·斯特恩的父亲也向克拉米乞求，不过当他亮出一份包括30个家人的名单时，克拉米拒绝了，并且扇了他一个耳光。幸亏德国人确定身份时很马虎，几个名单上的人才能被其他人替代。不同政治团体都有自己的优先标准，例如孩子、孕妇或者有特殊功勋的积极分子都应当优先离开。要么是由于领导人的指示，要么是由于自





愿，许多本来在名单上的名字被其他名字代替了。那些自我牺牲是值得尊敬的，不过同时还产生了一些激烈的争吵。最终，经过克拉米的同意，最初的300人名单被增加到了318人。

当那些幸运儿收拾着行李的时候，剩下的我们站在旁边，非常羡慕。有些人将食物、香烟、药品和衣物留给了还留在集中营的人，其他人则将所有物品都带走了。那些将离开的人不再表示歉意、不再藏匿他们的喜悦，而那些仍然留在集中营的人很快就开始祝福他们一路平安。

最终，8月18日下午，318个幸运儿走出了大门，沿着我们6周之前进入集中营的那条道路前进。后来，我们听说他们于8月21日在巴塞尔穿过瑞士边界之前在运牛卡车里待了两天半。他们先是在蒙特勒的贝尔维尤旅馆住了三周，接着又被转移到了附近的勒阿凡。11月，他们大部分被分散到了瑞士的各个难民所，身上有钱的人则住进了私人住房。

那318个人离开后，剩下的我们既感到松了一口气，又感到绝望。胡达·布鲁姆认为，被留下来简直就是他一生中“最残酷的事情”：“我有一种被判处死刑的感觉。”我令人讨厌地不断询问我的父亲为什么我们没被选中。在克拉米离开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之前，他向我们承诺我们在几周以后也会离开。这给了我们新的希望，但一直没有下文，于是我们的情绪变得越来越坏。米里亚姆·巴克回忆道：“伴随着残酷的经历、谎言与欺诈，对1300个冷漠、焦躁、失望的人来说，剩下的就只有‘希望’了。”12岁的大卫·科恩记录道：“克拉米向我们承诺两周以后会进行第二次转移，然后在六周后将整个集中营中的囚犯全都转移。不过两周、四周、六周过去了，那个诺言仍然还只是一个诺言。人们绝望极了。”我当时试图使自己保持耐心，不过有时还是会无法控制地因急躁与无力的愤怒而颤抖。

尽管如此，这样的承诺还是使我们进行了进一步的计划。领导层开始制定名单与优先范围。政治与宗教组织开始辩论起来，比如，要将对党内

的忠诚与对巴勒斯坦的作用作为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不过很快，这样的辩论就变成了互相的谩骂。当菲斯彻发布规定种类与人数的准则时，人们的争论变得更加激烈。这种残酷的氛围持续了很多周，不过讽刺的是，这不过是浪费时间而已，因为最终我们都于12月离开了这里。

令我们苦恼不已的一件事是我们无法知道卡斯特纳谈判的进展。卡斯特纳成功地向我们传送仅有的几次信息中包括两封信件，一封写给他的岳父，另一封则写给他的妻子。第一封信于8月2日用德语写成，由克拉米转交，卡斯特纳通知菲斯彻，“暂时将有500人被允许继续他们去西班牙的旅程”。他解释道：“由集中营的领导人编制名单是一个复杂的任务，比起我们在这里自己确定人选，我们更愿意给你们提供一些可以参考的选择准则。”选择的准则如下所示：“对青年先锋、东犹太群体和来自科罗日瓦的群体，要根据他们的人数保证一定的配额。这同样适用于犹太复国主义者。你不能够忘记那些对提供食物与提供转移工具做出贡献的人，他们也必须被保证占有一个名额……有幼儿的家庭应当得到优先照顾。”

似乎没有证据表明这样一份名单的确是由我们自己的领导人制定出来的。卡斯特纳的信中还列出了一些具体的人名与家庭必须被列到名单中，而这些人中有些人最终踏上了转移的旅程，有些人却没有。信的结尾段暗示地提到了卡斯特纳最近的被捕，还模糊地鼓励了被留在集中营中的我们：“我最近刚刚从历时9天的远足归来，而且我现在身体不错，我希望你们也一样，请把我的祝福带给我们的所有朋友，告诉他们我希望他们很快就会离开。”

第二封信是于8月11日用匈牙利语写给他的妻子的，信中反映了他在与艾希曼谈判时经历的所有事。我们没有去西班牙，而是被带到了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对此，他感到十分失望：“我从没想过你们的行程会是这样，我很遗憾会变成这样。”当他安慰伯格幽的时候，他显然还没有预测到艾希曼要将他的家庭留在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中当人质的决定：





“我估计一周后你就不会待在那个集中营了。”他还表达了对我们这些在第一批转移中没能离开的人最终离开集中营的信心：“不幸的是，我们无法完全保证每个人都能离开，不过你必须让每个人安心——这只是时间问题。决定你们命运的官方已经声明，你们将会以一种方式或者另一种方式离开。这些官方从没有令我们失望过，我希望第二次转移很快就到来。”

这样的信件有时候能够减轻我们被孤立的感觉，虽然它们让我们燃起的希望会轻松地被证明是只是奢望。那 500 人的名单最终被减为 318 人，对剩余的人进行转移则要比卡斯特纳预计的时间晚得多。

第九章 艰难的谈判

临时协议

当我们挣扎地忍受着到卑尔根 - 贝尔森集中营的震惊时，布达佩斯的犹太人获得了短暂的缓刑。6月末、7月初，教皇庇乌斯十二世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亲自呼吁摄政者贺西停止驱逐，6月26日，罗斯福总统也威胁道，如果不立即停止就会进行严酷的报复行动。7月2日，布达佩斯遭受了规模最大的一次空袭，7月7日，贺西终于下令停止驱逐。虽然对犹太人的仇视活动仍在继续，但布达佩斯的20万犹太人躲过了那次劫难，除了那些死于其他方式的人以外。

德国人与匈牙利的暴民希望驱逐能够在8月5日继续进行，但被贺西拒绝了。德国人与多姆·斯托杰政府商议后，决定将恢复驱逐的日期定在8月25日，然而，瑞典、葡萄牙、西班牙、瑞士与梵蒂冈的代表都要求“彻底取消这种非人道的行为”。8月24日，贺西通知德国大使费森迈耶，



犹太人只可以在匈牙利国家范围内进行迁移。第二天，匈牙利政府正式通知了德国大使关于取消驱逐的禁令。当天午夜，希姆莱发来电报，命令匈牙利的德国安全部队指挥官温克尔曼停止对驱逐的所有准备。我们并不确定希姆莱为什么会下达这样的命令，一个原因可能是卡斯特纳在瑞士边界与比彻和梅耶的谈判取得的进展，卡斯特纳与比彻是这样说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另一个原因则是罗马尼亚的变节，罗马尼亚于8月23日脱离了轴心国而加入了苏联阵营。8月25日晚上，威斯里舍尼与卡斯特纳会面，告诉他：“你赢了，我的队伍要撤走了。”威斯里舍尼解释道，特别行动小组被命令撤出布达佩斯，因为希姆莱不希望对犹太人的进一步残害激起人们反犹太的情绪而使匈牙利成为下一个罗马尼亚。不过艾希曼并没有离开匈牙利，他待在这个国家，伺机重新开始驱逐。他没有等很长时间。

在几个星期内，一个由盖佐·拉卡托斯出任首相的匈牙利新政府执行着更加温和的反犹太政策，对驱逐的停止避免了最残酷的迫害。虽然犹太人仍然被逮捕、折磨或者杀害，不过至少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屠杀。这样的喘息由于10月15日箭十字党的政变而最终结束。

当我们在莫雄马扎尔挣扎于“奥斯皮辛或奥斯维辛”的谜题时，卡斯特纳拜访了艾希曼，要求他对我们的停滞进行解释。艾希曼声称，我们的人数太多而无法进入斯特拉斯霍夫，他通过电报指示列车将我们带到另一个叫“奥斯皮辛”的特权集中营，但由于奥斯皮辛也不合适，所以他又让我们去了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确，由于同盟国在法国的战况，我们不可能按照约定被送到西班牙，不过鉴于艾希曼臭名昭著的口是心非，他很可能是想让我们在莫雄马扎尔耽搁并被囚禁在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为他进一步提供机会去敲诈、勒索。就在这时，比彻渐渐代替了艾希曼，成了主要的纳粹谈判者。虽然他也是一个靠不住的盟友，却在卡斯特纳成功的行动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就在乔尔·布兰德开始那注定失败的“商品换血肉”任务差不多两个月后，7月5日，布达佩斯的“瓦达”最终收到了布达佩斯发来的“临时协议”。巴拉斯、布兰德和其他两个人称自己是犹太事务处的授权代表，并且承诺，只要犹太方相信德国人对这笔交易的真诚，他们会立即解决取得德国人要求的货物的困难。在等待最终协议的过程中，为了暂停驱逐，他们每月要向德国人支付100万瑞士法郎；每护送1000人到巴勒斯坦，他们需要向德国人支付40万美元；每护送1000人到其他国家，他们需要向德国人支付100万美元。他们还承诺，将被允许运到隔离区和集中营的一半食物、衣物和药品送给德国。

卡斯特纳用这份假文件取得了艾希曼与比彻的信任：“我们海外的朋友正在准备同意一笔大交易。”他将布兰德没能获得卡车归罪于那些本应当作为“交换物品”的犹太人，艾希曼送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并且被毒气屠杀。他提了一个意见，希望一个德国代表在中立的土地上与高级犹太官员会面以商议德国人手中所有犹太人的命运，并不仅仅是匈牙利犹太人的命运。卡斯特纳强调，要想使谈判成功，德国人必须证明他们的诚心，同意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群体去中立的国家，而且他还补充道：“如果与此同时布达佩斯的犹太人被驱逐的话，那么谈判就取消。”

得到希姆莱的允许后，比彻开始为在里斯本（葡萄牙首都）与欧洲联合会的约瑟夫·施瓦兹以及犹太事务处的行政部门成员艾利胡·多布金会面做准备，然而，艾希曼仍然决定稳步进行“最终解决”（在希特勒领导下灭绝犹太人的纳粹项目）。7月17日，艾希曼告诉卡斯特纳，除非布兰德立即从伊斯坦布尔回来，否则我们将从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带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忍受折磨，也就是立即被毒气屠杀。毕斯还记得，从未流泪的卡斯特纳泪流满面地对他说：“一切都没了！”卡斯特纳稍早一些写给日内瓦的内森·斯克沃布的一封信证实了他与日俱增的绝望：“那伟大计划的梦想结束了；成千上万的人还不知道要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直到一





些恐怖的事情发生；我们试图反抗，不过经过了三个半月严酷的斗争，我必须说我们更像是在观看悲剧的上演及其无法停止的进程，我们却无能为力……毁灭的速度太凶猛了……救援的行动无法赶得上那样的速度；我无法向你描述灭绝的场景，只能够感觉得到。”

不过，卡斯特纳绝不是轻易屈服的人，他很快又恢复了精神，重新投入到战斗中。7月与8月，他与不同的纳粹军官进行一系列会面。一些会面在结束后，他便立即让秘书在记事簿上写下来。既然这些记录是为了帮助他对这些事件的记忆，那么我们应该没有理由去怀疑其真实性。如果有人看到他为了无数生命而与一帮冷酷的屠杀犯讨价还价的话，一定会惊讶于当他内心充满了恐惧、挫折、厌恶的时候表面上却能够表现出冷静与自信的能力。

记事簿中记录的卡斯特纳与比彻的第一次会面发生于7月15日，更可能是在比彻的办公室，而不是艾希曼的总部。会面以比彻的话开始：“现在，我们是在中立区会面了。”卡斯特纳回答道：“对我来说，这不是中立区，这里只有敌区。”接着他抱怨道，匈牙利各省的所有犹太人都已经被驱逐了，至少30万犹太人被屠杀，尽管艾希曼与威斯里舍尼保证不会进行隔离与驱逐、直到谈判结果出来前一切都会维持原状。他警告比彻，只有立刻停止灭绝屠杀，在里斯本的高层会面才有意义。卡斯特纳又要求希姆莱释放我们：“在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被耽搁的1600名犹太人无疑会对国外的讨论产生影响。”接下来便是一阵辩论，每一方都在谴责另一方没能兑现谈判的筹码。比彻承诺，会与希姆莱讨论我们这群在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中犹太人的命运，不过他担心一旦卡斯特纳的家人安全了，他就不会反悔。卡斯特纳向他保证，他并不是只考虑“个人和家庭因素”的人。

这样的交流典型地表现了卡斯特纳与比彻之间矛盾的关系。每一方都试图恐吓、欺骗、剥削另一方，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之间似乎发展了



某种程度的亲密关系，但绝不是友谊。卡斯特纳将比彻视为对抗艾希曼的盟友，尽管他知道比彻也随时可以用他的权力轻而易举地摧毁自己。对比彻而言，他准备竭尽全力通过恐吓、欺骗或者承诺、妥协去敲诈犹太人，为了应付艾希曼，他必须向艾希曼报告一些事情的结果，而基于该目的，他又需要卡斯特纳的帮助。即使卡斯特纳知道比彻在到匈牙利之前可能犯下的战争罪行，他也不得不为营救计划而忽略那些。

在与比彻谈话后不久，卡斯特纳便被绑架了。当卡斯特纳于7月18日从卡伦巴兹大街回家的时候，他被两个用带有匈牙利口音的德语称自己为艾希曼的信使的两个人拦住，并要他们跟他们走。卡斯特纳谢绝了“邀请”，却被另外三个说匈牙利语的人拽进了一辆汽车。卡斯特纳被蒙上眼睛，带上手铐，汽车开到了离布达佩斯30公里的哥德罗的宪兵站。在那里，就“瓦达”与纳粹的联系以及为我们所支付赎金的问题，卡斯特纳被审讯了3个小时。在一个密封的储藏室，他被关了4天，然后被带到安格瓦（今乌克兰的乌日哥罗德），拉兹罗·费伦奇的副官、匈牙利宪兵的主任利奥·路雷就与德国的交易、交易的款项、他是不是美国间谍的问题对他又审问一番。路雷和费伦奇在战后不久就因为他们的罪行被处决了。

根据之后路雷的叙述，费伦奇曾经命令他，如果卡斯特纳拒绝透露有关他与德国人谈判的信息就杀死他。卡斯特纳同意合作，但路雷觉得他并没有“完全坦诚”。我们不知道卡斯特纳告诉了路雷什么，不过5天后，他被送回布达佩斯由费伦奇亲自审讯，之后，费伦奇又命令卡斯特纳不要告诉艾希曼是谁绑架了他。在卡斯特纳与艾希曼的会面中，他声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他一直被蒙着双眼，艾希曼也没有深究这个问题。卡斯特纳在从安格瓦返回的途中由于最近驱逐的景象而感到无比哀伤：“我们通过沙布加帕斯亚（匈牙利曾经犹太人口最密集的地方），穿过荒凉的城镇与废弃的村庄，到处都是关门的公司、工厂、商店和寂静的教堂，这些无不提醒着我们此处犹太人的灭绝。”



卡斯特纳于8月2日再次与比彻会面。比彻称，希姆莱仍然允许用商品交换犹太人移民，同时还允许我们这个群体中的500人离开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去一个中立的国家，而我们中剩下的人也可以紧随其后。艾希曼愤怒地接受了希姆莱的命令，不过他仍然威胁道，在比彻与“世界犹太组织的代表们”第一次会面的日期确定之前他不会让任何犹太人离开。

卡斯特纳准备通知尤若夫·菲斯彻，让他依照“瓦达”早先制定的准则——分配500个名额，信件于8月末克拉米释放了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318名犹太人时通过他交给菲斯彻。艾希曼补充道，剩下的我们原则上来说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周内离开，但前提是布兰德从伊斯坦布尔回来。实际上，艾希曼已经决定在9月15日之前完成对所有匈牙利犹太人的驱逐，包括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就像他曾经承诺的那样，然后他会竭尽所能撕毁他与卡斯特纳的协议并违背希姆莱的命令。

进而其他赎金一样，艾希曼也狡猾地玩弄着对我们在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这些人要支付的赎金。账目由代表“瓦达”的毕斯与代表纳粹的突击队中队长卡尔·格莱鲍达成一致。关键问题在于要交到德国人手中数百万的便戈与值钱东西的兑换比率。“瓦达”坚持称，每人1000美元的赎金已经缴清了，卡斯特纳、奥芬巴赫与汉斯·布兰德在6月20日时已经将三个满满的手提箱交给了克拉各斯。比彻却否认了，并且要求用“货物”充当补款。“瓦达”只能通过“瑞士的空头支票”进行回应，他们向比彻展示了30台拖拉机的信用证，“瓦达”声称，这些拖拉机已经开始运送了，但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离开瑞士，并承诺提供两卡车来自布拉迪斯拉发的羊皮。几个月后，来自柏林的特使收货的时候，却发现什么都没有。“瓦达”确实运输了15000公斤的陈咖啡到布达佩斯的自由港口，这批货物是由联合会资助的。汉斯·布兰德回忆道：“运送的货物到了比彻手中，正因为如此，为了释放犹太人而与艾希曼进行的谈判才得以继续。”

虽然赎金已经被支付了，不过艾希曼还是拒绝允许我们离开卑尔根-

贝尔森集中营，正如卡斯特纳嘲讽地指出那样，艾希曼似乎突然“关心”起我们的生命来。那时，同盟军直逼巴黎，德国人的铁路被持续地轰炸。艾希曼问卡斯特纳：“如果列车被英国或者美国的炸弹炸到或者列车卡在路上了怎么办？你认为德意志帝国现在除了去保护犹太人就没别的事可以做了吗？”卡斯特纳认为，艾希曼很有可能是想拖住我们而向犹太组织敲诈更多的赎金，也有可能是想在收到赎金后炸掉我们的列车而嫁祸给盟军。卡斯特纳告诉艾希曼，无论发生什么事，“瓦达”会承担全部责任。他还建议道，与途径法国去西班牙相比，我们去瑞士会更加安全。

在卡斯特纳被监禁期间，施瓦兹放弃了与比彻在里斯本会面的想法，因为作为美国人，他不能与德国人交流。比彻也决定取消这次行程，因为有人警告他英国当局可能会在中立地区抓他当人质。就在这时，萨利·梅耶完全进入了卡斯特纳的行动中。

作为在瑞士的美国犹太联合救援会代表，梅耶被世界难民委员会授权参与谈判以为犹太人争取时间，不过他并不可以做出经济上与政治上的任何承诺。截至1944年，联合会已经将650万美元交由梅耶处理，其中，380万美元为瑞士难民的专项拨款，270万美元则用于需要援助的欧洲犹太人。梅耶没有用于支付赎金的资金，而且他也被联合会明确地要求，进行拖延，并且试图在不给德国人任何回报的前提下使德国人做出妥协。

梅耶与卡斯特纳之间的合作并不顺利，他们之间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性格的冲突。梅耶反感卡斯特纳的鲁莽与粗心，卡斯特纳则认为梅耶思想狭隘并且缺乏理解与怜悯之心。梅耶是那种正直的瑞士人、传统的犹太人，有粗鲁、固执、暴躁的脾气，缺乏手段的他更擅长讲学与说教，并不特别适合这个需要外交手腕、想象力、灵活性、虚张声势的任务。尽管如此，在这些限制的条件下工作，他还是取得了一些真正的成功。尽管梅耶拒绝对纳粹进行过分的承诺让卡斯特纳感到沮丧，瑞士的世界难民委员会代表罗斯维尔·麦克里兰却充分肯定了梅耶在空无一物的情





况下为拖延时间而进行的“对话、承诺、哄骗、暗示、威胁”。虽然卡斯特纳声称，如果梅耶更大胆一些，就会有更多犹太人得救，但任何更大胆、不切实际的承诺也同样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事实上，与卡斯特纳能够或者愿意意识到的相比，梅耶扮演着更加积极的角色。研究犹太人与纳粹之间营救交易的杰出历史学家胡达·鲍尔所说的话或许是对的：“假如没有梅耶的拖延策略，那么达成的任何事情都是不可想象的，虽然卡斯特纳与毕斯也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当比彻与施瓦兹原定于在里斯本的会面没能成行的时候，卡斯特纳安排比彻到瑞士边界与梅耶会面。7月12日（此时，匈牙利各省已经没有犹太人了），卡斯特纳要求比彻确认布达佩斯的20万名犹太人能够免于驱逐。比彻回答道：“直到我们完成对话，这座城还是安全的，不过如果对话的结果不那么令人满意，城里的情况就会变得紧张起来。”所以，考虑到根本无法提供德国人要求的货物，卡斯特纳唯一能够保证城里安全的方法就是将谈判拖延得越长越好。如果想要德国人在战争结束前尽可能多地放过犹太人，那么德国人必须相信他们能够与世界犹太组织或者同盟国做一笔大交易。如果要同盟国给德国人留下这种印象，他们必须知道德国人真正地准备通过交易而放过犹太人。我们被释放将会成为为拯救更多犹太生命而具有标志性、决定性的第一步。卡斯特纳拼命地试图劝服梅耶与他合作误导比彻，不过梅耶有上级的指示和自己的做事方法，而这些指示和方法都不是卡斯特纳期望的。

无法兑现的承诺

早在4月25日，“瓦达”就将关于与威斯里舍尼的谈判通知了梅耶，

描述了匈牙利犹太人日益危险的情况，并要求如果达成协议联合会能够提供 200 万美元的赎金。5 月 4 日，梅耶回答道：“德国人应该提供证据证明他们会做的事情，尤其是停止对法国境内的犹太人的驱逐。”卡斯特纳愤怒地写道：“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教淘气的纳粹懂些礼貌，那他们必须要听话才行？”卡斯特纳有些偏颇地谴责梅耶与自由世界的犹太人没有全力救助德国人手中的犹太人，因为他们缺乏同情心与团结：“他们在那边，我们在这里；他们没有被直接影响，我们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在进行教化，我们却在恐惧、死亡；他们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想活着的我们必须相信自己一定能得救。”几周后，卡斯特纳、梅耶、比彻和其他几个人多次会面，如果不是在当时那样悲剧性的背景下，这些会面或许更像一场场闹剧。与此同时，艾希曼已经离开了布达佩斯，等待他的良机。

第一次会面定在 8 月 21 日。梅耶无法为比彻拿到一张瑞士的入境签证，所以会面地点定在德国与瑞士的边境。卡斯特纳在记事簿上记下的与克拉各斯于 8 月 18 日的谈话生动地反映了他失望与决心交融的思想状态，而这样的思想状态一直伴随着他的过去。他列出了要面对的所有的困难，比如，由于同盟国在法国的战况，“西班牙就不用考虑了”；瑞士“绝不会接收大量的犹太人”；“将货物从海外运到这里”也是不太可能的。这些困难使得一切变得没有希望，不过卡斯特纳还是决定继续战斗，不管将发生什么事情：“不论困难多么艰巨，协议一定要被达成，因为我们别无他法。”

8 月 19 日，卡斯特纳与比彻从布达佩斯动身，同行的还有比彻的副官纳粹上尉麦克斯·古森和威廉·毕利特兹——皈依的犹太人、曼菲尔德·维斯集团公司的董事。当他们于 8 月 20 日到达他们在布雷根茨的宾馆时，刚刚去过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监督我们群体中第一批人离开的克拉米也加入了进来。克拉米告知他们，艾希曼将被允许离开的人数从 500 人降到了 300 人，并且下令将卡斯特纳与布兰德的亲人留在集中营。由于克





拉米的许可，318人于8月18日离开了集中营，并在3天后抵达巴塞爾（瑞士西北部城市，位于莱茵河畔）。虽然与数百万丧生的犹太人相比，这318人简直微不足道，但这的确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正如卡斯特纳写的那样：“至少我们迈开了第一步。318人自由了。他们是第一批（不仅是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第一批，还是大量遭受希特勒式痛苦折磨的犹太人的第一批）在整个世界的注视下穿越一个中立国家边界的有组织群体。”

巧合的是，梅耶与比彻的第一次会面也发生于8月21日的德国与瑞士的边界，准确地说，应该是在奥地利的城镇霍赫斯特与瑞士的城镇圣玛格丽腾之间跨越莱茵河的大桥上。梅耶带了两个顾问——他的律师马库斯·惠勒和犹太社区瑞士同盟的代表皮埃尔·比加。比彻不能进入瑞士境内，而梅耶谢绝了比彻让他在德国海关办公室会面的邀请，这样的开始显然并不吉利。随着对话的深入，卡斯特纳也变得愈加担心。

比彻称自己是希姆莱的代表，被授权与同盟国和世界犹太组织的代表们讨论德国人手中犹太人的相关事宜，希望能够出于“经济考虑”而达成协议。对那些面临从布达佩斯被驱逐的犹太人来说，他们的命运取决于同盟国与世界犹太组织会为他们做出什么牺牲。比彻接着又问梅耶是否准备接受德国人的建议，用100万个犹太人换取1万辆卡车。梅耶回答道，他只是作为瑞士难民救助基金会的代表来参加这次会面的，他不知道德国人的建议，但愿意与相关的当局联系。梅耶还补充道：“对布达佩斯的犹太人进行驱逐本身并不是什么灭绝的灾难，不过德国人应该停止那该死的毒气屠杀。”比彻保证希姆莱会停止毒气屠杀，并指出，他们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真诚，将我们群体中的318人从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送到了瑞士。他承诺道，我们这个群体中剩余的人很快也会被送走。比彻询问梅耶，他们能用什么“货物”交换。当梅耶建议用“金钱”进行交换的时候（虽然联合会禁止他做出任何承诺），比彻则要求用“货物”进行交换。当梅耶呼吁人道主义的时候，比彻答道：“在这样的基础上，我无法就此问题

进行谈判。”当梅耶重申他会联系相关当局的时候，比彻愤怒地谴责卡斯特纳将他欺骗到瑞士的边界。毕利特兹出来解围，建议给双方一定的时间考虑清楚，最终，比彻同意一周后再次会面。而随后发生的事情极具争议。

8月25日，比彻通过电报向希姆莱发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如他所述，由于“那时300件犹太人正在穿过边境”，梅耶已经意识到了德国人对于提议的严肃性。他将人描述为“件”，究竟是想表达自己对犹太人的蔑视还是想唤起希姆莱对犹太人的蔑视，这点我们并不清楚。接受了无法从西方同盟国那里获得卡车的事实后，比彻建议德国人接收其他货物，如“金属铬、金属镍、滚球轴承、测量仪器、工具制造机器、金属钨、铝合金，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由中立国提供的商品。比彻列出了以下要做的事：（1）获得美国最高官方的获得授权以得到原则上的支持；（2）所有外国货币必须用于执行协议；（3）为供应的物品安排拟出整体的方案；（4）拟出可以立即提供的货物的详尽计划书。他还提到了犹太方的警告：“如果现在就进行驱逐，他们就不会将此视为一次严肃、认真的谈判，会放弃这次谈判。”比彻结束时说：“根据现有的信息，我真诚地希望得到允许继续谈判。”希姆莱于8月26日简洁地回复道：“我命令并允许你根据你的信息继续谈判。”

战后，被美国囚禁的比彻声称，由于他在瑞士边境取得的进展，希姆莱已经决定停止布达佩斯的驱逐。这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赫姆莱命令温克尔曼停止准备驱逐的电报发于8月25日凌晨3点，当天上午11点15分，匈牙利的德国大使同样通过电报向德国的外交大臣里宾特洛甫确认希姆莱的命令。比彻将报告通过电报发送给希姆莱的时间是8月25日下午6点10分，这样，希姆莱下令禁止驱逐的时间就比比彻报告的时间早好几个小时。不过，比彻也有可能在8月21日至25日之间的某个时间见过希姆莱或者与希姆莱通过电话，后来通过电报发送的报告则可能只是一种文





字上的确认。这种假设最主要的支持者是胡达·鲍尔，他断定：“由卡斯特纳发起、发展的对话才是对布达佩斯犹太人营救的主要因素。”不过反对比彻说法的人们认为希姆莱关心的并不是迅速与卡斯特纳达成协议，而是预先阻止匈牙利对德国人的日益憎恨，或者改善他在中立国或者同盟国眼中的形象。然而，这也无法排除比彻的报告对禁止驱逐有益的可能性。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卡斯特纳几乎每天都在催促比彻将我们从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释放，不过比彻拒绝在没有从瑞士得到满意答复的条件下就此问题对希姆莱进行建议。为了使事情继续发展，卡斯特纳提议，除了让德国人允许我们离开卑尔根-贝尔森继续前进外，还要允许 2500 名匈牙利犹太人移民，其中，每个人可以支付 100 美元的赎金。比彻将这个建议提交给了他的主管，收到了以下的电文回复：“对方一定是疯了。一个进入美国的犹太人要花费 1000 美元。一个离开欧洲的犹太人也需要 1000 美元。——希姆莱”

9 月初，卡斯特纳与古森在圣玛格丽滕的大桥上与梅耶和他的顾问们几次会面，比彻则在布雷根茨附近等消息。梅耶一如既往地拒绝做出卡斯特纳想获得的任何保证，卡斯特纳对他的支支吾吾感到非常愤怒。不过作为一种拖延的技巧，支支吾吾并不是毫无作用。比彻几乎已经意识到卡斯特纳是在欺骗他，但他需要谈判进展的证据（即使是似是而非的证据）来提供给希姆莱。有一次，梅耶说，美国当局已经指示他不要对德国人的建议说“不”，当卡斯特纳问，这是否意味着要进行积极回复的可能性时，惠勒代表他的客户回答道：“不，我们只被命令不要说‘不’。”古森插话道：“梅耶先生，我请您给我们承诺，否则，我们的老板比彻将无法为犹太人做任何事情了，而毒气屠杀将继续进行。至少请您承诺！这仅仅是一句话而已！您将有时间来兑现您的承诺，而到时候很多事情能够发生。”梅耶回答道：“我只会做出我能够兑现的承诺。”事实上，他偶尔也会做出他无法兑现的承诺，不过他还是比卡斯特纳谨慎得多，这一点还是值得肯

定的。

当比彻听到发生的事情后，他说：“很抱歉，我无法为犹太人做得更多了。”只要梅耶在电报上写上“行”，就可以使比彻重新回到谈判中。到现在为止，卡斯特纳不再对协议的真正执行抱有希望，他只期望获得更多时间：“只要希姆莱不在经济基础上妥协，西方继续反对、不信任他，那么这些谈判最多是双方在互相欺骗而已。”

8月末，斯洛伐克发生了针对德国人的暴动，这也给了艾希曼一个借口开始计划将仍然留在那里的23000名犹太人驱逐。卡斯特纳要求比彻与希姆莱进行交涉，不过比彻鉴于在瑞士边界上的谈判缺乏进展而拒绝了他的要求，但同意，如果得到梅耶的明确承诺就会重新考虑。虽然卡斯特纳发出了数封电报，梅耶直到9月末才回复说他准备在瑞士银行为纳粹开立一个账户。9月28日或29日，卡斯特纳在瑞士边界再次会见了梅耶与惠勒，这一次，陪伴卡斯特纳的是代替古森的突击大队长赫伯特·加托茨，最终，梅耶向比彻承诺用金钱拯救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卡斯特纳向比彻建议道，联合会将提供1500万瑞士法郎的赎金，但前提条件是：“（1）德国人立刻停止对斯洛伐克犹太人的一切行动；（2）布达佩斯的犹太人不会被驱逐；（3）还留在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我们可以立即离开德国。”

就在这时，卡斯特纳相信我们的自由已经近在咫尺了。他在10月6日写的两封信（一封是写给他的妻子，一封是写给他的岳父）反映了他因艾希曼的拖延而感到的挫折感，不过也同样反映了他对我们提前释放的期望。在写给菲斯彻的信中，他解释道：“我们已经多次得到保证，你们早晚会离开那里，只要我们履行我们作为交易方的义务。只有你们的离开涉及到更大的谈判时，你们离开的日期才被耽搁。”卡斯特纳提到，继8月离开的318人之后，本来还要计划再运送200人的，其中就包括菲斯彻的家人。但最终，这个计划没有成行，因为与此同时，卡斯特纳已经开始与德国人讨论通过交易将整个群体全部释放的问题。在信中，卡斯特纳将用





代码“大叔”称呼梅耶。为了欺骗审信员，卡斯特纳变相地告诉了我们了即将到来的解放：“与大叔的谈判已经到了关键阶段，去达成协议的代表团很可能在下周会见大叔，这很可能会最终达成协议。”不幸的是，这种可能性又消失了，我们不得不又在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中待上两个月。

卡斯特纳写给他妻子的信当然用的是一种更加亲密、关心的口吻。他担心他妻子虚弱的身体，不过他要求她和其他人一样保持昂扬的斗志：“你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状况，你要保持这样的状态，并且保证家人与整个群体保持信心。我不在那里，这就是你的主要任务与责任。”卡斯特纳希望关于释放我们的决定能够在下周内确定，不过他同样也有失败的心理准备：“如果正相反，离开那里最终被证明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会成为你们中的一员。”加入到我们之中可以说就意味着死亡，卡斯特纳似乎就是这样准备的。在写给他母亲和兄弟的附言中，他补充道：“在我的心里，我与妈妈、艾尔诺、你们那里所有的人同在。”卡斯特纳或许是在赌博，不过他对自己的任务的确承担着很大的责任。

真正的结果

对迫害匈牙利犹太人的短暂停歇于10月15日贺西对俄国前线的停火宣言结束。箭十字党极端法西斯主义的领导人费里桑·斯扎拉斯在德国装甲车随时准备协助的情况下罢免了贺西，宣布自己为首相和国家元首。费里桑·斯扎拉斯任命埃米·加瓦兹为动员部长，盖博·瓦吉纳为内务部长，正是这两个最凶残的反犹太分子掌管了犹太事务。接下来的恐怖统治则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

政变发生两天后，也就是10月17日，艾希曼又出现在布达佩斯。他喝醉了，那个时候他经常喝醉，他将卡斯特纳召集到了比彻的办公室：“好吧，你看看，我回来了！”他得意地说：“这一次，布达佩斯的犹太人要被驱逐了，不过要是你能够为我们提供相应数量的卡车，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些卡车驱逐他们，或者你觉得那样并不划算？你害怕了，什么？别对我提你那些美国童话了。现在，我们要加快脚步进行驱逐了！对吗？”

当艾希曼决定屠杀布达佩斯剩下的犹太人时，比彻则试图获得希姆莱的允许继续进行交易。10月25日，在与梅耶进行了冗长的电文交流后，卡斯特纳为比彻和加托茨获得了瑞士的入境签证。11月2日，比彻到达苏黎世，并宣布希姆莱已经允许我们离开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11月4日，在圣加伦的瓦尔哈拉酒店举行的会面中，比彻解释道，希姆莱准备讨论关于将德国集中营中的其他群体释放到瑞士以及将一部分犹太人以特权外国人、被拘平民、战俘的形式移交给红十字会照管的可能性。作为回报，希姆莱坚持“立即运送指定的货物”。比彻则主动提出用2000万瑞士法郎换取数以万计的犹太人移民（即使不是去巴勒斯坦），赎金必须在两至三周内付清。

11月5日，苏黎世的萨伏依酒店进行了一次特别的会面。违反了不许与纳粹官员见面的禁令，卡斯特纳与梅耶将比彻介绍给瑞士的美国战争难民委员会的代表罗斯维尔·麦克里兰。布达佩斯的战争难民委员会当时正在与瑞士和红十字会合作以帮助犹太人藏匿，并且通过外交或者宣传渠道公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恐怖管理。麦克里兰的一个具体的任务就是获得美国国务院支持联合会为了救济与营救计划而向匈牙利转移资金的许可。带着些许幻想，比彻告知希姆莱，他已经打破了同盟国不与德国人谈判的禁令，正在与一个美国高官商谈。就卡斯特纳来说，他希望能让一个美国高官表面上参与进来而诱使希姆莱在犹太人的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卡斯特纳错误地将麦克里兰称为贵格会教徒，他对酒店里的会面描述如下：“战争





难民委员无法再派出一个更加令人尊敬的代表：麦克里兰——贵格会教徒、卓越的人道主义者、一个冷静且极有修养的外交家，他目睹了欧洲犹太人悲剧的所有细节。另一方的比彻则注重第三帝国的威望，专注于一个注定要失败的任务，却在寻找他甚至不敢说清楚的东西。”

比彻事先得到了希姆莱的批准来参加这次会面。在多大程度上麦克里兰是在听从上级的指示去行动，还是服从自己的意志，我们并不知道。无论如何，他解释道，他会迅速办理瑞士当局颁发的出口许可证，然后准备授权联合会在瑞士交付德国 2000 万法郎（约等于 500 万美元），这样，第三帝国就可以用这笔钱来购买货物了。作为回报，他要求德国人停止迫害，并且尊重“德国人手中的所有生命，不论是何种种族、何种信仰、何种国籍”。比彻负责将麦克里兰的建议传递给希姆莱，加托茨则留在瑞士购买货物。

梅耶向比彻展示了一份由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签字的电报，电报的大意是美国国务院已经同意联合会在战争难民委员会的监督下将 5 万美元转入瑞士，当作营救资金。麦克里兰没有告诉比彻，只有美国政府同意，这笔钱才能够支付。麦克里兰于 11 月 16 日将讨论的概要通过电报发给了战争难民委员会与美国国会，5 天后，他收到了这样的回复：“任何来源的任何资金都不能用在这样的提议之上。”卡斯特纳称这个提议为“2000 万法郎的骗局”。

在后来对艾希曼的审判中，比彻声称他从没有被犹太人的这些把戏欺骗：他放纵这些欺骗是因为这是唯一能够使希姆莱在那些受害者的身上让步的方法。也许，比彻真的怀疑犹太方是在欺骗他，不过并不太可能是他的人道主义精神使他进行合作。随着苏联向布达佩斯的日益逼近，他一定认识到他们的战争已经失败了，而他也开始担忧自己的生命。如卡斯特纳认为的那样，比彻与麦克里兰的会面以及徘徊于梅耶那欺骗性的提议要么是为了在最后时刻完成一个外交壮举，要么是要在日益崩溃的第三帝国中

拯救自己：“现在，他可以向希姆莱报告他已经成功地与罗斯福总统的特别代表进行了私人接触。伴随着这次接触的是渺茫的希望、政治和解的秘密渴求以及自我拯救。随着这些愿望愈演愈烈，第三帝国在战场上的情形也变得越来越糟。”

梅耶希望这 2000 万法郎的承诺能够使德国人将集中营交予红十字会管理，直到第三帝国的最后倒塌。卡斯特纳希望利用美国高官表面上的参与能够使得希姆莱进一步妥协。与麦克里兰的会面结束后，卡斯特纳准备了一系列要求，并在离开瑞士之前交给了比彻。这些要求包括禁止对布达佩斯和斯洛伐克仍然存活的犹太人进行驱逐，德国人手中犹太人的战俘地位，以及释放我们这群仍然在卑尔根 - 贝尔森集中营的人。经过激烈的讨论后，比彻同意建议希姆莱允许 16 岁以下 50 岁以上的男人、15 岁以下 40 岁以上的女人以及重病患者可以免于布达佩斯的驱逐。这远没有达到卡斯特纳的期望，不过如果希姆莱同意了，这还是可以拯救一些弱势群体的生命。

卡斯特纳刚到德国，比彻就拿走了他的德国外籍护照。德国人赋予了卡斯特纳许多表面上的特权——不必佩带黄色之星、自由移动、免于匈牙利当局的迫害，更令人吃惊的是，德国人居然允许他多次去瑞士，这种种特权都是为了使得他能够成为他们手中更有效率的工具而已，而比彻的这一举动也时刻提醒他，他仍然在他们的魔掌之下。尽管如此，在返回布达佩斯的长途旅行中，比彻还是用平等的口吻与卡斯特纳谈话。比彻尤其为希姆莱进行了辩解，他称这位帝国党卫军元首是一个“好心的人，并非大规模的屠杀者”，而只是被迫进行那些他违背他的初衷的反犹太措施。除此之外，比彻还提到了卡尔登勃鲁纳与盖世太保对他用的阴谋，他一定也想到了总是不择手段破坏他的计划、降低他在希姆莱心中地位的艾希曼。在旅途的最后阶段，比彻向卡斯特纳保证，由于与麦克里兰会面了，他会建议希姆莱下令停止对德国人手中的所有犹太人进行灭绝屠杀，他还进一





步确认，只有能够劳动的男人和女人才会在布达佩斯被驱逐。

他们于11月8日回到布达佩斯，同一天，艾希曼开始将城里的犹太人聚集到布达城郊的尤雷克砖厂，目的是通过臭名昭著的“死亡行军”将他们送到奥地利。卡斯特纳向比彻投诉，第二天，艾希曼释放了儿童、老人和病人，剩下的3万人（70%为女人）被迫行军至180公里以外的奥地利边界。他们在雨雪中、在缺衣少食的情况下走了6天或者7天，他们在露天过夜，不断遭到纳粹士兵与箭十字党活跃分子的骚扰。数千人力竭而死，数百人因无法继续走路而被杀死。11月3日，艾希曼下令对布达佩斯所有10岁以上的儿童进行驱逐。卡斯特纳就此警告了比彻，比彻随即通过电话威胁艾希曼，如果继续敢于他的计划，他就给希姆莱发电报。艾希曼撤消了那个命令，行军也暂停了几天。

战后，比彻声称，暂停行军的最大功臣是他。他说，希姆莱的命令是他与警察总管温克尔曼提出抗议的结果，他才是使党卫军全国副总指挥汉斯·加特纳提出相同的抗议的人。接着，红十字会的代表、梵蒂冈和中立国家都在敦促费里桑·斯扎拉斯停止死亡行军。卡斯特纳与比彻起到的作用或许很重要，不过他们并不是唯一试图改变那些死亡行军者们命运的人。

11月21日，艾希曼试图让卡斯特纳帮他再将65000至70000犹太人送到奥地利。当卡斯特纳拒绝的时候，艾希曼警告道：“帝国承诺了不再对犹太人进行任何措施，不过换来的是什么呢？美国人只是想拖延时间……我很想尊重你与比彻之间的协议，不过前提是别让我发现另一方是在欺骗我们。”卡斯特纳大胆地回答道：“美国人信息灵通。他们知道关于斯洛伐克的事情，也知道被迫的行军，更有理由认为德国人在犹太问题上的让步是一个骗局。”几天后，行军继续开始，一直持续到12月初。“瓦达”能够做的只是为那些人提供一些食物与药品。经历这种苦难的人数为76000个，其中，几乎有20000人丧命于此。

在瑞士，谈判也停滞了。11月18日，比彻收到了加托茨的一封电报，内容是：“我们还没有收到钱，他们总是有新的反对理由，我认为不太可能真正地达成真正协议，因为他们似乎根本没有钱。”比彻暴躁如雷，他警告卡斯特纳，如果他再没有收到那2000万法郎的积极答复，希姆莱很可能会立即取消谈判，他还让卡斯特纳将此情况通过电报告知梅耶。第二天，比彻飞到柏林见希姆莱。还没有等到梅耶的回复，卡斯特纳就给比彻留下了以下（完全是自己编造的）留言：“我被指示要重申一遍，那2000万法郎是可以支付的，支付时间的耽搁完全是技术上的问题。梅耶与他的上级正在日夜不停地克服那些困难，说我们不打算付钱没有事实依据。”

如今，比彻已经不再相信卡斯特纳的承诺了，不过他必须还得表现得和从前一样。对比彻来说，到这个游戏的最后阶段，向希姆莱承认自己被犹太人耍了无疑会搭上自己的性命，另一方面，如果谈判能够将他或者希姆莱美化成犹太人的救星，那么，接受卡斯特纳的欺骗无疑是最明智的举动。如胡达·鲍尔所写，对卡斯特纳来说，比彻是“接触希姆莱与改变余下犹太人命运”的唯一途径，而对比彻来说，卡斯特纳成了“他的一种保险”。

11月27日，加托茨又发来一封电报：“已经有10天无法与梅耶通话，他不接电话。待在瑞士已无意义，请将我召回。”艾希曼也出席了卡斯特纳与比彻的下一会面，他幸灾乐祸地说：“好吧，我早就知道这一切，我无数次地警告过比彻不要被牵着鼻子走。”他给卡斯特纳下达了最后通牒：“给瑞士发封电报，让他们把事情解决好。如果在48小时内我还没有收到积极的回复，我就会清除布达佩斯的所有犹太垃圾。”卡斯特纳能做的只有将此解释为一个误会。当时在场的毕利特兹建议卡斯特纳立即赶赴瑞士边界见梅耶，比彻立即同意了。艾希曼最后也同意了，并且将最后期限延迟到12月2日，同时威胁道，如果条件还不能够被满足，他会对布达佩斯的犹太人进一步采取行动。艾希曼接着又宣布，我们那个群体很快就





会离开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但要扣留卡斯特纳的亲人防止他逃跑。卡斯特纳拒绝赶赴瑞士边界，除非他的亲人和我们一起离开。最终，艾希曼勉强接受了卡斯特纳一定会回来的承诺：“布兰德也是这么向我保证的……不过你仔细听好，如果你也留在了国外，那我将给你的犹太同胞们好好上一课。”

一直以来，卡斯特纳都在不断地纠缠比彻使我们离开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虽然比彻曾经告知卡斯特纳，对我们释放的许可早在10月24日就被批准了，但一直没有动静。11月中旬，克拉米从维也纳发来电报称，由于“运输的问题”，我们离开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时间被推迟到11月28日至30日，这也意味着纳粹要继续勒索。应卡斯特纳的要求，比彻允许他通过纳粹的特别服务将以下信息传递给伯格幽：“卡斯特纳博士问候他的妻子，并且告知她所有人很快就会离开。他希望很快就见到他的妻子。”这些信息是由集中营的长官阿道夫·哈斯于11月18日递交到卡斯特纳的妻子手中的。“那封电报对那些绝望人们产生的影响是可以想象到的。”卡斯特纳后来写道。

11月26日，比彻高兴地从希姆莱的总部回来，他告诉卡斯特纳：“我赢了。”他提交给希姆莱的谈判记录换来了以下命令，即对犹太人的灭绝将会停止，毒气房间将立即被拆除；在帝国工作的犹太人将会与“东方的工人”获得同样的配给；犹太病人将被送往医院；布达佩斯的被迫行军将停止。比彻亲自将这些命令传达给卡尔登勃鲁纳，进而传达给所有集中营与盖世太保的长官。他对卡斯特纳说：“现在，我希望麦克里兰先生能够体会到希姆莱合作的诚意，比起我取得的这些成就，2000万法郎简直就是一个可笑的数字。”这次同样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很难判断比彻的证词的真实性。

11月28日，卡斯特纳、毕利特兹和比彻的副官纳粹上尉埃利希·克莱尔乘坐汽车离开布达佩斯，克莱尔的任务是不管梅耶是否交付2000万

法郎，12月2日都要给比彻发电报。我们那个群体即将离开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所以比彻还下令，如果没有收到赎金就延迟我们离开的时间。11月29日，当这三个人到边界的时候，他们发现梅耶已经在那里等了两个小时，接着他们回到圣加伦。毕利特兹报告说，不仅赎金还未解决，他也被命令在24小时内离开瑞士。在这些问题还未解决的背景下，12月1日，布雷根茨的纳粹边境军需部通过电报接到了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的通知，我们应于12月4日离开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并于两天后到达瑞士边境，然后我们就可以顺利地离开德国。

讽刺的是，12月1日，梅耶在圣玛格丽腾的一个酒店里告诉卡斯特纳，他根本交不出2000万法郎。即使不顾瑞士与美国当局的指示，他最多也只能筹到400万法郎。梅耶提出撤出谈判，将谈判移交给红十字会，但卡斯特纳最终说服他继续谈判。回到布雷根茨后，卡斯特纳向克莱尔和加托茨解释道，给比彻发送一封介绍当时真实情况的电报肯定会落入艾希曼手中，然而他们有责任帮比彻争取时间。卡斯特纳向他们保证，与同盟国的问题只是暂时的，都是由斯洛伐克驱逐的恢复、布达佩斯的死亡行军以及我们在卑尔根-贝尔森释放时间延期而造成的，只要我们被释放，另一方的态度会立即转变，钱就会立刻到位。在这段暂停的期间，克莱尔和加托茨必须为比彻抵挡一下。克莱尔说：“那么，你想让我们向布达佩斯发送一封假电报？我倒是愿意这么做，不过你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在找死吗？”最终，他向比彻发送电报，说500万法郎已经准备好了。然而，我们在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中被囚禁时间的延长导致了与同盟国合作的新问题的出现。

12月4日，比彻简单地看了克莱尔的报告，并确认了当时在布达佩斯被隔离的犹太人会得到尊重。然而，如果那剩余的1500百万法郎不被交付，后果将不堪设想。克莱尔和加托茨便开始要求卡斯特纳提供他交付500万法郎的证据。12月5日，在圣玛格丽腾，梅耶告诉克莱尔，加托茨





只给了自己 48 小时的期限，现在他已经通知了他的长官，他的长官们不愿再参与到这样“呆板的”谈判之中，不过那 500 万法郎的问题将会被调查。

这次令人沮丧的会面结束后，卡斯特纳回到布雷根茨等待我们抵达的列车，我们的确如帝国中央保安局 12 月 1 日的电报所称的那样，于 12 月 4 日离开了卑尔根 - 贝尔森集中营。在等待我们的过程中，卡斯特纳给他的朋友希勒尔·但泽写了一封信。希勒尔·但泽是我们八月份离开那批中的一员，和他们一起到达瑞士。这是一封很感人的信，信中表露出了他鲜少外露的感情，他承认道：“我真的无法想象当我再次见到我所爱的人们时刻。”他还提到，“老板”（一定是指希姆莱）已经接受了预付款并且期待进一步的发展。在计划着与梅耶还有自己的“同伴”（很可能是比彻）的下一次会面的基础上，卡斯特纳激动地问道：“难道我们没有可能拯救一切吗？”卡斯特纳将查姆·魏兹曼、史蒂文·怀斯、犹太世界代表大会视为可能的同盟，还敦促但泽与内森·斯克沃布尽一切力量促使交易继续进行，“现在，真正的结果终于就要出现了”。看过这封信，相信人们就不会怀疑卡斯特纳只想拯救他的亲人、朋友，或者我们所说的“特权人士”的私心了。

12 月 6 日，仍然在布雷根茨紧张等待的卡斯特纳给他的妻子伯格幽写了一封信，信中表达了他在奋力解救我们时的感受：“我上次见到你已经是 5 个月前了，我的生活中充满了担忧、问题与工作，尽管如此，我的眼前经常会呈现卑尔根 - 贝尔森集中营的场景。我试图想象集中营里并没有你，因为你真的不应该待在那里……当汉诺威被轰炸的时候，当西方的进攻接近你们的时候，我总是会想起你，我害怕你们受到伤害。想象可能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是无法令人忍受的，我无数次后悔让你去那里。”

卡斯特纳称赞了伯格幽在集中营中的表现：“我知道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你是多么坚强，我听说在旅途与集中营中你都超越了自己。”他

使用了希伯来术语“向上走”，意味着“移民巴勒斯坦”并敦促她想象即将移民巴勒斯坦的生活，但后来，他们在战后的两年半里一直待在瑞士：“去巴勒斯坦，我们已经受够欧洲了。”想想卡斯特纳写这封信时所处的条件，人们还怎么忍心责怪他对伯格幽与巴勒斯坦的理想化？

12月6日下午7点，我们的列车到达布雷根茨，赫尔曼·克拉米也和我们一起。与此同时，在圣玛格丽滕，克莱尔与加托茨争论起来，据卡斯特纳所说，原因是梅耶没能提供证据证明他们可以将500万法郎交付给比彻。另外，克莱尔争辩道，对卡斯特纳财产的估价已经交给了比彻作为赎金。在这最后阶段，艾希曼还是有可能将我们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无论如何，克莱尔正在支持我们继续去瑞士的旅行，加托茨却极力反对。最终，他们告诉卡斯特纳，我们可以离开了。

晚上9点，我们离开了卢斯特瑙，并被转移到一列温暖、明亮的瑞士列车。菲斯彻与卡斯特纳联合签署了“移交1368名犹太人”的收据，这个数据并不精确。12月的1368人加上8月的318人等于1686人，稍后我会解释，正确的数字应当是1670。不过当我们的列车在午夜穿过莱茵河进入瑞士的时候，没有人还想清点人数。

我们离开后，卡斯特纳和克莱尔回到了卢斯特瑙的海关办公室，一起商定最后的赎金数量，继续就5个月前递交给纳粹的匈牙利和外国货币、珠宝、黄金以及其他物品的价值问题展开讨论。“瓦达”方的奥第·毕斯、舒莱姆·奥芬巴赫和一个犹太珠宝商将其估价为720万瑞士法郎，纳粹方的古森与两位德国珠宝专家则将其估价为320万瑞士法郎。按照犹太方的估价，这些已经足够作为我们这个群体的赎金，德国人却不这么认为，卡斯特纳认为“瓦达”应该还有400个犹太人，克莱尔则坚持认为“瓦达”还欠纳粹65000美元。这就是午夜时他们回到卢斯特瑙后要面对的问题。

艾希曼曾经怀疑卡斯特纳可能会决定与他的家人留在瑞士，不过他错了。卡斯特纳为了继续他的营救计划而重回德国人的魔掌中。可以想象一





下，是选择一个自由的国家享受安全与舒适，还是选择一个魔鬼般独裁统治下的艰苦、屈辱、随时受到死亡威胁的环境，这对卡斯特纳来说多么难以抉择。虽然伯格幽要求卡斯特纳与她待在一起，他还是兑现了他的诺言、坚定了他的立场。在伯格幽抵达瑞士三周后，卡斯特纳给她写了一封信：“坚强一点，你知道，此时此刻，除了我所做的，我别无选择。”

第十章 从卑尔根-贝尔森到瑞士

如坐针毡

第一批的 318 人于 1944 年 8 月离开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后，我们之中一直流传着即将离开的传闻，不过这些传闻都没有成为现实。我们一次又一次将一些小事（菲斯彻被集中营的长官传唤、三个看似大人物的德国人来到我们的场地、一名德国士兵收集写有我们名字的卡片索引）看作我们即将离开的信号，不过什么都没有发生。卡斯特纳寄来的一些信件使我们燃起了希望，不过却远水解不了近渴。9 月过去了，10 月也过去了，我们的希望几乎每天都在涨涨落落，徘徊于乐观与绝望之间。

11 月初，流言又兴起了一阵，不过随着没有进一步的消息传来，换来的仍然是德国卫兵那“冰冷的沉默与冷酷的微笑”。正如米里亚姆·巴克指出的那样，我们的精神与身体状况急剧变坏：“绝望是可怕的，越来越多的人病了，整个集中营就是一所大医院。”



11月13日，克拉米出现在我们的场地，与他同行的还有另一名纳粹军官和一名平民，我到现在仍然不知道他们是谁，不过我们听到他们中的一个向我们内部主管团体的成员简诺·拉兹罗问起我们的状况，简诺·拉兹罗回答道，我们还好，就是有些寒冷。德国人说：“没关系，再有两周你们就会在瑞士了。”这几位来访者正式地告知我们的领导人，我们将在8至10天内去第一批的318人到达的地方。之后，那个外号“刀疤嘴”的纳粹军官用“过去时”的语法似乎是在告别地与菲斯彻说：“你们过去犯了许多错误，不过整体来说，我们对你们还是满意的。”菲斯彻则对这样的赞美进行了还礼。

11月18日，集中营的长官哈斯让菲斯彻给伯格幽捎了一条口信：“告诉她，她的丈夫在问候她，请同时捎去我的祝福，两周内，她就会与她的丈夫团圆了。”菲斯彻问道：“卡斯特纳要来这儿？”哈斯回答道：“不，是她要到她的丈夫那里。”菲斯彻接下来的话语则在不同人的口中有不同的记录，菲斯彻要么是接着问道：“那其他人呢？”，要么是问道：“那我呢？”不管怎么样，哈斯回答道：“其他人也一样，所有人都会离开。”人们的情绪又达到了11月13日时的高度：“又是同样的场景，几秒钟内，整个集中营中都活跃了起来，人们疯狂地欢腾着。”简诺·科尔布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不过这样的好景并不长，虽然这样的传闻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还在流传，但我们没有听到什么具体的消息。科尔布在11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人们的情绪又降到了谷底，他们对我们简直太残酷了，他们没有让我们懒洋洋地待在这里……而是让那些传闻打断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无比兴奋，现在却又把我们打入万丈深渊之中。”

然而，到11月23日，我们的情绪又急剧高涨，因为成包的食物、暖衣、香烟和巧克力被交到了卡斯特纳的家人、布兰德的家人以及奥芬巴赫的亲人手中，这似乎是一个不错的兆头。而第二天事情似乎变得更好了，寄来的88封信被交到了不同收信人手中。其中，两封信是卡斯特纳寄出

的，一封是写给菲斯彻的，一封是写给伯格幽的，信件日期均为11月18日。

在写给菲斯彻的信中，卡斯特纳说，我们被释放的时刻似乎就要来临了，我们“本应该在10月底离开这里，不过由于运送的问题，很可能在本月底离开”。他解释道，去巴勒斯坦已经不太可能，我们将待在瑞士直到战争结束。写给伯格幽的信件则更短一些，口吻则更亲切。虽然他知道审查员会审阅他的信件而抑制了他的情感，不过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这个纳粹坚韧的敌手同时还是一个忠实的丈夫、儿子和兄弟：“日日夜夜，在我的脑海里，我都与你同在，我知道你的精神与身体承受了多大的困难，我希望你足够坚强……你现在就要离开了，我会与你在一起，或许并不仅仅是在我的脑海里……等我，不要忘记你对我的承诺。代我亲吻我的母亲与兄弟。”卡斯特纳想在瑞士见到伯格幽，而一旦见到我们全部安全了，他又会回到德国人的恐怖统治下去拯救其他人，这真的令人非常感动。

一收到卡斯特纳的信件，菲斯彻就立即召开了主管团体的临时会议以计划我们的旅行。据传，一辆卧铺火车已经为我们的离开做好了准备工作，我们的最后一餐正在集中营的厨房中进行烹饪。“每个人都兴奋极了，集中营里没有了悲观主义者。”科尔布用他那干涩的讽刺口吻描述道。

11月25日，集中营似乎发生奇迹。我们收到了日内瓦的红十字会的大约60箱食物、药品、维生素和1300盒思达沃塞。我对当时用它填饱肚子时的喜悦记忆犹新，科尔布的日记中也印证了人们的兴奋状态：“这是5个月来第一次有了真正的美味——巧克力，老人与孩子们都为此着迷；他们用勺子吃，干吃，放在面包上吃，蘸着黄油吃，就着水吃，就着果酱吃，就着糖吃，等等。人们都发生了变化，表情喜悦、宁静，话也多了起来，都有积极的心态……到天黑的时候，许多人那本计划应该是一天三勺的思达沃塞就都吃完了。”





直到今天，我们那个群体中的幸存者还经常兴奋地谈论“思达沃塞”。当时，那是我们的命运即将发生改变的信号，虽然我们还要多几次那样的暴饮暴食才能够从5个月的饥饿中恢复。

德国人也和我们一样对这些物品感到惊愕，随即他们便要求分一杯羹。11月27日，集中营的长官将我们的领导人称为“亲爱的菲斯彻先生”，要求他在我们离开时将药品留给其他囚犯。菲斯彻同意了，并且补充道，我们最初带来的药品中剩下的部分也可以送给他。

虽然对我们来说，长官这样的要求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信号，不过菲斯彻说，我们最快也要下周才能够离开。我们的喜悦又变成了深深的忧郁。一天后，科尔布在日记中写道：“人们的情绪又从天堂跌到了谷底，思达沃塞都吃完了，还没有离开的消息。许多病人开始头痛、肚子痛，我本以为再也不会进入那个浴室了，不过现在我还得拖着皮包骨的身子站在里面。”三天后，他只写下了7个字：“等待。希望在消亡。”

在这样的低潮中，12月3日清晨，突然传来的我们将要于第二天离开的公告将我们从睡梦中惊醒，接下来便是被肖莎娜·哈森称为“完全歇斯底里”的兴奋。在混乱中，我们准备好行李，中午，我们按照命令将行李拖到集中营的大门处接受检查。那天下着大雨，在检查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们被要求将一些小件随身带回我们的场地，将一些沉重的东西留在大门处，而一些文件、照片和工具都被没收了。对我来说，那时的一切很有可能以灾难而告终，我故作勇敢地将一小瓶维生素透过铁丝网递给了挨着我们的荷兰人场地的一个骨瘦如柴的人。我刚刚递过药瓶，就觉得被一个卫兵发现了，于是惊慌地跑回棚屋中，藏在床底下，直到确认没有卫兵追赶我。我不知道是否是有一个卫兵真的看到了我，还是仅仅只是我的幻觉。

虽然当时年幼的我并不能完全地体会到身边发生的一切，不过仍然与其他挣扎于希望与绝望的人们分享着相同的起起伏伏的情绪。我也记得一

些人从我们的场地中移走后被送到集中营其他地方时，我是多么震惊。

11月18日，当长官第一次告知菲斯彻即将到来的离开时，安德里亚斯·加索韦茨、他的妻子还有他们的三个孩子被送到了关押南美和西班牙囚犯的中立集中营，因为当我们刚到集中营的时候他宣称自己与家人属于罗马尼亚国民，德国人决定留下他们以换取罗马尼亚的德裔人，但那样的交易最终没有发生。我前面曾经提到过，我的父亲因为我们的特兰西瓦尼亚的背景而不知道是否应该称自己为罗马尼亚人，最终，他还是和其他人一样选择了匈牙利国籍。如果他和加索韦茨做出了同样的选择，那么不管是拖着残腿的他还是11岁的我都不太可能熬到战争结束了。加索韦茨在解放的后几天就去世了，但他的家人都幸存了下来。

还有两个家庭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尤金·克尔提斯与亚历山大·维斯发现他们曾经被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女儿如今被囚禁在女人集中营，因此当我们接到离开的命令时，他们祈求新的集中营长官克莱默允许带上自己的女儿，他们假装是在去浴室的途中巧遇她们的。为了惩罚他们这种非法的交流，克莱默将尤金·克尔提斯夫妻和亚历山大·维斯夫妻送进六角星集中营，他们的女儿则仍然被关在女人集中营。克尔提斯在解放前便去世了，维斯与克尔提斯女士不久也离开了人世。

还有8个人与我们分开后被送到了六角星集中营，他们是乔尔·布兰德的母亲、妹妹和其他亲戚。他们被留了下来，以满足艾希曼因布兰德在伊斯坦布尔的失败而进行报复的欲望。他们大部分都幸存了下来，不过布兰德的母亲在被解放几天后就去世了。

我们还是回到人数的问题上吧。虽然我们被囚禁时和囚禁之后有一些名单，但都不精确。卡斯特纳认为于6月30日离开布达佩斯的是1684人。正如我所说的，没有人知道离开拉加斯坦德茨火车站调车场时列车上的准确人数，也没人知道到达奥地利边界之前有多少人上车或下车，不过1684这个数字是我们到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时最可能的人数。我们一般都认





为318人于8月去了瑞士，当剩下的我们于12月抵达瑞士边界的时候，卡斯特纳与菲斯彻签署了包括1368人的收据，这就使得总人数为1686人，17个被留在集中营中的倒霉蛋似乎也被算进了收据之中。一份之后在瑞士统计的名单似乎更具可信性，里面包含了12月抵达的1351个人名，加上8月离开的318人，一共是1669人。考虑到这个数字也未必准确，我一般会说卡斯特纳在卑尔根-贝尔森救出了大约1670条生命。

在我们知道即将自由的那个夜晚，我们几乎没有睡觉。我们无法相信这样的苦难就要结束了，我们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虽然我们并不十分相信我们会有这样的好运，不过集中营似乎就要变成遥远的记忆了。我们自然而然地同情那些被留下的人，不过我们都太幸福了，即使释放还没有开始，我们已经抑制不住开始庆祝了。当领导人为我们分发食物储备的时候，我们对此不屑一顾，就像不会再吃一般。当我们在迎接解放的黎明时，所有的安静、命令与清洁都被抛在了脑后，科尔布将此描述为“载歌载舞，充满废话、兴奋的等待”。

获救

12月4日清晨，克拉米再次出现，陪伴在他身边的是克莱默和一些纳粹军官。我们看到他们与菲斯彻和伯格幽交谈了一会儿，然后，我们离开的安排被正式宣布了。小孩、老人和病人会和行李一起由卡车运到火车停留的地方，当大约600只手举起，要求由卡车运送的时候，结果只有50个座位，而其中的许多座位已经由我们的领导人占了。下午1点，我们终于在回到卑尔根-赫内站台的路上了，正是5个月前我们到达的地方。以我

们当时的状态，我们花二或三个小时才走了六或七公里，一些最虚弱的人用的时间更长。孩子们哭喊着，试图赶上他们的父母，我的双脚正受着那僵硬的木鞋底的折磨，那肯定花费了我父亲许多香烟。和以往一样，卫兵们大喊着，猎犬们狂吠着，不过我们并不在意，因为我们就要去瑞士了。

我们这种愉快的心情并没有维持很久，我们在站台处等了五六个小时的火车，这段时间简直是最令人不安的一段经历。虽然我也清楚地记得那段痛苦的经历，不过当时 12 岁的大卫·科恩在之后不久便用笔头记下了与我相同的记忆：“我们 5 点到那里后坐下来等待，天开始下雨，接着又停了，然后又下了起来，一直下到天黑。空袭警报一遍遍响起，我们被雨水浸透的身体颤抖着，与此同时，我们还在寻找自己的行李。半夜 11 点火车才来，开来的火车是客车，我们得到的是三等车厢。人们疯了般冲进火车，还出现了一些打斗和事故，有人被挤倒了，不过除了惊恐，没有人受到什么伤害。火车艰难地启动时，他们开始分发食物，我们得到了果酱、糖块、人造黄油和面包。我们又重新养尊处优起来。”

我清楚地记得那恶劣的天气中的无尽的等待，记得对空袭的恐慌，记得在黑暗中寻找被卸在站台上的行李，记得火车刚到时人们为了抢座位的争斗。而我当时不知道，我们的领导人抢走了最舒适的车厢，如科尔布冷淡的叙述那样：“那里根本没有 9 号车厢，因为领导人占据了 9 号——头等卧铺车厢。”

当我们最终于午夜离开后，用米里亚姆·巴克的话来讲，我们“太累了以至于高兴不起来了”。德国人给我们每人分发了 500 克面包、30 克人造黄油、150 克干肉、20 克果酱和 500 克罐头。除此之外，我们的领导人还分发了一些食物储备。挨饿 5 个月后，我们这样的暴饮产生了可怕的后果。贝拉·索尔特就在他未完成的《九个手提箱》的第二部中描述了我们这次旅行中的片段，他的描述或许有些稍稍夸张：“在火车上，每个人都吃多了，人们开始腹泻……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我们的呕吐物布满了列





车的过道，卫生间都恶心极了。”他将此巧妙地解释为“集体粪便嗜好症”，不仅仅是生理需要，而是“对被关在铁丝网后受严规制约的一种反抗”。

我们的火车自北向南以很慢的速度穿过德国，途中经常由于空袭而中断，由于炸弹对铁路造成的毁坏而改变方向，或者停下以避让运送德国士兵的列车。我们的火车一次次转向东方行驶，人们变得紧张起来，再次引用索尔特的话，“我们开始相信那些在荷兰人场地的邻居所说的话了，他们由于我们能够离开而嫉妒、愤恨我们，为了满足心理平衡，他们试图向我们保证我们将会被送到俄国边界去挖战壕、建地堡或者被屠杀”。当我们的火车再次转向南方的时候，我们甚至能够感觉到身边宽慰的气氛，而在那些青年先锋的车厢里，他们大笑、欢歌起来。

虽然这样的车厢与那些运牛的卡车有天壤之别，但我们觉得越来越不舒服，被设计用来载运8名乘客的车厢被塞进了20多人。在黑夜里，为了避免空袭，我们不得不关闭所有的灯光。我们没有水喝，我一度饥渴难耐。当我们停在一个大站的时候，我父亲下车去寻找些水，透过车窗，我看到一个16岁左右的士兵命令我父亲回到火车上之前给了他一耳光，我觉得我们当时是在哥廷根——德国最大的大学城。不过还有一次，当火车停靠在一个农场附近的时候，一些身着希特勒青年装的男孩给了我们很多苹果。在旅途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空想，窗外的景象则是充满废墟的城镇，衣衫褴褛的人在步行，耸着肩膀抵御寒冷。虽然这时正值寒冬，烟囱里却没有炊烟升起。

12月6日，我们发现自己已处于丛山包围之中，乡下积满了白雪。晚上，我们到了林道。在漆黑的德国，我们透过康士坦茨湖凝视着瑞士的灯光。几个月前，瑞士当局取消了禁灯令，对我们来说，这简直如童话一般美妙。不一会儿，我们停在了奥地利的康士坦茨湖车站，看见了克拉米和卡斯特纳。这期间耽误了几个小时，现在我才知道那是因为德国人准备继



续进行勒索。接着，我们换乘一列瑞士火车，并于12月7日凌晨1点到达瑞士的圣玛格丽腾，永远逃离了纳粹的魔爪。

在圣玛格丽腾，我们受到了瑞士士兵、妇女辅助军团的成员以及红十字会成员的友好接待，他们为我们分发了巧克力和报纸——我们几乎已经忘记这些东西的样子了。科尔布记录了他与第一个进入他车厢里的瑞士军官之间的对话，当时的特别情况以及双方的情绪或许可以表现双方对话中的拘谨。

“你现在到瑞士了。”

“感谢上帝！”

“我们知道你们遭受了许多磨难，希望你们能够在这里恢复。”

“我们很感谢热爱自由的瑞士能够接受我们。”

“自由是上帝赋予我们的。”

下一站在圣加仑附近。在那里，我们下火车后步行到一个军营，一些病人立即被送到了医院。午夜时分，经历过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那无尽黑暗的我们吃惊地看到明亮的街道、灯火通明的商店以及行驶或停靠在路旁的时髦汽车。一些过路人问候我们。米里亚姆·巴克传神地抓住了我们当时的情绪：“12月7日午夜，我蹒跚地跟着队伍从圣加仑车站去军营……我看到的景象与我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一个安宁、风景如画的小镇，我们却骨瘦如柴、衣衫褴褛……对我们来说，这座小镇就是真正人道的缩影。”不幸的是，瑞士并不总是如此热情地对待犹太难民，但不管怎样，我们这些卡斯特纳群体的人都要好好感谢他们。

我们到军营了，透过窗户能够看到有桌布、餐盘、酒杯和刀具的餐桌，在黎明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一顿有“奶酪、汤、马铃薯、面包、苹果的晚餐——真正具有欧洲风味的食物”，如科尔布所说。我们还得到了一些香烟，当科尔布将烟头扔掉而不用收集碎屑的时候，他犹如获得了新生一般。



我希望我可以说我们当时是有秩序地坐下、礼貌地用餐，不幸的是，在经受了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5个月的折磨之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不知道如何做一个绅士。蒂博尔·毕力克观察到的餐桌行为正好反映了我们在集中营人性的丧失：“餐桌上有许多碗、空碗、汤匙、刀叉，每个碗里都有一片白面包，如动物一般，人们冲向这些碗，尽可能地抢夺更多面包，忘记了他们手中拿着的正是别人的面包……我的意思是，他们可是正常人、有文化的人、杰出的人，而现在我们已经解放了、自由了，却有这样的行为——我应该怎样称呼这样的行为……如果你不把自己当人……那么人的兽性便会表现出来。”

吃完饭后，我们被带到一个宽敞、温暖的体育馆。在那里，我们可以伸展自己的身体，盖着毛毯躺在没有床虱、跳蚤的床垫上，我已经好久没有睡得这么好了。早上，我们仍然享受着这样的舒适，洗过热水澡后，我们得到了舒适、温暖的衣服，孩子们也得到了一些玩具。不过我现在觉得我们也是在那里被取的指纹，脖子上挂着一个数字被拍了照。

第四天，我们又登上了另一列火车（用于载运人而不是牛的火车），从东北向西南穿越瑞士，我们的旅行结束于日内瓦湖蒙特勒700米远的考斯。由于战争，瑞士境内没有旅游者，所以很多旅馆都成了难民的避难所，我们便被分配到其中的两个旅馆中，占少数人的传统派住在里贾纳旅馆，占大多数人的非宗教派则住在阿斯匹兰纳德旅馆。这两个地方都不够大并且没有供热，我们也不能离开我们的住所，不过这里没有点名、哨塔、坑厕和纳粹。保卫我们的士兵都很友好，食物也可以下咽，风景也还不错。我们都还活着，能向往自由与复原。

我们喜悦的心情只是短暂的。我们对于迫害的记忆、对于亲朋好友命运的担忧、对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发生的事情的逐渐了解以及对于将来的恐惧，代替了我们被拯救的喜悦。这使得我们中间出现了身体上的疾病、精神崩溃以及一些自杀事件。我也会做噩梦，不过白天我会探险般地探寻阿

斯匹兰纳德旅馆的每个角落，爬上塔楼顶而把我父亲吓得够呛，看一些垃圾从斜坡上滑下直到一个红十字会的护士制止我。在一次少有的去蒙特勒的远足中，我在路上获得了上帝赐予我的一个礼物——一个装有1法郎的小钱包，这正好能够购买一个我买不起的东西——一根香蕉。这就是一个在贝尔森度过5个月的小孩渴望的东西。至于大人们，米里亚姆·巴克的文字反映了为人们幸运地逃生而蒙上的一层阴影的心灵创伤与沮丧：“特权集中营没有那么多令人恐惧的事情，没有密封的四轮马车，没有毒气室，也没有孩子的尸体。尽管如此，在集中营的经历仍然令我感到沉重……我不知道600万中的我们为什么能够如此幸运地进入特权集中营，更重要的是，我们最终还逃了出来……我们感到沮丧，不仅仅因为我们经历的一切，更因为我们获得的生命、自由、希望以及一切，而没有人能够与我们分享这些……这就是我们的喜悦被蒙上了阴影，自由变得没有价值，希望则失去了飞翔的翅膀的原因。”

战争结束不久，美国与瑞士当局决定将我们转移到阿尔及利亚菲利普维尔的一个联合国救济与复原委员会，我们强烈反对，在菲斯彻被允许提前离开考斯后成为我们的领导人的德兹索·赫尔曼致信丘吉尔、美国的新任总统哈里·杜鲁门以及其他具有影响力的人士。第二个建议去的地方是突尼斯，而且有传闻称当局将动用武力强制我们去那里。我们在阿斯匹兰纳德旅馆的餐厅里举办了许多次愤怒的会议，会议中充满了振奋的演讲、欢呼声与嘘声，我则会在适当的时候弄响我的玩具手枪。据我所知，我们没有被迫进行转移。1945年8月，700人在菲斯彻的带领下通过意大利去巴勒斯坦，大约180人回到了匈牙利，有些人移民美国和其他国家，有些人则定居于瑞士。

我本来也是可以去巴勒斯坦的，不过我父亲无法获得英国当局的移民许可，我们害怕再被分开。我父亲请教了泰特尔鲍姆与斯容帝，他俩都以完全不同的原因建议我父亲不要让我单独离开。我父亲成功地说服一个救





济组织为我支付了坐落在阿尔卑斯山脉最美丽地区之一的一个寄宿学校的学费，在那里，我度过了两年快乐的时光而没有听到任何反犹太的言论。之后，我父亲的事业逐渐开始，我参加了文法学校，接着又在苏黎世念了大学。经过了12年的法定居住年限，由三个不同警察部门进行了调查、一组政客就瑞士民主问题进行盘问之后，我们获得了瑞士的公民身份。就在这时，我父亲迎娶了大卫·科恩的母亲，她曾去过巴勒斯坦，后来又回到瑞士和我们在一起。大卫在苏黎世学医，后来成了以色列的知名老年医学专家。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教师和记者，之后去萨塞克斯大学教授德语，那是1963年，而我现在仍然在那儿。

第十一章 集中营解救行动

慎重的细节处理

我们从卑尔根 - 贝尔森集中营被释放似乎证明德国人真的准备用适当的价格来换取犹太人的生命，因此卡斯特纳决定冒着生命危险继续他的营救。将 1670 名犹太人从纳粹的集中营中救出并送到瑞士是一件极其激动人心的事，而从现在开始，卡斯特纳试图阻止更大规模的灭绝屠杀，不过是以一种更隐蔽的方式。根据卡斯特纳自己的叙述，他与比彻曾经开展过许多营救行动，但大部分相关文件都被销毁了，所以我们很难说成千上万的幸存者中有多少人要归功于他们的努力或者其他因素。

12 月 8 日，我们穿过瑞士边界的第二天，卡斯特纳在布雷根茨再次会见了克莱尔与加瓦兹，比彻则留在布达佩斯等消息。卡斯特纳劝服他们给比彻发电报，告诉他 500 万法郎已经在瑞士被存进户头，而剩下的 1500 万赎金正在积极的筹集中。以为 500 万法郎已经被存进银行的比彻坚持要卡



斯特纳立即支付剩下的 1500 万法郎，还要求卡斯特纳兑现他曾为交换卡伦巴兹大街集中营的安全而做出的承诺——卡车。那些卡车（卡斯特纳说是 15 辆，比彻说是 30 辆）本应该是由一个生活在布拉迪斯拉发的德国商人阿洛伊斯·斯蒂格提供的，但他接受了一笔丰厚的贿赂，所以同意告诉比彻他们已经准备好在斯洛伐克交货了。不过当比彻最终试图验收这些卡车的时候，他发现它们已经被纳粹国防军充公了。

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据说箭十字党准备灭绝布达佩斯隔离区的 8 万到 10 万名犹太人，卡斯特纳和毕斯后来声称，正是他们通过比彻而进行的干预才阻止了这样的屠杀。不足为奇，比彻也同意这个说法。根据比彻于 1961 年的陈述，正是由于他的要求，希姆莱才通知极不情愿的艾希曼确保不继续虐待犹太人。卡斯特纳和毕斯或许夸大了危险的紧迫性以及他们在避免危险时所起的作用，但比彻的证词未免更加不足为信，因为虽然箭十字党的暴徒们在苏联于 1945 年 2 月占领这座城市之前犯下了无数罪行，而对布达佩斯隔离区的灭绝仅仅只是一个并没有发生的战争罪行。

当卡斯特纳正在试图通过比彻对希姆莱的影响力而营救犹太人的时候，奥托·加莫里、汉斯·布兰德和毕斯则在极其困难与危险条件下竭尽所能帮助那些在箭十字党的恐怖统治之下的受害者。他们为那些受害者提供食物，建立儿童住所，帮助藏匿逃亡者，并经常与那些采取一些英勇营救行动的中立国代表、红十字会成员以及青年犹太复国主义先锋者们合作。加莫里或许解救了 5000 至 6000 个儿童，他于 1945 年 1 月 1 日被匈牙利秘密警察逮捕后便杳无音讯。

最成功的应该是瑞典外交官沃伦伯格、瑞士领事查尔斯·鲁茨以及瑞士红十字会的首席代表弗里德里希·伯恩采取的营救行动。他们通过救出被逮捕的犹太人、让他们住在由匈牙利与德国当局认可的“安全屋”中或者向他们颁发受瑞典、瑞士或者红十字会保护的许可证，分别拯救了大约 10 万、6 万、1.5 万个犹太人。在很多情况下，基于伊斯坦布尔的“瓦达”

与瑞士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向匈牙利颁发的去巴勒斯坦的通行证，这些营救者可以给予被保护者潜在移民者的身份，而在其他情况下，他们会颁发一些未经授权的文件，而这种方法也往往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在这些计划中，布达佩斯巴勒斯坦办公室的主任、在瑞士共使馆寻求避难的摩西·克劳兹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卡斯特纳声称，巴勒斯坦办公室与“瓦达”采取的相辅相成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协调的，不过这两个组织间合作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受到了两位领导人个人恩怨的制约。

虽然这些行动解救了大量犹太人，不过有一个群体就没那么走运了。我们出发去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后，大约3500名犹太人在卡伦巴兹大街集中营避难，那里已经由国际红十字会进行保护。这些在卡伦巴兹大街集中营避难的囚犯组织了一个自卫武装力量，并弄到了一些武器以抵抗任何可能发生的攻击。12月2日晚上，一帮箭十字党的成员试图偷窃集中营的食物储备，其中的2个暴徒被自卫武装力量杀死了，其余人则逃跑了。匈牙利警察随后占领了那里，集中营的领导者尤若夫·莫斯克维兹、医生拉斐尔以及拉斐尔17岁的儿子都因他们的“抵抗”而被报复性地杀害了。其中，大约1500人被送到了隔离区，2000人被送到了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并于12月14日抵达那里。1945年4月初，根据希姆莱的命令，这两部分人中的大约2150人乘坐两列火车从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去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但在抵达目的地前被苏联军队解放了。

12月10日，卡斯特纳向布达佩斯的“瓦达”传递了一条讯息，告诉他们从梅耶那里不太可能得到资金。一天后，比彻要求立即见到剩下的1500万法郎。就在那时，联合会的欧洲负责人约瑟夫·施瓦兹正要去瑞士，卡斯特纳就劝服加托茨给比彻发电报，告诉他施瓦兹就是去给交付那1500万法郎的。

从12月20日开始，卡斯特纳与施瓦兹、梅耶、内森·斯克沃布在瑞士讨论了很多问题，他的主要目的是保证施瓦兹继续帮他们欺骗比彻。如





果美国不允许对德国进行任何实际上的支付，那么德国人至少可以看看那些他们并不会得到的钱吧。克服了重重困难，卡斯特纳终于让梅耶写下一封信，保证下次在边境会面的时候会将 1500 万法郎付清。

当东犹太派的两兄弟伊莱亚斯·斯特恩巴齐与伊扎·斯特恩巴齐在借与希姆莱交情颇深的前瑞士内阁大臣吉恩马力·穆西之力展开营救行动的时候，对卡斯特纳来说，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起来。这两兄弟的计划得到了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副局长瓦尔特·施伦堡的支持，一个名叫科特·楚姆坡的瑞士商人则充当着中间人的角色。12 月 21 日，兄弟俩要求卡斯特纳摆脱梅耶而建议比彻与他们合作以释放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的 1200 名犹太人，卡斯特纳拒绝了这个提议，反过来建议他们与自己合作而在梅耶的协助以及联合会的支持下实现大规模的营救行动。卡斯特纳解释道，对纳粹做出的承诺的目的应该是解救那些在死亡线上的犹太人，目前，布达佩斯隔离区的囚犯以及德国领土内的各个集中营都处于命悬一线的状况，虽然将一些犹太人运到国外看起来更加现实，但人们真正要做的是为了阻止任何地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而要进行的艰难的细节处理。

由于卡斯特纳刚在两周前将我们从卑尔根 - 贝尔森集中营解救，所以这样的言论似乎有些奇怪。一方面，他对那兄弟俩提议的反对意味着他更希望独自掌控局面。另一方面，兄弟俩也同意卡斯特纳的说法：对我们的营救只意味着整个行动的第一阶段，他还希望营救更多生命。两兄弟谢绝了卡斯特纳的提议，却很快就给卡斯特纳惹了不少麻烦。

12 月 28 日，卡斯特纳 12 月 28 日离开布雷根茨。由于苏联军队在前一天已经包围了布达佩斯，卡斯特纳留在维也纳，在那里的格兰德酒店待了 3 个月。比彻与艾希曼在布达佩斯遭到猛烈炮击的前几天离开了那里，艾希曼一直待在柏林，直到第三帝国倒塌为止，在奥地利藏了一段时间后，他躲到阿根廷，之后被带到以色列进行审判，并于 1961 年被处决。比彻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一直游走于柏林、维也纳、汉堡与各个集中营



之间，被美国囚禁了3年后重获自由，成了德国最有钱的商人之一。威斯里舍尼与克拉米从布达佩斯逃到了维也纳，威斯里舍尼最终在捷克斯洛伐克接受了审判并被处决，克拉米则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

1946年1月7日，联合会移交给梅耶2000万法郎，不过比彻仍然不知道这笔钱的一分一毛都不能用于支付，除非得到美国政府的允许。1月11日，比彻在拜访完希姆莱（希姆莱将比彻提升为上校）后从柏林回到维也纳，比彻告知卡斯特纳，他在与麦克里兰已经达成清楚的协议，并且希姆莱听说支付延期后感到十分震惊。卡斯特纳抱怨艾希曼不尊重比彻的任务，甚至不服从希姆莱的命令，他催促比彻让他保证布达佩斯隔离区在城市沦陷到苏联手中之前的最后阶段不受到伤害。比彻向卡斯特纳保证道：“党卫军元首已经告诉我他会禁止任何形式的报复性行动。”接着，比彻又抱怨着某些纳粹人物曾经建议他远离任何营救计划，现在却正在试图败坏他的名声，并且要干预他的计划。两周后，他变得更加直白，当他允许卡斯特纳让红十字会的代表带着食物与衣服去看望劳工集中营中的犹太人的时候，他警告道：“你必须非常小心，不要太显眼，你知道卡尔登勃鲁纳能够妥协的程度。”此时，比彻已经将卡斯特纳平等对待了。至于艾希曼，他一直很明确地竭尽所能破坏比彻的努力、回避希姆莱的命令，他这样做或许是出于同行的嫉妒，又或许是因为他“不让一个犹太人留在匈牙利”的信念。

同时，斯特恩巴齐兄弟在继续他们的行动。比彻于1月29日紧张地告诉卡斯特纳他在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的敌人已经告诉了希姆莱，与光说不做的联合会和麦克里兰不同，穆西能用货物、金钱来换取将犹太人运到瑞士。为了使希姆莱安心，比彻命令卡斯特纳去瑞士边界与梅耶再进行一次会面，克莱尔和加托茨与他随行。会面结束后，克莱尔将毫不含糊地给比彻发电报告诉他，梅耶是否收到了用于支付的500万和1500万法郎？这些钱是否可以任由比彻处理？梅耶是否准备为比彻获得一个签证以便在瑞士



继续谈判？

在接下来的会面中，梅耶承诺道，提供一份书信证明用于与比彻谈判的 2000 万法郎已经被存入瑞士的一家银行并且由梅耶与麦克里兰共同支配。克莱尔要求这笔钱明确规定由比彻支配。第二次会面被定于 2 月 2 日下午，而当天早上传来了一条消息：“梅耶正在忙于家事。”经过三天的僵局后，克莱尔收到了柏林的官方来电，命令他停止谈判，而之后，比彻又亲自打来电话，并在希姆莱的总部宣布 1000 名犹太人已经被派往瑞士以作为诚意。实际上，那是穆西代表斯特恩巴齐兄弟与希姆莱达成协议后从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释放的 1200 名犹太人。

2 月 11 日，卡斯特纳、比彻、克莱尔与梅耶之间进行了另一次会面，这次是在圣玛格丽特海关办公室，而不是横跨莱茵河的大桥上。梅耶向比彻出示了那 2000 万法郎存款的承诺信，不过他解释说，瑞士的中立性决定了银行的存款不能由德国人进行支配。比彻要求与麦克里兰会面，得到梅耶的承诺后返回维也纳，但那样的会面没能成行，原因可能是电话线路被军事行动摧毁了。

卡斯特纳在这段时间里写给伯格幽的两封信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状态。在第一封日期为 2 月 1 日的信中，他抱怨“孤独与孤立的感觉”，承认想“休息一会儿”，不过他还试图使自己和伯格幽振作起来：“亲爱的伯格幽，不要担心我。我仍然相信我的运气，只有在想起你的时候才会真正痛苦。”在第二封日期为 2 月 11 日的信中，他变得更加平静：“我们正处于动荡的时期，我试图隐藏自己的内在情感与颤抖的恐惧去做一些事情。”他运用的比喻也反映了他的赌博心理：“我的工作现在已经几乎变得平庸，似乎我的出价已经结束了，而吉恩马力能够完成剩下的赌局。”尽管卡斯特纳有些许消极的情绪，他很清楚自己仍然肩负重要的任务：“不幸的是，游戏还没有结束，而赢得游戏意味着赢得无辜的生命。”所以，他并不想放弃他给自己下达的任务，他的决心甚至比以前更加坚定，因为他的“个

人安全”比“以前”更有保证。考虑到德国不可避免的战败，比彻无疑会通过保护卡斯特纳而为自己战后留一条活路。

3月，卡斯特纳开展了很多营救行动。比彻拒绝帮助卡斯特纳释放毛特豪森的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一些杰出反法西斯主义者，不过，作为对承诺交付纺织品与食用油的回报，比彻允许卡斯特纳制定一份藏匿于布拉迪斯拉发的50名斯洛伐克犹太人的名单，并将他们送到瑞士。在布拉迪斯拉发的街上，卡斯特纳不幸遇到了匈牙利宪兵头子费伦奇。到达费伦奇的宾馆时，两名穿着纳粹制服的武装匈牙利人猛地扑向卡斯特纳，他们命令他将双手放在脑后，然后将他带到了宾馆的前厅，费伦奇正在那里等着他。费伦奇咆哮道：“你跟我走一趟。”“去哪？”卡斯特纳问道。“我会把你带到我的车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中校，你没有权力这样做。”卡斯特纳提高了嗓音。费伦奇厉声说道：“闭嘴，我知道你是谁。”卡斯特纳拼命地喊着“救命”，一群人聚集在前厅，其中包括两名德国军官。费伦奇向这两名军官解释道：“我认识他，他是美国的犹太间谍。”当卡斯特纳向那两位德国军官出示了通行证后，费伦奇才无可奈何地离开了。然后，卡斯特纳走进了他的房间，藏起了他随身带来的用于购买货物的法郎，并销毁了一些敏感文件。就在他刚刚做完这些的时候，负责灭绝斯洛伐克剩余犹太人的纳粹上尉阿洛伊斯·布鲁纳的五名手下冲进了房间，和他进行了下面的对话：

“你是卡斯特纳？”

“是的。”

“你以什么名义留在这里？”

“这是什么问题？当然是以我自己的名义。”

“你是犹太人吗？”

“我不被视为犹太人。”

“你进行过包皮环切吗？”





“是的，不过我还是不被视为犹太人。”

“好吧——根据我们的法律，你是犹太人，跟我们走吧。”

卡斯特纳被带到了纳粹总部，布鲁纳的副手检查了他的文件，之后又将文件交给了盖世太保头子约瑟夫·维特斯加。维特斯加注意到了卡斯特纳与比彻之间的联系，不到一小时，卡斯特纳便被释放了。

最终，28名藏匿于布拉迪斯拉发的犹太人被卡车运到了维也纳，除此之外，比彻还允许将维也纳的一些匈牙利犹太人也加到这辆卡车上，4月19日，一共68人到达瑞士。其中就包括道夫·魏斯曼德，他在前一年秋天的时候成功地从驶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列车上逃了出去并躲藏起来，他在与威斯里舍尼就“欧洲计划”谈判时的搭档吉兹·弗莱彻曼则不在其中，她也在驶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列车上并且刚到那里便被谋杀了。

伟大的时刻

随着第三帝国末日的日益临近，希姆莱承受着停止屠杀的压力。3月29日，比彻有一些重大的事件要告知卡斯特纳。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希姆莱已经向比彻保证不杀犹太人，所有犹太人都会完好无损地移交给同盟国。斯特恩巴齐-穆西行动使希特勒与希姆莱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吵。希特勒已经下令立即停止所有谈判，希姆莱却坚持自己的想法。希姆莱的这种态度也由克拉米告知了卡斯特纳。当希姆莱在维也纳巡视抵御红军的防御时，被当地的盖世太保头子询问如何处理该地区的犹太人，根据克拉米所称，希姆莱回答道：“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不应该受到伤害。”

一周后，也就是4月6日，在苏联全面进攻前，德国人撤退了，比彻

与克拉米在多瑙河斯皮兹（Spitz）小镇附近一个中世纪城堡的兵舍中会见了卡斯特纳。比彻兴奋地告诉卡斯特纳：“现在，你的伟大时刻已经来临了。我刚见过希姆莱，按照我们之前商量的那样，我建议他改善犹太囚犯与政治犯的待遇。希姆莱采纳了我的意见，并任命我为负责所有犹太与政治囚犯事务的帝国特别专员。现在，我会与你和克拉米去往所有的大集中营，当场采取必要的措施。之后，我们会到瑞士边界与麦克里兰探讨细节。”

比彻向卡斯特纳展示了有希姆莱签字的文件：“致上校库尔特·比彻：鉴于集中营恶劣的卫生与居住环境，我任命你为所有集中营的帝国特别专员。”比彻解释说，希姆莱已经同意用人道的精神重组集中营的管理体系，并准备放弃来自犹太人或者同盟国的经济报酬。经济事务部长会偿还“瓦达”之前支付的一切赎金或者将这些资金用于改善集中营的条件。

这是卡斯特纳最后一个主要计划的开始。卡斯特纳与比彻都坚称正是比彻才使希姆莱下令将集中营和平移交给同盟国，并且声称该命令在几个集中营执行的应归功于他们。事实上，希姆莱是在以下多方面的干预下才下达这样的命令的：瑞典红十字会副主席福克·伯纳多特伯爵、世界犹太代表大会代表诺伯特·马舒尔、希姆莱自己的医生费利克斯·克斯滕以及其他建议他放过幸存者的人。至于对于该命令的执行，卡斯特纳与比彻的确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星期里去过几个集中营，这些集中营的投降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努力却很难考证。

他们最先去的是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4月10日，在柏林公寓的比彻告诉卡斯特纳他已经再次建议希姆莱和平地将集中营移交给同盟国。当卡斯特纳在比彻的梅赛德斯轿车中等消息时，比彻和克拉米去艾希曼的办公室拜访了他以确保他不会阴谋违令。当艾希曼两个小时后从大楼里出来的时候，他假装没有看到卡斯特纳。比彻和卡斯特纳随即离开了柏林，于下午5点30分到达了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长官克莱默“冰冷、漠然”





地向他们介绍了集中营恶劣的条件：2月初，这里曾经有89000名囚犯，现在只有53000人，大多数人是因饥饿和斑疹伤寒而死，而“并非他的过错”。卡斯特纳提出，结束这种状况的唯一方法就是将集中营移交给正在逼近的英国军队。

4月11日，比彻致电希姆莱，希姆莱授权他立即安排投降。这次，克莱默带着比彻与卡斯特纳参观了部分集中营，看到了成千“活着的骷髅”，虽然他们与死尸是分开的。纳粹国防军指挥官卡尔·哈里斯起初拒绝投降，不过比彻在拜访北方集团军群高级指挥官后说服了他们，提议正在送往英国的途中。4月12日，当比彻正在视察汉堡·奥博加姆集中营的时候，他收到消息称一名英国参谋已经抵达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来商议集中营的投降事宜。当比彻通过电话告知希姆莱他将要去卑尔根-贝尔森的时候，他的老板申斥道：“这不关你的事，比彻。请把投降的事情交给国防军。”集中营最终于4月15日移交给英国。

这些事情大部分出现在卡斯特纳的回顾性报告中，缺乏铁证来支持其可靠性，不过在一些情况下，他会随着事情的进展而同步做出一些记录。他之后的回顾性报告描述了他当初做的事情，那些同步的记录则能够增加其可信度。卡斯特纳在汉堡于4月11日写的一封信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中的一段文字似乎肯定了比彻（卡斯特纳在信中以比彻的名——库尔特作为称呼）在使那些幸存者免于在最后时刻成为遇难者而起到的关键作用：“库尔特的意见没有得到热心的关注，不过库尔特获得了集团军群指挥官的同意，晚上8点，决议出来了：整个地方将成为中立区域，并且和平地向同盟国投降，一名上校负责将此决议传达给同盟国。”

在这封信的其他地方，卡斯特纳还写道，比彻安排了有3万至4万囚犯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仿照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投降。

4月13日，在返回柏林的路上，比彻露骨地为自己辩解。“要是我们最终输掉了这该死的战争，我希望同盟国足够重视我的努力与成就。”他

对卡斯特纳说。他甚至更加无耻地为希姆莱说好话，由于希姆莱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犹太与政治囚犯的措施，所以他现在正处于一个微妙的位置。在替希姆莱说完好话后，比彻又开始说梅耶的坏话，这就证明比彻注意到了犹太方一直以来施展的诡计，不过我们并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的：“要是梅耶先生没有这么做，要是他至少不那么吝惜他的承诺，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多。”的确，梅耶不如卡斯特纳期望的那么擅长吹牛与欺骗，但采用更加狡猾的方法是否能够从纳粹罪犯那里获得更多妥协？这一点，我们也无法确定。

当比彻与卡斯特纳到达柏林的时候，他们发现尽管有希姆莱的命令，大量囚犯还是从一些集中营被扔进了另一些集中营以防止他们被同盟国解放。例如，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投降的前几天，集中营的长官将 22000 人送到了弗洛森比格和达豪。比彻告知卡斯特纳，应他的要求，希姆莱已经开始给所有集中营的长官发电报，禁止转移或灭绝囚犯。

为了保证集中营和平投降，比彻决定去毛特豪森和弗洛森比格。尽管有英国低空战机的攻击，卡斯特纳、克拉米和哈什于 4 月 16 日到达特莱西恩施塔特，被德国人任命为发言人的拉比本杰明·梅斯坦带领他们参观了曾于 1944 年骗过红十字会的“模范隔离区”。卡斯特纳见到了一些囚犯，向他们保证他们很快就会自由。克拉米传达了希姆莱的命令，其 32000 名幸存的囚犯将被转交给红十字会，这最终将于 5 月 5 日完成，也就是在苏联军队接管的三天前。

4 月 27 日，比彻出现在毛特豪森，他显然取消了指挥官下达的“在一个地下军工厂消灭 22000 名奴工”的命令。不过，集中营最终向美国人投降多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比彻的努力，我们并不清楚。比彻在这里还有另一个更加私人的任务要完成。卡斯特纳最亲密的一个伙伴摩西·舒威格被盖世太保逮捕了，并且在德国入侵匈牙利不久就被囚禁在毛特豪森，在美国军队解放集中营的前一天，比彻释放了他，和我们看到的一样，他这样做





的原因并不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

卡斯特纳再次来到瑞士，4月20日，他出现在日内瓦，试图让麦克里兰、梅耶、斯克沃布能够与比彻在边界处再次会面。然而，卡斯特纳被告知，考虑到同盟国军队的进展，这样的会面已经没有必要了。

在前一天，卡斯特纳看望了在考斯避难的我们，并受到了热烈欢迎。代表住在里贾纳旅馆中占少数人的传统派以及住在阿斯匹兰纳德旅馆中占多数人的非宗教派，卡斯特纳收到了一个特制的证书，其中的图画象征着我们从科罗日瓦到布达佩斯、到莫雄马扎尔、到林茨、到卑尔根-贝尔森、到圣加伦、到考斯的各个残酷的阶段，上面还有一段希伯来文字：“1685名被救的犹太人祈求上帝保佑我们高尚的拯救者与保护者——以色列的卡斯特纳博士，他冒着生命的危险牺牲自己，奇迹般地将我们从嗜血的敌人手中解救了出来。”这是卡斯特纳最幸福的时刻之一，接着便是许多令人不快的时刻。

第十二章 战后事宜

正名之争

战争的结束自然意味着营救行动的结束，不过绝不意味着卡斯特纳故事的结束。1945年4月底，也就是德国最终投降的不久前，卡斯特纳与他的妻子伯格幽搬到了日内瓦的瑟吉公寓，1947年他们移民到巴勒斯坦前一直住在这里。1945年至1948年，他去过几次伦敦和纽伦堡，主要是为了向军事法庭提供信息、采访、写文章。他的生活费是由巴勒斯坦办公室、犹太事务处以及战犯法庭进行提供的。他唯一的孩子苏希出生于1945年12月26日，在一封写给在巴勒斯坦的亲人的信中，卡斯特纳称他的女儿为他萎靡的状态中“唯一的亮点”。在写给朋友德兹索·赫尔曼的信中，他倾诉道：“父亲并不是一个角色，而是一种心情，一种无法解释的好心情。”他将他那“像个日本人一般眯着眼的小女孩”描述为“他创造出来的最完美的作品”。



不过，这种父爱并不足以让他提起精神。如战后对卡斯特纳的生活最了解观察者耶奇姆·韦茨所述，“不管是在身体上，还是在心理上，卡斯特纳都只是他从前的影子。”对1946年5月在日内瓦见到他的乔尔·布兰德来说，卡斯特纳似乎“不仅样子萎靡，似乎思想也变得锈迹斑斑”。在与纳粹经历了那些刺激的时刻之后，他的行为似乎平凡、无聊起来。由于曾经与汉斯·布兰德之间的关系，卡斯特纳还必须忍受伯格幽无休止的吵闹。他本期待会被感激、歌颂，却因暗讽、谣言以及公开指责他在大屠杀中严重渎职而困扰。他感到沮丧、失望、痛苦。

指责卡斯特纳的人很多，包括他私人或者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失去亲人或者在集中营遭受折磨的幸存者，甚至还有一些我们卑尔根-贝尔森群体中的成员。那些谴责卡斯特纳的运动经常会在匿名的情况下进行，这也使得他尤为愤怒。在一封写给艾利胡·多布金的信中，他表现出了对那些“玩幕后游戏的人”的极端反感，并且要求“任何的误解都应该被摆明”，“任何怀疑都应该公开地表达出来”，“任何控诉都应该基于事实”。艾利胡·多布金否认控诉和怀疑的存在，诽谤与中伤却仍在继续。

卡斯特纳感到非常委屈。在写给赫尔曼的信中，他相信他是被伊术（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区）的领导人们“绊倒”的，因为他们“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感激我们取得的成就”。同样，在写给朋友瓦尔特·埃利泽的信中，他将自己承受的敌意归咎于在大屠杀中欧洲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之间不同的经历而导致的不同理解。本·古里安与夏里特一直忙于创建以色列国家而无暇顾及拯救欧洲的犹太人，犹太事务处的其他成员（如多布金、伊扎·格鲁恩鲍姆）则起初对此忽视之后又故意将那些幸存者当成他们自己内部政治的棋子。在犹太国家建立前，也就是卡斯特纳去世的十几年前，他就意识到这种分裂将成为以色列社会主要的鸿沟以及他自己悲剧的主要因素。不仅如此，除了对伊术领导人的不满，他还声称，梅耶、联合会、斯特恩巴齐兄弟以及传统派的阿骨打运动都试图篡夺原本属

于他的功绩。他看起来似乎有些多疑，不过他的确成了自己误述以及他人恶意的受害者。

为了为自己辩解，卡斯特纳发表了一系列陈述，夸耀自己战时的行为，要求给自己正名，对任何实际或者想象的贬义都会产生过度的反应。第一批这样的回溯之一是他于1945年8月写给犹太事务处成员的一封长达四页的信。在信中，他回忆了“瓦达”工作的“道德正当性以及政治得体性”，强调了“瓦达”的首要目标是挽救生命，还他列举了“必须归功于我们努力”的成功事件：卑尔根-贝尔森群体的释放；斯特拉斯霍夫群体的幸存；对布达佩斯驱逐的阻止；儿童与老人免于去奥地利的死亡行军；从箭十字党手中对布达佩斯隔离区的营救；希姆莱停止所有灭绝行动的命令；藏匿于布拉迪斯拉发的犹太人的解放；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与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向同盟国的和平投降。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卡斯特纳又多次重复了这个名单，不同的版本有细节上的小改动，但本质还是一样。卡斯特纳带着他那应得的骄傲在致瓦尔特·埃利泽的信中写道：“我们在布达佩斯所做的一切在与灾难有关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他或许夸大了自己的贡献，但明显是试图完成一个巨大的任务，而解救我们那1670人只是任务中极小的一部分。尽管他没有完成所有的梦想，他那远大的目标是确定的，例如，在一封写给世界犹太委员会阿莱·塔塔科维尔的信中，他指出：“1944年，100多万犹太人死于毒气，那时，有进行大规模营救的机会。”

1946年秋天，卡斯特纳被卷进了一个尤其激烈的争论中。10月14日，联合会发表了一份新闻稿，其过分恭维地颂扬了梅耶在营救匈牙利犹太人时的贡献，却对卡斯特纳只字未提。卡斯特纳气愤极了。在一封写给梅耶的信中，他反驳了新闻稿中的所有内容，声称所有的功绩应该属于“瓦达”，或者说属于他自己。卡斯特纳又在不同的报纸上发表了相同意思的陈述，并催促世界犹太委员会、犹太事务处以及联合会弄清事实。12月，





卡斯特纳收到了联合会的执行秘书摩西·李维特及其副主席海曼不真诚的道歉，他们将错误归咎于世界难民委员会代表罗斯维尔·麦克里兰的一份报告。有一句话或许会让卡斯特纳变得哑口无言，虽然这句话的道理再简单不过：“没有一个组织可以宣称是它独自完成了任务。”大约与此同时，卡斯特纳在一份“备忘录”中再次开始宣扬他的事迹，其中，他反复重申他与比彻合作实现的结果：卑尔根-贝尔森群体的释放，斯特拉斯霍夫群体的转向，布达佩斯隔离区的营救，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毛特豪森集中营、新加默集中营以及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的投降。

那时，对卡斯特纳伤害最大的攻击来自他的老对手摩西·克劳兹。在犹太事务处对克劳兹草率、挑衅的工作习惯进行调查后，1945年夏天，克劳兹已经调任布达佩斯的巴勒斯坦办公室主任。由于缺乏证据，克劳兹被判无罪，作为反攻，他向调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极力赞扬了自己做的营救努力，而诋毁了卡斯特纳。他声称卡斯特纳不仅在致力于解救卑尔根-贝尔森群体时失去了挽救更多犹太人的机会，还滥用了被指定用于营救行动的资金、为自己的安全而牺牲匈牙利的犹太人、阻碍了克劳兹的大规模营救行动。应卡斯特纳的要求，一个为了审查克劳兹而对卡斯特纳做出控诉的荣誉法庭于1946在巴塞尔开庭了，经过两次会议后还是无果而终，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搜集证据。卡斯特纳同样要求第二次开庭，不过却没有成行。在以色列于1950年引入《纳粹与纳粹勾结法》后，卡斯特纳被警察部门审讯了几次，不过都被释放了。卡斯特纳要消除流言、实现正名的愿望是他撰写《卡斯特纳报告》，并将它第二十二次提交给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的主要原因，该报告由于“自我澄清的分析”而受到批判，最终没能使卡斯特纳的敌人闭嘴。尽管如此，如果谨慎地加以分析，它还是一个非凡事业的宝贵记录。

卡斯特纳遭受的诋毁多种多样，不过最终的目的都是其因为自己的利益而与纳粹杀人犯们合作。这是一个可怕的指控，而卡斯特纳也做了一切

为自己辩护。当然，作为当事人的他不是一个有效的证人，不过至少还有一个能够在近距离客观评价卡斯特纳工作的人。罗斯维尔·麦克里兰于1945年8月向世界难民委员会的上级提交的报告中就有清楚、简洁、不带明显偏见的叙述，在他看来，卡斯特纳的功绩在于：（1）将两组犹太人从匈牙利通过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带到瑞士（1944年8月21日为318人，1944年12月6日为1355人）。（2）避免了1944年8月25日留在布达佩斯的20万犹太人的驱逐。（3）老人、病人、儿童免于1944年11月的死亡行军。（4）1944年6月，大约17000名匈牙利犹太人被转送到奥地利，而不是奥斯维辛集中营。（5）纳粹默许国际红十字会在布达佩斯及周边为大约3000名犹太儿童提供庇护（1944年8月至12月）。（6）帮助维也纳地区大约7000名在奴工集中营的犹太人获得、分发食物和衣服（1945年1月）。（7）69名来自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杰出犹太人于1945年4月18日被释放后抵达瑞士。

这份列表中可能存在一些微小的偏差，而且卡斯特纳的作用是否如麦克里兰描述的那么重要也值得怀疑，不过，麦克里兰还是谨慎地没有将集中营的投降也归功于卡斯特纳，因为卡斯特纳对此产生的影响是最具争议的。麦克里兰还在得出“卡斯特纳与梅耶、比彻的谈判‘无疑对以上的功绩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结论之前，谨慎地指出，他们“并不能独自实现这些成就”。

同年，麦克里兰后来还参加了关于卡斯特纳与梅耶各自功劳的争论之中。在写给卡斯特纳的信中，他指出在瑞士边界那些“持久、艰难的谈判”中，卡斯特纳与“梅耶、比彻、以及其他一样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他给予了卡斯特纳高度的评价：“要不是您主张建立必要的联系和‘协议’，要不是您一直不断地进行斡旋（或许应该说是在敌占区进行的斡旋），我们很难想象这些谈判能够成功。”

一些最恶毒的指责经常会将卡斯特纳与我们的卑尔根-贝尔森群体联





系起来，虽然这不公平，却可以理解。数百万人死掉了，那些人便指责卡斯特纳和我们这些幸存者，麦克里兰就是幸存者之一。在一封不知道写给谁的信中，他写道：“不管是组织逃离的人，还是逃离的人，他们都不应该为那些没能逃离的人负责。”非但没有批判卡斯特纳没能做成那些本不可能做成的事情，麦克里兰还对卡斯特纳于1944年8月至12月在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做的事情表达了崇高的敬意：“考虑到当时恶劣的环境，考虑到那时纳粹领导人的心态，将这两批人安全地送到瑞士的事实应该被视为具有重大意义的成就。”

不幸的是，很多人不以为然，很快，为卡斯特纳辩护的声音便都被那些诽谤中伤的流言蜚语淹没了。

卡斯特纳的宣誓书

卡斯特纳在大力宣扬自己功绩的同时还在进行三项工作，这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而且还需要在1945年至1948年多次去纽伦堡。他打算找回被纳粹偷走的匈牙利犹太人的财产，对艾希曼穷追猛打，并让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教法首席说明官）艾敏·侯赛尼得到制裁，因为艾敏·侯赛尼与纳粹合作让他们保证不让任何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在进行这三项工作的同时，卡斯特纳还为4名被安置在匈牙利的纳粹军官在战犯法庭上提供了宣誓书，他们是狄尔特·威斯里舍尼、汉斯·加特纳、赫尔曼·克拉米以及库尔特·比彻。卡斯特纳的证词显示了他态度上的巨大变化，他的宣誓书则令人惊奇地倾向于那些臭名昭著的纳粹。

最初，威斯里舍尼在卡斯特纳的宣誓书中只是一个负面的字眼。1945

年，卡斯特纳认为他所做出的任何好事都只是出于他自己的利益的考虑：“他相信如果让我活着、对犹太人做出一些妥协，这样当他在不得不为自己的暴行做出解释的时候，他或许会有一个能够为他辩护的证人。”到1948年，威斯里舍尼却变成了“第一个在彻底灭绝生效时打破这个原则的纳粹军官”。卡斯特纳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斯洛伐克驱逐的临时暂停与威斯里舍尼其实毫无关系。

加特纳则在1948年得到了卡斯特纳简洁却积极的描述。卡斯特纳称赞了加特纳于1944年秋天反对成千上万犹太人从布达佩斯行军至奥地利的行为，他总结道：“不顾艾希曼的反对，比彻和加特纳干预希姆莱后，死亡行军才停止了。”

1945年12月，克拉米的妻子请求卡斯特纳帮助她的丈夫，克拉米当时被关在英国的战犯营中。一开始，卡斯特纳拒绝了这个请求，但最终还是向克拉米的妻子保证道：“我已经随时准备好写下你的丈夫是如何在我们的营救行动中协助我们的，他甚至时常冒着相当大的生命危险。”卡斯特纳还向克拉米保证，他会帮助他恢复自由并且“在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在1948年5月的宣誓书中，卡斯特纳叙述道，克拉米帮他解救了29名在布拉迪斯拉发的犹太人，并且没有执行旨在消灭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中3万囚犯的命令。关于斯特拉斯霍夫的15000名匈牙利犹太人，卡斯特纳称赞了克拉米对这些生命的善意，他们的生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克拉米理解、执行命令的方式。同时，卡斯特纳没有忘记自己的角色，还补充道：“他希望减轻这一特殊群体痛苦的建议总是能够得到克拉米完全的理解与同情。”

除了与加特纳一起出现在一次宣誓书之外，比彻还两次出现在卡斯特纳的宣誓书中。卡斯特纳与比彻相关的第一次宣誓书出现在1945年9月对匈牙利犹太人迫害、灭绝的调查中，在这次的叙述中，比彻所占的部分相对较少。如同他对威斯里舍尼做出的宣誓书，卡斯特纳暴露了比彻慈善





背后自私的动机：“纳粹上校比彻保护我是为了给他自己制造无辜的证据，从1944年秋天开始，他就急切地证明他反对驱逐与灭绝，并且尽力向我证明他在试图挽救犹太人。”

第二次的宣誓书发生于1947年8月14日，而这次的宣誓书就像由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做出的一般，将主要的笔墨都用来褒扬比彻。卡斯特纳再次列出了在比彻的帮助下而展开的营救任务：“1685”名犹太人从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被解放；希姆莱于1944年秋天暂停灭绝；阻止箭十字党对布达佩斯隔离区85000人的屠杀；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55000名囚犯、新加默集中营12000名囚犯、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30000名囚犯的幸存。卡斯特纳接着又用极其吹捧的语句描述了比彻的行为：“毫无疑问，比彻是一名少有的有勇气反对灭绝工程、试图拯救生命的纳粹军官……比彻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竭尽所能试图从那些血腥的纳粹领导人手中拯救无辜的生命。所以，虽然我们谈判的形式与基础或许令人不快，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比彻善意的动机。在我看来，当同盟国或者德国当局审判他的时候，他应该获得充分的体谅。”

卡斯特纳在这篇令人印象深刻的颂词的最后还署上了一列头衔：“以上的陈述不仅代表我个人的意见，还代表犹太事务处以及世界犹太代表大会。卡斯特纳博士、日内瓦犹太事务处官员、匈牙利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前主席。”

10年后，这份宣誓书决定了卡斯特纳的悲剧命运。

备受争议的比彻

毫无疑问，比彻帮卡斯特纳挽救了成千上万犹太人，不过他同时也是

一名历史可疑的纳粹。

1909年，比彻生于汉堡，受雇于一家玉米交易公司，后于1934年加入纳粹，并于1937年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党。从1940年开始，他在波兰和乌克兰的武装党卫军服役，从一名下士迅速升为上校。1944年，他被希姆莱任命为布达佩斯的特别代表，1945年被任命为所有集中营的特别专员。1945年至1948年，他被怀疑是战犯而被囚禁在美国，不过没有遭到起诉。1948年，在一次德国去纳粹化的法庭上，他被判决无罪。1949年，他在不来梅继续玉米交易的生意，并于1960年成了巨富。1995年，他死于汉堡。

根据大多数人的描述，比彻相貌英俊，做事不择手段，是一个圆滑的恶棍、充满激情的骑师和乐此不疲的攀龙附凤者。对比彻尤其欣赏的人是卡斯特纳的女儿苏希·卡斯特纳。苏希是在比彻86岁见到他的，她着迷于比彻那“英俊、迷人、极具魅力的特征，他就是那种很讨女人喜欢的男人”。苏希强调，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比彻参加了“最终解决”（在希特勒领导下灭绝犹太人的纳粹项目），她说：“比彻的确热心于帮助我父亲解救尽可能多的犹太人”。奥第·毕斯对比彻也有相似的评价，说比彻解救了“几万条生命”以此“弥补他的同胞们犯下的罪行”。

其他人则大都对比彻是批判的态度。1961年2月，瑞士记者库尔特·埃门根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说明，比彻不仅仅是一个“勒索者与强盗”，还是一名“通过欺骗、扭曲以及他那半真半假的陈词而试图免于惩罚，甚至伪装成慈善家的纳粹罪犯”。他那些看起来很人道的行为不过是为了“用生命来换取商品的交易、为自己与希姆莱进行开脱”罢了。比彻用了纳粹“恐吓与勒索”等特有的技巧，犯了“盗窃、抢劫、勒索以及伪证”等罪行，不过他最大的罪行还是“参与大屠杀”，虽然他一直试图通过将自己塑造成“犹太人救世主”的形象去转移人们的视线。

在“卡斯特纳审判”中，法官们倾向于埃门根的观点，他们将比彻视





为一个利用艾希曼的驱逐行动而对犹太人进行剥削的战犯。地方法院法官本杰明·哈莱维认为“比彻的勒索行为是基于艾希曼的谋杀行为之上的”，最高法院的五名法官也同样认为“正是灭绝行动才使得比彻的勒索更加有效”。就连卡斯特纳自己也冷淡地谈道：“纳粹不同分支之间的合作是高效的：特别行动小组负责屠杀，经济部门则负责敛财。”

在研究过比彻的历史学家中，胡达·鲍尔或许是最杰出的人。他将比彻称为一个“纳粹投机分子”，或许他真的参与了大规模的灭绝行动，不过他也拯救了许多生命：“比彻或许是个杀手，或许是个凶手，或许是个强盗，而且他还肯定是个勒索者，但他也是成千上万犹太人的救星。”不过，鲍尔最后还是毫不含糊地对比彻进行了谴责：“他挽救这些生命终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比彻在战时的活动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在波兰与乌克兰，他与大屠杀关系密切。在匈牙利，他忙于大规模的勒索，但也参与了重大的营救计划。他不会错过任何使自己富足或者保证自己的安全的机会，为此，他用尽一切手段。

1940年至1943年，比彻在武装党卫军（也被称为死人头部队）的不同骑兵部队服役，这些部队的任务是强化占领区前线的警察系统。他们开展“平叛”，“肃清行动”，屠杀游击队、平民以及他们的主要目标——犹太人。他们的领导人获得了希姆莱的允许，在腐败、勒索以及抢掠的基础上过着奢侈、放荡的生活，其中最著名的罪犯之一就是比彻的上级赫尔曼·费格莱恩，他后来成了希特勒的妹夫。

1941年7月，比彻所在的部队在乌克兰的普里皮亚特沼泽执行希姆莱的“灭绝该地区‘种族低劣’居民”的命令。费格莱恩还补充道：“社会主义者要被公开绞死，有嫌疑的平民要被枪决，犹太人则要被隔离、枪杀或者溺死于沼泽之中。”大约14000名犹太人死于非命。8月，比彻被任命

为费格莱恩的副官，后来，比彻声称，他从来多没有参与（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屠杀行动，这很难令人相信。因为他在成为费格莱恩的副官前不久是一个负责“清理”沼泽的骑兵团的副排长，而成为副官后，他的职责包括传送行动命令以及报告行动结果。埃门根怀疑比彻“不仅仅只是一名帮凶，而是屠杀成千上万犹太人的积极参与者”。

比彻在匈牙利于1944年3月19日被占领之后不久作为纳粹“经济参谋”的主任来到了这里，他的下属包括麦克斯·古森、赫伯特·加托茨、以及卡尔·格莱鲍。在职务上，他负责为纳粹购买军事装备以及战马，不过希姆莱还赋予了他秘密的特殊权利。他的主要任务变成了依据纳粹的利益而剥削犹太人，而这也是一个能够让他中饱私囊的机会。比彻能够与希姆莱直接取得联系，他经常会通过希姆莱对抗与自己时而合作时而竞争的艾希曼，比彻通过为纳粹获得“曼菲尔德·维斯工业帝国”而深得希姆莱的宠信。

曼菲尔德·维斯公司是匈牙利最大的工业中心，由包括犹太人、皈依派、非犹太人的大家庭所有。通过一系列威胁、强迫、勒索以及虚假的承诺，比彻使公司的所有者将大部分股权移交给纳粹，由他自己主管，而他也与爱人赫敏·布雷吞伯爵夫人搬进了最奢华的一座维斯别墅。作为交换，1944年6月，维斯家族的9名成员去了瑞士，32名成员去了葡萄牙，还有5人被扣留在维也纳当做人质以保证交易的真相继续被隐瞒。在比彻的这个阴谋中，主要是由公司的主席、高级主管之一——费伦茨·科林博士进行斡旋的，他后来也参与了营救我们的交易。比彻后来声称，他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公司的拥有者而保护这家公司，但当苏联军队开向布达佩斯的时候他却将所有能够移动的值钱物品全部运到了德国。

霸占了曼菲尔德·维斯公司后，比彻开始构思更多勒索的方法。在副官们的帮助下，他建立了一些工厂，工厂里有布达佩斯最知名的工匠，工





匠们分文不取，但可以获得保护许可证。此外，大约 50 个富人被他加入到卑尔根 - 贝尔森群体的名单之中，其中，每个人向他行贿 1000 美元。

1944 年 10 月，比彻被任命为匈牙利 - 德国联合“撤离部队”的主任，任务是将战略重要物资转移到苏联军队的接触范围之外。按照他的命令，1200 列火车、370 只船、63000 辆汽车与卡车将钢铁、原材料、机器以及其他货物运到奥地利和德国，一部分货物被运用到了德国战争工业之中，但有证据显示，他计划将剩余的部分为自己在战后建立大型的工业生产装置做准备。除此之外，比彻还抢占了匈牙利银行的大量现金与黄金，夺取了几家博物馆的艺术珍品。

随着第三帝国江河日下，比彻需要解决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即如何掩盖他参与的纳粹罪行和如何处理他收到的“瓦达”为卑尔根 - 贝尔森群体而支付的赎金。这时，摩西·舒威格出现了。1944 年，舒威格从匈牙利被驱逐到了毛特豪森，到 1945 年，饥寒交迫的他已经濒临死亡，4 月 27 日，他被集中营的长官召见。在长官的办公室里，一个他不认识、平民模样的人悄悄地告诉他自己“为他做点什么”。后来，舒威格被转移到一个更加舒服的宿舍，有了充足的食物，囚服被换成了平民的衣服。5 月 4 日，他被一辆汽车带到多瑙河附近的瓦尔德泽的一座小镇，再次见到了那个平民，也就是比彻。比彻向他解释自己将其从毛特豪森集中营中救出来是为了送给“卡斯特纳博士一个私人礼物”。他们一起去了比彻与他的手下居住的萨尔茨卡默古特地区魏森巴赫附近的一个狩猎小屋。在路上，比彻称赞起了希姆莱：“如果您有幸与党卫军元首面对面，您就会知道他是一个多么好的人。”

5 月 8 日（恰巧是二战的欧洲胜利日以及我的 12 岁生日），舒威格给“同盟国占领区的所有军民当局”写了一封详细的信。在信中，舒威格将自己描述为“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处委员会”以及“犹太复国主义 - 社会主

义世界协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并说比彻“长时间地致力于保护、挽救犹太生命”。此外，他还补充道，比彻与他的手下（全部都列出了名字）“都做出了极大的自我牺牲而发起、开展了许多真正的营救工作”。这封信显然是在比彻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写的。

一天后，比彻给舒威格带来了两个手提箱，里面是6个装着28个满是贵重物品的袋子的铁盒。比彻解释道，这就是他承诺返还给卡斯特纳的用于我们卑尔根-贝尔森群体的所有赎金，接着，他丢掉那6个盒子，将袋子放进了手提箱。比彻要求舒威格将手提箱带到瑞士，不过，5月24日，舒威格由于害怕被控抢劫而将手提箱交由美国反间谍机关CIC 215的一名犹太上尉保管，这名上尉转手就将手提箱提交给了他的上司。

10月，舒威格在日内瓦见到了卡斯特纳，他们一起告知犹太事务处，一笔估价800万瑞士法郎（或者200万美元）的资产被收了回来，并呈请美国当局将这些资产移交给犹太事务处。在一封写给CIC 215的信中，他们将那笔资产描述为“黄金、香烟盒、手表、珠宝、白金、便戈、美元、金币”，不过这次，他们将这笔资产估价为820万瑞士法郎。联合会的秘书长李维特催促美国国务卿归还这笔资产，却没有得到满意的回复。

5月24日，在魏森巴赫狩猎小屋的一张床下，CIC发现了一笔数量更大的黄金、白金、珠宝、货币以及金牙，这一定是来自某个集中营。6月末，5名曾经与比彻一起去过萨尔茨卡默古特的匈牙利犹太人将另一笔资产交给CIC进行保管。美国当局将这两个发现以及舒威格托付的两个手提箱视为“已放弃产权的财产”。比彻从未因此事而接受询问，最终于1946年将这些东西存到了萨尔茨保（奥地利的城市）的两家银行。

在联合会的压力下，美国国务院终于决定将从舒威格那里收到的资产交付给犹太事务处。1947年3月，犹太事务处的两名代表达果柏·阿里安与梅尔·本兹·梅尔力从奥地利的银行里取出了那28个袋子并带回瑞士。





当袋子里的东西最终到达巴勒斯坦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些东西仅值 65000 美元，而非“瓦达”估计的 200 万美元。比彻说他已经将所有的赃金交给了舒威格，卡斯特纳也证实了此事，阿里安坚持认为比彻偷走了大部分资产而误导了舒威格对那些资产的价值。历史学家罗纳尔多·茨威格提到了产生差额的两个可能的原因，即“通货膨胀与匈牙利的货币改革”和“当贵重的个人物品作为赃物而堆在一起时不可避免产生的贬值”，不过他还补充道，这只能解释部分的差额，至于剩余的差额是如何产生的，我们也许永远无法找到原因。

在将手提箱交给舒威格不久，比彻于 5 月 12 日被奥地利自由战士抓获并被移交给美国军队。他在纳特恩堡与奥伯乌尔泽尔的拘禁营中度过了接下来的 6 个月，当他被送到布达佩斯为审判匈牙利法西斯者作证的时候，他生怕落入苏联手，但最终还是成了美国的阶下囚。1946 年 1 月，比彻被 CIC 上尉理查德·古特曼审问了两周，他怀疑比彻是一名战犯，却没有足够的证据起诉他。同年，美国希望将比彻的罪行定为谋杀，第二年，同盟国控告比彻在布达佩斯与毛特豪森犯下刑讯的罪行。匈牙利方面要求其引渡，却遭到了美国的拒绝。美国准备用这件事和毛特豪森发生的事情一起起诉他，不过到 1948 年审判开始的时候，他们已经对他失去了兴趣，对他到匈牙利前可能参与的暴行全都充耳不闻。1952 年，瑞士警察拒绝了他的入境申请，1961 年，以色列的首席检察官规定，只要他进入以色列，就会被立即逮捕。20 世纪的 60 年代，一个慕尼黑的特别法庭指控比彻参与了普里皮亚特沼泽的犹太人屠杀事件，甚至到 1982 年，他还被不来梅的一个法庭控告谋杀，不过这两个案件都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而不了了之了。

从卡斯特纳的角度来看，对比彻最重要的一次调查是在纽伦堡的德国第四去纳粹化法庭上。汉堡刑警将比彻认定为“一个自负、野心勃勃的纳



粹，一个为了自己利益而可以随时不守承诺的人”，不过没有证据表明他参与过任何“犯罪行为”。在他的爱人与律师的帮助下，比彻得到了50份从他的商业伙伴、前纳粹同事手中得到的旨在美化他的人格的书面试词。在这些伪证中，比彻是一个诚实的男人，总是准备帮助别人，而不管需要帮助的人的国籍、种族如何。他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犹太人，没有因为他的人道主义行为而得到任何物质回报。其中最具决定性的证词是由卡斯特纳于1947年8月提供的。

卡斯特纳在写下证词不久前看望了被关押的比彻。在美国的情报官员库尔特·彭格对比彻进行审讯的时候，卡斯特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彭格的审讯记录中显示，有些时候其实是卡斯特纳在教比彻如何讲话，特别是卡斯特纳通过一些暗示，使比彻“记起了”1944年12月挽救了布达佩斯隔离区10万个犹太人。根据这个可疑的回忆，德国守备部队指挥官卡尔·菲费尔通过电报请示希姆莱“如何处理箭十字党准备清理隔离区”的决定以及如何执行“纳粹在撤离时不留犹太活口”的惯例。希姆莱就此事与比彻商议，比彻回答道：“不要让犹太人出任何事。”希姆莱便下达了命令，挽救了隔离区。

比彻于1948年初被释放。根据美国调查部主任瓦尔特·拉普的回忆，美国取消了对比彻的控诉完全是卡斯特纳求情的结果。卡斯特纳对比彻的证词即使不是他们决定释放比彻的唯一原因，也一定是主要原因。1948年7月，卡斯特纳在一封写给犹太事务处财务主管埃利泽·卡普兰的信中描述了自己努力的结果：“库尔特·比彻是一名前纳粹上校，在营救事业中是我与希姆莱的联络官。由于我的私人介入，他从同盟军队控制的纽伦堡监狱中被释放了。”卡斯特纳即将为他这样的吹嘘付出沉重的代价。

战后，比彻抓住一切机会将自己美化成犹太人的救星。1945年至1948年，当他被囚禁在美国时，不论是在非正式的谈话中还是在正式的陈述



中，他都声称是他劝服了希姆莱下达一系列拯救成千上万犹太人生命的命令。他的一些最生动的陈词出现在1961年对艾希曼审判的证词中。以色列当局拒绝为比彻提供安全通行证，于是他谢绝了耶路撒冷的邀请，而在不来梅的一名法官面前回答了许多书面问题。但由于缺乏证据，人们很难从他牺牲艾希曼而为了澄清自己进行的夸大、曲解以及谎言中得到真相。他声称自己从“瓦达”手中敲诈得到的钱财都是为了以此为理由去劝说希姆莱，那个虚假的“卡车换生命”的谈判能够为他提供帮助犹太人的机会，其实他“早就清楚这根本不是一个认真的提议”。他还虚伪至极地解释了自己明明知道“瓦达”是虚张声势却仍要欺骗希姆莱的原因：“我为了保护犹太人以及政治受迫害者进行的努力就是我假装希望进行这些交易的原因，我将这些交易视为为这些人从希姆莱那里获得让步的唯一机会。”

比彻对自己的行动的叙述就像卡斯特纳做出报告的映像，他声称，正是由于他“一再跟希姆莱坚持运送必须继续”，卑尔根-贝尔森群体才能被释放，这也许是真的，但他的其他故事并不可信。对于他于1944年8月21日与梅耶谈话而产生的结果，比彻写道：“我提交报告后，希姆莱就立即下令停止犹太人在匈牙利的驱逐。”10月或者11月，他声称自己成功地使希姆莱下达了结束大屠杀的指令：“立竿见影，我阻止了所有犹太人的灭绝行动，而且我还下令照顾弱者与病人。”他还声称11月“停止将犹太人通过步行押送到奥地利”也是“他通过希姆莱而产生的成果”，而且他说服希姆莱于12月向不情愿的艾希曼重申他禁止驱逐的命令：“如果到现在为止，你已经灭绝了犹太人，那么从现在开始，我命令你必须将犹太人培育出来。”最后，他还将1945年春天几所集中营的和平投降、2万名幸存的囚犯被同盟国解放作为他操控希姆莱的另一项成果：“在战争的最后几周里，我为保护集中营的囚犯而采取的措施同样应该被视为我对艾希曼施加的影响的成果。”比彻对希姆莱的影响很可能在这些事件中起到了作



用，不过正如我之前说的，他只是许多因素中的一个而已。

比彻的证词中最令人反感的还是他坚称自己与匈牙利犹太人的交易完全出于人道主义的动机。我们暂且不管他在东部前线做过什么或者没做过什么，他在匈牙利进行的敲诈就不是营救那么简单，而卡斯特纳也列举了比彻无数次威胁和恐吓他们的例子。虽然艾希曼绝不是一个可信的证人，但他宣称比彻曾催促他加快驱逐的速度以制造紧张的气氛而使自己能够“更加自然、更加快速”地掠夺犹太人，这或许就是事实。比彻的确救了许多犹太人，但其动机绝不可能高尚。

第十三章 审 判

悲剧开始

直到 1947 年 12 月，卡斯特纳才与他的妻儿移民到巴勒斯坦。他曾认为欧洲是他追回被德国人偷走的犹太财产、继续追击艾希曼的有利基地，而且他希望为遭受谴责的自己讨一个说法，然后再以英雄的姿态去一个新国家。起初，一切看起来还算美好，报界“热烈地欢迎”了他，工党的领导层考虑对其委以重任，他与本·古里安海进行了十分友好的交谈，犹太事务处也比他自己想象的更加热情地支持他参与到纽伦堡审判中。卡斯特纳身无分文，因此不得不从妹夫皮萨齐·鲁吉克那里借钱住在特拉维夫（以色列的城市）的单间中。当一些朋友组织了一次捐款后，他就住进了更加舒适的住所，起初在阿姆斯特丹大街，然后在伊曼纽尔六号，这也是他最后的住所。

虽然卡斯特纳从来没有变得富有，不过他很快成了工党政府的高级官



员。从1949年开始，他便成了供给部、运输部以及工商部公共关系的负责人，还是匈牙利语报纸《新东方》的编辑以及一个匈牙利广播节目的负责人。他两次差点被选进以色列议会：1949年，工党赢得了46个席位，不过他是候选人名单上的第59位，1951年，当工党赢得45个席位时，他是第53位。

之后，一个升级到法庭争辩的看似可笑的诋毁不仅毁了卡斯特纳，还震撼了以色列国家的根基。事实上，“卡斯特纳审判”（这么叫其实不太准确）被证明是以色列发生的最轰动、最具争议的事件，包括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

使“卡斯特纳审判”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是它迫使以色列国民第一次公开地正视大屠杀以及大屠杀对他们产生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以色列社会最深的鸿沟之一变成了公开的冲突。简单地说，那些在战争前就定居在巴勒斯坦、远远地看着大屠杀的犹太人无法忍受欧洲的犹太人竟然允许纳粹“如羔羊般地屠杀他们”，欧洲的幸存者则挣扎着克服失去挚爱的悲伤以及身心受到的折磨。除此之外，他们还深深地内疚，既有当别人遇到危险时自己却无法提供帮助的内疚，也有死了那么多人他们自己却仍然幸存的内疚。这种心理折磨逐渐升级到了表面，那些拥有特权的政党、团体以及个人则导致了其他人对他们的报复情绪，如耶奇姆·韦茨所述，结果便是“真正的罪恶感伴随着为了政治以及个人目的而巧妙利用这些情绪”的混合大爆发。

那一连串不幸事件是由一名72岁的匈牙利犹太人马尔凯尔·格鲁恩沃德引发的，他是传统米兹腊希党派的活跃分子，并于战争爆发两年前从维也纳移民到巴勒斯坦。他曾经是一名记者，现在在耶路撒冷经营一家小旅馆，他的儿子死于1948年的以色列独立战争，女儿是斯特恩帮（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恐怖组织）的成员，死于自杀，其他的家人则死于大屠杀。他最喜爱的休闲活动便是写作、油印以及私人散布一系列叫“致

我在米兹腊希的朋友们”的宣传册以大范围地攻击公共人物和政策、搜寻真实的或者想象的犯罪及腐败，主要针对工党。汤姆·塞格夫将格鲁恩沃德的作品描述为“图谋恢复那些被遗忘的冲突、旧怨以及尘封丑闻的政治评论”。卡斯特纳就成了格鲁恩沃德于1952年夏天出版的第17期简报上的攻击目标。

格鲁恩沃德是一个不知节制的人，他公然高调地开始了他的谩骂：“我亲爱的朋友们，一具尸体的恶臭刺激着我的鼻孔！这将是 he 最合适的坟墓！卡斯特纳必须被杀死！三年来，我一直在等待机会揭开这个通过希姆莱的打劫和谋杀而羽翼丰满的野心家的真面目。由于他的犯罪阴谋以及与纳粹的合作，我认为他参与了对我们至亲至爱的屠杀。”他坚称，卡斯特纳“仅仅救出了他的52名亲戚”，“数百名其他犹太人（其中大多数人都皈依了基督教）则是通过支付数百万瑞士法郎才获救的！”将“成千上万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留下等死，卡斯特纳“解救了工党的成员”以及“拥有社会背景的人们”，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牟取了暴利”。他帮比彻洗脱罪名是为了确保他的这位犯罪同伙不会“将他们联合抢劫的行为泄露给国际法庭。”

起初，没有人注意格鲁恩沃德的谩骂，不过，对一名政府高官的中伤就相当于对政府的中伤，而且大选正在日渐来临。查姆·科恩是工党政府的首席检察官兼任司法部长，他准备起诉格鲁恩沃德，卡斯特纳将成为诉讼的主要证人。科恩以为能够轻松地获胜，要是他当时能够预知最后的结果，也许会听从别人的建议而不惹这个是非。

卡斯特纳自己则犹豫不决，他要求科恩不要管这件事。卡斯特纳去世十年后，他的妻子伯格幽在一次访问中说：“卡斯特纳不想进行那次审判，不过他的处境十分艰难……他被告知，要么同意参与政府提起的这场诉讼案件，要么自动辞职……我告诉他，‘辞职！’不过，他说他别无选择。”与此同时，卡斯特纳的内心也想反击。在他的朋友德兹索·赫尔曼的劝说





下，卡斯特纳也希望抓住这个机会名垂青史。伯格幽的堂兄里夫卡·巴尔约瑟夫认为卡斯特纳将这个案子当作“恢复他英雄与圣人地位”的方法。根据卡斯特纳的妹夫皮萨齐·鲁吉克的描述，卡斯特纳渴望像民族英雄一样走出法院。韦茨根据自己的理解，相信“他的冒险精神以及对于站在聚光灯下的渴望在他的内心中占据了优势地位，他将这次审判视为摆脱作为政府部门发言人的单调工作而获得他应有地位的机会”。1953年5月25日，诉讼开始了，案件号为124/53，于1954年1月1日在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开庭。

法官是40岁左右的本杰明·哈莱维，他是一名出生于德国的以色列人。几个月前，在一个军事特别法庭上，他严厉地判决了15名被控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年轻激进分子。这样的判决导致了右翼的公开反对，他们谴责他是在讨好工党。1953年12月，在升任最高法院法官失败后，他威胁首相本·古里安要辞职，但被本·古里安劝服了。1954年，他再次错过了被任命为最高法院法官的机会。1961年，他是审讯阿道夫·艾希曼的三人专门小组的一员，并在两年后如愿成为最高法院法官。1969年，他成为以色列议会的一员，代表右翼的利库德集团，1977年离开议会，最终死于1996年。

代表政府起诉格鲁恩沃德的是公诉人耶路撒冷地方法院的助理法官阿姆农·泰尔，他缺乏经验，并且没有准备好接下来要面对的事情。1954年6月1日，首席检察官科恩也亲自出马，不过这两个人都被证明不是辩护律师施穆尔·塔米尔的对手。

塔米尔生于以色列，30岁出头，是一名右翼激进分子，也是一个具有才华、不会感到良心不安的辩护律师。塔米尔来自一个修正主义者家庭，在帮助建立赫鲁特党（之后成为梅纳赫姆·贝京领导的利库德党的一部分）前曾是暴力的伊尔根集团的一员。塔米尔极其反对工党，而工党的领导人本·古里安则是他最为憎恨的人之一。直到这次审判的时候，塔米尔

一直是一名政治律师，他已经辩护了各种各样的右翼案件。用塞格夫的话来说，“他是一名狡猾的政治家，同时还是一名有敏锐的眼睛、锋利的语言、渴望戏剧性大阴谋以及媒体关注的律师。”在强烈的政治野心的驱使下，塔米尔希望搞垮工党政府而在不久的将来领导右翼的大以色列。他没能实现那个目标，不过他在法庭上的表现对工党统治的结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还帮助他于1969年被选入议会，1977年被任命为贝京政府的司法部长。他死于1987年。

当格鲁恩沃德请求塔米尔为他辩护的时候，不管是案件本身，还是穷困的委托人当作律师费的邮票，他都不感兴趣，他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在接这个案件时，他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他必须可以完全自由地进行辩护，二是他必须被允许将诽谤的案件扩大为对伊术领导人在大屠杀中表现的调查。

诉讼升级

经过两次延期后，审判于1954年2月18日正式开庭。在三天里，卡斯特纳表现得沉着、自信、骄傲，他将自己取得的成果再次叙述了一遍，从解救卑尔根-贝尔森群体说到将集中营和平移交给同盟国，接着，他又列出了德国人给予他的特权——免于佩带黄色之星，允许使用电话，有权旅行，这些都使他的营救任务变成可能。他显然很喜欢成为众人注意的焦点，使法官大受感动，他甚至询问格鲁恩沃德是否要撤销他对自己的指责。不过塔米尔的盘问扭转了整个局势。

一开始，塔米尔就将卡斯特纳当作被告，作为证人的卡斯特纳却无法





实施被告的正当辩护的权利。明确卡斯特纳最脆弱的地方后，塔米尔开始攻击他偏向比彻的作证。卡斯特纳解释道，在1945年至1948年，他在伦敦和纽伦堡为审判战争犯罪提供证词，或者将他自己夸张地形容成“有关犹太灭绝的顾问”。不过，他拒绝了塔米尔的指控：“我没有在纽伦堡提供偏向比彻的证词，也没有给国际法庭以及任何机构或官员提供这样的证词。格鲁恩沃德在宣传册中说我去纽伦堡营救比彻完全是一个谎言。我在纽伦堡的时候，针对比彻进行的德国去纳粹化法庭邀请我为他们提供关于比彻的证词，我拒绝了。我不想在任何德国人面前出现，在战争中我已经受够了德国人。不过，我同意为他们提供宣誓书。说我帮助比彻逃脱了纽伦堡的惩罚，这根本就是无中生有。”

在第二天的盘问中，塔米尔质问卡斯特纳“宣誓书”的内容到底是对比彻有利还是有害。卡斯特纳回答道：“既不有利，也不有害，我只是试图说出真相。”当卡斯特纳断言他的证词绝不会对释放比彻起决定性的作用时，塔米尔反驳道：“我告诉你，正是由于你的干预，比彻才从纽伦堡的监狱中走出去。”卡斯特纳咆哮道：“这是恶毒的谎言！”这时，塔米尔展示了卡斯特纳于1948年写给埃利泽·卡普兰的信件，在信中，卡斯特纳将比彻被释放描写成“由于我的私人介入”。搪塞一番后，卡斯特纳承认“信中有些自夸”，因为当时比彻曾经提出“将一些犹太财产移交给以色列国家”，而他希望卡普兰能够认真地对待这个提议。承认“在信中用词不慎”后，卡斯特纳继续否认任何帮助比彻的企图。

严格来说，正如另一个案子所显示的，卡斯特纳并没有说谎。1955年7月，塔米尔控告卡斯特纳犯有伪证罪，该案受理于耶路撒冷的治安法庭，为卡斯特纳辩护的是一个更有能力的律师米夏·卡斯比。卡斯比坚称，卡斯特纳并没有在地方法院说谎，因为他为比彻提供做的宣誓书是给德国去纳粹化法庭的，而非国际军事法庭。1956年3月16日，法官摩西·皮瑞泽宣布卡斯特纳无罪。不幸的是，那时地方法院的法官哈莱维已经宣布了

他那毫无根据的裁决。

在主审判中，卡斯特纳写给卡普兰的信件就已经被公开了，不过在辩论达到高潮的时候，塔米尔成功地让这封信看起来像一个重大的新发现。至于卡斯特纳，好像是没能够掩盖他曾经炫耀的东西，人们对他的印象糟糕极了：一名以色列高官使一名德国战犯免于他应得的惩罚，并且在宣誓时撒了谎。这就是审判的转折点。从现在开始，哈莱维不再相信卡斯特纳说的话，并总结道，如果卡斯特纳在帮助比彻的问题上撒了谎，那么他一定对许多甚至更加严重的罪行也撒了谎。

塔米尔无情的盘问继续着，卡斯特纳的自信消失得无影无踪。巨大的压力使他变得虚弱，法官几次打断诉讼而让他休息。在法庭外，这是右翼媒体重要的一天，其中最活跃的叫嚣者当属塔米尔最大的盟友乌里·阿福内里了，他最擅长煽动人们对当局真正或者所谓的恶性指责。事到如今，塔米尔已经公开宣称他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保证格鲁恩沃德被无罪释放，而是审判卡斯特纳、犹太事务处和工党。事实上，他此时已经将卡斯特纳当成了“被告”。起初，卡斯特纳自信地抗辩，希望最终获得他认为应得的认可，但现在，事情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如塞格夫所述，“他大发脾气，咆哮，变得慌乱不安”。

本次诉讼最大的错误就是邀请那些对卡斯特纳的任务知之甚少的知名公众人物来指控格鲁恩沃德，而没有邀请那些曾经真正帮卡斯特纳挽救生命的人作证。证人席中最知名的要数三个伞兵中的唯一幸存者乔尔·帕尔基了，帕尔基被视为民族英雄，不过他自己一直对在匈牙利的失败感到内疚，因此他对卡斯特纳的态度非常矛盾。据塔米尔所述，卡斯特纳曾为了救出自己的亲人而将帕尔基和哥德斯坦交到盖世太保手中，帕尔基则在卡斯特纳的影响下与盖世太保合作。帕尔基力图消除这些指控，却陷入了对卡斯特纳极为不利的矛盾织网。

这几位伞兵的命运尤其碰到了以色列的痛处。三名年轻的犹太人飞到





德国占领的欧洲反抗纳粹，这简直就相当于马察达宁愿选择集体自杀而不为罗马人奴役的反抗，相当于华沙隔离区的囚犯誓死抵抗德国人，相当于在巴勒斯坦与英国战斗的军事团体。所有这些选择反抗的犹太人都被视为那数百万温顺地走进毒气室或者试图与纳粹妥协的人的鲜明对比。汉纳·扎尼斯仍然被奉为犹太烈士而受人尊敬，哥德斯坦却几乎已经被人遗忘了，帕尔基的形象也变得有些暗淡了。不管怎么样，帕尔基那令人糊涂的证词没能证明卡斯特纳并没有背叛他们。

另一个更加没有帮助的关键证人是乔尔·布兰德。虽然他原本打算驳斥格鲁恩沃德的指责，但他的整个证词损害了卡斯特纳。这或许是一种他自己所处困境的反应，而不是故意要伤害卡斯特纳。布兰德的处境困难，幻想都已破灭了。他在以色列的生活没有实现自己的任何期望，他的脑中还经常为伊斯坦布尔任务的流产而纠结。在他任务失败后，卡斯特纳却取得了一些重大的成功，还趁他被囚禁在中东的时候和他老婆偷情。布兰德不仅没有客观地陈述卡斯特纳的成就，反而狠狠地攻击了这个与他坐同一条船的“敌人”。更严重的是，他还说犹太事务处的领导人故意让他在叙利亚被英国人逮捕，就是为了让他们自己讨好强大的殖民国家。布兰德的妄想跟帕尔基的含糊其辞一样，都没能帮到卡斯特纳。

致命一击

休庭后，审判于1954年6月1日继续进行。与第一次自信的陈述，此时的卡斯特纳变了很多。正如一份报纸报道的那样，“他脸色苍白，看起来就像是久病卧床后一般，声音变得柔弱、无力。”不过，塔米尔毫不留

情，继续就比彻的审判而指控卡斯特纳：“你不仅从纽伦堡的国际法庭上拯救了比彻，还为德国的去纳粹化法庭提供了一份宣誓书而使比彻逃脱了惩罚。”卡斯特纳回答道：“不！那不是真的！”接着，塔米尔挖了一个陷阱：“卡斯特纳博士，从国家的角度上看，偏袒一位纳粹军官并且使他被释放，你是否同意这是一种犯罪行为？”卡斯特纳回答道：“我的回答是‘同意’，从国家的角度来讲这确实是一种犯罪。”休庭期间，塔米尔找到了卡斯特纳于1947年8月14日提供的宣誓书。让卡斯特纳承认这样的罪行后，塔米尔向法庭宣读了这份控诉文件。卡斯特纳还没有从这样的打击中回过神来，塔米尔仍然继续他那无情的攻击：“你已经同意一名犹太官员对一名纳粹高级军官，包括比彻，进行偏袒性的干预是一种叛国犯罪，而我们现在看到你就是这样做的，那么你承不承认你也就是一名叛国者？”卡斯特纳无力地回答道：“那只是你的看法。”很明显，卡斯特纳已经输掉了这场比赛。

卡斯特纳帮助了一名纳粹战犯，这真够坏的，如果他在法庭上不是以证人的身份出现的，依据以色列于1950年颁布的《纳粹及纳粹勾结者（惩罚）条例》，他会被起诉，甚至可能被判处死刑。不仅如此，他还以最高犹太组织代表的身份签署了宣誓书，我们并不十分清楚他为什么会这么做。韦茨认为，他“冠以自己不同的头衔，包括一些他无权炫耀的头衔，是为了助长他的重要性”。卡斯特纳自己则宣告，如果他有先见之明，当时就不会使用这些头衔了，不过他还声称他得到了相关官员的许可：“在去纽伦堡之前，我与犹太事务处和犹太世界代表大会的人一起讨论如何处理对纳粹尤其是参与过犹太人灭绝的纳粹的审判，以及少数获得纳粹帮助的案件。那时，我尤其提到了比彻，法庭也知道我对比彻的看法。我问：‘假如我需要在比彻的问题上提供我个人的看法，我是否可以不仅仅以自己的名义，同时还可以以犹太事务处或者犹太世界代表大会的名义？’我得到的是肯定的回答。”





卡斯特纳以上叙述中所提到的“人”是犹太事务处的查姆·巴拉斯、艾利胡·多布金以及世界犹太代表大会的莫里斯·珀尔兹维格、吉尔哈特·里格纳。这时，多布金就在法庭上，但他否认曾经听说过比彻。

轮到首席检察官代表控方开始盘问了，卡斯特纳已经彻底丧失了意志。汉斯·布兰德回忆道，卡斯特纳一直“坚持了过来”，直到他不得不面对他的那份倾向于比彻的宣誓书，那时他“彻底失去了自信”，他试图改变说法，但又想坚持自己的原则：“我认为我没有以绝对诚实的态度来提供证词，在这样蛊惑人心的盘问的压力下，我说出了一些我感到十分抱歉的事情，不过这并不会改变我的基本态度。”不过此时，在哈莱维的眼中，卡斯特纳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甚至更糟。接着，将卡斯特纳至于这番境地的塔米尔开始了最后一击。

塔米尔声称，卡斯特纳于1944年5月3日来到科罗日瓦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有关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事情，但为了使艾希曼承诺释放一些VIP人士而故意不告诉犹太社区。卡斯特纳的沉默使那里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有了错误的安全感，并使他们自愿登上开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列车而没有反抗或试图逃跑。塔米尔传唤了许多证人。很多人来自科罗日瓦，他们在死亡集中营中失去了亲人并且几乎丧命，他们一致谴责卡斯特纳将他们蒙在鼓里或者误导他们。雅各布·弗雷菲尔德就声称，犹太领导人为了解救自己而眼睁睁地将他的家人送入地狱。耶吉尔·施姆利证实道，犹太人登上列车而没有反抗是“因为我们一直被告知要被送往加耶梅佐工作”。大卫·罗子纳尔说，如果卡斯特纳战后“在街上出现过的话”，那他“早就被杀死了”，因为“他使犹太人错误地相信了德国人的好意”。在所有的证词中，用韦茨的话来说，卡斯特纳“被描述成一个无情的机会主义者，在社区中具有威望的他非但没有保护社区成员的生命，反而为了自己的家人和朋友而将他们拱手交给了死神”。

塔米尔的一个关键证人是摩西·克劳兹，他利用自己的证词报复了卡

斯特纳、工党以及犹太事务处。他声称，卡斯特纳起初的意图或许是好的，不过之后他想成为犹太社区统治力量的野心使他变成了一个纳粹的勾结者，而释放卑尔根-贝尔森群体只是狡猾的德国人用于隐瞒犹太大众关于奥斯维辛的真相、挑拨犹太领导人的阴谋诡计。当卡斯特纳即将实现自己的目的时，他变得狂妄自大，失去了良知，不考虑他人。他还说，他已经找到了解救犹太人的更好方法。他确实在鲁茨、沃伦伯格以及来自中立国家的其他外交家的大规模营救计划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我们必须知道，克劳兹和卡斯特纳是竞争对手，并且克劳兹曾因为他非常规的手段而饱受抨击。

塔米尔的主要证人是汉纳·扎尼斯的母亲加托，她在战后移民到以色列。加托陈述道，她每次试图与卡斯特纳见面、恳求他帮助汉纳的时候，都会被他的秘书赶走。塔米尔利用汉纳的传奇身份来丑化卡斯特纳。与那些试图通过妥协和缓和苟且偷生的犹太人，塔米尔称赞汉纳是“一个准备战斗与牺牲的真正的以色列人”。用韦茨的话来说，塔米尔随意却有效地利用汉纳的“奉献、自我牺牲、英雄主义的象征”来攻击卡斯特纳是个“阿谀奉承、通敌卖国的代表”。

格鲁恩沃德的证词也和他的宣传册一样充满了仇恨与愤怒，证词的大意与塔米尔的策略完全相符，不过他那将真正的痛苦与执著的夸大其词进行的糟糕混合完全是他自己的风格。他哀悼自己那52名在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和奥斯维辛集中营中被毒气屠杀的亲人时看起来似乎很真诚，他对卡斯特纳的指责却将其典型的夸大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根据我的调查，我确信帮纳粹实施历史上最邪恶的犯罪的人就是卡斯特纳。”简而言之，格鲁恩沃德的证词和人们能够预料的那样无法使人信服，却对塔米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证人做完证后，塔米尔又进行了冗长的总结。总结开始于概述“一个像卡斯特纳这样有缺点但充满才华的理想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如何堕落





成纳粹领导人忠诚伙伴的”。他还着重提出，卡斯特纳于1944年5月从科罗日瓦隔离区中选出的被解救的群体，其他所有人则全部被驱逐。卡斯特纳为了解救380名他的朋友与亲人而牺牲了2万名犹太人，这个群体的获救正是艾希曼要求卡斯特纳向犹太大众隐瞒他们的真正目的地的代价，从而使其他犹太人被送到毒气室前不反抗。这就是“卡斯特纳的通敌卖国”如何灭绝这些人的理由。

从心理学家的角度，塔米拉声称，卡斯特纳“期望成为权贵之人、犹太领袖的病态野心”正是导致“他的迷失、谎言和可怕罪行”的原因。他承认，直到1944年5月，卡斯特纳总体来说还是好的：“虽然他是一个利己、狡猾的家伙，不过基本上他的目的还是解救犹太人。”当艾希曼给了他解救“重要人士”的机会时，这位“来自克鲁日的小记者”便将他的野心置于信仰之上。他接受了艾希曼的提议，而艾希曼正是在他的帮助下而灭绝了成千上万个犹太人。驱逐开始于5月中旬，从那时起，卡斯特纳“越陷越深，他的罪行也开始日益增长”。最终，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卡斯特纳成了纳粹的代理人、信任的盟友及辩解者。

接着，塔米尔再次利用卡斯特纳和比彻的关系进行了毁灭性的指控。在卡斯特纳自己那令人遗憾的含糊其辞的基础上，塔米尔宣称，“帮助大屠杀的凶手之一——比彻逃脱审判，卡斯特纳无耻地试图掩盖自己的罪行”。他还提醒法官注意卡斯特纳做伪证的事，“他与他的同伙们阴谋一起向法庭、向整个世界隐瞒历史真相”。考虑到“卡斯特纳与纳粹凶手们勾结是罪大恶极的事”，塔米尔要求法官对卡斯特纳“依据《纳粹及纳粹勾结者（惩罚）条例》（一部允许死刑的法规）进行审判”。

实际上，与格鲁恩沃德和卡斯特纳相比，塔米尔还有更大的指控目标。塔米尔公然宣称：“虽然我在这里是为了证明卡斯特纳的罪行，不过我要说的是，我们自由犹太世界的领导人应该承担比他更严重的责任。”塔米尔利用他那高超的技巧将为他那无足轻重的客户进行的辩护变成了针

对以色列当局的攻击，通过类推，他将格鲁恩沃德谴责的对象扩大到了战时巴勒斯坦犹太领导人身上。他声称卡斯特纳堕落的责任并不只在他身上：“卡斯特纳加入了当时被其他组织包括犹太事务处和 JDC 而发展起来的毁灭体系，这种体系压制大屠杀消息的流传、禁止人们反抗、并且直接协助德国人。”正是“这种体系才不可避免地使卡斯特纳变成了一个纳粹的代理人”。

当然，塔米尔引进的“体系”一说并不是要洗脱卡斯特纳的罪名。以下是法理学家阿什·毛茨对该情况进行的总结：“与塔米尔希望利用卡斯特纳攻击伊术领导层一样，本次对于格鲁恩沃德的起诉也并不只是希望给格鲁恩沃德定罪。通过为卡斯特纳澄清，他们也同样可以澄清伊术领导层所遭受的非议。”这样，双方都在根据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卡斯特纳，不过塔米尔显然占了上风。

在大屠杀中，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区用复杂的情感注视着欧洲的情况。随着种族灭绝的流言渐渐变得清晰起来，他们感到恐惧与怜悯，但同时也蔑视那些要么试图藏匿逃生（这种方法经常以失败而告终）、要么如同“待宰羔羊”般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同胞们。最令人钦佩的例子要属华沙隔离区的囚犯了。面对强大的德国军队，他们进行了毫无希望的反抗，虽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赢得了尊重。

大屠杀时期的巴勒斯坦是在国际联盟的授权下由英国管理的，犹太方对此的态度大概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工党与犹太事务处为代表的主流中左翼犹太复国主义，另一派则是主要由激进右翼团体如伊尔根集团、斯特恩帮为代表的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团体包括更多生于巴勒斯坦的年轻人。在战争时期，工党、犹太事务处与英国人联合起来反对德国，希望通过对英国的顺从与妥协能够最终在双方商定的边界内实现以色列的自由。另一方面，修正主义者则试图通过武装反抗英国而实现大以色列的梦想，都有恐怖主义的行为。战后，工党成了以色列议会的第一大党，犹太事务处的领





领导人组建了政府，修正主义则成立了赫鲁特党，赫鲁特党后来成了利库德党的一部分。通过攻击卡斯特纳，塔米尔希望推翻工党政府并且使赫鲁特党执掌政权。

不管是在战时还是战后，修正主义者一直都在谴责犹太事务处和工党懦弱的心态，他们却视自己为一个新以色列的光荣战士。因此，塔米尔打算通过将卡斯特纳与犹太事务处、工党联系起来以败坏犹太事务处和工党领导人的名声。塔米尔称：卡斯特纳与德国人的勾结就相当于犹太事务处与英国人的勾结，双方都故意隐瞒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消息。正如卡斯特纳的沉默将匈牙利的犹太人送入了地狱一般，犹太事务处的沉默错过了唤醒巴勒斯坦犹太人反抗英国统治或者迫使同盟国采取措施拯救欧洲犹太人的机会，伊斯坦布尔和巴勒斯坦的官员尤其是夏里特，密谋在叙利亚逮捕乔尔·布兰德。他们破坏了一个本可能会拯救成千上万犹太人的任务，目的就是迎合英国人，因为英国人不想犹太移民移民到巴勒斯坦。塔米尔义愤填膺地猛烈抨击着“犹太事务处高层公然犯下的这一罪行”，接着，他又继续对那些本不存在的联系进行指责，并提出了这种联系的共通点——对权力的渴望。正如卡斯特纳因为自己的野心而背叛了匈牙利犹太人一般，伊术的行政机构听命于英国政府、在最危急的时刻抛弃了欧洲的犹太人，就是因为他们不想放弃自己在巴勒斯坦的内部统治。

历史就是这些，不过塔米尔对现在更感兴趣。考虑到战时的许多伊术领导人此时正在工党建立的新以色列国家占据重要的职位，塔米尔诋毁他们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行为，这其实是要动摇 20 世纪 50 年代的工党政府。塔米尔声称，战争开始后当局就对大屠杀的相关事件采取欺骗与沉默的策略，沉默是为了掩盖卡斯特纳的罪行，而且还有更深的含义。“全部具有实权的政府机构，”塔米尔解释道，“都在保护卡斯特纳，因为他们害怕卡斯特纳泄露他知道的另一个勾结——犹太事务处与英国人的勾结，而正是这样的勾结破坏了对欧洲犹太人的营救并且加速了他们的灭绝。”通过最

后的这个策略，塔米尔成功地使工党政府成了犹太事务处所谓的罪行的帮凶，反过来，犹太事务处的所谓的罪行又通过卡斯特纳的所谓的罪行展露无疑。这才是格鲁恩沃德当初向塔米尔求助时他希望达到的效果。

卡斯特纳的结案陈词简短而沮丧。他已经由于塔米尔不断的指责以及哈莱维恶毒的询问与批评而疲惫不堪。除此之外，右翼的媒体在抨击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他视为一个罪犯。卡斯特纳在审判的开始阶段自信满满，而在人们将指责的矛头转向自己的时候过于保守，在支持比彻问题上的含糊其辞对他造成了最致命的损害。面对对奥斯维辛集中营保持沉默的指控，卡斯特纳承认在1944年德国占领匈牙利前，“瓦达没有能够适当地警告匈牙利犹太人开展抵抗行动”，但并不承认这与勾结或叛国有关。他坚称自己与同伴们有良好的意愿：“我们已经尽力了。”不过，卡斯特纳放弃了他的骄傲，承认“比起灾难的程度，他做的事简直微不足道”。

法庭外，随着悬念的增加，公众始终密切注意着这起诉讼，夏里特、本·古里安以及他们工党的伙伴都低着头，赫鲁特党以及报界则愈发猛烈地抨击卡斯特纳。塔米尔完美地利用了修正主义者惯用的思维，他与卡斯特纳之间的博弈被表演成了年轻、勇敢、正直的萨布拉（生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与卑下、懦弱的散居在外犹太人之间的对抗。为了做出准确的裁决，法官宣布休庭一段时间，因此人们对此案悬念的关注逐渐消失。然而当法官在几个月后做出裁决的时候，其影响则如同爆炸一般。

判 决

1955年6月1日，也就是庭审的9个月后，法官哈莱维回到了耶路撒





冷地方法院，卡斯特纳则焦急地独自在摩利亚旅馆等消息。从上午8点到晚上10点，哈莱维宣读了他那长达300页的判决的摘要。那份判决被证明极不公正，毛茨称其为“国家历史上最具煽动性、最具争议的审判之一”，塞格夫则将其描述为“以色列历史上最残酷的审判之一或最残酷的审判”。

哈莱维将格鲁恩沃德针对卡斯特纳的谩骂总结为四项指控：“（1）与纳粹勾结；（2）对匈牙利犹太人的间接谋杀或为谋杀提供条件；（3）与一名纳粹战犯共享赃物；（4）战后帮助战犯免于惩罚”。他还提道，“匈牙利隔离区的大批犹太人完全顺从地登上了驱逐的列车，他们不知道列车真正的目的地，错误的消息显示他们会被转移到匈牙利的奴工集中营”，而这些谎言都是由犹太委员会散布的，尤其是卡斯特纳。那些散布并且证实错误信息、没有组织任何反抗的犹太领导人没有陪伴他们的同胞去奥斯维辛集中营，而是加入了去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队伍。要是卡斯特纳当时履行他的义务而警告他的犹太同胞们，那么纳粹根本就不会那么轻松地对他们进行驱逐。卡斯特纳隐藏了他知道的信息，使得那些受害者从未试图逃往罗马尼亚、躲藏起来或者进行反抗，因此，他“为毁灭机器的车轮涂上了润滑油，为大屠杀的高效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他隐藏了他知道的信息，“大约50万人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登上了去奥斯维辛的列车，并且成了这一恶毒欺骗的受害者”。

接着，对卡斯特纳隐瞒真相的动机，哈莱维解释道，为了救出一些“特权个人”，卡斯特纳故意“抛弃了绝大部分匈牙利犹太人”。他屈服了一个他无法抗拒的诱惑。当艾希曼的猫鼠游戏使他变得最脆弱的时候，他得到了“从即将到来的大屠杀中解救600条生命并且可以通过进一步付款或商议稍微增加一些人数的机会”。他接受了这个提议，虽然艾希曼的条件是要求他对此完全保密，就是为了使驱逐能够在没有恐慌与反抗的情况下顺利进行。当艾希曼允许他挑选认为的最重要、最值得被解救的人时，他选择了他的家人、亲人、朋友以及一些犹太社区的领导人。所以，卡斯

特纳以保持沉默为代价而换取了解救“特权人士”的许可，他不仅接受了灭绝普通人的计划，还为驱逐与灭绝提供了实质上的帮助。这样，为了营救那些特权人士，犹太营救委员会的领导人与匈牙利犹太人的屠杀者的头目合作而将那些受害者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这绝对是犯罪。

接着，哈莱维宣布了可能是近代世界法庭上最无耻的一项判决。他说，卡斯特纳或许希望解救更多犹太人，但他认为只有自己的方法才能够成功。当艾希曼为他提供这个机会的时候，他将对那些最重要的犹太人的解救视为他个人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伟大成功，一个同样可以为他的行为进行辩解的成果。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样的馈赠”，哈莱维还引用拉丁语警句“timeo Danaos et dona ferentes”强调“这是一个害人的馈赠”。然后，他引爆了他那爆炸性的言论：“接受了这笔馈赠，卡斯特纳将灵魂出卖给了撒旦。”

后来，哈莱维后悔使用了这种过激的表达，但说出去的话如泼出去的水，再也无法收回了。在紧张的气氛中，哈莱尔的情绪由于法庭内塔米尔的雄辩以及法庭外反工党媒体的煽动而一再高涨，他的这一言论不仅提供了一个极其诱人的新闻标题，更远远超出限度地给卡斯特纳增加了一个污点。

哈莱维提出的下一个敏感问题与那三名伞兵有关。他坚称卡斯特纳背叛了这三名伞兵，劝说哥德斯坦使他自愿落入盖世太保手中，没能使哥德斯坦和帕尔基免于驱逐，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解救汉纳·扎尼斯。其原因便是他最大的利益——关乎被救者的命运、关乎他亲人的命运、关乎他自己的命运的营救计划，驱使他忠诚于他的主人。的确，卡斯特纳与这三名伞兵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绝对不是出于他对纳粹的忠诚。

哈莱维还翻出了比彻的事：“卡斯特纳否认曾经偏袒、帮助过比彻，他故意在法庭上提供虚假的证词，还隐瞒了他曾以犹太事务处与世界犹太代表大会的名义偏袒比彻的重大事实。”他将卡斯特纳在宣誓书中对比彻好的叙述认定为故意帮助战犯逃脱审判与惩罚的虚假陈述。哈莱维坚信，





卡斯特纳的目的是使比彻为他的罪行保密：“正如纳粹罪犯知道他们需要为其辩解的证人因而希望通过在最后一刻解救一些犹太人来达到其目的一样，作为纳粹勾结者的卡斯特纳也希望找到这样的证人。”

在总结中，哈莱维重申道，卡斯特纳声称他曾经尽全力去帮助这三名伞兵是撒谎，同样，他否认试图帮助比彻的陈述也是谎言。至于毒气屠杀的停止、集中营的投降、布达佩斯隔离区的保存，甚至我们卑尔根-贝尔森群体的释放，哈莱维认为，希姆莱对这些情况下达的命令都由其他因素决定，而不是卡斯特纳的影响，卡斯特纳做出这些虚假的陈述是为了给比彻和他自己脱罪。哈莱维最终撤消了这场诉讼：他认定格鲁恩沃德已经证明了卡斯特纳与纳粹勾结、帮助屠杀匈牙利犹太人的凶手并且使一名战犯逃脱惩罚。对于卡斯特纳与比彻一起偷取犹太财产这个指控，哈莱维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处格鲁恩沃德犯有诽谤罪，象征性地给了他1以色列镑罚款的惩罚。

判决过后便是以色列媒体与议会中的激烈争论。工党还是一贯地低调，赫鲁特党则幸灾乐祸，那些支持赫鲁特党的报界简直要将卡斯特纳撕成碎片，过分的大标题下重复着哈莱维偏激的判决。工党的领导人们被指责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而帮助卡斯特纳，他们与卡斯特纳都被描述为“准备与敌人（不管是纳粹还是英国）合作的腐败的利益至上者”。这个判决对以色列政治产生的长远影响则更加显著。大约在判决的一周后，工党领导的联盟政府中的“大犹太复国组织”放弃了两张不信任票，这大大削弱了夏里特总理的权利基础。6月29日，夏里特辞职了，新的政府迅速成立。第三次议会的选举开始于7月26日，自然，卡斯特纳已经无法成为候选人了。工党仍然是最大党，但失去了以前的45个席位中的5个席位。梅纳赫姆·贝京领导的赫鲁特党赢得了15个席位，比1951年的8个席位增加了7个，赫鲁特党就这样成了第二大党。1977年，吸收了赫鲁特党的利库德党第一次赢得了大选。卡斯特纳事件对于工党的没落及其对手的兴盛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样的判决对卡斯特纳及其家人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住在耶路撒冷的卡斯特纳从汉斯·布兰德口中知道了判决结果。虽然他也曾经怀疑过审判可能不会那么顺利，但这个结果还是令他十分震惊。当他回到特拉维夫的家的时候，卡斯特纳告诉伯格幽，法官做出了一个甚至连塔米尔也想不到的难以置信的判决。“他的世界完全破碎了。”韦茨这样写道。这些年来，卡斯特纳在布达佩斯的活动一直让他引以为豪，不过现在他真的需要超人的毅力才能够在早上从床上起来、走出房子、像什么都没发生那样走在街上。卡斯特纳被印在自己身上的那“耻辱的标记”深深地伤害了，他仍然坚称自己是那不堪忍受的不公平的受害者。渐渐地，他的自豪、骄傲和自信都被猜疑和不安代替了。

卡斯特纳并不是唯一需要忍受这些痛苦的人，他的妻子与女儿同样会遭到暴民的骚扰。他们的住宅被涂上了“卡斯特纳是一名杀人凶手”或者更糟的涂鸦，他们的凉台会遭到垃圾的袭击。苏希从9岁开始就在学校、街上被骚扰、被恐吓、被称为“女杀人犯”。这样的迫害一直持续了好多年，这两个女人持续遭受的情感伤害可想而知。

汉斯·布兰德是这样描述卡斯特纳周围的环境的：“陌生人公然敌视他，朋友们则对他小心翼翼，这都令他相当痛苦。”他经常被人威胁，而当局也足够认真地对待此事并且为他派了两名保镖。不过可笑的是，在他真正需要保镖前，他们却被撤了回去。另一方面，他收到了许多支持的信件，尤其是他在布达佩斯一起共事的青年先锋团体。两处基布兹（一种以色列的集体社区）可以收容他，也有人建议他离开这个国家，直到风暴渐渐平息为止。不过，他并不准备逃跑，决心恢复自己的声誉。他愤怒地发了一份声明，并被刊登在各大报刊上：“历史以及在那糟糕的时期知道真正发生的事情的人能够为我作证……我会不惜一切为自己正名、恢复我的名誉。”

哈莱维做出判决两个月后，首席检察官向以色列最高法院提起了上诉。





不公的审判

卡斯特纳显然是一场灾难般误判的受害者。哈莱维非但没能将审判的缰绳牢牢握住，反而允许塔米尔展示大量无关的材料并将正在调查的案子变成了他自己的政治演讲。他和塔米尔一起对卡斯特纳进行具有诱导性的提问，和塔米尔一样，哈莱维也将卡斯特纳当成了一个已经定罪的罪犯而非诉讼中的一名证人。卡斯特纳在对支持比彻的指控进行抗辩的时候，哈莱维已经失去了客观性，单方面地接受了塔米尔对卡斯特纳的指责。

说卡斯特纳在战时对驱逐、屠杀信息保持沉默的指控，这并非完全属实，因为他并没有完全隐瞒驱逐的消息。据他所说，早在1941年12月26日，他就帮助组织了一场由匈牙利与罗马尼亚公众人物参加的会议。在会上，他详细地报告了东欧进行大规模处决的消息，预计被暴力处死的犹太人将达到100万以上，并呼吁与会人员建立一个由犹太代表组成的非官方团体以对可能发生的德国人毁灭匈牙利犹太人的暴行进行政治反抗，却遭到了在场的大多数人的否决。在德国占领匈牙利的前一天，也就是1944年3月18日，卡斯特纳和“瓦达”派出了大量犹太复国主义先锋者去警告各省的人，不过人们并不相信，人们让他们“滚蛋”，甚至将他们当成制造恐慌的人而殴打他们。当卡斯特纳于5月3日抵达科罗日瓦的时候，他警告菲斯彻与其他犹太领导人这里有驱逐的危险，而驱逐就意味着灭绝，不过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有人说（如布拉汉姆），卡斯特纳那个时候已经完全知道灭绝屠杀的事情了，因为，1944年4月末，他在去斯洛伐克的路上得到了弗尔巴与魏兹勒撰写的《奥斯维辛记录》的副本，其他

人（包括卡斯特纳的侄子伊扎·卡特赛）却相信驱逐开始后他才收到那份副本。不过，他什么时候得到的那份副本其实并不重要，不管是什么时候，他都有足够的信息来再一次警告菲斯特等人——如果他想这样做。他之所以没这么做，完全是因为他自己，而不是他的敌人嫁祸给他的那些无端的指责。

并不是像卡斯特纳的敌人们宣称的那样，匈牙利的犹太人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存在，有些人被抚慰性的谎言所误导，其他人则根本不想知道真相。他们相信，或者他们试图使他们自己相信这样恐怖的事情或许会发生在其他地方，但绝不是匈牙利：匈牙利人会感激犹太人对他们的忠诚，或者匈牙利人会意识到伤害犹太人的同时也会损害他们自己的经济与文化。然而，德国占领匈牙利后，由于难民或者犹太复国主义积极分子的报告，大部分犹太人才对东部的大屠杀有了些许概念。

虽然当时年幼的我并不理解布达佩斯的人为什么烦躁、猜测、争论、痛苦，不过我知道绝对是关乎生死的问题。我对卑尔根-贝尔森群体的三名成员所做的采访就反映了这样的状况。维拉·约翰斯坦纳的回忆虽然有些模糊，但绝对算不上微不足道：“我学校里有一个人的亲戚知道一些关于奥斯维辛的事情，我不敢说那个人知道多少，不过我们还是不明原因的知道世界上没有比被带到奥斯维辛更坏的事情。”玛塔·格哈特回忆起当那些来自波兰的难民们试图警告人们的时候他们是如何被对待的：“人们对他们感到非常愤怒，他们说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谎言。”本·赫尔施注意到两个问题，一是传言将在有益健康的工作集中营中被重新安置的谎言，这些谎言是德国人命令犹太委员散布的，二是惰性与恐惧使人们宁愿忽视危险也不愿试图逃跑或者反抗：“当我们开始记起之前那些难民讲述的故事的时候，人们倾向于不去想它，因为想起它会令你感到难受。而且你的领导人都告诉你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根本就没有必要再考虑这个问题了。”

对卡斯特纳的沉默阻止了大批匈牙利犹太人进行反抗或避难于罗马尼





亚是经不起推敲的。无法利用媒体，走动的机会有限、在德国人与匈牙利秘密警察的密切监视下，卡斯特纳几乎不可能有效地拉响警报，不过即使更加努力地去发布警告，大部分犹太人也做不了什么。他们在敌人的包围下，被剥夺了财产与人权，没有武器和战斗经验，无法组织反抗，也就无法实施大规模的逃跑行动。如安·帕斯捷尔纳克·斯莱特指出的那样，“反抗那可见的危险似乎比顺从那未知的风险大得多，而且顺从看起来比立即的死亡与报复行动更好”。乖乖地待着，等待雨过天晴是大部分人的希望，不幸的是，这样的希望被证明是虚幻的。不过，如果卡斯特纳把所有的努力都用在劝说犹太人逃跑或抵抗上，他可能无法救出他实际救出的那么多人。

卡斯特纳意识到了保持沉默带来的危险，在1944年7月15日的记事簿中，他记录了对比彻说的话：“我已经想过很多次了，是否动员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人们拒绝进入砖厂、登上卡车才是最正确的。”比彻实事求是地指出这没有任何意义，卡斯特纳回答道：“也许吧，不过这至少会保留我们的尊严。”此外，卡斯特纳也认识到了他的沉默对灾难起到的助长作用：“我们的人像牲口一般被赶上卡车，这是因为我们相信谈判会取得成功而没能告诉他们前方等待他们的悲惨命运。”但这并不能证明卡斯特纳是蓄意背叛。杰出的大屠杀历史学家之一——马丁·吉尔伯特于20多年前写的东西似乎仍然是对“瓦达”的行为最有力的解释：“不选择立即警告犹太同胞抵制驱逐而与纳粹秘密谈判，希望避免所有的驱逐，这是匈牙利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做出的选择”。如果仍然要说卡斯特纳有罪的话，那么他的罪名只能是过于自信与自负，而非背叛。不管对与错，卡斯特纳对奥斯维辛的事情保持沉默是因为他相信，与不切实际的反抗相比，通过秘密的手段能拯救更多生命。

战后，鲁道夫·弗尔巴成了卡斯特纳最猛烈的抨击者之一。将犹太委员会与“瓦达”归为一类，他于1961年在《每日先驱报》中写道：“这一小帮内奸明知道在希特勒的毒气室中他们的同胞们正在遭受什么折磨，

他们却以沉默为代价换取自己的生命。”或许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生命，因为在之后的一篇文章中（其中他暗示我们人员冗杂的卑尔根-贝尔森群体中全部是VIP人士），弗尔巴将艾希曼“对那1800名相对富有或有良好社会关系的犹太人释放后送到瑞士”描述为“是对他隐瞒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发生的暴行的一种奖励”。

巧合的是，弗尔巴的文章出现在《生命》杂志上的《阿道夫·艾希曼的告白》连载的一年之后。在连载中，艾希曼解释道，他在匈牙利最关心的事情是使驱逐顺利进行，他是为了避免像华沙隔离区暴动的意外发生而与卡斯特纳谈判的。他对交易的描述正好奇怪地附和了塔米尔提出的指控：“如果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几百名或者几千名犹太人非法移民到巴勒斯坦，那么他同意帮助我避免犹太人抵抗驱逐，甚至会帮助我让他们在隔离区保持秩序。这是一笔不错的交易。”

我应该不用强调艾希曼的证词并不是完全值得信赖的。事实上，卡斯特纳完全明白艾希曼是在利用他，不过在这样一个残酷的博弈游戏中，反过来他也在试图利用艾希曼。卡斯特纳在他1945年的宣誓书中明确了这一点：“德国人因为行政效率的问题而与犹太社区的领导人们走上了谈判桌，我们则抱着救出一些生命的希望而与他们进行商议。”

然而，一个知名的历史见证者似乎完全相信了艾希曼的故事。在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汉娜·阿伦特因为犹太委员会所谓的合谋参与了对其同胞的灭绝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她声称，与国外具有联系的“瓦达”对纳粹更重要，因而获得了更多特权，“瓦达”的成员可以来去自由，不必佩戴黄色的大卫之星，可以探望集中营。特别是卡斯特纳，他甚至可以在纳粹德国随意穿行而没有任何身份文件显示他是一名犹太人。她宣称，艾希曼允许将几千人移民到巴勒斯坦，但需要卡斯特纳保证各个集中营中数十万将被送到奥斯维辛的犹太人“安静与有序”，这就是卡斯特纳获得这些特权的原因。此外，阿伦特给卡斯特纳强加了法西斯的脾





性，说他也和纳粹有相同的看法，也就是“知名的犹太人比普通人更有权利活下去”。如果阿伦特能够更加认真地研究事实，而非纵容自己的偏见，那么她或许不会得出与艾希曼相同的结论。

说卡斯特纳的卑尔根-贝尔森群体中全部是他的亲人以及他在科罗日瓦的犹太复国主义密友，这样的指控根本就是无稽之谈。虽然卡斯特纳明显干预了名单的制订过程，但名单是依据为此项任务而成立的小型委员会制定出的标准而进行编制的。至于说他的亲人，根据安·帕斯捷尔纳克·斯莱特的回忆，卑尔根-贝尔森群体中只有他的母亲、哥哥、嫂子、妻子、岳父、岳母、妻子的两个姐妹及其孩子，总共10个人。卡斯特纳的许多其他亲人（他母亲的兄妹、他父亲的哥哥以及他们所有的孩子）都被驱逐并且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而科罗日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卑尔根-贝尔森群体中占多数，这并不奇怪，因为科罗日瓦是匈牙利的第二大城市，有最大、最活跃的犹太复国主义社区，而整个营救计划的前提就是巴勒斯坦移民证件。然而，这个群体并不仅仅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者，我与我的父亲就是许多非犹太复国主义者中的两个，曾经在斯洛伐克、在卡斯特纳的帮助下完成过许多危险营救任务的前青年运动领导成员佩雷茨·雷维茨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自传中，雷维茨说道，“那份名单包括广泛的代表以及各领域的公众人物：医生、艺术家、科学家、经济学家，等等”，其中大多数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不过，雷维茨补充道：“这份名单还包括一些极其传统派的犹太人，其中，扎利斯·泰特尔鲍姆就是因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而知名。”

不可否认，这个群体中有过多匈牙利犹太人中的精英分子，不过挑选的标准要远远超出了卡斯特纳的同情。我们这群人的年龄范围从0岁到80岁，几乎包含所有的职业、政治观念或宗教方向。整个群体绝不是全部都是富人，我们已经知道，大约150个富人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了大多数赎金，我和我的父亲便是那些既没钱又没权、只有幸运的人之一。曾近距离

观察这些事情的雷维茨强调了卡斯特纳在挑选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的局限性以及“瓦达”试图从匈牙利犹太人中选出最合适的人的真诚。自然，在这样可怕的条件，达到绝对的公平是不可能的，但“瓦达”决心继续完成它的任务：“目前的运送只是一系列运送的开始而已，这样的想法才给了那些应该做出这些决定的人些许安慰与希望。”如果卡斯特纳相信我们被营救后会有许多其他营救行动，那么指控他为了救出我们而背叛了其他匈牙利犹太人就是完全不成立的。

我不相信卡斯特纳蓄意与纳粹勾结，不过许多难以理解的问题则仍然没有答案。其中两个棘手的问题便是他为什么会为比彻提供那样的宣誓词？为什么在法庭上否认这件事？

根据一种假设，一向过于自信的卡斯特纳认为，只要打死也不承认，他就能打发对方的律师；根据另一种假设，他撒谎是因为他问心有愧。还有一种更有说服力的答案：卡斯特纳的女儿苏希告诉我，当卡斯特纳帮助纳粹这件事突然被曝光的时候有点惊慌失措。考虑到法庭诉讼的压力、他的律师的无能、自己一方的证人无法提供任何帮助，以及塔米尔的穷追猛打，他瞬间失去控制是可以理解的。还有一种更有可能的情况，那就是卡斯特纳的侄子伊扎·卡特赛告诉我，或许卡斯特纳与他的律师都收到了他们上级的指示——不能供认任何可能损坏工党政府的声誉的事情。

格鲁恩沃德声称，卡斯特纳的目的是要比彻对他们共同犯下的罪行保持沉默，这种说法简直是无中生有，塔米尔和哈莱维却相信了这种说法。另外，韦茨提出的三种解释也能够为该谜题提供些许帮助。韦茨将第一种解释称为“君子风格”：假设比彻曾经劝服卡斯特纳向他承诺如果德国战败卡斯特纳会为他辩解，所以，卡斯特纳义不容辞地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以下是卡斯特纳的女儿给出的原因：“他为什么会为他们说话？因为他向他们承诺过。作为君子，承诺就是承诺。”经常指出卡斯特纳缺点的伊娃·斯皮特的看法也大致一样：“我认为他做得对，因为他承诺过。而且，





没有比彻的帮助，他不可能做成那么多事情。”即便是没有明确的承诺，卡斯特纳或许也应该觉得有义务帮助那些在他绝望的时候曾经为他提供帮助的少数敌人（不论他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亚历克斯·巴泽尔称赞了卡斯特纳不计报酬地为比彻邀功的事：“比彻的确是那样做的，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他从前是纳粹分子就否认他真正做过的事情”。韦茨或许说到要点，他认为卡斯特纳的动机之一或许是他对公正的追求：“也许，卡斯特纳真的相信比彻曾在犹太教的营救行动中帮过他，所以他必须报答比彻。”

韦茨的第二种解释为“失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卡斯特纳经历的不仅是沉甸甸的责任，还掌握着成千犹太人的生死、为创造历史而与那些最邪恶的屠夫们进行交易。我们可以想象，当他不再需要日复一日地集中全部的精力去面对那些纳粹的时候，他会感到多么泄气。如果他为了试图克服这种反差而参与新的营救计划，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即使这次的目标是纳粹的军官。以下是乔尔·布兰德的观点：“在纽伦堡，他又恢复了拥有权力的感觉：拿起电话，几句好话，介入，书面陈述——这就足够救人了。”韦茨也怀疑那些宣誓书或许给了卡斯特纳重新体验在被占领时期拥有权力的机会：“他回到了舞台的中央，决定人们的命运。”

第三种解释则是“心理因素”。基于“认知失调”的概念，韦茨认为卡斯特纳曾经与那些他害怕、憎恨的人紧密合作，必须对他们形成一种可接受的概念，即使那种概念与事实不符：“与那些他憎恨却依赖的人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使卡斯特纳希望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他们。”这是情感防御的自我欺骗。与这些敌人的联系从两个方面影响了卡斯特纳：这使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使他感到内疚。为了纾解这种压力与内疚，他或许已经使自己相信那些敌人是他的搭档甚至朋友了。这完全是无意识的，而“这种无意识的想法是为了将他摆正在自己心里的位置，为了使它能够与他们继续谈判，为了使他在战后能够保持自尊。”

对许多人来说，这种理论或许过于主观，但卡斯特纳似乎的确与比彻

产生了友谊。卡斯特纳于1951年写给比彻的一封信或许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在表达了对比彻的爱人之死的沉痛心情、简洁说明了在以色列的生活后，卡斯特纳继续写道：“我做了许多工作，我很高兴并且希望现在与你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这对都取得卓越成就的我们俩才更合适。”其中，两个地方尤其突出。一是卡斯特纳将“Du”（称呼的简体形式）与比彻的名——库尔特连在一起，还在结尾称其为“我的老朋友”。另一个则是对“更加密切的联系”的期望。卡斯特纳或许在考虑新的商业联系，不过这种友好的口吻带有更多私人的成分。比彻或许配得上卡斯特纳的友谊，但卡斯特纳对他们的合作取得的“卓越成就”明显感到的自豪似乎是真诚的，而不像是在隐瞒任何秘密。在那样动荡的时期，共同完成一项重要的计划或许甚至能够为——一个纳粹勒索者和一个肩负营救犹太人的任务的犹太人之间搭建一座桥。

然而从表面上看，卡斯特纳确实支持了一帮曾经为了勒索而冷酷地利用过他的纳粹暴徒，虽然那些人对他的营救行动的确有所帮助。我相信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实用主义的需要。战后，卡斯特纳一直试图追回犹太财产、追击艾希曼、将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绳之以法，他为那些纳粹军官提供支持是为了使他们在以上问题上提供帮助，并不仅仅代表自己，而是得到了犹太高官的指示与认可。关于那些原本可以拯救卡斯特纳的生命、但当时却不为人知的文件，肖莎娜·巴里最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用她的话说，卡斯特纳“将比彻、克拉米、威斯里舍尼描述为犹太人的救星，这是为了配合犹太事务处试图一方面逮捕艾希曼和大穆夫提，一方面试图追回匈牙利犹太人财产的努力”。这种解释得到了卡特赛肯定，他曾经与他的叔叔探讨过许多重要问题。同样援引卡特赛的观点，卡斯特纳的宣誓书是为了显示犹太人会信守承诺以及他要达成的那些计划均是他这样做的最主要原因。

卡斯特纳想追回被偷的财产的原因之一是满足个人需要。有人造谣说





卡斯特纳盗用财产，卑尔根-贝尔森群体的一些成员逼他交出精确的账单甚至返还他们曾经提交的赎金。即使是在最正常的情况下，卡斯特纳也不是一个耐心的管理者和一丝不苟的记账人。考虑到当时那笔赎金不得不极其匆忙地从那些惊吓中的犹太人手中筹集并送到多疑的匈牙利人背后那些贪得无厌的纳粹手中，到处都充斥着逮捕、拷打、驱逐与死亡，要卡斯特纳精确地记录简直就是荒谬的要求。用卡斯特纳的话来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挽救生命，为此我们战斗了一整年，我们努力，我们冒着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谁还能够进行常规的合法记录？”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通过偿付他们或者将重新获得的财产交给犹太组织以停止这样的诋毁。

可以肯定的是，犹太事务处的几个主要人物知道卡斯特纳试图追回被偷财产的想法。在1946年12月的便函中（很可能是写给犹太事务处的），卡斯特纳想起了“瓦达”曾经将价值875万瑞士法郎的货币与物品交给比彻作为我们的赎金，他问道，这一笔以及其他大笔财产如何能够在美国人盗用之前而被追回：“简单的手续就可以吗？还是需要更加高层的政治力量介入？这件事十分紧急，因为这笔财产有可能会转为战利品而无法归还给犹太人。”在接下来的两或三年里，不同的个人以及组织就该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他们包括幸存者、犹太事务处、世界犹太代表大会、联合会、美国占领当局、法国及匈牙利政府、一些瑞士银行以及日内瓦的巴勒斯坦办公室主任查姆·波斯纳。自然，卡斯特纳、舒威格与比彻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比彻曾经收到、之后又返还给舒威格的那笔用于支付卑尔根-贝尔森群体的赎金最终落到了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处的手中，结果却只是预期价值的一小部分，其他财产（包括著名的装着从匈牙利犹太人那儿偷来的珠宝的“黄金列车”）则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许永远也找不到了。

卡斯特纳想追击艾希曼的雄心也没能实现。1946年3月，他通知塔塔科维尔：“犹太事务处的一名成员成功地发现了艾希曼的踪迹，看起来找到这个家伙并非绝不可能。”一年半后，卡斯特纳致信他的律师弗里德里

希·斯坦纳：“我今天要去纽伦堡，在那里我将被询问关于艾希曼的问题，我希望我能够说服相关的同盟国当局对他进行缺席审判。”大约还是那个时候，卡斯特纳为被关在斯洛伐克的威斯里舍尼寄去了100或200瑞士法郎，他这一出人意料的举动是希望获得艾希曼的行踪作为回报，还是出于相同的目的，他希望将威斯里舍尼作为“艾希曼小组中唯一能够完整、彻底交待灭绝计划的成员”而被引渡到美国，不过他的愿望没能实现。威斯里舍尼被斯洛伐克人处决，而卡斯特纳在有生之年也没能看到艾希曼被逮捕并受到应有的惩罚。

卡斯特纳的制裁和耶路撒冷大穆夫提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在世界犹太事务处的阿莱·塔塔科维尔与那鸿·哥德曼的帮助下，卡斯特纳揭露了大穆夫提与纳粹狼狈为奸的真相，在美国与瑞士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西方的当局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尽管哈莱维对此感到暴怒，但卡斯特纳有理由相信他有权以最高犹太组织的名义签署关于比彻的宣誓书，即使他并没有明确的指示去这样做。卡斯特纳于1947年2月5日写给克拉米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不会轻易忘记那些在某些时刻给予我们理解的人。”1944年7月，犹太事务处的维尼亚·彭慕兰与梅纳哈姆·邦德尔曾建议卡斯特纳对纳粹承诺进一步的帮助以换取卑尔根-贝尔森群体的生命以及进行更多交易的诚意：“试图劝服你的客户……我们不会忘记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1944年8月，伊斯坦布尔的犹太事务处代表让布达佩斯的“瓦达”传递同样的承诺：“我们不会忘记那些现在于我们站在一起的人，这比金钱更重要。”这三封信中几乎相同的表达似乎肯定了卡斯特纳于1947年做的事正是犹太事务处于1944年承诺的。

巴里引用的1945年至1948年不同官员间大量的通信显示出犹太事务处并不反对与前纳粹谈判，并且利用卡斯特纳以完成该任务。其目的不仅仅是要追回被窃的犹太财产，更要与战后的德国建立经济联系。这些项目（以色列政治的烫手山芋）远非本书所能提及，不过我或许可以举一个例





子：1948年，在瑞士的查姆·波斯纳试图代表巴勒斯坦的犹太事务处从德国的比彻手中购买用于制造军火的机器。

卡斯特纳有理由相信他的方法是经过他的上级授权的。再一次引用巴里的话：“不管他得到的是犹太事务处明确的预先授权，还是仅仅只是一种隐晦的暗示，卡斯特纳都是代表犹太事务处与世界犹太代表大会合作的。”关于这一点，艾利胡·多布金在证人席上的行为令人不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卡斯特纳说多布金是为他以两个最高组织的名义帮助比彻开通绿灯的官员之一，却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矢口否认，甚至说从未听说过比彻，这是自相矛盾的。如乔尔·布兰德所述，卡斯特纳曾经于1944年邀请多布金“和他一起到里斯本会见比彻”。如果布兰德所述属实，那么多布金一定在撒谎；如果他在撒谎，那么最后一次引用巴里的话，“他这样做很可能是因为以色列的政府官员不能公开承认一个全新、纯洁、理想的国家与纳粹官员有联系……也不能承认他们允许提供偏向纳粹官员的证词与辩解”，即使这样做的目的是惩罚纳粹罪犯以及为他们年轻的国家获得资金、物品以及军事装备。为了以色列的现实政治，没人再关心卡斯特纳了。

上诉及之后

1955年8月21日，首席检察官为反对哈莱维判决而提起上诉，他列举了大量的理由：法官根据错误的证据或者没有证据宣判格鲁恩沃德无罪；哈莱维受到了证人席上的卡斯特纳与其他人一些矛盾陈述的影响；他忽视了在纳粹恐惧下犹太人的精神状态；他没有考虑到人类记忆的缺陷，尤其是在讨论那样可怕的时期时；他没有指控卡斯特纳与纳粹合作或者指

控他明知、愿意协助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有效证据；称卡斯特纳将灵魂出卖给了撒旦，这完全是主观的说法；断言卡斯特纳没能够警告科罗日瓦的犹太人关于死亡集中营的事情助长了大规模的灭绝行动，这是毫无根据的说法。在伞兵的问题上说卡斯特纳对纳粹忠诚也没有证据；没有证据显示卡斯特纳偏向于比彻的宣誓书是为了使一名战犯逃脱审判与惩罚。

刑事上诉 232/55 号于 1957 年 1 月 19 日开庭，于 1957 年 2 月 6 日闭庭。该上诉由 5 名法官进行审理：首席法官伊扎·奥尔斯山，代理首席法官扎尔曼·柴思琴，法官席蒙·阿格兰纳特、摩西·席伯格以及大卫·戈伊泰因。卡斯特纳已经恢复了以前的大部分精力，决心为自己正名。这一次他确实赢了，但事情并不完全如他期望的那样。

卡斯特纳的一群朋友请米夏·卡斯比与查姆·特扎多克当他的律师，卡斯比的能力与塔米尔旗鼓相当。卡斯比进行攻击的主线是阐明：如果卡斯特纳曾经警告科罗日瓦的犹太人，那样也于事无补。他列举了大量的证词，其中最有说服力的证人是萨博。萨博解释道：“街上普通的匈牙利犹太人知道关于奥斯维辛的事情，不过大规模的逃离是不可能的，相信匈牙利犹太人能够组织起任何反抗绝对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了，失去了工作，穿着缝着黄色的补丁的衣服，家里被贴上了封条，处于非人条件下的隔离区中，这样的情况已经使他们的意志变得渐渐消沉。”他们的自信和精力被慢慢榨干了，他们缺少的并不是消息，而是拯救自己的精力和意志。所以，他们不愿意面对那可怕现实，假装相信灾难不会发生：“他们知道危险，但不愿相信。”希望将他们从漠然之中唤醒的尝试经常被人误解，甚至有人会产生敌意。兹维·高尔法伯是从斯洛伐克逃到匈牙利的青年犹太复国主义积极分子的成员之一，他曾试图警告当地的犹太社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经历的事情。根据他的证词，以下是发生的事情：“当我们来到这里，告诉他们实情的时候，他们并不相信我们。他们不想与我们有任何关系，甚至在之后的一段时间，他们还是听不进去。”





5名法官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才做出了决定，1958年1月15日，他们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宣读自己的判决。5名法官一致同意由调查委员会执行对原案件的审判，认定卡斯特纳曾经蓄意帮助一名纳粹战犯逃脱审判，并且在法庭上对此事说谎；4名法官决定维持涉及那些最严重指控的上诉，澄清了“卡斯特纳有意识地与纳粹勾结并且合谋进行大屠杀”的指控；格鲁恩沃德因诽谤罪而被判处缓刑一年，并被处以500以色列镑的罚金。法官们说，考虑到1944年那样特殊的条件，卡斯特纳的行为不能够完全依照正常年代的标准进行衡量，而大部分法官认为卡斯特纳的目的是拯救生命。就这样，判决从整体来说还是勉强恢复了卡斯特纳的名声。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判决是阿格兰纳特做出的裁定。他批评哈莱维不能够考虑到卡斯特纳与他的伙伴们是在什么样的时期、什么样的大背景下工作的。针对哈莱维提出的“卡斯特纳基于一笔邪恶的合约而与纳粹勾结”的指控，阿格兰纳特指出，艾希曼在当时无所不能，而卡斯特纳就如同他手里的蚂蚱，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所谓的合约，因为合约是要基于自由选择以及双方平等之上的。至于所谓的合约的内容，阿格兰纳特强调，“一切都要基于动机”。他断然否定了“卡斯特纳企图将匈牙利犹太人带向灭亡”的指控，说卡斯特纳绝不会为了小部分知名人士而出卖大批犹太人，“在任何时候，卡斯特纳的目标都是要解救所有的匈牙利犹太人，卑尔根-贝尔森计划的实行只不过是这一目标的一部分，而绝不是卡斯特纳唯一的目的。”如果卡斯特纳真正相信通过与纳粹进行经济上的谈判能够解救更多的犹太人，那么这便是他的道义让他去这样做的；如果他确信通知科罗日瓦的犹太领导人关于奥斯维辛的事情会威胁到这些谈判，那么他就有权保持沉默；如果根据原先的协议，卑尔根-贝尔森群体是要去巴勒斯坦，那么卡斯特纳决定挑选一些知名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也是完全有道理的。所以，阿格兰纳特总结道：“我们无法从那样的行为中找到道德缺陷，也无法从那样的行为与驱逐、灭绝的迅速进行之间找到任何因果联

系，不能将他的行为发展到与纳粹勾结的程度。”

柴思琴同意阿格兰纳特的观点。他认为，即使卡斯特纳知道并且在科罗日瓦隐瞒了那些残酷的事实，这也并不能证明他希望帮助德国人采取灭绝行动。他解释道，卡斯特纳没有警告匈牙利的犹太人他们面对的危险，是因为他并不认为这样的警告能够起到任何作用，而且他认为泄露这些信息所导致的行动只会给他们带来灾难而非帮助。柴思琴和阿格兰纳特都认为，匈牙利犹太人没有能力（不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反抗。柴思琴没有否认，从道义以及公共的角度来讲，卡斯特纳应该负领导不力的责任，然而，他总结道，卡斯特纳的沉默不应该被视为在灭绝过程中蓄意的勾结与协助，因为所有的迹象都显示出卡斯特纳的努力都是为了进行大规模的拯救行动。奥尔斯山也同意阿格兰纳特的观点，并且因哈莱维允许不相关的细节与道听途说阻碍了诉讼而对其进行了批判。戈伊泰因起初保持中立的态度，不过最终决定加入阿格兰纳特阵营。

只有席伯格采纳了哈莱维大部分的裁定。他否认卡斯特纳进行过任何大规模的营救，并且声称纳粹之所以能够“没有牺牲而轻松、顺利地进行灭绝”完全是“卡斯特纳向那些受害者隐瞒可怕真相”的直接结果。席伯格坚称，卡斯特纳为了开展他那解救重要人士的计划而蓄意满足纳粹的欲望，他就是这样加速了大规模灭绝的进程。为了强调卡斯特纳所谓的那些犯罪倾向，他再次提到了比彻的案子：“他试图使比彻免于绞刑，这就证明那名战犯犯下的暴行在卡斯特纳的眼里并不是那么恐怖与可鄙。”不过，即使是席伯格也反对哈莱维所谓的“将灵魂出卖给了撒旦”的这种诋毁，他指出卡斯特纳“也并不愿意帮助灭绝600000名犹太人”。

最高法庭做出裁决后，整个国家依然对此观点不一。工党以及工党的支持者对这样的结果感到满意，赫鲁特党（包括乌里·阿福内里以及他的周报《哈莱姆·哈扎报》）则坚称卡斯特纳并非真的清白，塔米尔要求进行公开的调查，他在有生之年一直在证明卡斯特纳无罪。不幸的是，当最





高法院宣读判决的时候，卡斯特纳已经死了。

这一次，还是韦茨给予了我们最完整的叙述。1957年3月3日晚上11点30分左右，卡斯特纳离开特拉维夫的新东方编辑部，乘车返回位于伊曼纽尔大街6号的家。当他下车的时候，一名身穿卡其色衣服的男子走了过来，将手电筒照在他脸上，问道：“你是卡斯特纳博士吗？”当卡斯特纳回答后，那个男人掏出一把左轮手枪指向了他的头，扣动了扳机，不过并没有射中他。卡斯特纳猛地推开了那个男人，拼命跑向家。那个男人又开了两枪，第二枪射中了卡斯特纳。卡斯特纳倒在了人行道上，喊着“救命”，那名枪手坐一辆吉普车逃之夭夭了。邻居们报警并叫来了救护车，在卡斯特纳被匆忙送往哈达莎医院之前，伯格幽为了使他能够更加舒适一些而拿来了枕头和毯子。发生这一切的时候，他们的女儿正在熟睡。

当卡斯特纳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发现子弹穿进了他身体的左侧，撕开了他的脾脏、穿透了他的肠子、毁坏了他左胸附近的器官。卡斯特纳在进行历时3个小时的手术前还能够向警察描述发生的事情。他的情况似乎好转了一些，不过危险依然存在。他收到了许多电报与鲜花，格鲁恩沃德就致电他：“对这样残忍的事情，我感到十分震惊。尽管我们存在分歧，不过我还是希望您能够恢复健康。”塔米尔也在一次报社的采访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根据耶路撒冷的审判中辩护所展示的内容去判断卡斯特纳在匈牙利的活动，这种行为是无比令人厌恶的。”受袭8天后，卡斯特纳的状况开始恶化。1957年3月15日早上7点20分，卡斯特纳死于心力衰竭。

3月19日，卡斯特纳的葬礼举办于特拉维夫。当卡斯特纳的尸体在医院前的广场上被放进棺材的时候，成千上万个哀悼者到这里为他送行。

这次暗杀激起了千层浪，许多嫌疑犯被立即逮捕了，无辜的人被释放了。4月，特拉维夫地方法院对三名男子进行了审判，他们是亲手执行暗杀任务的泽夫·埃克斯坦、驾驶吉普车的丹·舍莫尔以及一个地下组织的

头目——约瑟夫·孟克斯。1958年，他们被判谋杀罪名成立，处以终身监禁的刑罚。不久，一些人试图能够减轻对他们的刑罚，尤其是约瑟夫·孟克斯，他当时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很差。1963年，首相本·古里安私人争取伯格幽及其女儿的意见，伯格幽仍然充满仇恨，苏希则同情孟克斯的子女。苏希对本·古里安说：“我父亲永远也回不来了，至少他们的父亲还能够回到他们身边。”同年，三个人都被释放了。

暗杀的真正情况一直无人知晓。由于当时警察发现了大批武器的藏匿处，所以一个版本说这次暗杀是一个危险的地下运动进行大规模行动前的一次象征性行动，另一个版本则称这是曾经长时间骚扰卡斯特纳的右翼极端群体所为。还有一个版本是由赫鲁特党集团提出的，他们将矛头指向了国家安全部队，而在国家安全部队的身后，正是政府蓄意下令暗杀卡斯特纳，因为卡斯特纳知道工党的领导人们太多秘密。按照这种说法，埃克斯坦被认定曾经是安全部队的成员，并在服役两年后于1956年被撤职。尽管流言不断，真相却从未大白。

卡斯特纳留下的寡妇与女儿则处于绝望之中，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情感上。朋友们试图为他们提供帮助，最终，伯格幽通过经营小本生意而勉强维生。卡斯特纳被枪杀五年后，伯格幽根据她丈夫的国家保险而要求获得抚恤金的申请被拒绝了，因为卡斯特纳并不是在工作时遭到谋杀的。伯格幽在16年后去世，这段时间，她的生活一直十分拮据，并且很悲伤。苏希成了一名护士，在特拉维夫附近的佩塔提克瓦的一所医院工作。她已经离婚了，有三个女儿，她始终坚信自己的父亲是清白的。

没过多久，卡斯特纳的名字便从报纸的头条新闻的位置上消失了，却从未被人们遗忘。由于1961年对艾希曼的审判，关于卡斯特纳的争辩再次开始，汉娜·阿伦特重新翻出了塔米尔与哈莱维的陈述，轻信了艾希曼关于卡斯特纳的故事，并表达了大多数以色列人的看法。不过，到20世





纪80年代，以色列社会经历的变化使它能够采取更加客观的态度。历史学家道夫·迪努尔1987年的著作（其希伯来语的标题翻译成《卡斯特纳：领导人还是罪犯》）为恢复卡斯特纳的名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之后，其他类似的学术著作以及文章层出不穷。当该书第一版正在出版的时候，小说家安娜·波特出版了《卡斯特纳的列车》（2007年）：她在她那冗长的介绍中解释道，她尽可能地保证事实的准确性，不过由于在书中主观重现了一些场景与对话，她将卡斯特纳那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业变成了出版商口中的“政治惊悚故事”以及“跌宕的爱情题材”。几部致力于再现历史的电影与纪录片在过去的几年里问世了：以色列莫蒂·勒纳的《卡斯特纳审判》（1994年）、英国比尔·特拉罕·琼斯的《布达佩斯最后的列车》（2000年）、德国赛尔·勃兰特的《车轮滚滚》（2005年）、匈牙利格尤拉·拉多的《卡斯特纳列车》（2006年）、美国盖伦·罗斯的《卡斯特纳之死》（2008年）。2004年，“受难者纪念馆”为纪念卡斯特纳而举办了展览，2007年7月，苏希及其家庭成员为“受难者纪念馆”提供了许多文件。虽然以卡斯特纳的名字命名特拉维夫或海法一条街道的努力因为政治操控而落空，不过海法附近的一个小丛林和他在布达佩斯西街12号旧公寓入口处的牌匾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最近去以色列的时候，一名年轻的移民官问我要去哪里，当我告诉她我想做一些关于卡斯特纳的研究时，她满脸茫然。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她年轻的同事前来解围，告诉她关于审判以及谋杀的事情，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样。

耶奇姆·韦茨精准地总结了人们对卡斯特纳的成就所持观点的变化。“那时，人们很难理解卡斯特纳的所作所为多么英勇与无畏，”他说，“不过在一代人以后，一个更加成熟、自信的公众就能够理解为了救人而进行的谈判并非可耻的事情。”

第十四章 时势造英雄

一个拯救成百（很可能是成千）犹太同胞的犹太人，却被一名犹太法官冠以“勾结犹太敌人”的罪名而被犹太公众排斥，并最终被一名狂热的犹太枪手暗杀。从表面上来看，这似乎有些离奇，但只要结合二战后十年里以色列充斥的不正常的情绪，就能知道卡斯特纳为什么会在当地受到轻视了。

在这段时间里，许多犹太人仍然沉浸在大屠杀的悲痛与震惊之中，而法庭上对卡斯特纳的那些指控似乎印证了关于他的一些谣言，这无疑在他们还未愈合的伤口上撒盐。

卡斯特纳的成功连同他的自负都引起了别人的嫉妒。他从卑尔根 - 贝尔森集中营解救的 1670 个人与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数十万人的灭绝形成了过于鲜明的对比。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卡斯特纳因为在绝大部分人被屠杀的时候救出了一小部分人而遭到痛恨，以及卑尔根 - 贝尔森群体在其他人全



部被屠杀的情况下幸存遭到痛恨，但这并不公平。

当时，以色列大多数犹太人都遭受了无法挽回的损失，许多人还因为在大屠杀中的无能为力而感到内疚，悲痛与内疚交融便极易产生愤怒的情绪，而愤怒只能够通过指责而得到发泄。既然他们无法惩罚真正的罪犯——纳粹，一个在灾难中通过与敌人可疑的交易而看似如鱼得水的名人则是一个显眼的攻击对象。我们群体中一位具有敏锐洞察力的成员娜奥米·赫斯科维茨这样描述道：“处于痛苦、悲伤中的人显然无法做客观的判断。他们要寻找一个造成这些痛苦与悲伤的人，而这个人就变成了他……人们看到我们在这里，而他们的至亲至爱不在这里，这对他们来说的确非常痛苦，所以他们必须找一个替罪羊来发泄。”卡斯特纳就这样成了发泄整个社会累积痛苦的替罪羊。虽然这并不公平，但蕴含着可悲的逻辑。赫斯科维茨再次强调：“卡斯特纳并没有杀人，他救人，他救了许多生命，但心理学是一个复杂的事情。”

卡斯特纳曾经期待在以色列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却被视为叛徒。对伊术的犹太人来说，英雄是一个为了自己的目标而进行武装战斗的男人，如果他在战斗中牺牲了，就会变成人们歌颂的烈士，但他绝对不能躲藏、卑躬屈膝或者寻求交易。卡斯特纳来自巴勒斯坦以外的地方，那里的犹太人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要一些诡计，当大屠杀降临在匈牙利的时候，卡斯特纳毫不犹豫地不顾个人安危，承担起了解救生命的重任。他没有采取人们理想中的英雄的方法，而是为了善良的目的进行斡旋与交易，如果这并不是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崇拜的战争英雄主义，那么这也是与其旗鼓相当的英勇行为。卡斯特纳用几句话向伊扎·卡特赛进行了解释，这些既不浮夸也不保守的文字更加具有说服力：“匈牙利被德国占领后，这里的情况简直令人绝望，人们无路可逃，没有人能够、愿意或者敢于做些什么，而我

做了，所以我是一个英雄。你可以说我是一个英雄，而且我是一个时势造就的英雄。”

当时的情况很特殊，因此卡斯特纳的解决办法也很特殊。虽然卡斯特纳的解决办法中充满了欺骗与谎言，但同样展现了极度的勇敢。“英雄”一词已经由于一些不加考虑的使用而贬值，不过我们卑尔根-贝尔森群体中的两名成员将该词用在了卡斯特纳的身上，我认为再合适不过了。伊迪特·哥德斯坦认为，华沙隔离区中的死亡虽然看起来更加壮观，但在死亡线上通过伪造文件、藏匿逃亡者、面对像艾希曼这般的魔鬼而试图拯救生命的人同样英勇：“他一次又一次地深入虎穴，为了拯救他人而冒着生命危险。即使他只救出了一个人，这也应该是伟大的成就，更何况他救出了成千上万人。在我眼中，他就是一个英雄。”欧文·黑尔珀的观点也是如此，卡斯特纳因他敢站在艾希曼的面前、敢做出生与死的决定而应该被人钦佩，不过使他成为真正的英雄的则是，当他本可以与妻子、家人安逸地待在瑞士的时候却毅然返回德国，因为他曾经承诺要解救犹太人。虽然无法否认卡斯特纳的鲁莽，黑尔珀还是公正地称赞了他的自我牺牲精神：“这绝对不是对刺激的渴望，这是一种献身、一种使命，我想象不到还有谁能够像他那样做。”在所有专业史学家中，胡达·鲍尔对此的总结最公正，他毫不吝惜地指出了卡斯特纳的一些缺点，不过他最终将卡斯特纳描述为一个“难以置信的英雄人物，他那无与伦比的勇气使他不费一枪一炮而做出了卓越的功绩。”

卡斯特纳并非孤身作战，要是没有诸如奥托·加莫里、乔尔·布兰德、奥第·毕斯这些人的贡献、没有汉斯·布兰德坚定不移的支持、没有梅耶那恼人但有益的谨慎，卡斯特纳就不会实现那样的成就。他们都有自己的缺点，虽然他们之间的关系远非亲密，不过他们一起与那些最恐怖的





家伙完成了伟大的交易。再一次引用鲍尔的话：“那些打开谈判之门的犹太人需要冒巨大的风险，包括个人的风险，也包括公共的风险。最终，我们的结论必须是他们做出了正确的事情，他们采取了唯一可能拯救生命的方法。与那些合理的想法相反，他们的这种方法真正救出了一些生命。考虑到当时的情况，他们不可能完全获得成功，但他们所做的是已经令人惊叹不已了。”

尽管如此，卡斯特纳以及他的伙伴能够做的仅仅只是沧海一粟。他们带来的微弱的光明被笼罩在无尽的黑暗之中。劳尔·希伯格对此进行了公正的分析，他承认了“瓦达”的功绩，但同时又提醒我们在那样邪恶的环境下他们能做的多么有限：“考虑到匈牙利犹太人的无能为力以及缺乏一切的外界支持，‘瓦达’的成就是了不起的，但与那灾难的程度相比，它的成就又是极其有限的。”

我不相信卡斯特纳是一个纳粹勾结者，不相信他背叛了那三名伞兵，不相信他为了获得解救几百名所谓的VIP的机会而出卖了匈牙利犹太人，不相信他为了帮助艾希曼平稳地开始驱逐而隐瞒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暴行。他的确在帮助比彻的问题上试图欺骗法庭，不过在今天看来，帮助纳粹军官并不像当时以色列人认为的那么可憎，况且，他这么做（至少部分）是出于其政治领导人的身份的考虑。对他在从数十万人中挑选几百名男女老少的过程中“扮演上帝”的指控也是不成立的，因为他将编制名单的任务交给了小型委员会，而且他们依据的是已经确定好的准则，而没有刻意干预编制名单的人。

有人或许会认为在纳粹导致的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不管名单是如何挑选出来的都不会令人满意，所以从逻辑上来讲，唯一的选择便是不解救任何人。这或许符合逻辑，但并不人道，而且这也不是卡斯特纳做事的方

法。如同我们卑尔根 - 贝尔森群体的一员亚瑟·斯特恩在一次采访中所述：“卡斯特纳在那样的条件下做出了正确的事情，因为拯救一些生命总比让他们全部死亡要好。”

无情的事实是，数百万人（其中包括我的大部分亲戚）被屠杀了，我却半个多世纪后的现在仍然活着。从超自然的层面来看，我不知道如此多的人死了而我为什么能够幸存。不过，为了保证我的神志正常，我不会对此进行猜测。从实际的层面来看，答案很简单，即我活着是因为卡斯特纳救了我。没有与其他人一起死掉，我或许应该感到内疚。我可以理解一些比我们遭受更多苦难的人们会憎恨我们，不过令我感到安慰的是，当我与我的父亲被允许进入到这个群体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故意霸占别人的位置。这个理论同样适用于卡斯特纳，虽然他拯救的人数的确微不足道，但他同样没有为了解救我们而将其他任何人送往地狱。有时，当他看到艾希曼进行驱逐的列车一天接一天地开往奥斯维辛的时候，他的挫折与痛苦一定也达到了几乎无法忍受的程度，不过，他非但没有向绝望屈服，而是竭尽全力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那些站在道德高地的人们或许会想，与邪恶进行妥协是否真的能够不影响自己的人格；那些追求绝对规则的人们或许会问，到底是让灾难顺其自然还是冒着脏了自己双手的危险而进行干涉更好。在我看来，这样的问题无法从理论上真正地回答，而只能由个人进行实际的检验才能够得到答案。我认为卡斯特纳并没有花费太多时间思考这些问题，当他的大多数犹太同胞们正在消极地等待自己命运的时候，卡斯特纳为他们挺身而出。其他人会在艾希曼面前颤抖不已，他却压抑着自己的恐惧，通过决心与狡猾从大屠杀主要的组织者那里获得了空前的妥协。是选择与邪恶进行交易，还是静观其变，斯特纳选择了他认为更加人道的前者，却因此而受到了残





与魔鬼的交易

——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

酷的惩罚。他或许没有救出他经常说的那么多人，不过毫无疑问，他救出了我们这 1670 人，而且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他还救出了更多人，那不公的审判以及暗杀真的不应该发生在他的身上。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与魔鬼的交易 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

作者=

页数= 2 4 6

出版社=

出版日期=

S S号= 1 2 6 1 9 8 2 6

D X号=

URL=<http://book.szdnnet.org.cn/bookDetail.jsp?dxNumber=&dxNumber=204018350E153ABB9B73FEB82B56715>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一章 反犹太人群中的犹太小孩

特兰西瓦尼亚的小镇

我的家庭

反犹太主义

第二章 匈牙利的大屠杀

黄金时代

衰落

灾难

犹太委员会

第三章 科罗日瓦隔离区

恐怖的砖厂

一次没有目的地的旅程

第四章 迈开最初的步伐

救济难民

开局策略

第五章 “生命卡车”

“布拉德任务”

在伊斯坦布尔的惨败

第六章 残酷的任务

卡斯特纳的双面性格

“诺亚方舟”

伞兵事件

斯特拉斯霍夫群体

第七章 从布达佩斯到卑尔根—贝尔森

运牛卡车上的生活

奥斯皮辛还是奥斯维辛？

令人尴尬的林茨之旅

恐怖的代名词——贝尔森

幸运还是不幸？

第八章 特权集中营中的生活

不同的待遇

自治

难得的文化活动

错综复杂的宗教信仰

铁丝网综合症

8月的名单

第九章 艰难的谈判

临时协议

无法兑现的承诺

真正的结果

第十章 从卑尔根—贝尔森到瑞士

如坐针毡

获救

第十一章 集中营解救行动

慎重的细节处理

伟大的时刻

第十二章 战后事宜

正名之争

卡斯特纳的宣誓书

备受争议的比彻

第十三章 审判

悲剧开始

诉讼升级

致命一击

判决

不公的审判

上诉及之后

第十四章 时势造英雄